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 | Studies on History and Thought

John Newton



〔英〕约拿单·艾特肯 (Jonathan Aitken) 著 张鹤译

奇异恩典 约翰·牛顿传



From Disgrace to Amazing Grac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逼真地重现了约翰·牛顿这位几乎被人遗忘的信心伟人，并确立了他在改变西方历史进程中应有的地位。

——罗伯特·拉普顿 (Robert Lupton)

写一部新的传记是对约翰·牛顿逝世和奴隶贸易废除200周年的最好纪念。废除奴隶贸易是威伯福斯的成就，而牛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书能深入到传主的内心世界，见解深刻，生动又不乏学术性，是传记大师约拿单·艾特肯的杰作。这部传记与传主一样，可谓充满了戏剧性。

——J.I.巴刻 (J.I. Packer)

恩典常常环绕在羞耻恶行周围……救赎之恩可以将那无法抹除的过去加以利用和改造，提供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这本书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

——杨腓力 (Philip Yancey)

From Disgrace to Amazing Grace

约翰·牛顿是历代最受人喜爱的圣诗《奇异恩典》的作者。本书讲述了他如何从一个堕落的水手成长为受人爱戴的牧师，从一个邪恶的奴隶贩子转变为英国废奴运动领袖，因着这样的经历，他成为了18世纪英国政治史和宗教史上影响和贡献重大的人物。书中还记述了牛顿与妻子波琳浪漫的婚姻以及与著名诗人考珀不寻常的友谊，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显明了恩典如何仿若流水，总是自高而下，涌流到最低处。

ISBN 978-7-5004-8703-6



9 787500 487036 >

定价：39.00元

奇异恩典

——约翰·牛顿传

[英]约拿单·艾特肯(Jonathan Aitken) 著

张鹤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 01-2010-52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异恩典：约翰·牛顿传/(英)艾特肯著；张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8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

ISBN 978-7-5004-8703-6

I. 奇… II. ①艾…②张… III. 牛顿, J. (1725~1807)—传记
IV. K835.61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2293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John Newton: From Disgrace to Amazing Grace
by Crossway Books.

Copyright © 2007 by Jonathan Aitke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U. 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 reserved.

责任编辑 陈彪
策划编辑 游冠辉
责任校对 刘晓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63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总序

本译丛选择现代西方学者的思想史研究经典为译介对象。迄今为止，国内译介西方学术著作主要有两类：一是西方思想的经典著作，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等等；二是现代西方思想家诠释西方思想史的著作，例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等。然而，国内学术界对基于专业专精于学术富有思想底蕴的学者型的阐释性著作却甚少重视，缺乏译介。这就忽视了西方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一维，也无益于西方思想史的真实呈现。西方学术界的实际情况却是相反：学者们更重视富有启发性的专业研究著作。这些著作本着思想的历史作历史的发微，使思想史的客观、绵延和更新的真实脉络得到呈现。本译丛希望弥补这一空缺，挑选富有学术内涵、可读性强、关联性广、思想空间宏阔的学者型研究经典，以呈献于中国学术界。

本丛书以“历史与思想”为名，在于显明真实地把握思想脉络须基于历史的把握方式，而不是着意于把一切思想史都诠释为当代史。唯有真实地接近思想的历史，才可能真实地接近历史鲜活的涌动。

本丛书选译的著作以两次地中海文明为基本视野。基于地中海的宽度，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传统多维交融、冲突转化、洗尽民族的有限性，终能呈现其普世价值。公元1世纪至6世纪是第一次地中海文明的发力时期，公元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则是西方文明的第二次发力。这两次文明的发生、成熟以及充分展示，显示了希

腊、罗马和基督教所贡献的不同向度，体现了西方思想传统的复杂、厚实、张力和反思力。本丛书所选的著作均以地中海为区域文明的眼光，作者们以整体的历史意识来显示不同时期思想的活力。所选的著作以此为着眼点，呈现社会历史、宗教、哲学和生活方式的内在交融，从而把思想还原为历史的生活方式。

主编 章雪富

2008年12月16日

序言

杨腓力(Philip Yancey)

恩典仿若流水，总是自高而下，涌流到最低处。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像约翰·牛顿(John Newton)那样如此完美地体现这一原则。那首可能是历代最受人喜爱的圣诗《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就出自他手。这首写于大约230年前的赞美诗，历经岁月沧桑，依然传唱至今。茱迪·柯林斯(Judy Collins)录制该曲后，发现它竟然在排行榜的30首歌中名列榜首。伟大的米哈利亚·杰克逊(Mahalia Jackson)在民权集会上演唱过它，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把它当作监狱巡访中的一个节目，我们在许多庄重的场合，比如国葬仪式上，还听到过它的长笛演奏版。

本书讲述了这位圣诗作者早年经历的种种磨难。被迫加入皇家海军后，约翰·牛顿试图潜逃，结果惨遭毒打，因为不顺从被除名，不久即开始了贩奴船上的生活。即使在那些品德恶劣的同伴当中，牛顿也是有名的擅长恶语咒骂的人。在美洲最黑暗最残酷的奴隶制时代，他在一艘贩奴船上做工，并最终成了一名贩奴船船长。

一次惊险的海上航行，戏剧性的转变将他引向了寻求恩典之路，不过持续的时间不长。靠岸时，他写下了《耶稣之名何等甘甜》(How Sweet the Name of Jesus Sounds)这首赞美诗，同时却在等着下一艘满载非洲黑奴的船只到来。后来他说，直到有一天他在船上大梦初醒后，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

当牛顿放弃了贩奴生意时，他遇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障碍。神学学习结束后，他曾向圣公会、循道会、长老会和独立派教会申请过神职，接连遭到拒绝。一直到7年之后，英国圣公会才授权他牧养一个教区。

我曾参观过英国奥尼（Olney）小镇那座美丽的石头教堂，牛顿就是在那里开始他的牧师生涯的。那是一个远离散发着臭气的贩奴港口的风光旖旎的乡村。他从未忘记过也从未否认过那随之而来的一切印记令他产生的羞耻不配感。搬到奥尼不久，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一群属于你的孩子中，你给了一个背弃信仰的人以名字和存身之地，你召唤一个不信的人做传福音的牧师。我曾经何等穷乏可耻，赤身露体地漂泊游荡，没有家没有朋友；我常常四处奔走，周围的人待我如狗，你却预备了一个适于与人相交的家，让我居住在里面。”

在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和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等知名人士的扶持下，牛顿成为一个奋兴的福音派布道家，并最终成为废奴运动领袖。他热心帮助一位饱受忧郁之苦的青年诗人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后者因精神疾病自杀未遂，牛顿在这期间一直服侍照顾他。（在奥尼镇的“考珀和约翰·牛顿博物馆”里仍然保存着两个人友情的记录。）与此同时，牛顿还是著名政治家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属灵导师。威伯福斯在大英帝国为废奴议案奋斗了40年，牛顿极力劝勉他不要放弃这种努力。他自己也曾以无可辩驳的亲历者身份在会议上见证了奴隶贸易的可怕与反人道。从牛顿与患忧郁症的天才诗人及富有的国会议员之间的两段友谊中，可见其交往的广度和影响力。

他后来到伦敦一座著名的教堂任教区牧师，在那里，他与当时的许多贵族结下了友谊。在他的一生中，“拯救像我这样罪人”的恩典始终伴随着他。牛顿的各种成就为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赢得了一席之地，在他去世两个世纪之后，他的威望一直延续到今天。牛顿最近被选入“福音音乐名人堂”（Gospel Music Hall of Fame），并成为2007年摄制的一部关于威伯福斯的电影《奇异恩典》中的一个角色，由阿尔伯特·芬尼（Albert Finney）扮演。也许最具象征性的表现是塞拉利昂（Sierra Leone）有一座小城被命名为“牛顿”，那里是他过去停泊贩奴船的地方。

牛顿在生前面对过许多来自他人的反对、蔑视和苛评。有些人不满于他的传福音的热情，有些人指责他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帮助朋友威廉·考珀缓解痛苦上，还有些人嘲笑他投身于废奴运动就是为了减轻他对过去行为的负罪感。牛顿从未打算为自己辩护，而只是指出他所拥有的任何美好莫不出于上帝的奇妙恩典。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折不扣地坚持着圣经的传

统，因为那些伟大的英雄中也包括谋杀犯和通奸犯（大卫王）、叛徒（使徒彼得）和迫害基督徒的人（使徒保罗）。恩典常常环绕在羞耻恶行周围。

下面我要谈谈本书的作者约拿单·艾特肯（Jonathan Aitken）。尽管许多美国读者对他还不太熟悉，但在英联邦，他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不久以前，在英国的各类小报上，他的名字占据了通栏标题。在约翰·梅杰（John Major）任首相期间，人们常常提到他，认为他是大有希望的继任者。他来自一个声名清白的家族，他是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的侄孙，他的父亲是一位下议院议员，祖父是一位男爵。他在国会获得了议员席位，随后在约翰·梅杰手下担任财政大臣。一场突变遽然发生，他被指控犯罪，经过一番激烈的反驳后，他承认犯了伪证罪，被判入狱服刑 18 个月。因为无力支付审理的费用，他宣布破产，不久离婚。

英语中有一个奇妙的短语，叫做“从恩典中失落”（fall from grace）。那个时候，人们常将此语用在艾特肯的身上。事实上，同约翰·牛顿一样，这更像是“落入恩典之中”。艾特肯发现，在绝望之谷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朝向拯救之路的。他的朋友查克·寇尔森（Chuck Colson）深明此理，在查克充满仁爱怜恤的引导下，艾特肯利用在狱中的时间研读圣经，学习希腊文，出狱后在牛津大学攻读神学。

直到今天，我在英国的朋友们仍然对艾特肯满腹疑虑。归信是这么容易实现的吗？他曾在通栏题目里被醒目地贯以“说谎者”、“可耻”和“丢脸”等字样，现如今，他的书稿能够把他从往日的名誉扫地中拯救出来吗？艾特肯在自传《傲慢与伪证》（*Pride and Perjury*）中对此有所陈述，书中收录了一些曾经支撑他走过那段低谷时期的诗篇与祈祷。和牛顿一样，艾特肯并未在自己的过去面前一蹶不振，反倒在奇异的恩典中回归，这恩典拯救了像他一样的可怜罪犯。救赎之恩可以将那无法抹除的过去加以利用和改造，提供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这本书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因为恩典仿若流水，总是自高而下，涌流到最低处。

致谢

诚挚地感谢所有帮助我查询、预备和创作这本有关约翰·牛顿新传记的人们。

我最应感谢的是我的首席研究员和顾问玛丽莲·劳斯（Marylynn Rouse）。她是约翰·牛顿项目（JNP）的负责人，这是一项专门致力于搜集和保存牛顿各方面文献材料的慈善基金会。没有玛丽莲·劳斯的学术指导和精神鼓励，我根本不可能发现并认识到许多未出版文献的重要价值，而正是它们使本书变得丰富多彩。因此，我要感谢玛丽莲，而且我对她长期投身于记录约翰·牛顿的生活和成就的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本传记题献给她。

我也要感谢 JNP 的助理和理事专家们，他们是：约翰·朗格洛斯（John Langlois，主席）、托尼·贝克（Tony Baker）、马丁·汉斯（Martin Hines）、迈克·史威斯（Mike Swales）、马尔科姆·特纳（Malcolm Turner）和罗伯特·沃森 [Robert Watson，约翰·牛顿的密友威廉·布尔（William Bull）的第四代外孙]。我与这些优秀的牛顿专家们进行共同或个别讨论，这群出色的助理为我的主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此外，我还特别要感谢阿历克斯·戴维斯（Alex Davis），这位天才的青年诗人现在谢菲尔德大学研读英语语言文学，本书有关奴隶贸易和威廉·考珀的章节中许多出色的叙述都出自他的手笔。

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好友拉尔夫·威尔曼（Ralph Veerman）不断地鼓励劝勉我，他同时也是我在美国的文稿代理人。他使美国人不断增加对约翰·牛顿的兴趣，对他的友善与理解，我深为感激。

此书的打印稿与再印稿是个沉重的负担，这由一个勤劳而特别的秘书团队完成。她们是杰姬·科特雷尔（Jackie Cottrell）、海伦·帕尔默（Helen Palmer）、卡蒂·查尔斯（Katie Charles）、罗兹玛丽·古汀（Rosemary Gooding）、玛格丽特·威金斯（Margaret Wikins）和普鲁·福克斯（Prue Fox）。海伦·柯克帕特里克（Helen Kirkpatrick）带领并组织这个优秀的团队。我要向她们每个人表达我真挚热切的感激之情。

最后，我特别要感谢委托出版该传记的出版商——Continuum 的罗宾·贝尔德·史密斯（Robin Baird Smith）和 Crossway 的艾尔·费舍尔（Al Fisher）。Continuum 的出版团队由本·海斯（Ben Hayes）和安亚·威尔逊（Anya Wilson）带领，他们在日程安排紧张的压力下负责图片和终稿的编辑工作，我要向他们表达赞美与感激。

任何一位传记作者在重评其笔下著名的传主时都要对前几百年间走过同一条路的传记作家们表示感谢。因此，我要对从前所有创作和研究有关约翰·牛顿生平与工作的作者们表示感谢，特别感谢约西亚·布尔（Josiah Bull）、理查德·塞西（Richard Cecil）、布莱恩·爱德华兹（Brian Edwards）、伯纳德·马丁（Bernard Martin）、约翰·波洛克（John Pollock）、斯蒂夫·特纳（Steve Turner）和布鲁斯·汉德马什（Bruce Hindmarsh）。

最后，我满怀爱意地感谢我的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她以极大的耐心忍受着有关牛顿的资料如山一样不断地增高，如河一样地绵延不绝，最终形成了家中的一道风景。她对这道风景不乏精彩评论，她对初稿颇富智慧的洞察与鼓励对我甚有帮助。

我诚挚地感谢上面提到的所有人，他们帮助我在约翰·牛顿生平事件的长河里畅游，但我要明确地指出，我是独自掌舵，所以书中的每一个判断、意见和结论都由本人负责。

前言：约翰·牛顿简介

约翰·牛顿是谁？这个问题在两百年前几乎不需要回答。因为在那个年代，牛顿的故事，其光荣与耻辱的种种细节都尽为人知，它是 18 世纪那些最轰动、邪恶、属灵、浪漫、影响巨大且历史意义重大的传奇故事之一。

在牛顿个人旅程的沙滩上，他留下了两行鲜明的足迹。他凭着一己的良知参与政治活动，帮助威廉·威伯福斯推动废奴贸易运动。从两位社会活动家许多未出版的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合作对废奴运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约翰·牛顿在改革政治运动中地位非凡，但在改变世人的精神信仰方面，其作用却更为重要。他经历的比传奇更传奇的归信使其从一个邪恶堕落的奴隶贩子变成了一位获得重生的福音传道人，这让他成为许多福音派基督徒的标志性人物。作为一位畅销书作家、传道人和圣诗作者，他赢得了唯有 18—19 世纪信仰大复兴运动发起者才会获得的景仰。那场信仰复兴和牛顿的不朽贡献对我们当代社会中福音教会的全球化增长仍然具有极强的推动力。

不过，虽然约翰·牛顿在政治史和宗教史上的贡献重大，但非常遗憾，今天大多数人对他已经一无所知。如果说他曾经渗透到 21 世纪大众的意识当中，那是因为人们只把他当作那位《奇异恩典》的作者，这首歌是美国演唱和录制得最多的属灵歌曲。但除此以外，如今在大街上甚至在书店里随便提问，几乎没有人知道约翰·牛顿是谁了。当我和一位通常被认为见多识广的朋友谈及我要写一本牛顿的传记时，他问我：“你肯定自己有能力应对他的物理和数学知识吗？”我对他的问话深感惊讶，显然他

把约翰·牛顿当成那位同名的艾萨克·牛顿先生 (Isaac Newton) 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在我们这个世俗化时代，牛顿已经被遗忘到何等地步。

约翰·牛顿在他的时代其声名远超过那位发现地心引力的艾萨克·牛顿，也许这是因为只有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才可能关注到《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的作者，而成千上万的人则对约翰·牛顿自述的那个“大罪人”产生认同。他的爱情故事、贩奴生涯、归信的传奇、圣诗创作的故事和 50 年以基督为中心的服侍生活共同构筑了一部在当时引人入胜且令人大受启迪的个人史诗。

在废奴运动胜利 200 周年之际，重新评估这部个人史并将其命名为《奇异恩典——约翰·牛顿传》(*John Newton : From Disgrace to Amazing Grace*) 似乎颇为恰当。本书以简洁的速写再现牛顿暴风骤雨般生活经历中的那些巅峰与低谷。

牛顿的早年生活真是充满羞耻。他是一个任性鲁莽、暴躁易怒的年轻人，在任何时候都与权威对抗，做出种种愚蠢之事反对父亲。18 岁时被强征入伍，进入皇家海军服役，他触犯军规，不计后果，结果因为潜逃被当众鞭笞。在“痛苦的愤怒和忧郁的绝望”中，他在自杀还是谋杀船长之间举棋不定。仅仅因为他单恋着 13 岁的表妹——他在查塔姆看到的波琳·卡特莱特 (Polly Catlett)，才使其没做出破坏性的冲动之举。

在马德拉岛，他作为交换品从战舰登上一艘贩奴船，但在那里，他的性情更为粗野狂暴。他说：“我邪恶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自己做罪魁，而且还利用所有机会引诱、怂恿他人犯罪。”他日后展现出来的圣诗创作天分此时微露萌芽，他写了一首贬损新船长的歌儿教给所有船员唱。因为他不断地惹事生非，最后只好匆忙离开贩奴船，开始下一步的生活，为一位在塞拉利昂做陆上贩奴生意的商人工作。在那里，他依然沉溺于种种恶习——包括巫术——之中。因为被诬告偷窃，他遭到雇主的黑人情妇的虐待，这位部落公主给他戴上铁链，不让他吃饭，粗暴地对待他。一位从利物浦远航至西非的船长解救了他，因为牛顿的生活当时已经大有改善，他一开始拒绝了对方带他乘船回家的建议，但渴望再见波琳的心愿终使他回心转意。

在返回英格兰的长途旅程中，牛顿故态复萌，重又变得惹事生非。尽管他曾由一位信仰虔诚的基督徒母亲抚养，但她在他 6 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牛顿长大后便成了一个大胆妄为的无神论者和亵渎神灵的人，连同行

的水手们都对他的谤渎之词深感震惊。行至大西洋中部，因着旅途无聊，他顺手拿起船上唯一能看到的书来读，那是托马斯·厄·肯培（Thomas à Kempis）的《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他一边读着，一边开始忧虑那些话倘若是真的当如何是好；而后他合上书，开始睡觉。一声尖叫惊醒了他：“船要沉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骤然临到。

从船体的破洞涌进来大量海水，大船似乎就要沉没了，牛顿此时惊恐异常，他开始祈祷：“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经过几个小时的危机险境，风暴渐渐平息，牛顿才松了口气。他说：“这一次，我开始知道，有一位听祷告的上帝。”牛顿几乎是立刻就停止了诅咒，改变了先前轻浮放纵的生活方式，开始祈祷和读经。从1748年3月21日那天开始，直到1807年去世，牛顿从不曾有哪一年忘记过在其归信的“伟大的转折日”里，向上帝表达真诚的感恩之情。

牛顿的归信充满了挣扎，有前进求索，也有摇摆游离。为了能够迎娶波琳，他需要展现出赚钱养家的大好前途，于是他重回海上去做贩奴生意。在1748年至1754年之间，他四次远航非洲，其中三次担任贩奴船船长。

牛顿在日记、书信和航海日志中记录了18世纪中叶贩奴贸易所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它们成为这段历史中最真实的证据之一。当时，他对自己参与的这场商业活动之可恶和非道德的本质还不太清楚；许多年之后，他才对此深感懊悔和痛恨。不过，在他做贩奴船的总指挥时，他对这项贸易活动中深藏的残忍野蛮已经逐渐生出厌恶。与大多数运送奴隶的同行船员不同，牛顿显示出自己是一位特别人道的船长。1754年，他从非洲航行至加勒比海，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远航，船上没有一名奴隶或船员死掉。在那种认为在“中间航道”（middle passage）^[1]的旅程中死掉几个船员或者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关在底层甲板上的奴隶纯属正常的时代，牛顿的做法可算异乎寻常，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人道主义的成果吧。

1754年，29岁的牛顿因个人的健康问题放弃了贩奴生意，当时他已经和波琳结婚了。他们彼此相爱的婚姻关系堪称典范，这场婚姻持续了40年，直到波琳去世。在一开始，他们两个人都算不上是典型的基督徒，但牛顿不断地寻求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建立构成了他生平故事的关键性章节。这个过程涉及许多著名的牧者、导师和传道者，这其中包括循道会的领袖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和约翰·

卫斯理 (John Wesley)。他们偶尔会分别到利物浦来传讲福音，当时牛顿在那座城市做稽查主管，这个海关公务员职位允许他拿出大量的空闲时间认真热切地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

在将近 33 岁那年，牛顿听到了上帝让他全职服侍的呼召。为了测试自己的职业能力，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详细的自测项目，包括阅读、设立高标准的行为准则，他把它们记录在那本迄今仍未出版的日记《有关重要问题的遐思与疑问辑录》(*Miscellaneous Thoughts and Enquiries Upon an Important Subject*, 1758) 中。在这卷文件中，牛顿对自己完成整个过程描述的态度之认真、成熟和谦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内容可以进一步地参阅本书第 21 章。在当代，任何一位申请圣职的候选人都能够通过研究 250 多年前牛顿的职业自测方法获益颇多，因为对于一位渴望上进的牧师来说，牛顿的《遐思录》是现存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神学和属灵的试金石。在获得授命之后，他在文稿中总结了自己的目标：“只有知道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才能够宣告，对于罪人，他具有深不可测的丰富……全部的重点都落在强调他的位格和他的身份之荣耀，他的奇妙大爱和谦卑俯就，他的能力、信实和甘愿付出以拯救，其工作之伟大、其榜样之完美，还有他的生活、情感、死亡与复活。”

当牛顿准备回应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呼召受命圣职时，他却发现前面有重重阻碍。在此后的 6 年里，他不断地遭受到来自英国圣公会的主教和大主教们的一个又一个拒绝。他的麻烦源于人们怀疑他是可恶的“狂热派分子”，在圣公会内部，这种代称表明对循道会派信徒的评价颇为不公。

牛顿对循道会派、独立教派和浸信会信徒的确怀着同情，许多年中他一直听这些教会的传道人传讲福音，但他感觉自己的职分是在英国圣公会里，尽管它并未感觉要呼召并接受他作牧师候选人。最终，是达特茅斯伯爵的介入才使牛顿摆脱了被基督教会排斥的境况。达特茅斯伯爵是一位虔诚的贵族，他的福音派倾向使其获得了一个绰号——“圣诗歌手”。他很尊敬牛顿，为他提供了奥尼附近的达特茅斯乡村住宅，受其监管的生活费用，并劝说当地主教为达特茅斯地区的牧师候选人授职。正如历史学家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对这个事件的总结所言：“达特茅斯伯爵对高派圣公会地区施加影响，因此赢得了约翰·牛顿的任命权，牛顿因其对信仰的过分执著认真让人无法轻易地相信他能够教导它——除非此事能得到一位大人物相助。”

到达奥尼后，牛顿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位出色且富创新能力的教区牧师。他使主日参加教堂礼拜的会众人数增加了三倍，达到 600 人；他为儿童和成人开办圣经学习班；探访教民和布道使他的日程表安排得满满的，他的讲道吸引了邻近小镇和乡村的听众。有些人从伦敦赶来听牛顿布道，其中就有威伯福斯家族成员，包括还是小学生的威廉·威伯福斯。

牛顿因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而获得更高的声望。他的自传《真实的叙述》(*An Authentic Narrative*) (1764) 成为国内外的畅销书，并被看作是归信文学的经典之作。尽管在《真实的叙述》之后他还创作过其他大获成功的作品，但其身为作家的最高成就是他在朋友威廉·考珀的激励下创作圣诗，后者是公认伟大的英国诗人。

考珀搬到了牛顿牧养的奥尼教区。他们的友谊亲密而富创造力，在牧养事工和圣诗创作上共同协作。但考珀在 1773 年患了精神疾病，几次自杀都因牛顿突然介入而受到阻止。因为朋友患病，牛顿只好独自完成当初共同努力创作的赞美诗集。因此，《奥尼赞美诗》(*Olney Hymns*, 1779) 中的大部分圣诗都出自牛顿之手，其中包括《耶稣之名何等甘甜》(*How Sweet the Name of Jesus Sounds*)、《有荣耀的事乃指你言》(*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 和那首广为流传的名作《奇异恩典》。牛顿如何创作这些圣诗以及《奇异恩典》如何成为美国音乐史上最流行的属灵歌曲也是其生平故事中引人入胜的章节。

在奥尼生活的 16 年间，牛顿的书信、日记和祈祷词都记录了他在许多危急时刻的内心经历，那些时刻包括考珀企图自杀、波琳深受重病折磨危在旦夕和村民对副牧师的反感等等。日记中写满了令人感兴趣的历史素材，比如牛顿对 1776 年美国反殖民独立战争的支持，对此，他还曾被迫进行自我辩护。

1780 年，约翰·牛顿由于朋友和赞助人约翰·桑顿 (John Thornton) 的影响调往伦敦市金融区中心圣玛丽伍尔诺斯任教区牧师。

像在奥尼一样，牛顿身为传道者的名气很快使教堂人满为患，他吸引了其他教区和教派的会众来参加敬拜。他仍继续开展创作事工，与广泛的人群通信，以神学专栏作家的身份提供建议。这些书信深受欢迎，牛顿最后把它们编辑成畅销书信集。他创建的“折衷派社团” (*The Eclectic Society*) 是一个青年牧者和虔诚上进的平信徒进行讨论的小组，他作为一位属灵智者的名望因此得到提升和巩固。小组中好几个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

宣教士和福音派传道人。牛顿在未出版的文字材料中记录了自己对折衷派社团论题的提议，由此可见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对教会未来的领袖们具有的持久的影响力。

牛顿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经历的最辉煌的时刻在 1785 年 12 月一个寒冷的夜晚，那天，威廉·威伯福斯请求与他进行一次秘密会谈。这位时年 24 岁的赫尔国会议员陷入了精神危机，他意欲中断大有前途的国会议员的政治生涯进入教会服侍。牛顿强烈建议这位年轻的朋友不要退出政界，反而要留在下议院，以一个基督徒政治家的身份来服侍上帝。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位资深的牧者给一位大有潜力的圣职候选人提供的建议。倘若牛顿赞同威伯福斯的想法，认为他应该离开政界进入宗教界服侍会发生什么事呢？英国的政治和国会历史都会遭受损失，最主要的是会让废除奴隶贸易运动遭到破坏。

这场至为关键的谈话之后，牛顿在日后的岁月中成为威伯福斯的属灵导师。他们的友谊在各自的书信和日记中得到完整的记录（参见第 41—42 章），并成为重要的政治和属灵事件。牛顿对奴隶贸易的深入了解和他迟来的基督徒的良知反省都对威伯福斯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1787 年 10 月 28 日，威伯福斯与牛顿单独交谈了很长时间，漫长的一天结束之后，他在日记中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全能的上帝在我面前放下了两个伟大的目标：制止奴隶贸易和进行道德改革”。

牛顿在枢密院、下议院特别委员会及那本令人动容的小册子《对非洲奴隶贸易的思考》（*Thoughts Up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1788）中对奴隶贸易进行了公开举证，这使他成为威伯福斯废奴事业的重要盟友。只需想象一下就能明白，当牛顿讲述一位他熟识的贩奴船长如何残酷地虐待奴隶时，他的描述将对公众舆论产生何等影响：

惩罚那些被他判了死刑的可怜的奴隶有两种办法，我至今难以忘却。他把那些人绑到一起，把其中的一些人切成一块一块的肉，也就是先用一把斧子砍下他们的脚，接着是膝盖以下的小腿，然后是大腿；再用同样的方式砍他们的手，然后是肘以下的手臂，再然后是肩膀，直到整个身体只剩下一段躯干，仿佛被削掉所有枝叉的树干；最后，砍下他们的头颅。在整个过程中，他不断地把那些发出恶臭气味的四肢和脑袋扔到那群瑟瑟发抖的奴隶中间，他们被用铁链锁在主甲板上。他用一根细细的软麻绳捆住其他奴隶的脑袋的上半部，水手们

把这称之为找点，这一点使绳子松到恰好可以塞进一根短杆，通过他不断地转动短杆，绳子会越勒越紧，直到最后把他们的眼珠勒出来，当他厌烦了对他们的折磨后，便砍掉他们的头。

牛顿和威伯福斯不但共同为废奴运动而战，他们更因一些相对来说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事业而并肩合作。他们经常一同参与基督教福音事工，比如帮助牛顿推荐的那些年轻牧师建立教会、赴海外宣教等。其中一件事是：1787年，牛顿极力督促威伯福斯向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请示，派遣一位官方专职牧师随第一舰队遣送罪犯赶赴澳大利亚博特尼湾流放地。这次游说取得了成功，牛顿提名的理查德·约翰逊牧师（Rev. Richard Johnson）成为澳新地（Antipodes）第一位基督教福音牧师。牛顿当时颇有预见性地写信给威伯福斯说：“有谁能告诉我们，因约翰逊先生远赴新荷兰（即澳大利亚），将会发生何等重要的事呢？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是件小事。一块奠基石与矗立其上的大厦相比是极其微小的，但它却是整个建筑的开端和保证。”

通过圣玛丽伍尔诺斯的讲坛，牛顿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影响。他以非同寻常的能力布道和巡游。有时他承担重要的福音布道事工，如借亨德尔（Handel）一百周年诞辰纪念会演出《弥赛亚》（*Messiah*）之际，牛顿在宣叙部、咏叹调和大合唱之间连续布道50场。他还定期在国内的小镇与城市之间巡游，为那些渴慕福音的人们传道。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指出，在半个世纪里，教会中的福音派牧师已经由100位增加到了400多位。牛顿自己在这场大复兴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为后世留下了典范与遗产（详细分析可参见结语一章），其中一个就是他对福音运动的推进使之从英国社会信仰的边缘进入主流。今天，这股潮流仍然在国内和国际涌动。

这部传记对约翰·牛顿进行重新评价依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其日记和祈祷簿的历史研究。它们表明他忠心于主，是耶稣基督的真正仆人。21世纪的读者从其私人祈祷的内部所看到的远比18世纪那些心怀崇敬的旁观者从其众所周知的事工的外部研究中看到的更具说服力。终其一生，牛顿在自己漫长而影响深远的公共生活中都是一位受人瞩目的人物，他一直是一个忠实、谦卑和感恩的人。他的忠实是上帝的信实使然，他的谦卑源于其身为不配获救的罪人的真实感，他的感恩出于他在那首不朽圣诗中所言——“如我可怜罪犯”却竟然能够获得上帝的“奇异恩典”，他对此怀有无限感激。

约翰·牛顿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表达了使其成为一位深具影响力的传道者的属灵境界，弥留之际的牛顿说：“我是大罪人，但基督是大救主。”他依靠这些言词背后的力量，不但改变了自己，而且也改变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宗教、政治和社会，而这正是本传记的主题。

注释

[1] 指旧时自非洲西海岸至西印度群岛或美洲贩卖黑奴的大西洋中央航线。——译者注

目 录

序言 杨腓力	(1)
致谢	(5)
前言：约翰·牛顿简介	(7)
1 灵性培养	(1)
2 初恋与首航	(7)
3 被迫服役	(13)
4 鞭笞与降职	(18)
5 交换	(22)
6 为奴在非洲	(26)
7 获救灰狗号	(31)
8 惹是生非与亵渎神明	(35)
9 死荫之旅	(39)
10 船上浪子	(43)
11 爱情与船主	(46)
12 布朗罗号的远航	(51)
13 书籍、肉体与灵魂之争	(56)
14 与波琳结婚	(60)

15	阿盖尔公爵号船长	(64)
16	非洲号首航	(71)
17	航海生涯结束	(76)
18	失业、灵感与祈祷	(81)
19	循道主义与物质主义	(86)
20	利物浦的生活	(90)
21	圣职呼召	(95)
22	第一次遭拒	(101)
23	疑虑重重	(106)
24	《真实的叙述》	(112)
25	终获任命	(118)
26	奥尼的第一印象	(124)
27	教区牧师	(129)
28	迁居的压力：与波琳一同祈祷	(135)
29	祈祷与《教会史》	(139)
30	与考珀的友谊	(144)
31	创造力与危机	(151)
32	《奇异恩典》	(160)
33	《奇异恩典》的影响	(167)
34	赢得友谊和影响大众	(173)
35	卷入政治？	(183)
36	家庭生活与健康烦恼	(188)

37	离开奥尼	(194)
38	到达伦敦	(201)
39	家庭、朋友和《辩护书》	(207)
40	折衷派社团与《弥赛亚》	(215)
41	威廉·威伯福斯的导师	(222)
42	与威伯福斯通信	(229)
43	废奴运动参与者	(237)
44	波琳去世	(245)
45	暮年与余响	(252)
46	大罪人与大救主	(259)
	结语:约翰·牛顿的遗响	(264)
	参考书目	(269)
	缩写语的常用来源	(277)
	原始资料和传记注释	(279)

灵性培养

俗语说“孩童乃成人之父”，这句话用来表达约翰·牛顿的童年经历再贴切不过了。他的童年充满着动荡与不幸。年仅6岁，他的母亲就去世了。父亲长期不在身边，他对父亲一直是恭敬有余亲密不足。不过，即使有这些问题，这个孩子还是从父母双方那里继承了他们的性情、价值观和信仰。尽管在早期生活中，他远离所受的教育，几入歧途，正如他在那首著名的圣诗中所写的——“经过许多危险/试炼/网罗”，但自1725年7月24日诞生于伦敦到82岁去世为止，约翰·牛顿从父母那里获得的品格在他的一生中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725年7月26日，出生两天后，牛顿在一间不从国教的小教堂（Dissenting chapel）受洗，这座小教堂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北岸威坪的老石头街独立会议厅。他用的是父亲的教名约翰，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船长，是地中海著名商贸船上的首领。约翰的妻子伊丽莎白是老石头街教堂的教友。他们住在威坪的红莱恩街上。这所教堂的牧师是大卫·詹宁斯先生（David Jennings），他就住在与牛顿家相隔两户的地方。事实上，詹宁斯和牛顿这两家住得如此近，足以解释为什么小教堂会对约翰的童年时代产生那么重要的影响。

约翰·牛顿船长在儿子的早期成长教育中所起的作用不是太大，因为他常常在海上漂泊。18世纪，在地中海上的航行需要船员长期委身，牛顿船长通常一出海就是几个月。他回家时就是一位严厉的父亲。他要求儿

子要么不说话，要么开口就称呼他为“先生”，要求儿子在自己的面前时时刻刻表现出绝对的顺服、听从和恭敬的态度。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父子关系很正常。如果说牛顿船长对小约翰的态度似乎太一本正经，那可能是由于他在西班牙所受的教育使他用一种自己熟悉的方式教育儿子，而不是按照内心的情感来培养他。不过，正如后来发生的事情所显示的，每当约翰行为粗野、犯错误时，船长都表现出他是一位不乏舐犊情深的宽容的父亲。

老约翰·牛顿的家族背景和祖先历史几乎没有多少记录，不过，他的生活中的一些事例表明，他是一个性情淡漠、刚毅倔强又不乏魅力的人。他的儿子说：“他坐在四轮马车里，总是看着远方，一脸的严肃，让我心生畏惧和自卑。在他面前，我总是瑟瑟发抖。”老约翰的这种令人敬而远之的态度要归因于他在西班牙耶稣会所受的教育，那里有天主教改革运动中著名的信仰教育修会，其建立者罗耀拉的伊格纳修（Ignatius of Loyola）有一句名言：“把男孩交给我，到了7岁，我将还给你一个男人。”不管这句名言是否正确，在几百年间，它表达的哲理一直是耶稣会的教育基础。尽管老约翰·牛顿在塞尔维亚的耶稣会学院度过几年时光，在他的时代受到最重要的天主教教育家的培训，但他仍然拒绝成为一名天主教徒。由此，我们倒是可以对他的个性进行一番有趣的观察。在他的一生中，他对宗教事物始终保持沉默，但像一个新教徒那样持守自己的信仰，他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却不喜欢教会的仪式。

从对其个性的简单了解，我们可以猜想到，约翰·牛顿船长是一个见过世面、颇有教养的人，有自己的想法且毫不妥协地坚持到底。当他把内心的思想和情感都隐藏在冰冷的外表之下时，这或许让他成了一位不易亲密相处的父亲。不过，他在多年航海指挥生涯中形成的坚强的个性和高高在上的态度很容易就赢得了儿子的尊敬，尽管这种尊敬中不乏畏惧的成分。

孩童时期的约翰·牛顿与母亲伊丽莎白的关系要亲密得多。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人，父亲西蒙·斯凯特利夫（Simon Scatliff）是伦敦东部一位数学仪器制造商。伊丽莎白专心致志地以基督信仰来养育和教导她的独生子。她每天拿出许多时间和儿子一起读书，往往带着一种迫切之情，也许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吧。她从自己的咳嗽和痰液中看出自己患了痨病，即肺结核。在当时，这种致命的疾病比今天的癌症

更让人恐惧。

伊丽莎白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她将小约翰塑造成为一个出色的小学生。他心智聪颖，记忆超群。牛顿后来回忆说：“我4岁的时候，除了非常难的生字外，已经能像现在这样阅读了。”他把这归功于母亲“用圣经的许多珍贵片断和章节、教理问答、圣诗和诗歌”对他进行的心智启蒙。他的记忆才能包括记住1647年的《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中许多问题的答案，还有艾萨克·沃兹（Isaac Watts）先生在1732年出版的《圣经历史全景概览》（*A Short View of the Whole of Scripture History*）中的回答，其问答形式是专为“少年和具一般阅读程度的人预备的”。

这种死记硬背的艰苦学习有可能让牛顿变成一个枯燥乏味的孩子，如他自己所言，他“总是呆坐不动，从不外出活动和游玩”。也许他根本没时间放下功课跑出去和威坪那些邻居家的同龄孩子欢声笑语地做游戏，无法和他们一起沿着泰晤士河敲鼓、滚圈儿、舞棍子。要记住沃兹和《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的长篇大论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都是件很费力的事，更何况一个还不到6岁的孩子。事实上，牛顿在如此小的年龄就能达到这个地步，说明他的智力早熟，擅长复述，有很好的记忆天赋。

有三个重要人物曾对约翰·牛顿的童年产生过属灵影响。第一个人是他的母亲伊丽莎白。她虽身体孱弱，却是一位信仰坚定的女性。身为老石头街不从国教教会的虔诚会友，她对圣经和改革宗神学的内容都很熟悉。她热切地期望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能超越他的航海的背景，成为一名牧师。牛顿回忆说：“母亲告诉过我，打我一出生，她就在心里把我奉献出去做牧师了。我长到适龄入学的时候，就被送到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接受教育。”仔细寻看约翰·牛顿的一生经历，会发现这位母亲的愿望得到了完完全全的实现，这的确很有意思。牛顿本有可能成为一名苏格兰的加尔文宗牧师，因为这是18世纪圣安德鲁学校的神学教育方向。但是，牛顿自学的神学理论使他拥有了更为宽容和超宗派的心胸与眼界。在晚年，这种态度让他身为一位布道者、圣诗作者和畅销书作家而对更多的听众读者具有一种感召力，这远比一名心灵狭隘而严苛的苏格兰加尔文主义者做得更多。

伊丽莎白·牛顿太太和她的儿子经常受到邻居大卫·詹宁斯的属灵指导，他是老石头街小教堂的牧师。像大多数独立派教会的带领人一样，他

每个礼拜日早晨布道至少一个小时，详细阐释圣经章节片断中的“道”。牛顿深受詹宁斯布道的激励。1730年某个礼拜天早晨的布道可能对小约翰·牛顿产生了尤为特殊的影响，他当时坐在小教堂里，听詹宁斯讲解圣保罗的《腓利门书》（这篇信息后来收入他的《写给年轻人的布道集》一书中），这位使徒为了一个逃跑的奴隶阿尼西母特意写信请求腓利门原谅此人。詹宁斯说：“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值得永记不忘的事例，对于那些从上帝的慈爱中逃离的卑微可耻到极点的罪人，上帝的恩典依然丰沛满溢，充满鼓励。”也许牛顿那首著名的圣诗开首句就是对这段话的一种回应：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今得赦免！（拯救如我罪人！）

可能这次有关恩典、罪和奴隶制主题的布道像一粒种子一样撒在孩童牛顿的心中，历经多年之后才萌芽。无论这种猜想是否准确，约翰·牛顿对他儿童时代的牧师、第一位属灵导师大卫·詹宁斯是相当尊敬的。牛顿信仰重生之后，与詹宁斯进行过大量的书信往来，他经常把詹宁斯描述为自己的“恩人”。

对小牛顿的属灵影响较大的第三个人是艾萨克·沃兹先生（1674—1748），他是大卫·詹宁斯的牧师同事。在当时，沃兹是著名的圣诗作者，也是一位出色的布道者。他有时会到老石头街小教堂讲道，伊丽莎白·牛顿和她的儿子与会众一起听他用圣诗的句子为例布道。显然，由于沃兹和詹宁斯之间的合作与友谊，牛顿有机会在早期的灵性培养中受到沃兹的圣诗影响。事实上，在大约50年后，当已经成为牧师的约翰·牛顿出版畅销书《奥尼赞美诗》（1779）时，其中许多歌曲的创作灵感明显来自艾萨克·沃兹。

沃兹圣诗中流行最广的一首很可能在威坪的老石头街小教堂举行圣诞会时演唱过，那时牛顿还是个孩子，歌中唱道：

普世欢腾，救主下降！

大地接他君王；

唯愿众心，预备地方，

诸天万物歌唱。

这首圣诞颂歌的曲调直至 21 世纪仍然广为流行，曲作者是当时新晋的年轻音乐家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l）。1726 年，也就是牛顿出生的第二年，亨德尔加入英国国籍。当牛顿成为一位声名远播的伦敦布道者时，他最成功的一次布道会就是 1785 年在亨德尔的《弥赛亚》中的宣叙部、咏叹调和合唱之间连续布道 50 场，吸引了大批会众，那是这位作曲家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

在约翰·牛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亨德尔的音乐、詹宁斯的布道和沃兹的圣诗对其早年成长产生的共同影响颇值得深思。他们在他们面前流露的情感非常真实，尤其在他听到艾萨克·沃兹那首关于耶稣受难日的著名圣诗时，他表现出的感情异常强烈。在圣诗开头的句子中，沃兹写道：

每当我低头思想宝贵十架
年轻荣耀的君王赴死之地

这些话之所以能够对年仅 6 岁的约翰·牛顿产生如此深刻的意义，是因为那位年轻的母亲因身体的疾病每天都要检视自己的十字架。

1732 年春天，伊丽莎白·牛顿的肺结核症状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体重锐减，眼睛闪亮，脸色苍白，一阵一阵地猛咳，痰里带血。抱着一丝康复的希望，她到了表妹伊丽莎白·卡特莱特家，他们住在东南部肯特郡海滨的查塔姆。据说多多呼吸海边空气能够治愈肺病患者的疾病，但对伊丽莎白·牛顿却一点儿效果也没有。1732 年 7 月 11 日，年仅 27 岁的伊丽莎白在卡特莱特家去世。唯一的儿子当时不在身边，人们认为他太小了，不应该目睹母亲临终之际的痛苦哀伤。因此，牛顿被留在伦敦，寄居在别人家，这家人也在詹宁斯先生的教堂里做礼拜。牛顿还有两个星期就到 7 周岁时，传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

伊丽莎白·牛顿对儿子的教育和属灵影响之大是她在世时从未意识到的，也是牛顿自己未意识到的。她使儿子自小就相信上帝的全知全能，对他的审判心生敬畏，接受他的“道”，如圣经所载——这一切就是真理。尽管在青少年时期和步入成年之初，约翰·牛顿常常违背这些教导，但是母亲的祈祷和他进行的灵性培养却令他终生难忘。它们为牛顿最终归信、委身基督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伊丽莎白不但是儿子的灵性指导，她还注意培养他的勤奋习惯和好奇心，以及运用丰富的词汇进行自我表达的能力。牛顿后来写了大量作品和

布道文，至少在某些片段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母亲早期灵性的映射。牛顿在谈及母亲对自己的无私之爱时说：“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对我的教育中了。”

约翰·牛顿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的父亲还在海上。直至1733年初，他才从地中海的航行中回来，迈进家门方知他已经是个鳏夫了。不过，牛顿船长饮泣痛哭的时间并不长，他很快便再婚了，娶了埃塞克斯地区埃夫雷一个“富裕的牧场主”的女儿。牛顿船长的第二任妻子名叫托马西娜（Thomasina），她的家产相当富足，在那个年代，农夫和牧场主之间的差距至少是500英亩的土地。托马西娜的祖上是意大利人，她与牛顿船长生养了两儿一女。可以预想得到，这些孩子的出生令牛顿在家中处于边缘位置，作为继子，他被那个亲密的新家排除在外。牛顿后来在描述这种不愉快的境况时说：“父亲放任我在大街上乱跑，他和我保持着极大的距离。”

这种距离在牛顿8岁的时候达到顶点，他被送到埃塞克斯地区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学校寄读。他的第一个老师有一支打人极狠的教鞭。牛顿回忆说：“他的草率和激烈几乎敲碎了我的精神和我对书本的热爱……我把母亲曾经教给我的数学基本原理和公式都忘得一干二净。”好在，他的第二位老师注意到了这个男孩出众的才能。按照教学大纲，那一年要学习维吉尔和塔利（Tully）^[1]的作品，牛顿的拉丁文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不过，还没等约翰·牛顿的拉丁语和其他课程的学习取得更大进步，他就被父亲从学校领了出来。他的正规教育在10岁那年结束，牛顿船长认为已经到了把儿子送到海上去的时候了。

注释

[1] 塔利（Tully）：即罗马著名演讲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英文名。——译者注

初恋与首航

海洋流动在约翰·牛顿的血液中。他在泰晤士河边的威坪长大，那是一个近海的小镇，可以望见伦敦桥下的水域，划船到那儿很容易。这个滨海小城到处充斥着黑暗与邪恶，是酒鬼、妓女和海盗出没之地。1725年6月，在约翰·牛顿出生前一个月，该地的绞刑架上曾吊死了6名海盗。不过，在此生活的大多数人都还是老实本分的当地居民，依靠停泊在伦敦桥边的海船生活。船员、船上的杂货商、码头工人、下级水手、制帆工和船长们都在邻近这些狭窄的水边街道上找到了方便的栖身之地。在牛顿出生时，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和本特号（Bounty）船长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及其暴动的船员^[1]都曾在威坪住过。他们受人瞩目纯粹因其声名狼藉。老约翰·牛顿船长和他们不一样，他在伦敦的海员群体中受人尊敬，就像科弗代尔（Coverdale）的英译版圣经《诗篇》107篇所说的那样，因为他是“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下，小约翰·牛顿自然而然会受到身边航海生活的影响。每当父亲的船靠岸，他都时不时地会被带到船上去。1736年，他刚刚11岁，就作为水手中的一员开始了前往西班牙的航海之旅。

不过，这次海上航行似乎并未让两位牛顿之间的关系有多大改善。事实上，从1736年到1742年间，五次环地中海的旅行对父子关系也未有太大的促进作用。船长一如既往地拿出拒人千里的严厉派头来，在他的观念中，父亲就不应该和儿子建立亲密的情感联络。不过，在父亲的看顾下，

十几岁的约翰·牛顿练就了一套扎实的航海基本功，并且多少有了一段在异域的奇妙经历。15岁那年，父亲为他在西班牙阿利坎特市（Alicante）一位商人那儿找了一份工作。那个职位前途远大，但牛顿几个月后就离职出走了，他后来写道：“倘若我行为端正，我本应大有前途，但当时我已经积习难改，我心思邪恶，而且愚昧至极。”

正像牛顿自己所描述的那样，他的任性和悖逆已经初露端倪。1736年，他的父亲从海上回家之后，对长子身上表现出的这种令人忧虑的性情未给予太多的关注，他的心思更多地投入到刚刚出生的儿子威廉·牛顿身上了，这是他和托马西娜的孩子。也许家人对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偏爱令约翰·牛顿生出怨恨，他变得愈发地粗野任性。他交了一群坏朋友，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满嘴污言秽语。不过，他并未完全离弃从母亲那里学到的宗教训诫。牛顿似乎想用敬虔来平衡过错，他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宗教书籍的阅读中。对他颇有吸引力的一本书是本杰明·班尼特（Benjamin Bennett）的《基督徒祈祷室》（*The Christian Oratory*），他热心地追随着本杰明介绍的祈祷和读经法。两个偶然事件让他看到上帝神圣的看顾，让青春期的牛顿的内心产生了波动，使他暂时明辨了信仰的方向。

第一个插曲是一个小小的骑马事件。12岁那年，在埃塞克斯乡下，牛顿从马上摔了下来。他爬起来的时候，发现一根从灌木篱墙后面穿出来的尖利的长钉子，离他的脚只有几英寸，他差一点就被铁钉刺穿，这件事让他由衷地感谢主基督。他赞美恩慈的上帝让他死里逃生，他意识到自己不配面见施审判的创造主，他为此忏悔了好一阵，想要改邪归正。但是不久，他又重蹈覆辙，做出他所说的那种“亵渎行为”，表现出“更深的邪恶”。

第二件让他的良心产生震动的事是：一个星期天下午，他打算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参观如今被称作战舰的东西，这艘战舰停靠在长滩附近泰晤士河口。牛顿与朋友约定在码头见面，因为途中耽搁了一会儿，他迟到了几分钟，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舰的大艇驶出码头。不过，他的懊丧马上就变成了惊恐，那艘大艇撞到了水下障碍物，瞬间破裂，大部分乘客都被淹死了。参加葬礼的时候，牛顿心中大受震动，这不仅因为朋友遽然离世的悲剧，还因为他在不经意间竟然逃过一劫。牛顿把这件事归于上天的眷顾，他再一次下决心与世界、肉体 and 邪恶断绝关系。这次他有整整两年活在忏悔之中，他以禁欲主义的态度持续地禁食、静思、祈祷和读经。可

是，这种本应令其圣洁虔诚的生活方式却反而让他生出无成就、无价值的感觉，他说：“这种信仰真是糟糕透顶，它让我变得郁郁寡欢、封闭孤僻、百无一用。”

作为对愁肠百结之生活的一种缓解，牛顿在满足感官欲望的需要还是满足对属灵读物的渴慕两者之间犹疑徘徊。这种状况注定会导致不平衡，因为二者的力量势均力敌、平分秋色。不过，他还是找到了一种平衡——他说服自己说，有一本宗教读物可以被看作是**所有属灵智慧的集大成之书**，这就是沙夫兹伯里伯爵三世（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的《品性论》（*Characteristicks*）第二卷，这位自由主义哲学家主张应该很方便地改造上帝的律法以适应人性的软弱。牛顿被书中一篇名为“狂想曲”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他甚至能逐字地背诵其长达 88 页的内容，但这种记忆天赋与其理解才能不成正比。沙夫兹伯里的“狂想曲”为放纵行为大开自由、方便之门，对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牛顿来说，它相当具有吸引力。他说：“我认为作者是一位最富宗教情怀的人，我只要跟随他就很快乐了。”18 世纪 40 年代，受到“狂想曲”迷人内容的蛊惑，牛顿开始有了种种自我放纵的迹象，其情形就像 20 世纪 60 年代新纪元运动中的嬉皮士。他变成了一个放浪形骸的人、一个神秘主义者——“我耽于冥想生活的虚幻之境，宗教、哲学和消极情绪彼此混杂，对那种积极进取、勤勉工作的想法深恶痛绝”，这很好地概括了他当时的生活态度。

约翰·牛顿船长对儿子的观念与想法毫无欣赏之意。由于对儿子适于航海生涯不抱希望，他为牛顿找了一份在岸上的工作，把他推荐给密友约瑟夫·曼内斯特（Joseph Manesty）。他是利物浦一位成功的商人，后来在约翰·牛顿的生活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不过，在最初的相处中，在未来的老板面前，17 岁的约翰·牛顿的表现还是相当糟糕的，其原因在于，牛顿像这个年龄的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了平生第一次令其辗转反侧的经历——他堕入了情网。

约瑟夫·曼内斯特提供给他工作有一个大好前途。约翰·牛顿需要到牙买加去，在曼内斯特的一座甘蔗种植园里受训做主管。一旦牛顿学会了如何监管奴隶，如何加工甘蔗，他就可以自己做种植园主了。可以保证，他一定会过上舒适的生活，有机会积累大笔财富。

牛顿满怀热情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然而，在启航赴牙买加的前几天，他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改变了他的生活，信是亡母的表妹和密友伊丽莎白

白·卡特莱特写来的。1732年，伊丽莎白·牛顿就是在她的家中去世的。

牛顿太太的去世使牛顿和卡特莱特两家人的关系趋于冷淡，牛顿船长匆忙再婚似乎也导致了彼此的冷战。不过，经过10年的疏于往来后，卡特莱特一家还是发来了邀请，请约翰到他们在肯特郡查塔姆的家中去做客。

约翰·牛顿正准备到肯特去一趟，他后来把这件巧合看作是其生活中一个幸运的转折点。牛顿船长本来要让儿子到肯特郡梅德斯通镇（Maidstone）办一些生意上的事，小牛顿就把父亲允准的这次出差扩大到造访卡特莱特一家。

这次拜访差点儿未能成行。办完父亲要他在梅德斯通做的事后，牛顿犹豫是否应尽快赶回家，因为他对卡特莱特家的邀请“并无多大兴趣”，最后还是决定顺路去看看。1742年12月12日一个寒冷的冬夜，在回埃塞克斯的途中，他发现那里距卡特莱特家只有不到半英里的路程，于是他拐入一条小路，敲开了卡特莱特家的门。给他开门的是一位美丽的少女，卡特莱特家的长女玛丽，通常大家叫她波琳。

约翰和波琳从来不知道，两个人的母亲伊丽莎白·牛顿和伊丽莎白·卡特莱特曾经说起过希望有一天她们的孩子能有幸结为夫妻。她们说这话的时候，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3岁。妈妈们之间说的这种婚配几乎都是开玩笑，可以想见，两个做母亲的谁也没把这话当真，她们也都没想到约翰·牛顿与波琳的初次见面，竟会让他如此心潮澎湃。牛顿后来写道：“从我第一眼看到她之后，我内心的激情就再也没有消退过。”

他们初次见面时，波琳只有13岁。约翰·牛顿感觉一腔衷情无法向她倾诉。尽管丘比特的箭有力地刺进了他的心房，他后来描述说那是“激烈而庄重的情感……胸中仿佛有一团压抑的火苗……其激烈程度和浪漫小说作家们所想象的不相上下”，但是对于心中炽烈的爱恋之情，他半点儿也不敢透露。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延长他在卡特莱特家逗留的时间，一开始是几个小时，然后是几天，最后竟然连续住了三个星期。这种耽搁给他将要在牙买加开始的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没能及时赶到利物浦搭约瑟夫·曼内斯特的船出发，反而在卡特莱特家流连，故意错过启航日期。对波琳的暗恋完全征服了他，使他取消了精心设计的大好前途，那本来有可能让他成为一名种植园的管理者和庄园主。他解释说：“当我重新考虑所有计划的时候，我发现牙买加太远了，只能四五年回来一次，我根

本不可能在那儿生活下去，于是决定放弃。”

对于约翰·牛顿来说，他真正难以面对和向其解释这个决定和这份痴情的人就是他的父亲了。可以理解，当牛顿船长发现儿子错失了终生在牙买加工作的机会，他会怎样大发雷霆。不过，父亲的震怒平息得比约翰设想的要快。也许船长的失望受到一种希望的缓解，毕竟孩子还可以跟着他从事航海业，因此，他打算再尝试一次，把这个任性的儿子栽培成一名海员。他把约翰安排到一条在亚德里亚海航行的船上，船主是他的好朋友。这是他第七次海上航行，这一回，约翰·牛顿不再作为船长的儿子受到保护了。身为一名普通水手，他必须寻找立足的机会。

船上的生活让约翰·牛顿变得粗野冥顽。无论在海上航行还是靠岸休息，他从同船那些品行不佳的水手那儿学会了喝酒和咒骂，这是他最糟糕的恶习，就像他自述的：“尽管我还没堕落到放荡的地步，但我正在朝着远离上帝的方向大步前行。”

牛顿的大步逃离被一个小插曲所阻止，他后来把这看作是上帝伸手介入的又一个例证。这个插曲以梦的形式出现，里面充满了神秘的超自然事物。梦中的场景发生在威尼斯港口，牛顿所在的船刚刚在那儿停泊过。牛顿梦见自己深夜在甲板上站岗，他看见一个陌生人走到他面前，送给他一枚戒指。送礼物的人郑重地提醒说，只要牛顿完好地保存这个礼物，他就能获得幸福和成功，但是如果丢了它，那么他的生活将会十分悲惨。牛顿记下了对方的提醒，把戒指戴到手指上，那位赠送者随即消失了。在梦里又出现了一个超自然的形象，他劝牛顿把戒指扔掉，牛顿刚把它摘下来扔到船外，威尼斯后面的山峦便迸放出火焰。随后，牛顿认出第二个说话的人就是“我的诱惑者”，他把戒指扔掉了，也就是自行切断了上帝赐给他的恩典，这个梦立时变成一个令他无比痛苦的噩梦。然而，这时第三个人形出现了，他熄灭了山上的火焰，从船上跳入威尼斯港口的水下，找回了那枚戒指。当牛顿问是否他还可以把戒指拿回来时，那个人拒绝把戒指还给他，但告诉他说：“我会替你保存，无论何时需要，我都会为了你的益处出示它。”然后牛顿便醒了。

这个梦听起来很像后来 J. R. R. 托尔金 (J. R. R. Tolkien) 的传奇故事或者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的歌剧《魔戒》(Ring) 中的一段，但它却是年仅 18 岁的约翰·牛顿对一场神奇梦境的描述。他后来从这个以威尼斯为背景的梦中找到了丰富的寓意，认定那两个谈话者分别是

耶稣和撒旦。不过在当时他并未这么想，他很快就把这个梦忘掉了。1743年11月，他们的船返回英国，牛顿的内心完全被一个更实在的形象所占据，那就是波琳·卡特莱特——他一切的梦想只在这个少女身上。1744年1月，他再次造访肯特郡波琳的父母家，而这次拜访却给他带来了随后的远航。

注释

- [1] 本特号 (Bounty): 又译为慷慨号或邦迪号, 原名贝西亚号 (Bethia), 是一艘 1783 年开始建造的商船, 1787 年由英国海军购买, 曾经发生过船员反抗船长暴虐的暴动事件。——译者注

被迫服役

约翰·牛顿第二次拜访查塔姆的卡特莱特一家，这次浪漫行程带来的结果对他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尽管他对美丽的波琳满怀深情，但他却怎么也不敢把这份爱恋之情向她透露半句，甚至对她的父母也未置一词。再过6个月他就19岁了，却仍然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他根本无法张口求婚，更别说结婚了。在18世纪，一个人必得有钱或有一份大有前途的事业才能向一个有名望人家的女儿求婚，而牛顿一无所有。事实上，为了能够在卡特莱特府上多留一段日子，他在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多次丢掉获得大好前途的机会。1744年2月，他又一次放弃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工作机会——到一条商船上去做一名记账员。错失这个机会再一次引起父亲的震怒。牛顿后来描述这段经历时说，“我对父亲的安排非常失望，像从前一样极为轻率地放弃了这份工作，这大大地激怒了他，差点儿与我断绝父子关系。”

牛顿船长一定对儿子与卡特莱特家的关系感觉既困惑又失望，他一点儿也没想到那是因为一场暗恋的缘故。也许卡特莱特夫妇对外甥兴致勃勃地在他们家逗留这么长时间也感觉有点儿惊讶不解吧。他们对约翰内心的激情毫无所知，把他和波琳视作兄妹。牛顿自己一定也感觉到身处此境的尴尬，如果不说是深深地沮丧的话。他唯一能够保持情绪镇定的方式就是跑出房门，在查塔姆的各个地方走来走去。1744年3月1日，他像往常一样在街上漫步，却不幸与抓兵队相遇。

海军授权抓兵队逮捕或者“强迫”男子到英国船队去服役。从中世纪开始，皇家海军的舰长们就被授权强征壮年男子到皇家军舰上服役，保卫国土。臭名昭著的抓兵队在大街小巷和港口民居四处游荡，寻找可征用的新兵。尤其在战争时期，皇家军队格外需要海员。如果约翰·牛顿当时头脑足够清醒的话，他应该早就明白，1744年春天在查塔姆的大街上漫步是危险的消遣，当时英国和法国出现了边境危机，而查塔姆是供应战舰日常给养的前沿地区。3月1日，战舰哈威奇号（HMS Harwich）正在港口外停泊。低层甲板上的配备人员不足，哈威奇号舰长菲利普·卡特雷特（Philip Carteret）便派出一批船员上岸强征新手水手，抓兵队就这么把约翰·牛顿强行带上了船。

被抓来的前三天，牛顿在小城里被监管起来，与此同时，抓兵队不断地四处搜寻，抓来更多的强壮劳动力。牛顿一定是设法给父亲送了个口信，告诉了他自己的情况。因为牛顿船长马上赶到查塔姆，恳请抓兵队的托马斯·卢芬（Thomas Ruffin）中尉放了他的儿子。但请求未被获准。约翰·牛顿正年轻，又有相当的航海经验，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不能放走。哈威奇号的卢芬中尉解释说，当法国舰队在海岸线上逡巡，战事即将爆发之际，即使是著名船长的儿子也没有被特赦的资格。

3月4日星期天，牛顿和另外8名被强征者被依次带到哈威奇号上。船上的军医为他们做了身体检查，结果全部适于服役。卡特雷特舰长随后与他们每个人单独见面。他来自于一个古老的海军家庭，有很好的政界关系，他是国王乔治二世的国务大臣亨利·卡特雷特的侄子。舰长了解到牛顿曾经在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航行过，这种经历使他比大多数被强征入伍的新兵更能在船上发挥作用。因此，卡特雷特任命牛顿为正式的二等水手，比普通水手高一级。

二等水手牛顿在哈威奇号的第一个月过得异常艰难，他用“艰苦卓绝”来形容自己当初加入皇家海军时的生活。不过，这四个字还不足以概括这位新兵所经受的严苛的纪律与严酷的惩罚。在任何的天气条件下都要战战兢兢地爬上桅杆，费力地拖拉绞盘，打磨甲板，在狂风中收卷或展开风帆，应对后座炮一齐点火产生的冲撞和烟雾，这些就是训练的所有内容。训练中出现任何懈怠或者不到位都可能招来一顿“学习”——水手的委婉说法，事实上就是水手长挥动藤条进行的体罚。在春分之际的狂风暴雨里，3月的大风日日吹打着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上的船只，这些都表明牛

顿在哈威奇号上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

1744年4月3日，被强征入伍5周之后，牛顿与全体海军士兵在列队接受检阅时，听见卡特雷特舰长宣告与法国开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战事的爆发对约翰·牛顿的现状倒是有所改善。战争开始时，在海岸线上的牛顿船长曾想尽办法打算把儿子从军舰上解救出来，后来，他希望年轻的约翰能有机会为国家和国王尽忠，便改变游说努力的方向，重新尝试，他找到一位海军朋友，请他在卡特雷特舰长面前为约翰·牛顿说几句好话。这次推荐比较成功，牛顿马上被任命为海军候补少尉。这种候补的官衔和地位表明他已经在训练中获得了报偿。但他担任的这个角色却扰乱了后甲板上其他军官的权力，他的训练职权高过先前和他一起受训的底层甲板上的同船水手，他有可能被进一步提升为正式的中尉。在航海生涯中，这些改善本应让牛顿兴高采烈，但实际上他却拿不准它们对他是好是坏。正像他后来所写的：“如今我的日子仅就外表看过得容易多了，可能因此获得尊敬，但我里面心神不安，外面漫不经心。”

正是牛顿的这种态度使他失去了同行的尊重，先是底层甲板上的水手，然后是船桥甲板上的水手。在他们看来，牛顿对待他们的态度是傲慢而严厉的。作为刚刚从他们当中被提拔出去的一员，牛顿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骄傲埋下的怨恨给他带来的麻烦，远远超过他的想象。

卡特雷特舰长对牛顿也渐渐地感觉不耐烦了，因为这位新提拔的海军候补少尉对自己的升迁没表现出任何喜悦之情，反而一脸的阴沉不快，对上级的命令置若罔闻。这中间出现的一段插曲使牛顿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起因是约翰·牛顿对波琳·卡特莱特的思恋。

1744年12月，哈威奇号在多佛海峡（the Downs）抛锚，那里是一片突出的避风水域，在迪尔（Deal）的肯特海岸与古德温（Goodwin）的沙洲之间，离岸两英里。牛顿发现自己所在的港口到查塔姆的卡特莱特家骑马只需要几个小时，他便向舰长请假上岸一天，准假的那天是1744年12月20日。

牛顿早就知道，从请假开始，他就在说谎，就他的体力来说，他根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从迪尔到查塔姆走个来回。更糟糕的是，再次见到波琳·卡特莱特后，他内心的澎湃激情胜过了遵守舰队的命令。牛顿后来说，是“难以抑制的满腔热情”促使他有了这次造访，这次拜访由一天延长为十多天，而这十多天却是未经申请和获准的。用牛顿自己的话来说，

这次错误的旷工期仿佛是“一场梦”，不过，好在他终于有机会第一次向波琳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她对他的爱情表白却表现得极为漠然，牛顿说：“我本想再也不离开心爱的她，但我对这次谈话很是失望。”

他随后与卡特雷特舰长进行的一场谈话让他更为不满。1745年1月1日，当牛顿重新回到哈威奇号上时，舰长对他请一天假却走了十来天的做法大为光火，这倒真是可以理解。一些军官兄弟为牛顿求情，说他年纪太小，又为情所累，希望能宽大处理。卡特雷特是个颇有人情味的长官，对于这位犯了错误的海军候补少尉，他未滥施体罚，也未予以任何严厉的处分。然而，这段插曲给牛顿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他失去了别人的信任，他这样描述他返队的情形：“我在舰长面前努力为自己的迟归找理由，但这种笨拙手段（尤其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这么做了）却着实令他不满，我从此失去了他的偏爱，这种状况再未改变过。”

继失去舰长的偏爱后，约翰·牛顿也失去了虔诚的信仰。他的内心激荡不安，某些陌生的无神论思想在其间翻动，这主要是他与哈威奇号上另一位海军候补少尉詹姆斯·米切尔（James Mitchell）进行的一次谈话造成的。他的年龄比牛顿大，受教育的情况比牛顿好。牛顿被强征上船时，24岁的米切尔是舰长的秘书，进行例行登记时，他把牛顿的名字误写成了“约翰·牛登”（John Newtown）。1744—1745年新旧交替之际的冬天，哈威奇号在北海（the North Sea）上来回游弋，为在苏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内的商船运送物资，米切尔和牛顿就有了大量交流的机会。就像牛顿后来所描述的，米切尔是“一个强悍的、强夺其信念的人”，他是一个自由思想者。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努力让牛顿也接受这个观点。他们的一些讨论集中在沙夫兹伯里的《品性论》上，牛顿对书中的宗教和哲学论述非常推崇，而米切尔却对此百般嘲笑。牛顿说：“他察觉到我对《品性论》一书出于无知的恋慕，他与我进行辩论，力图证明我对其根本一无所知。”不但如此，米切尔还“用一大串问题攻击驳斥我，力量非常之大，我的内心不久便败坏堕落了……就像一个粗心大意的水手，在风暴将至之时，却撤离岗位，我放弃了福音曾经带给我的盼望和安慰。”

围绕约翰·牛顿而起的风暴不但有无神论的问题，还有情感问题。被迫在海上航行让牛顿愈发地思念波琳。在查塔姆最后一次告别，大约三周之后，他在一封信中尽情吐露了一腔痴情。信件标着详细精确的日期——1月24日早晨。就像牛顿后来告白的那样，他当时激情澎湃：“自从我第一

天看见你，我就爱上了你。渴望有一天能配得上你（并相信必会如此）的念头让我从早已习惯的那种沉闷茫然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把我推进了一个新世界。”牛顿说，“我对你一往情深”，他请求波琳务必给他回信，尽管她的妈妈禁止他们来往。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想我本可以不断地写下去，写成一卷书，但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心中的激情是多少词汇也表达不出来的。”他最后的签名是：“您最衷情、忠实的爱慕者 J. 牛顿”。

不过，牛顿必须从自己的炽烈激情中暂时分神出来，投入到 1744—1745 年冬出现的各种海上紧急战事上来。其中一场战斗发生在哈威奇号和法国军舰坚固号（Solide）之间。两艘战舰在约克郡（Yorkshire）海域的北海上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艰难激烈的对抗，最终重创坚固号，法国人投降了。那是约翰·牛顿第一次经历海战，在其中他也经历了许多恐惧的时刻。

另一次紧急事件发生在 1745 年 2 月的康沃尔郡（Cornwall）海边，一次致命的风暴造成皇家舰队的许多战舰失事，哈威奇号是这支舰队的一员，2 月 23 日从斯皮特海德（Spithead）出发，护送一大批据说是印度和几内亚人的商船。在海军准将乔治·坡考克（George Pocock）的指挥下，舰队向西航行，2 月 26 日在德文郡（Doven）和康沃尔郡的海域遭遇狂风。暴风雨异常猛烈，许多船的船帆、主桅和船首斜桅都遭到损坏，包括海军准将指挥的旗舰萨瑟兰号。当舰队打算进入托贝（Torbay）海湾避风时，大量军舰和商船在出发地就被冲毁了。2 月 28 日夜里，严重前倾的哈威奇号在大海上与其他船只差点儿撞上。经过三天的拼搏斗争，哈威奇号与舰队其他的残留船只到达普利茅斯（Plymouth）。

约翰·牛顿和哈威奇号上的其他船员在暴风雨中经历了出生入死的恐惧。在船只靠岸准备大修时，至少有三名水手——花名册上的名字分别是爱德华·阿慕斯壮、威廉姆·兰姆塞和爱德华·福特——准备秘密逃离。这是最令菲利普·卡特雷特舰长恼火的事，哈威奇号随后在普利茅斯海峡停泊。然而，这种具预防性的措施却并未能阻止约翰·牛顿的潜逃。

鞭笞与降职

让约翰·牛顿从皇家海军潜逃的主要动机还不是对暴风雨的惧怕，而是对波琳的思念。在听说哈威奇号将改变航行计划时，这个令人绝望的消息使牛顿越发难以忍受内心燃烧的激情。海军部发布新命令，要求将原定为期一年的地中海之旅变为前往东印度的航行，这将意味着船上的所有船员要远离英格兰在外服役五年。

当牛顿听说这个计划后，他简直要崩溃了。对他来说，同波琳分开12个月已经到了他能忍受的极限，分开五年绝对是不可能的。可是要从哈威奇号上逃跑也根本没机会。自从上次的迪尔事件后，舰长不会再准许这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上岸了，所以，当哈威奇号停泊在普利茅斯时，他只能焦急地待在船上。1745年4月初，牛顿船长正好行经托贝海湾，与那些定期开往非洲的贸易商船协商签约。当牛顿听说父亲就在30英里外时，他的沮丧感大大减轻。约翰·牛顿对他后来的行动是这样表述的：“我当时想，如果我能找到他，他有可能介绍我去船上做事，但那也比经历漫长动荡的旅程跑到东印度去要强啊，我决定，不管怎样，我一定要离开这条战舰。”

这个决心最终变为行动源于一个机会——舰长卡特雷特决定派人护送一条大艇到普利茅斯港收集一批重要的给养，他授权牛顿管理这支补养队。在大艇出发前，卡特雷特舰长严厉地训导这位年轻的海军候补少尉，要他保证不会有一个船员逃跑。

到达普利茅斯之后，牛顿对波琳的思念之情远远胜过了他对卡特雷特舰长的服从之心。引用一句他深信不疑的格言就是“想做就做”（Never deliberate），刚刚指挥大艇靠岸，他就跑到了岸上。这位海军候补少尉本来负有防止士兵潜逃的重任，此时自己却成了潜逃者。许多年后，牛顿在描述自己的这个行动时说“我背叛了别人的信任”。这个时候，倘若他对此事的后果有所考虑，他一定会重新估算潜逃被抓的危险与同波琳分开五年两件事孰轻孰重。走错一步会带来多么大的风险啊！

在逃跑开始的几个小时里，牛顿的潜逃是成功的。他避开了普利茅斯市民的眼目，他们通常能一眼认出谁是潜逃的海军士兵。到达城郊后，他只能自行猜测哪条路才能把他带到托贝。他选择了右边的小路，在德文郡南部的荒野山地艰难跋涉了大约 25 英里。

突然，他看到一队巡逻的海军士兵正沿着港口搜寻可疑的潜逃者，他知道自己打算落空了。牛顿无法让询问的士兵相信他真的不是一个非法潜逃的海军士兵。他的水手的步态马上就泄露了他的秘密，他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没有相识的熟人，也没有从哪位船长那儿得来的准假条说明他的身份。于是，牛顿被逮捕并一路押送回普利茅斯。当他腕上戴着表明犯罪的镣铐，在众目睽睽之下满面羞愧地重新进入城区时，他一定对自己的命运生出恐惧：潜逃罪是要判死刑的。如果军纪法庭判牛顿有罪，他极可能在军舰的桁端处被施以绞刑。在 18 世纪，那是许多从皇家海军潜逃的士兵的命运。

接下来的两天，牛顿一直被拘押在军队禁闭室里，与其他潜逃者和罪犯关在一起。随后，他戴着镣铐被送到军舰的底层甲板上。靠着船的舷墙，他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他能够免于被吊死在船头的桁端处，得益于父亲老约翰·牛顿的朋友梅德里海军上将（Admiral Medley）的请求。老约翰·牛顿听说了儿子愚蠢的潜逃行为后，与梅德里联系，后者向卡特雷特舰长建议用商船上的一位健壮适龄的年轻水手来替换海军候补少尉牛顿。这是当时对待那些海军闹事者通用的交换手段，但卡特雷特却不愿接受这个建议，恐怕会因为处理过于软弱而使哈威奇号那些私下筹谋潜逃的船员们得到一种错误的惩治信息。不过，卡特雷特还是决定照即决裁判而不是军法处置牛顿，宣判结果是牛顿要当众受鞭笞，并被降职。

18 世纪的海军鞭刑极其残酷。牛顿对这次体罚的全过程只用了一个

形容词——“我被当众打得皮开肉绽”。那个时候，与此相应的惩罚就意味着哈威奇号上所有水手都会被召集到甲板上，三面站开，面对被结结实实地绑在一个固定格栅上的半裸的牛顿。在喧天的鼓声中，水手长的助手举起打了结的九尾长鞭狠狠地抽打，每一下都在牛顿的身上撕开一道裂口。

在哈威奇号航海日志上，牛顿所受的鞭笞没有记录，他究竟挨了多少九尾鞭只能依靠推测。当时一位严厉的舰长可能认为对付逃跑者鞭打一百下是比较适宜的惩罚，不过，菲利普·卡特雷特素有仁慈美名。尽管牛顿让他大为失望，但这个犯人正值年少，又兼有海军上校的求情，这可能令其宽大为怀。因此，一个公允的推测是，约翰·牛顿有可能被九尾鞭打了12下或者24下。然而，对于被看作是底层甲板上傲慢而不受欢迎的人，牛顿所受的惩罚虽然时间不长，其残暴之力度却非同一般。许多水手，包括水手长的助手，那些曾经被牛顿尖刻的言辞伤害过的人此时都挥起了皮鞭。作为一种角色对换，如果这位海军候补少尉的言辞不是那么尖利的话，他也不会遭到水手们如此严厉的暴打。显然，约翰·牛顿受到了残酷的惩罚，当他从格栅上被放下来时，背上的道道鞭痕一定让他疼痛不已。

尽管牛顿被允许养好伤后再重返岗位，而且随舰医生还花了一两天的时间照顾他，但是他刚回到岗位就发现，他受的鞭刑还不是这次判决最糟糕的结果，可怕的厄运是“降职”。牛顿不但失去了海军候补少尉的特权和在后甲板上的舒适生活，而且受到底层甲板那些普通水手同行们的嘲弄、欺负和侮辱，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他宿怨未消，此时自然借机报复。

哈威奇号驶离普利茅斯，开往位于加那利群岛的马德拉，在5年的航程中，这是它到达的第一个港口。约翰·牛顿的内心激荡着狂怒与悲愤。在那些海军候补少尉和正式军官中间，他是前同事不愿接触的“贱民”，当他在底层甲板上遭受对手们的粗暴对待时，前同事中没有一个人肯伸手相援。根据牛顿的自述，连卡特雷特舰长“几乎也表现出难以宽恕的怨忿并多次显露出来”。结果，牛顿对舰长的不满日益高涨，以至于他满脑子的奇思异想就是怎么谋杀舰长。当他无法实施刺杀卡特雷特的计划时，他开始筹划自杀。牛顿对这一时期的内心状态曾做过如下描述：

我的内心极度痛苦，充满了渴望、愤慨和绝望。每个小时带给我的都是新的侮辱和艰辛，毫无解脱和减缓的希望，没有朋友替我分担，也没人听我抱怨。

尽管在哈威奇号上他缺少听众，但牛顿似乎已习惯了自怜中的独白，他最主要的抱怨就是失去波琳。当战舰慢慢驶离港湾，从康沃尔郡的背风处悄悄启航，英国的海岸线在目之所及处渐渐消失时，牛顿经历了伤心欲绝的时刻，他认为不太可能有机会与自己心爱的女孩重逢了。在回忆这段痛苦经历时，他写道：“我感觉痛苦和恐惧的不是别的，而是看到自己被活生生地与所爱之人强行分开，而且几乎没有再见的希望。”

1745年4月，当战舰驶向东印度群岛时，牛顿沉浸在无法早日返回英国的绝望之中，他必须重新调整已经跌至谷底的生活。遭受羞辱、受鞭打、降职、被军官们弃绝、被水手们欺负、与心爱的女孩分离、连续5年的航行让他甚为厌烦，这就像在一座漂浮的牢房里度过5年牢狱生涯，而且里面到处是满怀敌意的室友，无怪乎牛顿会时不时地“想跳海”。

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负面情绪，那种“几乎没有再见的希望”仍然在约翰·牛顿的生命中不断地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后来说自杀的念头会消失，全因为“上帝那只隐秘的手阻拦了我”。不过，当时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牛顿那时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而且是个聒噪的渎神者。因此，对于早期生活中即将发生的戏剧性改变——那场完全令他意想不到的“马德拉奇迹”，他并未将任何荣耀归与上帝。

交 换

从普利茅斯港启程大概三周后，哈威奇号停泊在马德拉主要港口丰沙尔（Funchal Roads）。这个位于大西洋中部加那利群岛的港口是开往东印度群岛的船只重要的维修和补给地，因此护航舰及其护卫的船只只要在那儿停靠好几天，直到整个舰队维修和补给完毕才再次启航。1745年5月9日，哈威奇号离港，牛顿当时在吊床上睡得正熟，没听见甲板长起床集合的哨声。

执行早晨巡视的是一位年轻的海军候补少尉，是牛顿风光时候的朋友。所以一开始，对这位曾经同在后甲板上的前同事的酣睡，他只想小小地批评一下，他用一种“半玩笑半认真”的口吻命令牛顿起床。但牛顿当时的心情颇不佳，烦乱而郁悒，一动也不想动。这位年轻军官对他拒绝服从命令的态度不耐烦起来，他拔出匕首，割断了吊床的绳索。牛顿一下子跌落到底层甲板的地面上，后背的鞭伤让他疼痛非常。尽管心里很生气，他却不敢表现出来，只好迅速穿上衣服跑到甲板上去。这时，他看到一个船员正把自己的行李扔到哈威奇号旁边的一条小船上，准备离开。牛顿和这位船员简单交谈了两句，知道原来这是一种交换。战舰上的海军准将乔治·波科克（George Pocock）相中了几内亚商船上的两名水手，他们的船也停泊在马德拉。准将命令菲利普·卡特雷特舰长在哈威奇号上选择两个船员来交换那两位水手。听到这个消息，牛顿意识到，哈威奇号还要交换一位船员，他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和采取的行动：“我的心里立时燃起

一团热火，我祈求让那条船多停几分钟，跑到中尉那儿，恳求他们和舰长说说，趁这个机会把我开除。”

根据牛顿近期的糟糕表现和消极行为，无论中尉军官们还是舰长都没有理由向他施此恩典，但他们竟然答应放他走了。也许中尉们对这位前海军少尉预备军官怀有一种隐隐的同情，也许卡特雷特舰长的人性战胜了他的无情，也许在心里，这位舰长巴不得把牛顿快点儿打发走，再也许如牛顿自己所认为的，那位让他突然从床上掉下来的海军少尉预备军官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而事件中的所有环节只是“上帝出于看顾和保护在我生命的许多重要关头进行的一场安排”。不管采用何种解释，从吊床上掉下来不到半小时，约翰·牛顿就被皇家海军正式开除，转到几内亚的商船飞马号（Pegasus）上。这一天好运还未结束，更让他惊喜的是商船船长盖·彭罗斯（Guy Penrose）竟然认识约翰·牛顿船长。彭罗斯非常高兴自己能够和老熟人的儿子在船上相逢。牛顿写道：“他待我非常和气，表现了极大的关心和帮助，我相信他会成为我的朋友。”不过，这个开始只是看似美妙，当约翰·牛顿的毛病完全显露出来后，这位新船长的仁慈、帮助和友善便很快化为尖刻厌烦了。

在哈威奇号上，牛顿无论身为海军候补少尉还是普通船员，他的行为举止都受到皇家海军纪律的限制，甚至在他对卡特雷特舰长深怀不满时，表面上仍要对他恭敬有加。没有了海军纪律的要求，在几内亚人船上更为宽松的氛围中，牛顿逐渐给船上的同事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引致他们公然蔑视船长彭罗斯的权威。

这些行为包括引人反感的戏仿和讥讽。一开始，牛顿还只是歪曲性地模仿，后来他就发挥填词作曲的天赋，创作了一些粗野的诗句诋毁飞马号船主。牛顿说他的邪恶行径就是要败坏船长的威信，他“写歌笑话彭罗斯的商船、他的计划和他的属下，而且还教船上的水手们唱它们”，但这种行径造成的影响远超过歌曲本身。在商船上，牛顿成了一匹害群之马，他炫耀自己的无礼、懒惰和不守规矩，想尽办法让别人效法他的坏榜样。他回忆说：“我真是坏到了极点，不但自己毫无愧色地犯罪，还寻机引诱别人一起堕落。”

牛顿种种令人震惊的行径似乎包含了怨恨、反抗和渴望不受束缚。怨恨源自他对自己生存状况的不满和与波琳的分离，¹反抗表现为抵挡上帝，此时牛顿已经变成一个擅长咒骂和渎神的家伙，在商船水手中间颇有恶名。至于

对自由无羁的渴望则必须从牛顿离开哈威奇号时写的航海日志中找证据，他记录了当时自己踏上飞马号时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从此我就要像脱了缰一样不再受任何束缚了。”

一个不受束缚的约翰·牛顿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当几内亚商船驶往西非，最终停靠在终点站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的海港上时，倘若彭罗斯船长对在马德拉与乔治·波科克准将交换得来的这位水手失去耐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未待彭罗斯将想法付诸实践，1745年的最后一周，他突然在塞拉利昂去世。继任的新船长是大副约西亚·布拉特（Josiah Blunt），他早就对心浮气躁的牛顿暗生厌烦，他也不像彭罗斯那样对牛顿的父亲怀有尊敬之心。当飞马号准备从非洲启航远赴西印度群岛时，牛顿意识到自己先前与大副——刚刚上任的新船长——的恶劣关系有可能使他落入危险之境。牛顿是这样表述内心的苦恼和恐惧的：“我毫不怀疑，如果我和他到西印度群岛去，他肯定会把我重新弄回到军舰上。”有可能重回皇家海军的前景令这位普通水手“怕得要死”，牛顿说，“为了避免这种结局，我决定留在非洲。”

非洲吸引约翰·牛顿的是延展到大西洋的那片广袤开阔的西部陆地，就是今天环绕大西洋沿岸建立的尼日利亚、贝宁、多哥、加纳、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冈比亚和塞内加尔等国家。18世纪40年代，这片地区统称为几内亚海岸。这片开阔的处女地有上千米的海岸线，上面满布着河流、河汊、沼泽和原始部落，还有偶尔出现的欧洲探险家。这些白人寄居者过着危险的生活，大做伤天害理的贸易，对待土著居民的手段异常残酷，通常很年轻就死了。少数活下来的人也要面对当地的种种危险，比如传染病、食肉动物的袭击以及部落中有时因财产问题发生的武装械斗。白人财富的主要来源是贩卖奴隶。

牛顿从阿莫斯·科劳（Amos Clow）的口中第一次听说这种生活方式。科劳是一个海盗型的奴隶贩子，是牛顿在彭罗斯船长当任时在船上结识的，当时他们正从马德拉驶往塞拉利昂。科劳拥有飞马号四分之一的份额。18世纪40年代初，他初次到达非洲时还一文不名；1745年，他与牛顿认识时已经是一位殷实的商人了。科劳用赚来的钱开了一家工厂，在18世纪的非洲，“工厂”这个词和制造业没什么联系。在几内亚的海岸上，一家工厂就是一座堡垒或者一座防范加固的围墙，里面关着那些被猎奴者从内陆抓来的土著。一家工厂有许多被称作“奴隶集中地”的小棚

子，被抓来的土著就被囚禁在其中，直到贩奴船到来。船长会拿些寄售的食物或不值钱的饰品和主人或当地拥有奴隶船的酋长进行交换。一旦交易成功，工厂里就会上演一出出骇人听闻的惨剧。土著居民被迫与其家人骨肉分离，为了让他们能够听话，他们被剥光了衣服，打上奴隶印记，戴上脚镣，遭受鞭打，他们满心惊恐地被拖上船，在那里，经过 8 周“中间通道”的航行而活下来的人将被送到西印度或美国的奴隶市场。

当阿莫斯·科劳讲述他在非洲大陆进行野蛮开发获利时，年仅 20 岁的约翰·牛顿立刻也想通过同样的渠道赚取财富，他声称科劳的故事为他提供了一个“黄金梦”。那些在贩奴贸易繁荣时期找到西非发财之路的年轻商人们个个野心勃勃，这个充满贪婪欲望的远景在他们身上并不少见。在那个时代，几内亚海岸（此名来自于英文中硬币——几尼一词^[1]）相对于 18 世纪航海家们而言，其意义正如克朗代克河^[2]相对于 19 世纪淘金者一样。一年有 3 万到 4 万奴隶被从非洲运到美洲，这让贩奴者、船长和船主们大发横财。牛顿渴望成为这场残酷的赚钱狂潮中的弄潮儿，阿莫斯则变成了他的偶像。当牛顿报名成为科劳的雇员时，他说：“科劳的成功激发了我也要取得同样成功的希望。”他们达成了这项交易，科劳安排他的“弟子”直接从飞马号的水手中出来。科劳保证说，牛顿做水手时的工资将在他们最终到达英国时由伦敦船主付给他。这份口头协议并不会奏效，但当时牛顿对他的新雇主如此信任，丝毫不怀疑他的品行。满怀发财欲望与期待的牛顿与科劳一离开塞拉利昂海岸就驶往普兰提内群岛（Plantane Islands），他作为一名奴隶贩子的生涯开始了。

注释

[1] 几尼是用非洲金矿中的金子制造的硬币，1 几尼相当于 20 先令。按今天的兑换标准，相当于 100 英镑或 200 美元。

[2] 1896 年，一个探矿队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现了黄金，这个发现触发了克朗代克河淘金狂潮。——译者注

为奴在非洲

作为一个活跃在陆地上的奴隶贩子，牛顿早年的生涯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牛顿最初的工作是监督科劳位于普兰提内岛的工厂内外的当地人，这个岛是一个方圆约两英里的沙岛。牛顿被记录的唯一监督任务就是为他的雇主盖房子。尽管从技术上来说，他是建房的工头，但他的独特个性让他在科劳的情妇面前毫无权威。她是一个黑人女性，出身于当地名族，他们帮助科劳变成一名成功的非洲奴隶贩子。据说这个女人是一个部族公主，叫 PI——拼作皮·艾（Pee Eye）。不幸的是，只要她一看见情人的新助手，气就不顺，她对牛顿厌恶之极。一开始，PI 的敌意和厌恶表现得还不强烈，在任何重要关头，科劳都会护着他。不过，等科劳一踏上去雷奥·奴那（Rio Nuna）的行程，情况就变了。

原计划由牛顿陪同雇主一起旅行，可是临近启程时，他却发起高烧来。这场病让他异常虚弱，无法在科劳的轻舟（指一种适于浅水区使用的渡河船）上航行两周到雷奥·奴那的交易前线去，因此，他被留下来，躺在病床上靠 PI 公主照料。科劳的轻舟刚刚驶出 PI 的视野，她就开始像魔鬼一样对待牛顿。她减少他的用水，除了她脏兮兮的盘子里的一点儿残羹剩饭，她什么吃的也不给，不但如此，她给那点儿东西的时候还连讥带讽的。在这种境况下，牛顿饿得骨瘦如柴。

有一次，他被叫了起来，PI 仍然用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朝他丢了一些剩饭，并且为此洋洋自得。牛顿当时身体虚弱之极，手抖得连盘子都端

不住。他一失手，盘子掉到地上，本来就所剩无几的一点儿剩饭全都洒到了地板上。PI既不允许他把剩饭从地上捡起来，也不让他从满满一桌子的饭菜中拿点儿来吃，反倒拼命地嘲笑他，不准他吃任何东西。

在如此恶劣的境况下，大病痊愈似乎遥遥无期。为了尽快康复，牛顿只好夜半到园子里挖根茎，当场吃掉。如果他能把那些根块煮熟了再吃，也许还能获得一些营养，但直接从土里挖出来，不洗不煮地生吃，其结果如牛顿所言，“就像服了一剂吐酒石^[1]。”尽管生根块把他折腾得上吐下泻，但牛顿实在饿得受不了，只好每天半夜都到园子里啃它们。唯一能让他从糟糕的饮食中稍得补养的，是一些同情其遭遇的当地土著带给他的食物。这种仁慈的安慰甚至来自于PI的奴隶，他们夜半悄悄靠近牛顿的住处，在门外放上一口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口粮，他们身上的锁链在爬行时会发出叮当声。

当牛顿开始从疾病中缓慢地复原时，PI公主又想出新的法子折磨他。她喜欢到他住的地方辱骂、诅咒他。牛顿说：“她骂我是个废物、懒货，甚至在我还无法行动时就强迫我站起来走。她让随从模仿我的样子，冲我拍手、大笑、扔石灰。”偶尔，PI也会鼓励她的手下人冲牛顿扔石头和酸橙。这种虐待对牛顿的身心都造成了影响。唯一的小小补偿就是，一旦PI看不见，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黑奴向牛顿表达善意。对于以如此粗暴残酷的方式对待一个生病的白人，他们显然深感震惊。

最后，阿莫斯·科劳总算从雷奥·奴那回来了。牛顿向他大吐苦水，详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不过，他太不明智了，竟然当着PI的面抱怨不已。科劳把她带到一边，安慰她，根本不相信牛顿的叙述，对他的冤情毫不在意。不过，在一段时期内，科劳和牛顿之间的主雇关系表面上还是有进展的。他们一起进行了第二次赴雷奥·奴那的轻舟旅行。一开始两个人合作得很好，他们共同的商贸事业前景远大。然而，在行程中，科劳与一个商业伙伴相遇，这个竞争对手心术不正，企图拆散这对搭档，于是他声称牛顿偷了科劳的钱财。这种控告毫无根据。牛顿后来回忆说：“这应该是我唯一没犯的罪了，我无法接受这种控告。我能够夸口的仅存的教育成果就是诚实了。”

尽管牛顿百般解释自己是一个绝对诚实可靠的雇员，但阿莫斯·科劳却不相信他。他粗暴地惩罚这个年轻的助手。牛顿被锁在轻舟的甲板上，只能得到最低份额的食物——每天一品脱米饭。这样的饮食自然让他饿得

要命，当雇主和那位控告者上岸和人长时间畅谈生意时，他也无力抓鱼充饥。

另一个生存挑战是西非的雨季。轻舟停泊在雷奥·奴那，按照科劳的惩罚要求，牛顿不允许在船舱里躲风避雨。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大雨瓢泼，一天24小时他都被锁在甲板上，不得进船舱。这样的露天生活使牛顿又病得不轻，而且患了胃痉挛。他后来描述这段遭遇时说：“过分的寒冷和潮湿……严重地摧毁了我的体质和精神。”当科劳从普兰提内岛回家后，牛顿的境遇更糟糕了，他被戴上镣铐，像那些戴着锁链的奴隶一样。在非洲，这是一个白人对待另一个白人最为残暴的方式，但科劳似乎定意要把牛顿当作罪犯来惩治，他像PI公主那样羞辱牛顿。

在普兰提内岛的囚徒生活是牛顿经历的生命最低谷。身在饥饿、捆绑和绝望中，他甚至成了其他奴隶伙伴怜悯的对象。曾经在哈威奇号上，尽管境状也很糟糕，但他依然暴躁易怒，如今，他狂躁的怒气已经荡然无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精神完全被击垮了。我丧失了所有的志气，几乎不会思考了。”

不过，即使这样，牛顿还是找到了一剂帮助他与沮丧对抗的良方，这就是艾萨克·巴罗（Isaac Barrow）的数学教科书《欧几里得几何》（*Euclid*）。这是他在普利茅斯买到的，也是他离开哈威奇号搬到飞马号又到达普兰提内岛时，微薄的财物里留存的唯一一本书。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在科劳苦待他的那些日子里，牛顿利用研究几何书的前六章来消磨空闲时间，他拿一根长棍在沙滩上复制那些几何图形。在他学会了欧几里得几何后，大约过了30年，牛顿给一位正在预备圣职任命的年轻人写信谈及自己的经历时，写道：

我认为自己很自然地对数学生出兴趣，我对它略有了解；虽然只是稍有涉猎，但无论睡着还是醒着，我的大脑都装满了几何图形和计算公式。我想入非非，在我眼中，所有的东西不是呈现为直线就是呈现为曲线。

这里所说的“想入非非”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保持大脑活跃”。那些在沙滩上学习几何的孤独时光不但帮助牛顿保持了头脑清醒，而且后来还成了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一首诗歌的灵感之源。下面的诗句出自华兹华斯的《序曲》（*The Prelude*），这首诗基本上是对牛

顿自述的引用：

我曾经读到过，船只失事
 一个人和一群受难者被海浪推到
 一处无人之地
 一个偏僻的小岛，他上岸只携带了
 一本小书——关于
 几何的论述——仅此而已
 无衣亦无食
 凄惨之状非常人可受
 离开伙伴，只握一书在手
 像一个学子寻找其中的真理，
 在偏僻的小岛的角落中
 沿着海岸，
 用一支长长的木棍，
 在沙上画写几何图案，以此
 消弭时常涌上心头的忧伤，几乎
 要忘怀自己的感觉……

约翰·牛顿试图通过几何练习消弭和忘却内心的忧伤与感受，这在实际中的经历要远比诗中描述的艰难得多。一天又一天，他与科劳的奴隶们一起顶着烈日干农活，他既疲惫难耐又羞耻不堪。但更糟糕的感觉还不是羞耻，而是无助和绝望。1746年7月24日，当他度过21岁生日时，他的情绪一定跌到了最低点。为奴生涯看起来没有尽头，无论科劳还是PI，对他的敌意都似乎毫未改变。想挣脱锁链，从岛上逃跑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如果说在他的生活中还有什么微弱的亮光的话，那就是他的体力日渐增强，而且欧几里得几何让他的大脑聪敏清醒；还有一根让牛顿生出希望的“稻草”是他曾经给父亲写过一两封信，描述他在普兰提内岛上经历的悲惨遭遇。那些信被偷偷交给偶尔到普兰提内岛做生意的商人，但牛顿根本无法知道那些恳请救援的信件是否被带到英国，送达父亲手中。他写给衷心挚爱的波琳·卡特莱特的信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当被囚已长达一年，而他没收到任何回音时，他便愈发地消沉了，他不再尝试与外界进行交流。他后来回忆说：“当一条船靠近岸边时，出于羞耻，我藏在树林里，

好避开陌生人的眼光。”这句话传达出一颗灵魂所受到的伤害，他出于羞惭躲避科劳的造访者，而不再向他们寻求援助。

科劳对牛顿的身体与精神不断地进行摧残。有一天，牛顿正在种酸橙树时，其间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表明他的雇主对他的轻蔑。科劳搂着他的情妇 PI 公主路过此地，他停下来，用一种令人难堪的尖刻语气说道：“谁知道呢，也许这些树长大结实后，你就可以回到英国，弄个船长干干，重回旧地，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了，谁知道呢？我们拭目以待喽。”对于科劳向自己所作的刻薄的预言，牛顿自己补充说：“我想他也许认为我应该去波兰做国王呢。”

不过，这还只是约翰·牛顿早年经历中发生的种种巧合之一，阿莫斯·科劳的“预言”虽然只是句戏弄的话，却一语成“真”。这个戴着锁链的年轻人听到这番笑论时，他正在为酸橙树苗的树根培土。有一天，他将带着一条船重回自己的为奴之地，在那儿，他将从当年种下的那棵果树上采摘鲜橙。

注释

[1] 吐酒石 (a tartar emetic)：一种杀虫剂。——译者注

获救灰狗号

1746年底，牛顿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岛上还住着一个商人，他想让牛顿为自己干活。一开始阿莫斯·科劳不想让这位21岁的囚徒恢复自由去做新工作。不过，他很快就动了恻隐之心，也许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总算摆脱掉的”心理，就像18个月以前，激发哈威奇号舰长菲利普·卡特雷特同意交换牛顿的想法一样。

牛顿说：“换了一个雇主，对我的益处大多了。我很快就穿得整整齐齐，住得宽宽敞敞了。”他发现新雇主的生意比科劳成功得多，他在沿岸有好几处工厂，雇用了大批白人为他工作。牛顿很快就得到了提升，新雇主把他看作一个诚实可靠的伙伴，让牛顿照管所有的家事，他同时也管理贸易往来的现金，大概有几千英镑。

不久，牛顿的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他得到了雇主在吉塔姆（Kit-tam）工厂的股份，这座工厂坐落在歇尔布罗（Sherbro）河岸，这条河蔓延大约70英里，与海岸线平行，彼此相距只有几百码。牛顿和另一个白人协作管理吉塔姆的产业。成为合作者意味着他有权拥有一定数量的土著奴隶，并把他们卖到奴隶船上获利。最近，一位到塞拉利昂海岸参观的美国人声称他找到了牛顿关押奴隶的那座工厂，这位名叫约翰·里德（John Reader）的参观者是这样描述这座工厂遗址的：“那是一座石头墙围成的方形围栏，每一面10米长，2米高，用石灰和泥涂抹，高墙坚固无比，墙顶端仍然插着18世纪的酒瓶尖利的碎片。”

无论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遗迹是否就是牛顿身为贩奴者和奴隶主时的交易之地，不可否认的是，1747年初，他已经从自己的产业中大发横财。他回忆道：“我们那时过着心满意足、事业发达、雇主满意的生活。”

过得心满意足指的不只是他心情愉快，而且更表明他喜欢这种远离祖国的白人贩奴者的剥削生活方式。在这种捕抓、囚禁、买卖奴隶的可怖的过程中，牛顿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不过，正是这种野蛮行径使他有机会与同样进行剥削的土著首领成为合作伙伴。就像牛顿在自述中说的，他已经“变黑了”，这句话常用来形容一个生活在土著居民中间，并被其生活习惯同化了的欧洲人。

牛顿纵情于当地的两大邪恶活动——淫乱和巫术。牛顿落入第一种试探也许不足为奇，当时他刚刚从数月被拘禁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当他被迫成为一个女人的奴隶时，他已经对非洲女人生出强烈的征服欲。但作为深受基督教熏染的青年，牛顿会迷上巫术，这的确有些让人无法理解。不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深深地迷恋非洲部落中盛行的“魔咒、通灵术、护身符和占卜”之类的东西。对于巫术和巫毒的古怪仪式他也许还没到迷恋的程度，但他很坦然地承认自己时刻处在受其魅惑的危险之中，因为他对那些奇特的活动仪式有特别的兴趣，他补充说：“最终我很有可能会深陷其间。”

当约翰·牛顿沉溺在吉塔姆“变黑了”的生活中，身边有招之即来的金钱、女人和魔法时，在英国，却开始了一场对他的营救行动。牛顿船长远航回家后，收到了儿子通过贸易商船从普兰提内岛寄给他的信。他对儿子在阿莫斯·科劳手下遭受的残酷待遇深感震惊，船长给利物浦的老朋友约瑟夫·曼内斯特写信求助。对于曼内斯特来说，这个请求很合适，他做许多生意，而且是一位颇有能力的船主，他有一条船灰狗号（*Greyhound*）正打算开往塞拉利昂。灰狗号船长接到约瑟夫·曼内斯特的命令，在靠近塞拉利昂的沿岸寻找约翰·牛顿，并把他带回家。居住在西非这一带地区的白人相对来说不太多，灰狗号完成这个托付还不至于像大海捞针那么困难。不过即便如此，在寻找约翰·牛顿的过程中，时机、偶然性或者说上帝的安排仍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牛顿在许多年后所言：“无疑，在那一刻，上帝亲自把我放在了吉塔姆。”

1747年2月，灰狗号船长斯万维克（Swanwick）先后在塞拉利昂和本那诺斯群岛（Benanoes Islands）停靠，在两处分别寻查约翰·牛顿的

踪迹。关于牛顿下落的报告都非常模糊，表明他有可能在内陆深处，因此斯万维克船长认为这种寻查毫无意义，他开始设计回程路线了。灰狗号沿着海岸返航到达第一站时，船上的瞭望员看见海滩上有一缕青烟从火光中升起，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信号，告诉过往船只岸上有商人想商谈生意。斯万维克船长本打算不理睬这个烟火信号，因为当时他的船正顺风而行，他希望继续前进，可他突然间又改了主意，下令靠岸。

那个看见灰狗号就在岸上燃火生烟的商人正是牛顿在吉塔姆的搭档和同事。他划着独木舟靠近商船，登上甲板，听见船长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约翰·牛顿的人时，他不由得大吃一惊。斯万维克船长听说自己要找的人就在吉塔姆一英里外的地方，他立刻上了岸。半小时后，他已经坐在牛顿住所的阳台上了。两个人对他们竟然能够在此会面的种种巧合感觉异常惊奇，斯万维克说他清晰地看见了烟火信号本打算不理睬它，牛顿说他两天前刚刚从内陆做生意回到吉塔姆。彼此寒暄之后，谈话陷入了僵局。斯万维克说他接到命令要把牛顿带回家，而牛顿却坚持说他不回家了。他后来解释自己当初的想法时说：“如果我是在普兰提内岛饥病交加的时候接到带我回家的邀请，我一定会立刻接受，那就像让我起死回生了一样；但时过境迁，再听见这个邀请，我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这种漠然源出于牛顿“变黑了”的生活方式。他颇为享受这里提供给他物质丰富和纵情享乐的生活，他不愿意再回英国了。斯万维克船长发现自己提出愿意带牛顿回家的建议受到如此傲然的拒绝，他一定很诧异。想到船主约瑟夫·曼内斯特正焦急地等着他把牛顿从非洲带回去，他竭尽全力想劝说这位固执的乘客和他一同登上灰狗号返回故乡。为达到此目的，他给牛顿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极富想象力，因为它是虚构的。

斯万维克向牛顿道歉，说他把一大包写给牛顿的信放在英格兰没带来。他解释说，否则他们可以就信里面提到的好消息进行一番交流了。这个好消息是他从牛顿的父亲和约瑟夫·曼内斯特那儿听说的，消息的实质内容就是约翰·牛顿即将获得一年400英镑的巨额财产，对于一个刚满21岁、不久前还一贫如洗的年轻人来说，这笔年收入（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两百万美元或一百万英镑）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牛顿起初不相信，但斯万维克提出有力证据，说他已经接到指令，如果能够把牛顿救出来，他就可以获得灰狗号货物的一半作为奖金。无论财产还是奖金，其数目都完全是虚构的。然而，对于牛顿来说，一种对于家族财产的遥远记忆还是给斯万维

克无中生有的故事提供了部分可信性。他回忆说：“我对他说的那笔财产并不太信，但在那种充满乐观希望的年龄，我觉得这有可能是真的。”

这笔神话般的财产让牛顿的发财梦更加绚丽，他梦想着与波琳·卡特莱特重聚。尽管他在吉塔姆同许多他喜欢的非洲女人有过性关系，但对那个远在查塔姆的少女，他的一腔纯真挚爱从未消退过。此外，那笔巨额财产也能让他向波琳开口求婚，拥有大好前程的他可以保证让她过上好日子。牛顿反复思考这项随船回家的建议，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自己的思考结果时，说：“当时接受这个建议的唯一理由就是我可以牵着她的手了，我对恋人的思念，想看见她的渴望，胜过了其他所有的想法。”

还有一个想法似乎也对约翰·牛顿最终的决定具有一定的影响，那就是他这次可以坐在头等舱里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船长向我进一步保证——他真的履约了——我可以临时住在他的船舱里，和他一起用餐，作他的随身陪伴，他不指望我做任何服务性的工作。”因此，与牛顿前两次在船上的经历相比，无论是被锁在科劳的轻舟的露天甲板上，还是睡在哈威奇号军舰底层的吊床上，灰狗号提供给他的豪华住处一定是极大的进步。坐头等舱回家的旅行前景、巨额财产和有机会同波琳成婚等因素使牛顿无法拒绝斯万维克提出的建议。他后来回忆说，“本来在一个小时之前，我从没打算也从未希冀会发生这种变化，”但在灰狗号船长踏上他的台阶的60分钟后，“我与他乘船同行，几个小时之后就远离了吉塔姆。”

惹是生非与亵渎神明

约翰·牛顿的回家之旅既不迅速也不安全。有据可查，在牛顿颇富传奇色彩的一生中，正是这次旅行成为其最具戏剧性的转折点。海上的暴风雨引发了深刻的属灵经历，并最终使他归信基督。可是，在航行初期，牛顿的言行却处处表明他是一个非基督徒甚至是一个反基督徒。

灰狗号不是一艘奴隶船。它进行的海上贸易包括黄金、象牙、非洲红木（一种染料）和蜂蜡。这些商品搜集起来需要的时间远比抓运奴隶的时间长。到吉塔姆寻找牛顿之前，斯万维克船长就已经沿着被海员们称为非洲迎风面的地方航行了5个月。灰狗号名为灰狗，其实名实不符^[1]，她的航行速度极慢，经常在冈比亚和塞拉利昂的港口长时间停泊，如果有生意可做，也会在海岸或河口稍做停留。牛顿上船之后，船舶向南航行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离开吉塔姆一千多英里，她沿着海岸线一路做着贸易，直到到达南纬一度附近的洛佩斯角（Cape Lopez）。

在牛顿连续乘坐的四条船上，牛顿开始第四次与船长彼此疏远。旅行时间越长，牛顿的言谈举止越糟糕。幸好他在船上的地位特殊，与船长住在一起，在灰狗号上没什么任务。尽管他把不少时间用来深入研读《欧几里得几何》，但大部分时候他都在捣乱。他的污言秽语成了他与船长斯万维克发生争执的主要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清醒的时候，我的生活是极其可怕地肮脏、不虔诚。我从不知道自己是如此地亵渎神灵，我不但指天骂地，胆大妄为，而且还发明各种新式骂法，这常常遭到船长的严厉

批评。”

无论是从里面出来的，还是从外面进去的，牛顿的这张嘴都成了可责之物。在他年少的时候，他从不曾醉过酒。他后来回忆说，“我对酒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但是在1747年夏天，快满22岁的时候，他突然开始狂喝滥饮起来，他说：“尽管我不喜欢酒精饮料，但我愿意胡作乱闹，喜欢恶作剧。”

对于牛顿来说，为着胡作乱闹的目的酗酒其实是一种冒险行为，因为他很容易喝醉。后来，有一天夜里，灰狗号停泊在加蓬河入口处，发生一件事，表明牛顿因醉酒有过多么危险的举动。

那天，牛顿和四五个水手坐在一起，比赛轮流喝朗姆酒和杜松子酒，看谁能坚持时间最长。他们荒唐地豪饮作乐，不但把两种烈性酒混在一起，还用了一只公用的盛酒器——不是玻璃杯，而是一只海贝。牛顿酒力不支，他第一个显示出豪饮的后果。用海贝喝了几轮之后，他的脑袋和身体开始发热，跳到甲板上开始跳舞，舞蹈里面融合着非洲祭司最为狂野的技巧，那些旋转的姿势有可能是他从吉塔姆伏都巫术仪式中学来的。水手们不断为他击掌叫好。突然，他的帽子掉下去，飞落到水里。牛顿立刻像他常用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想做就做”——他爬上船边的围栏准备跳进救生艇里，他认为它就系在船边。酒精和月光让他丧失了判断力：救生船并未系在灰狗号旁边，而是由一条长绳子牵着，漂浮在大约20英尺外的水面上。牛顿正准备跳下去，在最后一刻，他的手都快松开了，一个伙伴从后面抓住他的衣服，把他拉了回来。这个举动救了他的命，不然，他就会掉进黑黝黝的水里，被加蓬河的强大水流冲走。像他同时代的许多水手一样，他从未学过游泳，所以，即使他当时头脑清醒也未必能活得了。他的伙伴们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根本无法援救他，而船上的其他人都在酣睡。牛顿后来把这次侥幸获救的事件归于上帝的保守。

此后，牛顿不断地制造各种危险事件“麻烦”上帝伸手保佑他。当灰狗号到达洛佩斯角时，他跑到内陆去打野牛。他一枪就射中了目标，但是当他和伙伴们进入林中寻取射中的野牛时，他们却迷了路。夜幕降临，他们穿过危险的沼泽和茂密的丛林，却绝望地发现自己正在绕圈子。在非洲，深夜是最可怕的时刻，没有指南针或星光的引导，他们深入到野兽出没之地。牛顿写道：“我们处于危境之中，没有灯光、食物和弹药，感觉每棵树后面都潜藏着一只准备随时跳出来的老虎……倘若情况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极有可能死于此地。”幸运的是，月亮和星星从云层后面露出来，一群人总算找到了回船之路，一路上没遇到一只丛林猛兽。

牛顿随后写道：“但诸如此类的保守对我仍然不起任何作用。”这就是说，他并未转向母亲曾经教导给他的信仰，也未感受到基督徒良心的谴责。甚至在他饿得要死、被强行囚禁的时候，他也从未曾向小时候深信的上帝大声呼求过，也很少想到要向上帝恳求赦免他的罪。可以推想，这种无神论的好战心和亵渎神的言词在现代精神病学家看来可能会被称作“过激反应的犯罪道路”，这种心理使牛顿一直积极地否认信仰和对他的内心造成困扰的良知，因此，在表面上，牛顿是一个全然不知悔过的罪人，如其自言：“我似乎浑身印满了拒绝悔改的标记，无论审判还是恩典对我都丝毫不起作用。”

灰狗号与洛佩斯角各地的贸易交往终于结束了，在最后的几天，斯万维克船长开始筹划回程路线。第一站就是安那波纳岛（Annabona），距西非大约 250 英里，是食品补给地。商船通常需要补给大量食物，包括活羊、活牛和家禽，还有大量桶装淡水。安那波纳能够提供大量补给，这是斯万维克在返回英国途中选择此地而非其他中途港停靠的原因。这段归途的航程有 7000 多英里，如果沿着信风路线航行，有可能在不到 5 个月的时间里走完。

1748 年 1 月初，灰狗号从安那波纳出发。一开始，斯万维克船长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商船朝西航行，直到望见巴西海岸。随后，船只又向北行驶，直到美国殖民地的东海岸，此时，距它宣称脱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王权独立约有 28 年。灰狗号向北又航行了大约 700 英里，到达英属殖民地纽芬兰岛（Newfoundland），在大浅滩（Grand Banks）停泊，这里是世界上鳕鱼最多的地区之一。不过，这种捕捞探险对于船员们而言，与其说是为了增加营养，不如说是为了娱乐。估计灰狗号储备了丰富的物资和淡水供船员们在归途中吃喝享用。1748 年 3 月 1 日商船从纽芬兰启程，连续八天乘着强劲的西风在大西洋上迅速前行，看起来灰狗号似乎要在预定日期前到达目的地。

在这次旅程的部分时间里，牛顿开始阅读一本重要的基督教书籍《效法基督》，作者是托马斯·厄·肯培（Thomas à Kempis）。他因何转而去读这本名作是个谜。也许他看《欧几里得几何》看烦了，也许灰狗号上可读的图书太少，他找不到别的可读。但显然，他并非受到某种基督徒式的

好奇或信服感的影响，他说自己“不小心”拿起这本书“只是为了消磨时间”，他还说，“我漫不经心地读着，仿佛这是一本浪漫小说。”

牛顿在船上找到的这本书是由17世纪晚期坎特伯雷教长乔治·斯坦霍普（George Stanhope）编辑整理的。该书原标题全称为——“基督徒的典范或论效法耶稣基督（英译本）四册拉丁原文作者托马斯·厄·肯培，另附默想录及为病人做的祈祷文”。这段略显冗长的表述说明斯坦霍普教长的编辑要比肯培的经典小文内容更多。该书于1698年第一次印刷出版，对信徒来说，它实际上是一本灵性启蒙读物。在《效法基督》中，有许多著名的段落供信徒们进行深入领会。我们无法知道，在肯培珍贵的神学表述中，究竟哪一句吸引了约翰·牛顿，也许它隐藏在下面抄录的几行中吧：

只有当你抵抗情欲，而不是向情欲屈服时，内心才会有真正的平安。

如果你欢喜地背负十字架的苦难，它也会担当你一切的忧患。

有耶稣的同在和友爱是何等地富足、欢喜、充满属天的甜蜜呀……但倘若你把信念和喜乐置于任何他之外的事物上，你将使自己何等地痛苦啊！

无论是斯坦霍普教长、托马斯·厄·肯培的写作还是圣经，这些表述都在约翰·牛顿的心中扎下了根，书里的某些内容将他从无神论的思想中唤醒。阅读之时，有一个想法不断地在他的心中萦绕：“如果这些事是真的，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无情地敲击着他的内心，让他无法再忍受。他说：“我合上书，决心不再想这些事。”这是1748年3月9日夜里他做的决定。但是到了3月10日早晨，只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他被一阵呼喊声惊醒，他的决定就变成另一种情形了。他描述说：“夜里，我像往常一样无所事事地上床睡觉，却在酣睡中被惊醒，海浪汹涌，猛烈地撞击我们的大船。海水涌进来，充满了我住的船舱。甲板上传来哭喊声——船要沉了！”

注释

[1] Greyhound 又译为快速船。——译者注

死荫之旅

“船要沉了”可不是一句玩笑话。那股在过去的9天一直推动灰狗号顺势而行的狂风逐渐增强为北大西洋的狂风。船身的许多地方都不太适合航行了，因而在这场狂风中无力招架。过去的15个月里，在非洲赤道的水域中，商船的木料开始腐烂，船帆破落，缆绳磨损。1748年3月10日凌晨^[1]，当大浪排山倒海般地涌来时，上首船头有一块地方被一波巨浪打得粉碎，折断的厚木板使船侧面露出一个大洞，海水迅速涌入，不一会儿，灰狗号就灌满了水，面临沉没的危险。

牛顿当时正在铺位上睡觉，大浪扑来，撞碎船头横梁发出的断裂声惊醒了他。海水旋动着涌进他住的船舱，他急忙跑出去找舱室升降梯，想爬到甲板上。还没等他爬上去，船长就命令他回舱里拿把刀。牛顿听从了命令，另一名水手攀上梯子爬到甲板上，却立刻被大浪卷到了船外。在这一刻，对于自己的侥幸逃脱和同事的碰巧死亡，牛顿根本没有时间做任何反应，他说：“我们连为他哀哭的时间都没有，而且也没法去救他，因为大船马上就灌满了水。”

随后的几个小时里，几乎所有人都变成了抽水机，有12个水手同时用水桶向船外倒水，但更多的海水仍然不断地涌进来。使灰狗号免于沉没之险的是船上与众不同的货物——蜂蜡和重量较轻的非洲红木。这些物品虽然也遭到水浸，但它们的浮力却帮助商船脱离了沉没的危险。一个船员和所有的羊、牛和家禽都丧生了，在暴风雨肆虐的几个小时里，他们统统

被卷进海洋，同时被卷入海里的还有大批食品。

拂晓时分，暴风雨开始平息，但海浪依然汹涌，商船仍处于极度危险之中。随着天光渐亮，大家看见船身的木板腐烂、开裂，大量的海水不断地从裂缝和漏洞中涌入。人们用各种厚木板、寝具和衣物堵住破口，又从船上其他部位拆下了几片木板，用钉子钉牢，封住了船身最大的破洞。在紧急修护中，牛顿试图开个玩笑给一个同伴打打气，说几天之后他们就会喝着酒来回忆这场考验了，但这个玩笑毫无可笑之处，那位水手反倒放声大哭，呜咽地说道：“完了，现在已经太晚了！”

这种极度悲观的情绪瞬间也传染了牛顿，此后，他从未忘记过那种“在暴风雨中不停地向船外倒水，连继续活 15 分钟的希望都没有”的绝望感。上午 9 点，为生存进行的抗争已经让牛顿累得筋疲力尽，冻得瑟瑟发抖，他找斯万维克船长谈话。两个人都明白，尽管风力有所减弱，但已经受损的灰狗号飘摇在大西洋的惊涛骇浪中，仍然随时都有沉没的可能。他们两个人中一定有一人提出了最后加固船体的建议，因为牛顿忧心忡忡地与船长交换意见后，得出结论说：“如果这样都不行，只好求上帝怜悯我们了。”

此言一出，牛顿自己都大吃一惊。他回忆说：“我一下子被自己的话惊呆了，许久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渴望向上帝求得怜悯。”先前，从约翰·牛顿嘴里吐出来的通常只有诅咒、辱骂和对上帝粗暴的拒斥，此时，他竟然用一种尊崇敬畏的口气提及上帝之名，他对自己感觉震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海上行程中，牛顿内心的良知被突然唤醒的情形很像后来人们所熟知的那种“散兵坑信仰”（foxhole religion），就是那种在战斗中惊恐地蜷伏于掩体坑里的士兵所处的境况。灰狗号处于危难之际，约翰·牛顿当时的处境让人不由得想起他的同代人、18 世纪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说过的一句话：“船上的生活和在监狱中差不多，而且前者还多了沉没的可能。”或者借用另一位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的格言：“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将被吊死时……他会超乎寻常地集中精力思考。”

牛顿整个早晨忙着向船外倒水时，他的大脑开始了敏锐的思考。当时船上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他说：“几乎每排大浪都让我的大脑受到冲洗，我们用缆绳把自己系紧，好使自己不至于被大浪卷进海里。事实上，我每次都希望大船沉到海里别再升起来了。”周围弥漫着恐惧的气息，牛顿开

始同上帝就自己在永恒中的未来前景进行了一番悲观的交流。他当时累得筋疲力尽，无法再做排水的工作，被派到甲板上去掌舵，在那儿开了 11 个小时的船，这给了他一个“便于思考的良机”。他大部分的思考都是消极的，他反问自己：“还会有怜悯落到我的头上吗？”他得出结论说，任何用下流话笑骂上帝和他的福音的人都没有可能在落难时刻得到拯救了。可是，另一方面，牛顿又想起小时候在圣经里学会的那些句子，他仍然记得上帝的种种应许。他回忆自己长大后一系列曲折离奇的经历，他把它们描述为“我曾经历过的各种召唤、警告和救助”，他想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否就通过这些事件表明出来。

3月12日晚，牛顿听说底层甲板上的排水工作终告成功，一种不乏克制的乐观情绪代替了他的恐惧。他说：“晚上6点钟，我听说商船里的水被排干净了，心里立刻升起一缕希望，我想我已经看到上帝之手对我们的安排。我开始祷告。”

对约翰·牛顿来说，祈祷早已不是一种熟悉的习惯，以至于他没办法在信心中祷告。他没有大声呼求上帝的帮助，而是向他祈求物质援助。后来，他描述说这种代求很像是“鸦啼”，它不是那种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信徒的祈祷。不过，当牛顿想起那位常受他嘲笑的耶稣时，他越发渴望得到一种证据向他表明信仰的真实性和圣经具有的神启的真实性。

当他为此进行思考和祈求时，风慢慢地平息下来。灰狗号在大西洋上漂得太远了，它至少要航行 10 天才能到达最近的陆地。日渐好转的天气状况让船员们一时生出了希望——尽管船身有所损坏，但他们仍然有可能到达安全的港湾。不过，这个希望马上就消失了，一个新的生存威胁——饥饿——摆在了他们面前。

船上的食品供应库存一旦发生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骇人的景象。所有的牲畜都在暴风雨中被卷落海中，连剩下的食物也未能幸免。经过海水的浸漫，船上的大部分储备食品都变成了无法食用的糨糊。唯有船员们在纽芬兰岛大浅滩捕捞的鳕鱼保存完好，此外还有几袋用来喂猪的谷物和豆子。这些所剩无几的食物如果按照最低配额分配，至多能够维持船员一周的生活。（当时以为）唯一令人安慰的货存是船上还保留着大量淡水。

食物缺乏导致的凄凉气氛在一天早晨的拂晓时分突然被打破，瞭望员喊道：“哈！陆地！”牛顿和船上的其他人一起跑到甲板上，凝望着远处的地平线。美丽的朝霞似乎正在为从阳光照耀的海面上显露出来的岛屿、小

丘和山冈拉开大幕。牛顿用“光明灿烂的前景”来形容当时的景象，他也一定把天际出现的那些神秘的坡线看作是祷告的回应。在暴风雨最为猛烈的时刻，他的内心经历了激烈的争斗，他改变了先前的习惯和态度。他在回忆中写道：“我把大部分空余时间都拿来阅读和默想圣经，向上帝祈祷，求取他的怜悯和引导。”

牛顿认为他在那个令人振奋的清晨从灰狗号上看到了上帝的怜悯，并确信“我们很快就会平安无事，第二天就将丰衣足食。”在瞭望员宣称看见陆地的最初一个多小时里，整条船洋溢着巨大的幸福感。大家一致认为，他们焦虑的双眼所望之处的那片时有时无的物体是绵延海岸的山脉峰顶。导航计算机显示商船距爱尔兰大约 20 英里，因此，他们所望见的海岸有可能就是爱尔兰的西北角地区。斯万维克船长对此确信不疑，他甚至下令打开船上最后一瓶白兰地。酒瓶在欢欣愉快的气氛中在大家手中轮换，每个人都喝了一大口。一个声音快活地叫道：“很快我们就能喝个痛快了！”基于同样的心情，人们分发了最后一点面包。牛顿描述说，在那种情形下，同伴们好像“一群获得死刑特赦的人”。

船上一位经验丰富的水手哈迪（Hardy）对此表示异议，他用严肃的警告口吻声明他希望“那真是一片陆地”。他的疑虑使船员们对地平线上出现的那道影子开始了尖锐的争论——那真的是陆地吗？还是海市蜃楼？对远处进行更为仔细的观察后，那片所谓的山脉和岛屿随着太阳的升高开始变得越来越红，结论也就越来越清晰。水手们都知道，红色是一个明确的标志，意味着早晨看见的那片“陆地”不过是阳光、海水和云影制造的视觉幻象。当船上的人们明白真相之后，巨大的幸福感顿时被沉重的沮丧所取代。约翰·牛顿和灰狗号上的所有水手即使不会被饿死，也要面临天越来越冷、风越来越强劲、抵达陆地的希望完全破灭和饥馑带来的绝望前景。

注释

[1] 牛顿后来的许多信件和日记谈及这场暴风雨的周年纪念时，他记录的时间是 1748 年 3 月 21 日。日期的改变缘于 1752 年进行公历改革加入的 11 天。

船上浪子

尽管灰狗号上所有人对早晨看到的“陆地”最终被证实是一种幻象感到由衷的失望，但在接下来的 24 小时之内，船员们的心里仍然不乏期待。牛顿回忆说：“我们安慰自己，看不见陆地只是暂时的，只要风浪仍然平静，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大陆的。”可惜，第二天早晨海风改变了方向，一场从东北吹来的狂风一连持续了 14 天。

对于船上所有船员来说，这真是一场艰苦卓绝、令人疲惫不堪的考验。考验之一就是如何面对暴风雨。灰狗号的船首破了一个大洞，虽然船身的许多裂缝和小洞都被不断地修补填实了，但它其实已经不适合在狂风巨浪中航行了。此外，还要让破洞的位置尽量处于下风区。这些都需要船员具备良好的航海技术，而大部分的船帆都被吹走了。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海水不断地涌入下甲板，需要昼夜不停地排水才能保证船体的安全。

而此时，因为极度疲劳、缺乏食物和天气寒冷，船上的每个人都已经奄奄一息、筋疲力尽了。面对最后仅存的一点食物——几小块腌鳕鱼——大家只能紧缩配额。食物少得可怜，大家饱受饥饿的折磨，有一个船员死了。已经衣不蔽体的人们同时还要忍受低温和冷风的侵袭。所有的烦恼都在一种低迷的士气笼罩之下，这种低落的情绪和气氛让水手们不由自主地谈起同类相食和人祭的事。牛顿对船员们当时的心理概括道：“想到不是被饿死就是彼此相食，和这种恐惧相比，外面的饥寒交迫就算不得什么

了。每一天我们的希望都越来越黯淡。”

这一次，在谈及遭受的磨难和痛苦时，牛顿成了船员们谈论的焦点。灰狗号船长斯万维克的脾气越来越糟，他把牛顿当作特别挑选出来的谴责对象。别忘了，早在航行初期，牛顿的嘴里就不断地诅天咒地，对上帝之名大加亵渎。斯万维克认为应该把这位渎神的乘客扔到海里以平息神怒，于是他转向牛顿，多次指责他是“带来灾难的唯一原因”。

情况越是危急，斯万维克船长对牛顿的指责越强烈。这自然令人想起旧约中约拿与大鱼的故事，船长认为也许只有一种办法能够拯救商船和剩下的船员，那就是把牛顿扔到船外。就像水手们胡说着彼此相食之事一样，这个说法谁也没太当真，但牛顿自己对此却很忧虑。他回忆说：“大家不断地重复这件事让我相当不安。”不过，这种不安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他害怕成为人祭牺牲品，而是他的良心不断地受到刺激，似乎在与斯万维克船长的指责相呼应。他说：“我认为很有可能，降临在大家头上的这一切祸患都是由我引起的。上帝的强大威力催促我猛醒，使我在心里自己责备自己。”

在这一刻，牛顿内心的悲伤用一句神学术语来表达就是“悔罪”。这句话的表达还不算准确，因为他当时的内心状态比较混乱，还未形成清晰的定势，大西洋中部的风暴只是促使他重新转向从前在母亲膝前和威坪小教堂里学到的知识。在他学到的知识中，最强有力的一个信息就是，所有的真理之源就在圣经中。然而，在灰狗号上，没有基督徒的朋友或引导者帮助牛顿理解圣经。他能做的就是背诵圣经的话语片断，并随意加以解释。不难理解，当他不断地受到要把他扔到水里去的说法刺激的时候，他转向圣经就像在汪洋大海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牛顿最初想起的新约中的两句话帮助他度过了危机。他在船上读到詹姆士国王版圣经，这个版本的圣经当时已经发行了137年，所有说英语的基督徒都把它看作是“钦定本圣经”，他被《路加福音》11：13所吸引：“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牛顿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这本书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一段中包含的应许就一定是真实的。我需要得到圣灵……我一定要为此祈求。”

但是对于这个祈祷者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对自己所祈求的上帝并不相信。不过，用心读过《约翰福音》7：17后，他就跨过了这个障

碍。那一段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否出于神。”牛顿对这句经文的解释是尽管他不接受基督教的福音，但他眼下应该按照所读的去，至少这句话让他能做祷告。也许与内心的认识相比，促使他祈祷的动机更多的还是源于外在的天气状况。一个喜欢冷嘲热讽的人可能会说牛顿的祷告只是为了保命，但这个说法与他后来的叙述并不相符。对福音书的阅读开始对他产生了影响，早在灰狗号最终抵达陆地之前，牛顿就感觉他对圣经的研读已经“在我心里给出了一个满意的证据——福音是真理”。在海上航程中，这个转折点出现在他阅读《路加福音》15：11—32 中讲述的那个浪子回家的比喻。他认为自己就是故事中那个品行不端又任性妄为的小儿子，他对父亲竟然满怀恩慈地跑出来迎接并原谅这么一个儿子感觉不可思议。牛顿越思考上帝对悔罪之人的怜悯心肠，他的祈祷就越多。他说：“我看出，直到那个时候，上帝都未放弃我，我希望他再帮我一次。在那种情况下，外部环境促使我更为认真恳切地呼求上帝救我脱离危难。”

大约在 4 月 6 日，风力减弱并改变了方向。灰狗号船员意识到他们脱险在即。新的航线使船能够更容易让破损的部位不受海水的影响。按照指南针的指向，斯万维克船长计算出商船再一次朝爱尔兰海岸行驶。牛顿用一种明显带着乐观口吻的语气写道：“当我们继续行进时，希望在我心中升起，胜过了种种恐惧。”突然，瞭望塔上再次传来叫喊声——“哈，陆地！”这一次，没有虚假的曙光，也不是视觉幻象。4 月 7 日，人们已经能清晰地看到多尼哥（Donegal）外的托利岛了。24 小时之后，灰狗号绕过旦利（Dunree）前部，风尘仆仆地驶入宁静的斯威利港（Lough Swilly），于 1748 年 4 月 8 日靠岸。在这个平静海湾停泊意味着海上苦斗的最终胜利。当约翰·牛顿踏上爱尔兰坚实的大地时，他意识到自己同时也踏上了灵魂的救赎之途。正如他所写的：“从此，我开始知道，有一位上帝，他倾听并回应祷告。”正是这一次，约翰·牛顿归信了基督。

爱情与船主

灰狗号驶入斯威利港后几天，牛顿对自己外在表现的评价是——“从外表看我变了一个人。”有不少证据可以支持他的声明。他不再口出狂言，反倒开始去教堂了；他努力阅读宗教读物、参加团契活动；第一次参加早晨聚会，他就领了圣餐，并且做了庄重的承诺，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上帝。牛顿回忆说：“我很早就起床，对于个人的灵修极为认真和热心，带着一种非常神圣的热诚，我把自己永远地献给了上帝。”牛顿补充说，当他在伦敦德里教堂做完信仰宣誓之后，他感觉一股深切的平安流注他的全身。可惜，这种改变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几个月之后，牛顿又开始故态复萌。不过，与他将自己全然献给上帝之前那几年所发生的失足、堕落和罪孽相比，这时的牛顿至少还是有所改变的，尽管其心灵历程的发展不够稳定，但仍呈现出不断成长的迹象。

牛顿把自己经历的各种巧合和死里逃生都看作是上帝恩典的标记。在灰狗号到达爱尔兰的那些日子里先后发生了三件事，他解释说那正是上帝保守的结果。第一件事是商船在港口抛锚停泊不过几个小时，风向和风力就发生了改变。如果这种变化发生在商船刚刚靠近爱尔兰海岸时，她就有可能再次被风吹到大西洋上去，所有船员将面临灾难性后果。牛顿特别提及的第二件死里逃生的事是，在灰狗号安全到达港湾之际，没有人知道船上的淡水供应已经告竭。船员们一直认为六只木桶里装满了水，在船上时从未试图定量供应淡水。事实上，当他们在斯威利港的平安境况中重新检

查时才发现，所有的木桶都是空的。其中一只木桶里的水，大家在海上一直喝到最后一滴，而另外五只木桶因为在暴风雨中受到严重损坏，桶里的水已经一滴不剩。可以说，他们当时已经离渴死只有一步之遥了。

第三件事发生在牛顿身上。有一天，伦敦德里镇长邀请他一起去打猎。在那天，牛顿打破了所有日常安全规则。他攀上一处陡峭的堤岸，枪里装着子弹，枪管斜对着他的脸。扳机不经意间被扣动，牛顿侥幸没有受伤。他后来说，在那一刻，子弹就在他脸边掠过，他回忆说：“子弹擦着我的脸，把我头上的帽子烧掉一个角。当我们自认为极端安全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自己可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上帝在危急时刻全力救我们脱离险境，即使在最平安无恙的境况下，这种保守也是必不可少的。”

牛顿在爱尔兰的生活既舒适又安全。灰狗号用了两个月进行修理，在这段时间，他受到了伦敦德里小城内外的欢迎和礼遇。不但镇长邀请他去狩猎，那些慷慨的主人也邀请他赴宴，他们的殷勤好客让牛顿瘦削的身体得以康复，受伤的心灵得到安慰，他说：“我被临时安排住在一间特别舒服的房间里，待遇非常好，我很快就恢复了身心健康。”

在伦敦德里小住的那段时间，牛顿的日常生活就是每天去教堂两次做晨祷和晚祷，并且给在英格兰的亲友们写信。他们已经有18个月没接到他的任何消息了。他的父亲牛顿船长以为灰狗号已经沉于海底，当听说长子安然无恙时，他真是喜出望外，立刻着手筹划带牛顿一起开始下一次赴加拿大哈德逊海湾（Hudson's Bay）的远航，牛顿船长将以刚刚任命的约克堡总督身份远赴大英帝国北部的这个前沿基地。可惜，因为小牛顿所在的灰狗号延期修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当灰狗号在爱尔兰加班加点地修整完，小约翰·牛顿总算到达了英格兰海岸，而就在几天之前，老约翰·牛顿已经扬帆启程远赴加拿大了。父子二人失之交臂，未能团聚，成为日后巨大的遗憾。两人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相互寄发饱含亲情的信件，1750年，牛顿船长在哈德逊海湾游泳时不慎溺亡，他的过早去世导致两位约翰·牛顿从此未能再见。

牛顿船长在远赴加拿大之前不久，曾经从威坪到查塔姆看望了前妻的表妹卡特莱特一家。小约翰·牛顿在写于爱尔兰的信件中提及了这次会面。也许他已经把自己对波琳·卡特莱特的爱慕之情告诉了父亲，也许他给波琳的母亲或者姨妈写信打听求婚的前景了。无论他在信里说了什么，它都促使牛顿船长打算前往卡特莱特府上做一番调解工作。伊丽莎白·牛

顿于1732年因肺病去世后，她的表妹卡特莱特一家对刚作鳏夫不久就匆忙续弦的牛顿船长颇有微辞。事情过去16年之后，当波琳的父母和牛顿的父亲开始讨论两家后代彼此联姻的可能性时，显然他们已经原谅了船长当年的匆促再婚。两家家长最终决定祝福两个孩子，现在轮到两位年轻人自己决定是否要彼此结为夫妻了。

牛顿显然不知道事情的进展情况。1748年5月，他踏上利物浦的土地时认为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波琳。他之所以立刻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很快发现，灰狗号的斯万维克船长在非洲告诉他将在英格兰每年获得400英镑遗产的故事完全是编出来的。牛顿原本是因为这份美妙的财产才踏上回家的旅程的，他相信，有了这笔本不配得的财产后，卡特莱特一家就能允许他娶波琳，但如今他的浪漫计划彻底破产了。当牛顿意识到自己从一个身无分文的求婚者变成一位大有能力的新郎的梦想是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时，他简直要崩溃了。在极度痛苦中，他接受了他永远无法和波琳成婚的现实，他决定从此不再和她联系了。在写给波琳的姨妈艾文斯菲尔德太太（Mrs. Eversfield）的信中，他表达了这个想法。艾太太有段时间一直积极地帮他传递音信和情书。在这封日期为“1748年5月24日”的信中，牛顿表达了对那份从未曾存在过的遗产的失望。他说自己没有钱，这“剥夺了我在过去五年里所有的希望，那是我渴望实现的唯一目标（我只能这么说）。我非常爱我的表妹波琳。现在仍然爱她，就像从前一样，正是这份爱让我现在决定尽力放弃我的（提亲）愿望。”

谈完自己“绝无可能”改变经济状况后，牛顿以激烈狂乱的措辞宣布他要断绝对波琳的爱恋之情：

所以，这封信的中心就是想告诉您，我决定从现在起尽可能地不再思念波琳了。尽管我的内心曾经对她充满激情但我尽力把它压抑在心中不希望她或者您受到任何打扰。我希望您再见到她时能替我向她恳求，尽管我的处境使我无法希冀她的爱情，但请她仍然愿意在友情和祝福之地为我留个位置，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真切地希望她能找到一位能给她带来更多幸福的未来伴侣，就像我从前希望自己能带给她的那样。

可以想见，当波琳的姨妈艾文斯菲尔德太太读到这样一封诀别信时，她一定会为牛顿对表妹的一腔痴情所打动，也一定会为牛顿在恋爱无望之

际表现出来的高贵品质所感动。不过，直到此时，牛顿对事态的真相仍然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卡特莱特家和他的父亲已经对他和波琳的结婚事宜进行了商议，他也从不曾知道那些事项中是否包括牛顿船长提供的聘礼或财产。给艾文斯菲尔德太太寄出那封感伤之信后不多天，牛顿听说了两家人对他的婚事的积极态度。这时，牛顿才发现，他求婚成功的唯一障碍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求婚对象——波琳。他对这种状况总结道：“当我转回来的时候，才发现，我其实只需获得一个人的同意。但就像第一天与她见面时那样，我一直不敢确定能否和她站在一起。”

牛顿不但婚姻前景无法确定，他的职业前途也充满了不确定因素。这些事都由他父亲的老朋友、利物浦的船主约瑟夫·曼内斯特帮忙解决了。牛顿对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上帝为我预备了另一位父亲，就是这位先生用他的船把我带回家，他以无上的仁慈和真挚的友爱接纳了我，并给我以帮助……他是上帝恩慈的器皿，我对他充满感激。”

约瑟夫·曼内斯特本可以更为慎重地接待牛顿，如果不说是满心疑虑的话，毕竟6年前牛顿曾经无礼地拒绝了他提供的职位。当时，17岁的牛顿没能及时赶到利物浦搭上那条准备带他赴牙买加的商船，他原本是要在曼内斯特的庄园跟随一位合伙人做学徒。牛顿漫不经心地错过了启航时间，只因为他对波琳一见钟情，滞留在查塔姆，而未能远航加勒比海。这个举动当时让牛顿的父亲大为光火，也一定让约瑟夫·曼内斯特大为失望，可能也颇受伤害。

不过，尽管有这段历史，当约翰·牛顿于1748年5月到曼内斯特在利物浦的办公室拜访他的时候，曼内斯特显然已经原谅了他。这位船主不但忽略了这位年轻人6年前的失礼，他还以慈父之心热情欢迎这位浪子。虽然没有肥牛招待，曼内斯特却为他的拜访者提供了一个令航海者拥有更为美好前程的机会——在船上做船长。

可以设想，约瑟夫·曼内斯特邀请约翰·牛顿在其船队的某艘船上做船长，不会仅仅是出于对一位老朋友的儿子的慷慨大度。更可能的是，曼内斯特听完斯万维克船长所说牛顿在灰狗号穿越大西洋风暴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后慎重思考的结果。终于平安回到陆地后，也许斯万维克船长对自己在海上大发雷霆感觉尴尬，尤其对自己要把像约拿一样带来厄运的牛顿扔到船外去的威胁性说法感觉不安，他有可能告诉曼内斯特牛顿如何长时间操纵船舵，用自己的技术和勇气驾驶受损的商船穿过暴

风雨的袭击。

无论出于哪种方式，在曼内斯特建议牛顿担任船长之前，他已经对牛顿的航海技术报告感觉非常满意了。船主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基于牛顿对自己先前在非洲的探险和商贸经历的叙述，因为约瑟夫·曼内斯特邀请牛顿担任船长的那艘名为“布朗罗”（Brownlow）的商船是特别为贩奴设计建造的。

布朗罗号的远航

牛顿对担任贩奴船船长一事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顾虑，但几经考量，他还是拒绝了约瑟夫·曼内斯特的建议。他的拒绝源于其性情的日渐成熟，是一种谦卑的表现，同时，他也对波琳·卡特莱特有一天能够对他的爱情有所回应重燃希望。但这些因素并未能改变他成为远航海员的人生经历。1748年夏，牛顿接受了约瑟夫·曼内斯特为他提供的另一个职位，就是在布朗罗号上担任大副而不是船长。

牛顿对于黑奴贸易缺乏道德焦虑仅仅表明，一个18世纪中叶的年轻人，会很自然地接受当时英格兰的社会观念和习俗。那时英格兰还是一个野蛮的物质主义社会，对商业利润的追求盖过了良心的声音。不管怎样，奴隶贸易自身的不公正性许多年来一直未受到批评。宾夕法尼亚州贵格会信徒最早发出了抗议之声。1758年，在费城的年度聚会上，他们声明奴隶制不符合基督教原则。但无论是他们还是英格兰的贵格会伙伴，直到18世纪最后25年才开始明确地谴责贩奴生意。1783年，废奴运动出现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英国贵格会信徒建立了一个“救济和解放西印度黑人奴隶与阻止非洲海岸贩奴贸易”的协会。这件事发生在牛顿被邀担任布朗罗号船长后来做大副的25年之后。但在当时，对于这项任命，他的良心几乎从未受过任何困扰，当时也没有人对贩奴贸易进行过道德批判。

牛顿不愿担任贩奴船船长主要是基于现实而非伦理方面的考虑。他没能爽快地答应约瑟夫·曼内斯特提供的第一个职位，是因为其性格的变

化。先前那个鲁莽、无所顾忌、奉“想做就做”为金律的少年在 25 岁时变成了一个诸事谨慎、深思熟虑且极为谦逊的青年，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拥有良机。

有一个证据可以解释年轻气盛的牛顿如何变得谦虚慎重，对于请他担任布朗罗号船长的任命，他这样表达自己的犹豫心态：“经过慎重考虑，我拒绝了这个邀请。迄今为止，我的个性一直是躁动不安和粗心大意的。我想，在贸然接受这个职位之前，我最好先随航一次，学习服从命令，获得更多的见识和经商的经验。”

牛顿提到需要获得“经商的经验”与他对波琳·卡特莱特的爱恋直接相关。他认为自己需要获得“一笔财产”才有可能与波琳成婚。为了成功地赚取这些财产，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全面地预备自己，好使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在约瑟夫·曼内斯特的船队做一名船长。如果他贸然同意做船长，万一商船失事或者损坏，他的前途就会被葬送。因此，他决定先以大副或者船副的身份随同一位他尊敬的船长作一次远航，得到一些锻炼和提高。这是一个聪明的决定。

在约翰·牛顿的生活期望中，对于巨额财富的憧憬始终伴随着对于婚姻期待。1748 年 5 月底，他从利物浦航行了 250 英里到达伦敦，看望了卡特莱特一家。他们热情地欢迎他。牛顿与波琳总算再次相见了，但他却面红耳赤，说话结结巴巴。他回忆说：“我只有一次机会看见我最心爱的人。在谈话中，我笨拙至极。”不过，牛顿一回到利物浦，就给波琳写了一封情书，更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感受和心意。在焦急地等候波琳的回信时，他还给波琳的弟弟杰克·卡特莱特（Jack Catlett）写了一封信，信中坦率地写道：“倘若我的恋爱未能如愿以偿，它将变成一种推动我进入世界的动力，促使我努力抓住一切机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奋勇向前，总有一天我会达到目标。”

牛顿写给杰克·卡特莱特的信多少有点儿言不由衷，其实他寄给波琳的信已经近乎正式的求婚了，正如牛顿自己所说的：“我在信中以这种方式提及这个问题让她不能不给我一个答复，除非我真是错看了她。”

牛顿当然没有错看，他心爱的波琳给了他明确的答复。他说：“她的回答尽管措辞谨慎，仍让我深得安慰。我看明白，她从未接受任何人的求婚，她甚至不愿等我远航回来再办此事。”波琳的回信令约翰·牛顿大受鼓舞。1748 年 8 月，这位布朗罗号的大副满心欢喜地登上了远赴非洲的

航船。

从利物浦到非洲需要航行8周，在沿途海岸还要用8个月的时间进行奴隶贸易活动。当一条驶往西印度群岛的载人货船被围起来时，声名狼藉的交易和对奴隶身体的虐待是当地部落首领和白人奴隶主之间进行讨价还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牛顿不是第一次从事这种交易，但这次远航对他来说仍然是一种新的体验，毕竟他此时已经是一位船长了。作为布朗罗号的大副，牛顿充当交易先锋，用些不值钱的珠宝小玩艺儿交换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给这些奴隶戴上镣铐，把他们拖上船，囚禁在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底层甲板。没有证据表明，1748至1749年间，在布朗罗号沿非洲西海岸航行时，在信仰之路上蹒跚而行的牛顿，他的信仰使他在苦待黑奴时与别人有何不同。这位贩奴船上的大副的日常工作就是强迫那些流着眼泪的男人离开自己的妻子儿女，给那些高声呼喊的人戴上脚镣，把他们用锁链拴在肮脏可怕的狭窄空间里，那儿不比屠宰场的牲畜圈好多少。很可能牛顿就是这么做的。尽管牛顿对自己放荡不羁的一面未进行过分详细的叙述，但他后来对这段生活的回忆还是清晰地表明，他曾沉溺于与船上的非洲女人的淫乱行为，他承认自己“堕入了一种罪恶行径中，几个月以前我还以为自己有能力坚持得更长些……但我根本不想也无力胜过自己”。

在非洲之旅开始之初，牛顿就从伦敦德里和利物浦的虔诚堕落为布朗罗号甲板上的残忍了。他回忆说：“离开利物浦不久，我对上帝的渴慕等待之情便变淡了。我很快便偏离了。到达几内亚时，我好像已经把上帝的恩典忘得一干二净……我几乎像从前一样糟糕可恶。”

牛顿言行举止中有一个真正的改变，就是他不再诅咒叫骂了。从前那些从他嘴里滔滔涌流的咒骂和亵渎之辞完全消失了。不过，倘若某位记录天使在天国账簿的收入栏里记录了这么一个改变的话，那么他在总账的支出栏恐怕要记上更多的没变化。正如牛顿自己所说的：“敌人预备了一系列试探，而我是一个很容易到手的猎物。”

布朗罗号停泊的第一站是普兰提内群岛，牛顿显然很乐意重回旧地与阿莫斯·科劳和PI公主相见。18个月以前，他们曾经无情地虐待过他。当他们看见这位前白奴再次出现在眼前时，可以想象他们有多么惊诧了。也许他们会不无难堪地记起科劳的讽刺性预言——那天，他看见牛顿像奴隶一样汗流满面地栽种酸橙树——“谁知道呢，也许这些树长大结实后，你就可以回到英国，弄个船长干干，重回旧地，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了，

谁知道呢？我们拭目以待喽。”牛顿的生活经历比小说还精彩离奇，他自然记得这位雇主当时的嘲讽。他后来回忆：“在普兰提内，我从前的为奴之地，我此时身处顺境，受到两位从前轻视我的人的吹捧。我从前种下的酸橙树已经长高了，明年就能结实了，到那时，我希望带着一条自己的船重返此地。”

1749年初，牛顿沿着危险的海岸线开始贩奴航行，他的大好前途几乎总是令人担忧地伴随着“许多危险试炼网罗”。他在普兰提内享受的优待，只是其日常活动中的一个例外，通常他要乘无篷船到各种河流去做短途旅行，从沿岸进入内陆寻找黑奴猎物。船员中有7个人在远征途中死于热病，还有几个船员受了伤，另外一些船员被心怀敌意的当地人下了毒。牛顿描述说，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野蛮残忍，暗藏杀气，随时寻机报复”。这似乎让人不由得想到，这种语含轻蔑的表达对他带领的那个专门针对黑奴的水手抓捕队一样适用。

对非洲土著缺乏了解可能也是导致白人入侵者在开发过程中遭到憎恨的主要原因，这在牛顿偶尔给波琳写的信中有所反映。在一封信里，牛顿尝试着把他自己唯利是图的贩奴活动与天主教神父们的传教活动相提并论，他郑重地指出：“我们就像那些引人入教的耶稣会教士那样，不可避免地吃了许多苦，不断地乘船远游四处买人。”

那些在贩奴行程中遇到的种种辛苦包括令人惊恐的天气、危险的独木舟旅行、遭遇野兽以及不计其数的死里逃生。但这些危险似乎并未给牛顿造成任何困扰，他向波琳详细而形象地描述过各种险境之后，就用轻松愉快的语气对波琳说，尽管“在这儿我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但我向你保证，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来没像这次离开利物浦时那样地幸福”。

牛顿的幸福之源有一部分来自于他对上帝的信心，他坚信在他做贩奴首领时，上帝一直在保佑他。在写给波琳的同一封信中，他说：“自从上次分别至今，我能平安地脱离种种险境全赖上帝的保守，但愿他一直保守到底。”

几个月后，牛顿极为偶然地避开了一起致命的翻船事故，他把这个事件看作是上帝保守他的另一个例证。这起事故发生在1749年夏，当时布朗罗号的非洲之行接近尾声，正准备满载一船黑奴启航赶赴西印度群岛。商船停靠在塞斯特斯河（River Cestors）的入口处，距离塞拉利昂南部大约300英里。为了得到必要的粮食补给，每晚都要派一艘随船大艇上岸，

其任务就是获得足够的食品，尤其是淡水。大艇经过长途划行到达安提瓜岛，第二天再带着一船供给返回布朗罗号。牛顿是大艇指挥官，连续几天赶到岸上带回供给物。一天晚上，牛顿站在大艇上正准备出发，布朗罗号的船长突然从船舱里走出来，招呼大副回甲板。没什么特别的理由，船长让牛顿留在船上，命令另一个人代替他去大艇上做指挥。牛顿对此非常惊讶，因为大艇从来都是由他来指挥的，他问船长换人的原因，船长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那天晚上，没有常务大副的大艇离开布朗罗号后就再也没回来。它翻在河里，那位替换牛顿做指挥的水手被淹死了。船长本人并不是基督徒，他当时觉得他也许应该出面保护牛顿不受伤害，对那种神秘力量的催促他感觉相当震惊。船长超乎寻常地坚持要大副从大艇上下来，使他避开了这段死亡之旅，对此若是要求他予以解释，他也只能说他有此举动完全是依靠某些奇异的直觉。牛顿说：“他告诉我，在那个时候，他把我换下来没什么别的原因，他只是突然产生了一种要阻止我上船的想法。”大艇事件令牛顿大为震动，他相信是上帝保守他死里逃生，这让他再次下决心要战胜自己天然的罪性。布朗罗号返航的途中，牛顿转向了信仰寻求和发现之旅。

书籍、 肉体与灵魂之争

在布朗罗号回程的路上，约翰·牛顿在船舱里阅读和学习，智性和灵性上的渴求越发加增。

智性上的养分主要来自贺拉斯（Horace）的颂诗。牛顿第一次读罗马人贺拉斯的诗是在一本杂志的文章中，正是那首在文章中极为夺目的颂诗促使牛顿买了一套附有英译文的贺拉斯作品集。在令他生厌的埃塞克斯寄宿学校读书的时候，牛顿就已经显露出翻译拉丁语诗歌尤其是维吉尔（Virgil）作品的才能了。在布朗罗号上，他全身心地沉浸在贺拉斯的诗歌中，开始重新恢复阅读能力。他回忆说：“经过艰苦努力，在稍感迷惑的时候，我经常会有所领悟。逐渐地，我取得了进展，不但理解了许多诗歌和书信中包含的情感和意义，而且开始能欣赏作品的韵律之美了。”

从他对自己夜以继日地研读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牛顿是一个热忱的自学者。贺拉斯的颂诗是最复杂的拉丁语诗歌，一位学者要下很大工夫才能将其颂诗中出现的俄斯科勒波特体、格莱坎诗体、阿尔凯奥斯体、萨福体或者莫勒科拉提克体等阐释清楚，才能够把那些书信和讽刺文的六步格中那种朦胧多义的精妙表达明白。作为一名远航冒险家和“活动家”，牛顿对这段生活经历进行生动的描述中似乎只有不多的线索表明，他的理解力能够应付这种学院式的挑战，因此，当他回忆说“我脑子里更多地装的是贺拉斯的诗，比其他的拉丁语大师多。因为没谁能帮我，在我完全理解诗义之前，我通常只能把一大段诗记在脑海中”时，语含自豪就不难理

解了。

牛顿早在孩童时期就有长篇记诵的天赋，在学校读书时这种才能表现在拉丁语的学习中。在布朗罗号上，当他独自阅读以消磨时间时，这种才能再次显现出来。他的柜子里摆着诗歌和属灵读物。他说：“我从劳先生的所谓的‘古典激情’中获得了乐趣。”这里指的是威廉·劳（William Law），《圣洁和敬虔生活的严肃呼召》（*A Serious Call to a Holy and Devout Life*）的作者，这本书在18世纪被许多基督徒读者认为是激发属灵热情的经典作品。

撇开卡斯特里奥（Castalio）的拉丁语圣经对牛顿翻译技巧的磨炼，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贺拉斯和劳的作品是牛顿在这段时期的叙述中提到的仅有的两部读物。阅读这两位作者的作品对于任何学生而言都是一种负担，何况像牛顿这样在10岁就结束了正规学校教育的人。不过，可以设想，对于牛顿来说，贺拉斯和劳提出的智力挑战还在其次，首要的是两个作者完全对立的哲学思想使牛顿陷入了道德两难的处境。

贺拉斯（公元前65—前8）是一位喜欢教化的享乐主义诗人，常常采用一种愤世嫉俗的风格，包含着老于世故、诙谐逗趣和放浪不羁。他既是个无神论者，又很迷信；既不乏痛苦，又爱搞笑。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人，以反抗的态度对待当权者，在现实常识面前他既是自由主义的又很讲求实际，对此他引以为豪。

威廉·劳（1686—1761）是上帝热心的仆人，英国圣公会牧师，一位文笔朴素流畅的伦理神学作家。尽管劳在晚年有点儿神秘主义倾向，但牛顿在布朗罗号上阅读劳的著作时，他最有名的作品《圣洁和敬虔生活的严肃呼召》（1728）对福音派大复兴运动（the Evangelical Revival）的许多领袖人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其中包括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和托马斯·亚当（Thomas Adam）。在《严肃呼召》一书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劳建议他的读者：

若有谁能告诉你通向幸福的最快捷准确的道路，那就是，为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事向上帝表示感谢和赞美，并以此为原则。因为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你能为那些降临在你身上的患难而感谢和赞美上帝，那么它们必要为你而化为祝福。

约翰·牛顿到了晚年，作为一名坚定的基督徒和圣公会按立的牧师，他明确清晰地表达了在患难之中对上帝的感恩之情，这似乎可以表明劳的作品对他产生的影响。1749年，从西印度洋返航途中，当他在船舱里阅读贺拉斯和劳的著作时，他的灵魂深处一定发生过争战，因为两位作家以不同的方式从完全对立的两极影响了青年牛顿的人格。愤世嫉俗与理想主义、随心所欲与圣洁虔诚、自由放浪与甘心顺服、迷信与虔信、渎神与敬神等之间的冲突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一同展现出来，它们也反映了约翰·牛顿内心中道德和理性的纠葛。

从安提瓜到西印度群岛航行10周之后，布朗罗号又航行了4周到达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港（Charleston in South Carolina），船上的许多非洲黑奴已经异常虚弱，在被带到查尔斯顿奴隶市场拍卖之前，218名土著中已有62人死在了船上。其中大部分死于疾病和过度疲劳，有三四个人因不堪虐待在船上发动暴乱而被处死。在奴隶贸易中，这是常见的模式。黑奴不是死于精力衰竭，就是因反抗而经受酷刑，这都是家常便饭。在布朗罗号上，牛顿对这次非洲之行的感觉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厌恶。他后来告诉波琳，当贩奴船把黑奴们运送到查尔斯顿奴隶市场拍卖时，他感觉很轻松，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挪亚一样，在一只小小的方舟里，与许多不洁的动物关在一起”。

在查尔斯顿港停留的那几天里，对灵魂和身体之圣洁的渴望时时冲击着牛顿。他参加了圆形教堂（the Circular Church）聚会，那里有一位独立长老会（Independent Presbyterian）牧师名叫约西亚·史密斯（Josiah Smith）。这位哈佛大学毕业生以其火热激情的布道吸引了牛顿的注意力，也挑战了他的理性。他回忆说：“我曾经有那么两三次听说过这位不从国教的牧师史密斯的名字……他是一位出色而有能力的福音布道者。他的表达中有某些东西冲击了我，但我还不能准确地理解。”

在布朗罗号载满南卡罗来纳农场的烟草和玉米等新货时，理解和顺服的福音教导的挑战却不断地困扰着牛顿。他徜徉在查尔斯顿港美丽的街道、广场和公园里，欣赏着橡树和木兰树的高大繁茂之美，向造物主献上祈祷。他允许自己置身于所思与所行的冲突中，他回忆说：“那时我的言行充满矛盾，只要工作允许，我几乎每天都会退到树林和草场里去，我真切地感觉自己已经开始在祈祷和赞美之中深尝与上帝同在的甘美了。但每每到了晚上，我仍然在空虚无聊的交际活动中荒度光阴。”

牛顿严厉的自我批评让人听起来似乎以为他在查尔斯顿度过的那些夜晚如果不是放荡风流的，也算得上是肆意妄为的了。实际上，他认为自己的主要错误就是他一直未能找到“正派人士”，那些令他引以为憾的言行轻佻的同伴与他经常在城里见面却未能带他偏离正道。他说：“我是他们玩乐的见证人而并非参与者，上帝保守我脱离我所熟悉的罪恶行径。”

尽管他可能仍然对罪中之乐恋恋不舍，但他不再参与犯罪的确表明一个新生的约翰·牛顿正在灵魂的争斗中大步前进。过去的约翰·牛顿若是身处这样一个自在闲散的南方城市中，他一定有各种寻欢作乐的机会，追逐女人、狂喝滥饮、诅咒叫骂。也许他对贺拉斯的健谈和理智的调情仍不乏欣赏，但在灵魂深处，他遵循的是威廉·劳提倡的严肃、圣洁和敬虔之道。

牛顿对上帝不断进深的忠诚堪比对波琳。他对自己在查尔斯顿那段时期“偶尔”失败的叙述还是很真实的，似乎他心里的软弱要多于肉体的软弱。他说：“我经常受到酒精的诱惑，但上帝怜悯我的软弱，从未让敌人占上风。他让我逐渐地认清那些接二连三的事情中包含的烦乱和愚蠢，当我认识清楚之时，主就鼓励我远离它们。”

牛顿的内心充满艰难的挣扎这一事实确切地表明他的信仰之旅是真实的。他抵挡住了查尔斯顿的诱惑，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心并未回响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著名”祷文：“主啊，请赐我贞节之心，但不是现在。”在航行途中阅读的那些时光与在岸上闲逛的那些夜晚似乎都使他看清了一件事——1748年3月在大西洋中部那场暴风雨中归信的那一刻不过是他真正的归信开始后漫长、不懈和勇敢的努力的前奏。他正在赢得争战的胜利。1749年10月底，牛顿从美洲返航回到英格兰，在总结自己在南卡罗来纳州逗留期间的表现时，他说：“我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心灵的平安，我对上帝的事充满了强烈的渴望。”

与波琳结婚

1750年对于约翰·牛顿来说是多事之秋。他与波琳·卡特莱特在罗彻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St Margaret's Church Rochester）举行婚礼；父亲牛顿船长在加拿大哈德逊湾溺水身亡；不久，25岁的牛顿自己做了船长，成为阿盖尔公爵号（Duke of Argyle）的主人。在牛顿不断强化信仰探索和学习时，这种外在的个人生活的发展是伴随着内在更为深入的自律和理性一同发展的。

1749年11月，布朗罗号历时6周从查尔斯顿回到利物浦，不久，牛顿就与船主约瑟夫·曼内斯特见了一次面。布朗罗号船长在报告中对大副的评价显然让曼内斯特很满意，于是牛顿就获得了几周的假期，曼内斯特还答应，只要船队有合适的船，就会让牛顿担任船长。这样一来，拥有远大前程的牛顿现在就可以向波琳·卡特莱特求婚了。

不过对于牛顿来说，求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以至于在他们的订婚礼上，得由波琳采取主动。订婚大概一年后，牛顿在一封写给新娘的信中提到当时的情形：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相信你也会记得，那天晚上，你第一次向我伸出手……我就那么傻傻地站着，好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相信你看着我那么笨拙无措的样子也多少有些尴尬了。我当时心中充满了火热的激情，浑身颤抖，弄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波琳首先打破了这种僵局，牛顿把波琳在订婚礼上向他主动伸手称为“珍贵的礼物”。波琳对牛顿的挚爱不亚于牛顿对她的深情，其实，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牛顿做她的丈夫并无明显的优势。牛顿晚年的肖像显示他的相貌平平，也没多少钱。他自述财物状况时说：“我的全部财产就是70英镑债务。”对此，他颇感不安，以一种自卫的语气抱怨说他对家里未能提供一些钱帮助他感到失望。

他感觉不安还有一个潜在的理由，按照英国社会一贯在意的阶层标准，牛顿家族的社会地位比卡特莱特家族低。尽管波琳没带什么嫁妆，但她的未婚夫仍然满怀敬意地描述说，“她受到众多高贵的亲友极大的尊重”。相反，牛顿几乎没有亲友，他自己也绝算不上是“高雅之士”。艰苦的航海生涯将他锤炼成一条粗糙的汉子，尽管母亲早年的教诲和海上的自我教育让他不乏文雅之气，仍难掩粗糙的痕迹。

尽管他们并不门当户对，又没什么钱，1750年2月11日，新郎约翰·牛顿和新娘玛丽·卡特莱特（波琳正式的名字）还是肩并肩地站在罗彻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结为夫妻了。这是一座建于12世纪的诺曼式教堂，距离查塔姆的卡特莱特府仅两英里。圣玛格丽特教堂的副牧师约拿单·索安（Jonathan Soan）为这对伴侣主持婚礼。教区记录表明，早在几周前，索安就花了18先令6便士为教堂买了一本1662年新版发行的《公祷书》。按照英国圣公会的“婚礼仪式”，婚礼要从诵读这本祈祷书开始。当婚礼进行到誓约程序的时候，新郎把戒指戴到新娘的手指上，宣布说：“我，约翰，娶你，玛丽，成为我的妻子，从今以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富足还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我都会爱你珍惜你，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谨遵上帝神圣之约，我也向你谨守我的誓言！”

尽管约翰和波琳·牛顿的婚礼严守着宗教的所有礼仪，但就其婚姻的早期阶段看，还不能把他们的婚姻完全看作是基督徒的结合。牛顿说：“那时我们还不认识上帝呢。”这种说法让人不免惊讶。要知道，自从1748年3月10日夜里经历过那场几乎使灰狗号沉没的大西洋风暴之后，有两年多，牛顿曾把大量的时间用于祷告、阅读圣经和属灵书籍。40年后，在波琳去世后不久，他出版了《与妻书》（*Letters to a Wife*, 1792年）。在前言中，他对这个话题进行了一番详述。结婚第一年，新婚的牛顿夫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礼拜天基督徒”。牛顿以幽默的口吻写道：“对于那种与世俗生活中无害的乐趣相容不悖的体面的宗教活动，她

不少参与，那种生活让人们（按己所需）同样乐意成群结队地准时出入教堂和赌场，看戏和做圣事。她对信仰的了解仅此而已。”

波琳的信仰生活循着一套外在的礼仪而变得有名无实，它干扰了牛顿内心对上帝更深入的追求与寻找。有几个月，他完全沉浸于婚姻的幸福之中，开始遁入妻子的肤浅信仰的阴影里。他说：“如果我继续待在家里，很可能我会对她产生极大的依恋，这将使我重回老路。除了为彼此的结合感觉满足外，我们将无法领受更大的幸福。”牛顿为自己在心灵生活中的迷失深感焦虑，却无力改变。他写道：“我对上帝微弱的依赖感正在慢慢地消退，我过于胆怯，甚至不敢和波琳一起大声祈祷。”他甚至把自己与21岁的妻子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偶像崇拜式的依恋”，它把他与上帝分隔开了。

牛顿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使这种灵里分离的生活最终结束，他后来将此描述为“基督敲击我的心灵之门”。敲门声当时听起来还不太清晰，彩票失利、经济压力和约瑟夫·曼内斯特船长承诺的兑现等事件一步步改变了牛顿的计划。

1750年春天，三个月的新婚生活使牛顿决定待在家里陪波琳，不再出海远航。但当他一旦做此决定时，他发现自己必须在陆地上找一份工作养家，因为他已经债台高筑了。可惜，他寻找运气的方式竟然是赌博。他对此解释道：“对我来说，与波琳分离的前景真是可怕，无异于死亡。为此我不断地买彩票，心里想：‘说不定我马上就能中一笔大奖，就不必出海讨生活了！’”

牛顿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发现追求迅速获利其实并不是获得生活必需品之捷径的彩民。当损失增多时，上帝的手从未干预过（尽管牛顿曾多次向上帝保证要把中彩所得的一部分奉献给穷人），牛顿最终是被约瑟夫·曼内斯特从利物浦发来的召集令带回到现实生活中的。

牛顿说：“来自利物浦的召集令将我从幻梦中惊醒。”尽管他觉得与波琳分开让他“难过得要死”，但他后来却把这看作是伪装了的祝福，他甚至说如果他们继续一起待在查塔姆，“我们两个都会毁灭的。”这句生动的表白让我们看到波琳无意中正在把丈夫带离那条寻求灵性美善之路。虽然牛顿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试图表达他对妻子在信仰生活中不冷不热状态的感想，就像他对波琳所说的那样。但她对这种“诽谤”很是不满，她毫不掩饰地直接要求她的配偶改正他的说法。牛顿当时正在利物浦

港准备乘阿盖尔号出海远航，他只好写信向波琳道歉。这封信写于1750年7月10日，他向她解释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够虔诚，我是说，或者说我指的是……如果我们能相互帮助，彼此促进对信仰的理解，那可能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牛顿很明智地在这个问题上屈就了一下，因为事实上，在那个时代，波琳是一个言行得体、家道中庸的年轻的英国女性，深受基督教原则教导与训诲。从那位有可能过于吹毛求疵的丈夫的观点来看，她唯一的缺点就是，她对宗教礼仪的严格遵守是出于责任而非出于热爱。

牛顿觉得在新婚初期已然平淡的信仰激情又开始趋于火热了，他转向了自己所谓的“严肃的思想”和“唯有信仰才能够给予的支持”。在他被正式任命为船长之时，他愈加需要这种支持。约瑟夫·曼内斯特请他指挥阿盖尔公爵号，那是一艘重140吨的双桅船（类似于双桅横帆船），牛顿说它“对于一个几内亚人来说，就像曾经看到过的庞大的建筑物”；一个由30人组成的船员队伍，牛顿自言希望“人性化管理”并且“要做个好榜样”。1750年8月，约翰·牛顿刚过完25岁生日没几天，便带领阿盖尔公爵号从利物浦港出发赴非洲西海岸，这是他第一次以贩奴船船长的身份出海远航。

阿盖尔公爵号船长

牛顿作为贩奴船长进行的第一次远航充满了戏剧色彩。他在航海日志中记录了主管阿盖尔公爵号贩奴生意的 15 个月里发生的种种危险恐怖的细节，这其中包括从非洲转运 200 个奴隶到安提瓜岛，在人员过度拥挤的情况下，有些黑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暴动；还包括三名船员预谋叛乱；其他的危机事件还有在大西洋中部遇到飓风，有人企图用巫术给船上的水投毒，有 30 个人死在海上等等。除了这些公共事件，在给妻子波琳写含情脉脉的情书时，牛顿也得不断抵抗自己对非洲女人的欲望。在买卖奴隶的行程中，牛顿也带领船员们度过了信仰旅程——祈祷、读经、主日崇拜，他丝毫未感觉到这里面蕴含的讽刺性。

1750 年 8 月 11 日，阿盖尔号从利物浦出发远赴非洲，旅途平静顺利，这让牛顿有许多空闲时间。他将每天的时间都用来广泛研读对他来说是新的拉丁语作家的作品，阅读圣经、祈祷和崇拜。他一周给波琳写两到三封信。他在海上必须先把信件叠放在船舱的抽屉里，大约每 6 周才能遇到一艘驶往英格兰的船只，把信送回家。

牛顿给波琳的信中常常引用罗马作家普林尼（Pliny）的书信和加图（Cato）的警句，这表明他对古典文学的酷爱又进了一步。从利物浦启航之前，他带了一本拉丁语辞典，同时还把李维（Livy）、凯撒（Caesar）、萨卢斯特（Sallust）、泰伦斯（Terence）、西塞罗（Cicero）、普林尼和维吉尔等人的许多作品集带到了船上。牛顿竟然能在承担阿盖尔号指

挥任务之际，找时间对这些作品进行翻译和研读，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从利物浦出发，在海上航行3周后，他在一封写给波琳的信中解释说那些任务远比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指挥商船到达几内亚湾难得多。他写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个绅士旅行者，也许不必太考虑脑袋的问题，等到了非洲，我就得小心在意，会有一大堆麻烦。”

10月19日，阿盖尔公爵号抵达非洲西海岸，在几内亚湾周围游戏，寻找黑奴，4周后，牛顿在普兰提内群岛停泊，他在这里再次与PI公主相见。对这位先前折磨他取乐的女人，他精心地组织了一场不乏戏弄意味的欢迎仪式，并名之曰“最高贵的复仇方式”。牛顿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我派长艇到岸上去接她，他们很快把她带到船上。我让手下人在她头顶上方鸣枪向她表示欢迎。对这种以德报怨的方式她似乎深有感触。我送了她一些礼物，把她送回岸上。当下到小船上时，她显然感觉很好。”牛顿遇到两个普兰提内岛社会底层的黑人妇女，他曾经受到她们的取笑，她们最后一次看见牛顿时他还戴着锁链在岛上做囚徒呢。一个女人看见他叫道：“那是牛顿，你能想象吗——他竟然穿上了鞋！”另一个人回答道：“可不是，竟然还有袜子！”牛顿大笑道：“她们以前从没看见我穿过鞋袜。”

阿盖尔公爵号沿途泊靠塞拉利昂、示巴、里奥圣保罗、曼内、乔治岛和凯波山进行贩奴买卖，半年的时间里，像上面那样的乐事并不多。牛顿在写给波琳的信中多次抱怨当地的炎热、暴风雨、喧嚣和肮脏，幽闭恐惧症的压力。200个黑奴被迫像高温罐头中的沙丁鱼一样挤靠在底层甲板上。牛顿经历的最困难的事来自于他的船员，他处理了三名在船上闹事的水手，这个三人帮由威廉·利斯、汤姆·克瑞德和汤姆·特鲁组成，牛顿在日记中称呼他们为“我的背叛者”。在塞拉利昂，他们三人喝得酩酊大醉，最后在“阿盖尔号”的长艇上与法国水兵发生冲突，结果长艇被毁。在全体船员面前，牛顿下令用鞭子抽打他们。这听起来罚得很重，但对这几个刺儿头，这种惩罚显得有点儿轻了。克瑞德和特鲁仍然不改恶习，而利斯则变本加厉了。在普兰提内，利斯曾经逃跑过，被阿莫斯·科劳手下的仆人帮忙抓了回来，并戴上了锁链。牛顿决定放弃这个捣乱分子。他拜见皇家海军惊奇号（HMS Surprise）船长贝尔德（Baird），说服他用三个愿意到阿盖尔号上工作的海军士兵来交换那三个捣乱的家伙。当牛顿执行船长的职责做此巧妙安排时，他一定从往事的记忆中体会到一丝讽刺，当年

作为一个喜欢捣乱的年轻水兵，他自己就是一个顽梗、粗野、叛逆的逃跑者，被当众鞭打、受辱，最终被交换出去。

牛顿在船上是一个自律严格的人，但在陆地上他的职责就是为了获得奴隶而进行交易和交际。他会见了几内亚湾沿岸所有的酋长如查阿王（Charra）等人。牛顿写道：“他送给我一头山羊，但我却得送给他价值两倍的礼物，并用8条枪来回报……这位酋长如今对我的生意很上心。”另一次比较困难的会面是在乔治岛，当地酋长“极为周到地”迎接牛顿，“却又用极为明确的措辞说他早就决定尽可能不与任何从利物浦来的人进行哪怕是很小的交易。”还有一位性情更为温顺的交易者，是“威廉·安萨·塞塔卡鲁先生，非洲的一位王子……他到船上来找我，我对他身为首领既不失尊严又彬彬有礼的态度感觉非常满意，我很少在我们周围这些人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

无论他们是有礼还是无礼，肤色是白还是黑，这些想和牛顿见面交谈的非洲部落的酋长和欧洲中间人都只有一个目的，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得到铁条，这是奴隶贸易中临时的主要流通物，同时还有小刀、火枪、小首饰、成包的衣物和其他用来进行物物交换的东西。他们情愿为此去抓捕奴隶，把他们圈到工厂里，给他们戴上脚镣，烙上火印，交到阿盖尔号的船长和船员手中。对于这桩野蛮残酷的贩人生意，牛顿当时的心里从未出现过任何道德或者内心的愧疚。他在船上的航海日志中只是记录奴隶的数目，经常在旁边写下几句对价格过高和体格瘦弱的抱怨。他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早晨，耶卢·威尔带了一个奴隶给我，这个小男孩只有3英尺10英寸高，我只好收下，否则连这么一个都找不到。”还是这个中间人，不久又带来了一个更糟糕的“样品”：“耶卢·威尔给我带来一个女奴，乳房又松又长，病病歪歪的，我没要她，让他把她带回岸上去了。”3周之后，牛顿大有收获，一位老搭档约瑟夫·塔肯在一天之内围捕了18名奴隶。这时正值1751年春天，阿盖尔号底层甲板上的奴隶隔间差不多快满了，肮脏和污染有可能导致这些手戴镣铐的囚徒死亡。船上30名船员的看守任务加重了，这使得牛顿首次在航海途中取消了他带到船上的不同寻常的改革措施——所有人必须参加礼拜天的崇拜活动。牛顿写道：

被迫放弃这一天 [为船员预备的崇拜活动] 是旅途中的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雨季] 马上就到了，我害怕疾病，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有两三个患上流感，一个女人 [第79号] 今晚死于此病。

我把这归因于英国的食品供应，自从我来这儿之后，每天给他们吃两次大米，得过些日子才能知道是否让他们吃这些比吃蚕豆或豌豆更好。

至少牛顿对他的“活人商品”的饮食比较关注。这是一个较早出现的标志，表明在远航的后期，牛顿已经有了那么一点人道，使得他在奴隶贸易的非人道文化中鹤立鸡群。牛顿和大多数奴隶商之间的显著差异在于他的行为与性格，面对不计其数的诱惑，他坚守对波琳的忠贞誓言，并且绝不喝酒。在那些船长和商人中间，他的品行自然成了他人的笑柄。对于贩奴船和非洲通商口岸提供的唾手可得的享乐，大多数人都沉湎其中，恣意妄为，他们无法理解牛顿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享受，归因于他是个“忧郁”和沉闷的人。对于这些彼此冲突的生活态度有时会有生动的讨论。1751年3月20日从示巴发出的信中，牛顿告诉波琳说：“我在这儿受到远航船长们没完没了的取笑，他们认为我的生活观念有问题，我则确信出问题的是他们。”在信件原稿中，牛顿在黑体字下面画了横线。他继续写道：

他们说我忧郁；我说他们疯癫。他们说我是一个女人的奴隶，我不认为我是奴隶，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某些人的确是一百个女人的奴隶。他们对我的幽默深感奇怪；我对他们的幽默深怀同情。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从何取乐，我回答说我能想出比他们以为更好的方式。如果像他们一样靠酗酒滋事或者与妓女调笑来获得快乐，我会耻于与这样的人为伍。

牛顿并未能像他对妻子所言那样面对诱惑完全无动于衷。尽管他没和她提起过那些诱惑，但有许多时候他要努力克制使自己不至于堕入船上的性滥交中，那是大多数船长在买卖人口时都受到认可的特权。牛顿采取一种自律方式以抑制自己的性欲，他严格要求自己，只要船只离开港湾，他就只喝清水、吃蔬菜。晚年时，他把这件事告诉给一位密友、同时代的理查德·塞西尔（Richard Cecil, 1748—1810），后者在一份谈及牛顿的手稿脚注中记录了这场谈话：

我曾经听牛顿先生说起过他在贩奴船做船长的时候，手下有一大群女人供他一个人使唤。可以想见他当时所处的危险。在那种情况下，他决心全程禁肉，除了清水，什么也不喝。通过这种自制，他才有可能胜过每一种有害的情感。风帆一旦在某处扬起，就意味着到了

开始坚守自定原则的时候了。

25岁的牛顿给自己制定的这份控欲食谱让我们看到牛顿的另一面，这比他写给波琳的家书中所表现出的道学家的形象更真实。

5月21日，阿盖尔公爵号满载着200个奴隶离开示巴驶入困难重重的“中间通道”赶往西印度群岛。整个行程用了6周时间。牛顿描述说他“历经种种艰难险阻，却没什么特殊之举”。他最后用的那个词容易让人误解，因为贩奴船上的生活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不会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正常而已。

根据航海日志记载，中间发生过一段小插曲。由于一支解索针被偷带到底层甲，20个奴隶挣脱了锁链。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逃跑者被制服，被重新戴上铁项圈。牛顿下令严惩肇事首领，给他们上了一个小时的拇指夹刑。按照贩奴船的规矩，这种刑罚相当轻。但即便如此，尖叫声仍然不绝于耳，叛乱者们最终屈服下来。

牛顿在日志中这样评论道：“他们看起来仍然满腹怨怒，毫无疑问，他们脑子里充满了破坏的念头，倘若可能，他们还会伺机作乱的。但愿（依靠上帝的帮助）我们能威慑住他们。”

非洲奴隶还有一次闹事，据说他们试图往船上的饮用水源里投毒，这引起了阿盖尔号的临时警报。事实上，投入水源中的所谓“毒药”是那些巫术痴迷者发出的魔法咒诅。牛顿在6月16日星期天的航海日志中记录了这次事件：

下午，我们接到警示报告说，有些奴隶用某种手段往甲板上面的引水器里投毒，经过询问，我们发现他们投到水里的不过是当地崇拜的神物，或如其所言是一些护身符，他们幼稚地认为所有喝了这水的人都必死无疑。不过，再没有哪种企图比让我们受巫术而死更糟糕的了，这肯定不蒙上帝喜悦。他们伤害不了我们什么，而只是表明他们的意愿未能得到满足。

此时，对牛顿各种想法的最好的描述就是，在他的奴隶贸易与他的内心良知之间产生了困惑和冲突。但至少过了20年，他意识到役人为奴与基督福音相离相悖的实质时，他的良知才因此被唤醒。若要为牛顿开脱，可以辩护说，在18世纪中期的英格兰，没有一位基督徒领袖意识到——尽管有过抱怨——贩奴行为是一件在属灵和入道精神层面都应恨恶的事。

不过，对于牛顿当时的盲视，这只是一种解释而并非借口。

还有一点应该能够减轻牛顿在涉足这次贩奴行动中的罪责的是，有几条证据可以表明他是一位在意奴隶身体健康和利益的船长。直至1751年7月3日，即阿盖尔号停靠在安提瓜的圣约翰城时，当初与他一同乘船从非洲出发的200个奴隶中有174人活了下来。按照当时的海运状况，阿盖尔号的死亡率还是相当低的。1749年，在牛顿前一次做大副的旅途中，布朗罗号上奴隶的死亡人数是其两倍多，航海日志上记载，船上211名奴隶死了62名。在后来以船长身份参与的航行中，他仍然尽其所能地保护船上人员的生命。在一场残酷的商业贸易中，这只是一点小小的慈悲，但这种个人准则却使牛顿与其他大多数贩奴船长有所不同。

当奴隶们在安提瓜的圣约翰城市场待卖的时候，牛顿就去接收等待他的信件。他很高兴能找到波琳写来的信，日期分别为11月2日、1月11日和4月2日，但他的喜悦马上就转为悲伤了，其中一封信告诉他，他的父亲牛顿船长于1750年6月28日在加拿大哈德逊湾游泳时发生意外，溺水身亡。牛顿写下了当时听闻噩耗的反应：“泪水滴落在纸上……我对他充满了爱和尊敬。”尽管父子二人之间从未有过亲密的感情交流，但船长去世的消息也许还是让约翰·牛顿记起父亲在他悖逆胡为的时候随时提供的切实帮助。

牛顿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之后，仅仅过了6个星期，又一个噩耗再一次将他抛入悲伤之中，阿盖尔公爵号的同船水手、牛顿唯一的知己、船上医生罗伯特·阿瑟去世了。阿瑟是牛顿的密友，是他唯一能够推心置腹地交流特别是关于他对波琳的爱情的人。商船从安提瓜出发返回利物浦，在行程的最后一站，牛顿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在他痛苦的最后时刻一直陪在他身边，就在5天前，他还那么健康、面色红润。我真害怕他会就此远离，就此失去生命的气息……我经常向他提起你，在倾诉中我会得到安慰。如今，我再也找不到值得向他提起你的名字的水手了，如果我想说起你，我只能把我的欢喜与悲伤留给自己。

船医阿瑟是在阿盖尔公爵号航程中去世的第四名水手。赤道热病最终夺去了阿瑟的生命，此后，牛顿开始向波琳倾诉他越来越多的“欢喜与悲伤”。在余下的返乡途中，他在第15封信里描述了1742年12月12日，

同为少年的他与她第一次见面时他心中涌动的第一缕情丝，以及在长达 8 年的分别之后的重聚。这封充满深情的信件更多地表明牛顿内心的渴望，阿盖尔号乘着大西洋强劲的西风，有时以每天 180 英里的速度载着他驶向英格兰和爱妻的身边。

1751 年 9 月 5 日，牛顿对自己获得的新生和福乐向上帝的神圣护佑献上赞美后，借着一盏烛光在船长小屋里给波琳写信说：

毋庸置疑，我认为是你把我从罪过和苦境中拯救出来，也是你让我尽享生活的真实乐趣，你是做这些事的重要途径和器皿。拥有了你我就拥有了一切……如今，我保留的唯一的研 究活动（何等快乐的研究啊）就是我当如何更好地获得并回报你对我的美善之德。晚安。我要出去看北极星了。

在星斗的引领下，牛顿指挥他的船于一个月后平安返回利物浦。在船主约瑟夫·曼内斯特家客居了几天，曼内斯特答应来年还邀请他担任贩奴船船长。牛顿随后赶回查塔姆，与心爱的波琳重聚。

非洲号首航

牛顿担任过两次贩奴船的船长，其间间隔有 8 个月。除了偶尔几次到利物浦的捕鱼场参观检查非洲号（African）商船的建造情况外，牛顿大部分时间都在查塔姆和妻子宁静度日。尽管陪在妻子身边他一直深感满足，但他还是为生活过于安静呆板而心生不安。他天性勤勉，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上，他都喜欢埋头钻研苦读，他的研究对象超过了波琳的教育水平。1752 年初，他开始关注基督教作家们的教导、信仰和自传，并按照他们提供的原则进行祈祷和读经。当他开始写日记的时候，这个新的习惯进入了牛顿的生活。

牛顿催促自己写日记，这种勤奋通过他写在日记中的话能够有所显现。1751 年 11 月 22 日，他在一本厚达 577 页的对开笔记本的第一页上写下了这样的献辞：

哦，至圣荣耀的上帝啊，我要向您献上这本洁净纯白的书，愿您此时就来更新我染满罪污、邪恶、破败的心灵。哦，主啊，愿您赐福帮助我，愿您按照您美善的心意让圣灵充满我，愿您丰盛的恩典胜过并除去罪恶的印记，让我的世界时时得以更新，让我无论在人前交流还是退隐沉思，都能够确切地表明我是您的仆人，被赎回、被更新，并接受我主、我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受苦、施恩，做了我的中保。

在这个庄严的宣告后面，牛顿又记下了许多与此相似的庄严的决定，包括：“每天从早到晚与神同行”、“以勤勉之心熟读圣经，以配得上主题的尊贵”、“把安息日的全部时间都用来亲近上帝”、“只选择那些能够使我得以进步的义人做朋友”以及“向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好使我能救些人”。

这些积极的训词常受到一些消极的阻拦，他要警惕“使人心生贪婪与冲动的娱乐游戏”和“游荡无序、虚荣浮夸、欲念深重的种种思绪”。这种纠葛表明牛顿内心的争战并未停止，而且，显然他在进行一场“鏖战”。牛顿在1752年初的几个月里读了四本书，它们对他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四本书分别是亨利·斯科盖尔（Henry Scougal）的《上帝在人心》（*The Life of God in the Soul of Man*, 1677），詹姆斯·哈维（James Hervey）的《墓园沉思录》（*Meditations Among the Tombs*, 1746），菲利普·道得理奇（Philip Doddridge）的《詹姆斯·加德纳上校生平二三事》（*Some Remarkable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Colonel James Gardner*, 1747），大卫·伯纳特博士（Dr. David Burnet）的《马太·霍尔先生传》（*The Life of Sir Matthew Hale*, 1749）。这些作者无一例外都对牛顿产生了切实的影响，他在日记中抄录了大量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引文和个人经历。他特别认可马太·霍尔提倡的每日祈祷惯例，按照书中的教导，他把星期六晚上空出来专门为主日做准备。决定遵循霍尔的规则生活后，牛顿发现这让他有一个良好的机会可以“向我的造物主写信倾诉——如果我可以如此表达的话”。

这些倾诉表明牛顿的祈祷生活在稳步地进深。不过，他对自己缺乏与其他基督徒建立关系感到忧虑；但他又不敢说出来，看看谁会是他潜在的祷告伙伴，他说自己“胆怯封闭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不过，他寻求一位祷告伙伴的想法还是得到了满足，让他大为惊奇的是，波琳竟然提出他们应该试试在一起祈祷。牛顿说：“我感觉这就像一个人把他最心爱的珍宝托付给了最亲密的朋友。”

1752年6月30日，牛顿作为贩奴船船长开始了第二次远航。离开利物浦大约3周后，他庆祝了自己的27岁生日。他告诉波琳说，他希望每年自己都能“更有智慧更美好”。他认为按照时间表的严格安排，他正在探求一条自我更新之路，他告诉妻子说：“就目前的环境来看，我完全可以在固定的时间里按计划行事。我将时间分为祈祷、研读、活动和休

息。”他的意思是他将一天的时间划分为8个小时睡觉用餐，8个小时活动和祈祷，8个小时读书——主要是圣经。在赴非洲的航程中，他一直很好地执行着这套作息计划，但到达塞拉利昂之后，奴隶贸易带来的残酷和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使他几乎没有时间投入到阅读当中去。

1752年8月12日，牛顿到达塞拉利昂的法国人海湾，他在航海日志中记着说当时另有5艘贩奴船在同一处停泊，它们分别来自美国、法国和英国伦敦港、利物浦以及普利司通港。自他上次结束了在几内亚湾的航行后，这种竞争直接导致了奴隶价格的上涨。在与一大批名字古怪的部族首领和商人如彼得王——他是新的掌权者堂·彼得罗·德·卡斯（Don Pedro de Case）——以及来自吉斯吉斯的斯蒂尔先生一番讨价还价后，他买到了第一批四个奴隶。牛顿写道：“我发现在白人中间，奴隶的价格已经稳定在70根铁条了。”在奴隶贸易的价格浮动中，铁条是流通币，每根铁条约等于3先令的现金，这意味着牛顿需要为每个成年奴隶付出大约10英镑或20美元。

在里氏100度的高温天气里，牛顿和他的船员沿着西非海岸航行了9个月，在各个奴隶工厂和贸易站每次买上三四个奴隶。常常会有“棘手的时候”，他指的是在某些无法预知的时段，非洲号常会发生争执、暴动、叛乱和起义。1752年11月，牛顿揭穿了某些水手妄图控制商船的阴谋。阴谋暴动者中间突发痢疾，阻止了这场叛乱，首领威廉·斯万被戴了两副铁铐。12月，船上又暴发了一场叛乱，这场奴隶暴动侥幸被提前制止了。牛顿在航海日志中写道：

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及时地发现今天有奴隶正在策划一起叛乱。不可思议，其中两个奴隶试图除掉铁铐，他们挪到房间的尽头，有三个提供消息的小男孩，他们找到了一些刀子、石头、子弹等等，还有一把冷餐。我们审问了8个主要涉案破坏者和4个提供上述工具的小男孩，给男孩戴上铁铐，稍稍动用了一下拇指夹刑，他们就坦白了。早晨，我们检查了男性奴隶，按照条规惩罚了6个人，给其中4人戴上了项圈。

非洲号的船员也制造了一起麻烦。牛顿在日记中写道：“一场黑色灾难差点儿降临，我幸运地发现了有几名船员在策划劫船做海盗。”他给带头的人戴上铁铐，并自查是否

……我对待下属有粗暴可恶之处促使或激发他们做此尝试。我希望自己能诚实地说我从航行的第一天就在岗位上尽职尽责，从未压迫、辱骂、虐待过他们，因为我一直记着我有一位在天上的主。

在牛顿看来，无论奴隶们何时制造麻烦，那位“在天上的主”都在不断地施行保护。另一场阴谋叛乱发生在1753年2月，有几个一直给他们通风报信的非洲小男孩提醒船员说，有些成年的男奴隶准备起义。牛顿在日志中写道：“我们找到4个主犯。给他们上拇指夹，然后在脖子上套上枷锁。”

除了要阻止暴乱的威胁，牛顿还不得不处理一件严重损害其名誉的事件。他收到一封来自示巴的信，是白人奴隶贩子托马斯·布莱恩寄来的，他在信中谴责牛顿与另一个商人哈瑞·图克的妹妹私通。这封谴责信大大激怒了牛顿，他说“这极大地威胁了我在非洲和英格兰的声誉和生意”。这一指控是荒谬的。牛顿从未见过信中提到的那位女士。他后来经过探究追查，当众澄清了指控，保住了名誉。这段小插曲虽然不太让人愉快，但在沿几内亚湾进行奴隶贸易的那些可恶之人中间，这只是那些恶意流传的小道消息中的一个而已。不过，看到牛顿义愤填膺地为保卫名誉而战还是很有意思的事。在布莱恩的信件到达之前，一天夜里，牛顿做梦被蝎子蜇了，他认为这个梦已经提前向他预告了这场指控。他在日记中写他读信时的感觉——“我觉得还不如让一只蝎子蜇我呢。”牛顿当时认为他的指控者有可能会谋杀他，但双方的情绪明显都冷静下来了，几周之后，他与布莱恩和图克重修旧好，这二人继续和他进行奴隶贸易。

8个月后，牛顿在岸上抱怨“买卖不畅”。他很难用人填满非洲号的船舱和底层甲板，直到他参观了塞拉利昂本西岛（Bence Island），那儿有一间最大的奴隶工厂。坚不可摧的城墙和炮位有效地抵挡了非洲土著居民的进攻。伦敦下议院经投票，提供一年一万英镑的经费用于西非的皇家非洲公司维护堡垒。这提醒人们，英国国会共谋支持令牛顿借以谋生的贸易。

牛顿在本西岛获得了大量奴隶。1753年4月，他指挥商船驶向西印度群岛的圣克里斯托弗（St. Christophers）或称圣齐斯岛（St. Kitts）。在漫长的“中间通道”的航行让他有时间给波琳写一封情意绵绵的长信。他告诉妻子：

尽管我数算着与你分离的日期和分钟，我所度过的日子却并非漫长无聊。我每天用一部分时间为你祷告两三次，再用一部分时间研读圣经。剩下的闲暇时间里，我读书、写作、做数学题，这成了我的习惯。我对凯撒、庞培和古代其他二十多位冲动任性的英雄的行为有自己的判断，我细思他们的伟大计划、他们的软弱和冒险，以及他们最后的绝望，尽管他们达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我有时会微笑一下——还有什么能比得上爱情呢？有时会长叹一声——还有什么能比得上永恒呢？

当牛顿带领的商船在圣齐斯的拍卖市场卖掉 167 名奴隶重返英格兰时，永恒与灵魂的问题再一次萦绕在牛顿的心中。他的日记表明他长时间单独与上帝在一起，这似乎让他体验到了 1662 年他抄录的《公祷书》中的那句表达——“这种平安不是从世界来的”。后来回想这段生命经历时，牛顿说道：“当我在船上几乎与世隔绝时，或是当我在岸上与土著人在一起时，我一直默想着上帝赐予我的奇异恩典，我不知道还有哪些时候比我在最后两次赴几内亚的旅程中更能如此频繁地体会更为甜美的神圣服侍的时光了。”

牛顿努力把这种美善传送给船上的同伴。就像在阿盖尔号上那样，他坚持让非洲号上的船员们参加主日敬拜。不过，他发现《公祷书》里的话和礼拜仪式对船员们的影响甚微，于是他开始自己写祈祷文，调整敬拜次序以适应船员会众的需要。牛顿给他童年时代在威坪的牧师大卫·詹宁斯博士写信描述他采取临时措施在非洲号上努力成为 25 位船员的属灵带领人，他在信中说：“在我的生命中，很少有哪些时刻会比我在尝试进行牧养时更能让我体会一种真实的幸福。”

也许就是这些时刻最早激发了约翰·牛顿，使其日后以一名按立牧师身份开始服侍上帝。

航海生涯结束

1753年8月，重返英格兰后，牛顿和妻子在利物浦一栋租来的房子里住了6个星期。他把这段生活称作“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他后来告诉波琳说：“以前，我从未在这么安静的地方毫无干扰地与你这样充分共处。这样美妙的7周胜过平凡的7年。”

10月，牛顿在岸上短暂休息后再一次乘非洲号出航了。这10个月的航程是牛顿最后一次作为贩奴船的船长出航。这次远航成为其属灵生命意义深远的转折点，他有机会与一位同道——船长和基督徒亚历山大·科拉内（Alexander Clunie）结识。他们在圣齐斯的加勒比岛短暂见面，这次会面使牛顿对祷告、教义和见证等有了明确的认知。在长期的交往中，两个人建立了深厚持久的友谊，彼此通信，最终出版了一本《基督徒书信集》（*The Christian Correspondent*）。

有一个名叫约伯·利维斯（Job Lewis）的水手，从前与牛顿认识，后来牛顿在最后一次非洲之旅中与他同行，称呼他为“反基督教的乘客”一点儿也不为过。牛顿早在8年前就认识利维斯，两个人当时都是哈威奇舰上年轻的少尉候补军官。从前，利维斯是一个信仰纯正、自律甚严、生活纯洁的年轻人，而当时牛顿则是一个叛逆、放浪、不服管束的无神论者。但当他们在利物浦重逢时，两个人的角色发生了置换。牛顿看见利维斯过着放荡堕落的生活不由得自责，因为在哈威奇号上，牛顿曾经努力劝说利维斯弃绝信仰，像他一样过我行我素、放浪不羁的生活。满心悔恨的

牛顿、这位曾经倡导尽享罪中之乐的浪荡子如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他很想带领利维斯重新开始过敬虔、正派、严肃的生活。基于这种想法，非洲号的基督徒船长向哈威奇号旧日的同伴、如今的无神论者伸出了友爱之手，他为利维斯提供了一张免费客票，让他在即将开始的旅程中做一个“志愿者和船长的伙伴”。从现实的角度考虑，牛顿的这份邀请是为让利维斯在奴隶贸易中获得丰富的经验，以便有朝一日在约瑟夫·曼内斯特的船队里找一份自己领船的差事；从隐性的属灵角度考虑，就是促使利维斯归信。牛顿回忆说：“我希望在旅途中，我的言谈、行为和祈祷能够对他产生一些好的影响，但事与愿违。”

牛顿原以为约伯·利维斯可能会忏悔自己所犯的罪，远离他年少时宣称错误的生活观念。尽管他们在一起谈了很长时间，但航行得越远，利维斯变得越可怕。他在船员之间诅咒叫骂，满口污言秽语，不断挑起争端。这种胡作非为令牛顿大为震惊，肯定也让他想起自己当年在灰狗号上做船长的客人时种种可恶的行为。在最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牛顿把这个他称之为“我肋下的荆棘”的家伙打发出去。他让利维斯指挥一条名叫“赛马”（The Racehorse）的小船，授权他在几内亚湾沿岸各个邻近的港口做生意。即使按照那些寻欢作乐之地的放荡标准，约伯·利维斯也很快就赢得了放纵浪荡的“美名”。按照牛顿的说法——“他沉溺于所有的享乐中”，而且在此后的3周里一味地纵情声色，其间突患急热，并因此客死他乡。

在远航途中，约伯·利维斯不是非洲号上唯一一个因行为恶劣给牛顿带来麻烦的船员。出航不久，一个下级职员和水手因行为不轨触犯海运盗窃惩罚规则被分别用九尾鞭打了8下和12下，他们把“一桶淡啤酒偷运到船舱自用”。在到达几内亚湾不久，船上一个木匠被打了24鞭，牛顿说，“我外出的时候，他表现不佳，公然对抗管理职员，不肯履行职责。”另一个船员因为偷白兰地被“狠狠地打了12鞭”。在经过“中间通道”时，牛顿写道：“下午，我们离开甲板的时候，威廉·库尼引诱一个女奴到他的房间去，并对她施行性虐待。考虑到整个后甲板的安全，我给他戴上了铁铐。”

船员们的道德缺陷与牛顿在岸上失败的奴隶贸易相呼应。由于荷兰、葡萄牙、法国、美国以及其他许多买主之间的激烈竞争，每个奴隶的价格已经飙升到120根铁条了。1754年1月，牛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尽管

船上有不少最优秀的商人，他们也都认识我，但买奴之行毫无兴奋可言。那些先于我们到达的商船已经大量向他们倾销，我无法说服他们从我这儿再带走什么。”

1753至1754年冬天，是非洲西海岸的贩奴贸易极为糟糕的一年，而且对于那些留下来的白人更是极为危险的一年。牛顿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对许多留在海岸上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季节。我想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一年当中会有这么多人死亡、失踪、被害。”不过，在同一封信中他还是带着感恩的语气说，“但我还未曾为一个白人或黑人送葬”。能有这样的结果的确不容易，因为在经过“中间通道”时，船员和奴隶大批死亡是常见的事。33年后，当牛顿作为一名权威证人站在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领导的英国枢密院委员会面前，为废奴议案举证时，他理应因其人道主义成就受到表彰。不过，正如牛顿坦率直言的，零死亡率的主要原因源于这个事实——当他满怀失望地从西非出发赶往圣齐斯时，原本能塞200个奴隶的商船只装了87人。

牛顿在圣齐斯的加勒比岛短暂停留，在这四周里，他的属灵生命获得了极为显著的造就。他根本没想到在巴斯特尔港赶赴一场聚会时能结识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苏格兰人，他注定要对牛顿的基督信仰和团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位苏格兰人就是亚历山大·科拉内。他是伦敦一艘商船的船长（不作贩奴生意），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他是伦敦不从国教礼拜堂（Dissenters' chapel）的成员，那儿被称作斯特普尼独立教会聚会所（Stepney Independent Meeting）。在圣齐斯第一次见面后不久，科拉内和牛顿就变成了亲密的属灵伙伴。牛顿回忆说：“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不是我到他的船上去，就是他到我的船上来，我们通常会一直交谈到天光破晓。我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不但提高了我的理解力，他的教诲更温暖了我的内心。”

作为斯特普尼独立教会的成员，科拉内的基督信仰教导完全基于圣经，具有强烈的新教和改革宗神学的倾向。用当代的术语来讲就是保守的福音派（conservative evangelicalism），这种表达再确切不过，因为科拉内既给牛顿传福音又校正了他采取的信仰方式。在此之前，牛顿的宗教信仰几乎全靠自学。6岁那年，他离开了母亲和童年时代的牧师威坪的詹宁斯博士，从此在信仰方面就再未接受过正规的教诲和指导。在利物浦和查尔斯顿，他偶尔也会受到雄辩的布道的激发，不过，即便他在1748年3月

21日大西洋的风暴中有了信仰的皈依，他也一直是个孤独的基督徒。他深入研读圣经和神学著作，但仍是孤身一人在探求。他从不曾体验过通常由属基督的肢体们带来的团契的喜乐。如今，他在生命中第一次找到了一位基督徒伙伴，在圣齐斯亲密团契的几周里，亚历山大·科拉内成为约翰·牛顿的祷告伙伴、良师益友和属灵引导者。

科拉内教导牛顿如何与他人一同大声祷告，如何与其他信徒对话，如何研读圣经，如何向人做见证，说明上帝的恩典怎样改变了他的生命。最重要的是，科拉内十分强调因信称义的教义。他对这位新朋友的教导充满火热的激情，他接受了救赎的应许。牛顿写道：“现在我开始理解恩典之约所赐的平安了，我希望得到保护，但这不是凭我自己的能力和圣洁，而是凭着上帝的大能和应许，因信那位永远不改变的救主。”

1754年6月20日，牛顿带着亚历山大·科拉内的叮嘱从圣齐斯启程，行前两人约定互通信件，并在英格兰相会。6周后，他到达了利物浦。尽管他的雇主和恩人约瑟夫·曼内斯特对非洲号的第二次旅行收获不甚满意，但他对牛顿还是很满意的，他答应让他指挥一条新船。这条新船建造得差不多了，牛顿获准为它选了一个名字——蜜蜂（Bee）。命名仪式结束后，他陪波琳在查塔姆住了几个星期，于10月带着妻子重回在利物浦租住的小屋。牛顿在预备蜜蜂号首航的最后阶段突然病倒，也许像他所认为的那样，这是出于上帝的保守。

尽管年少时曾经有过一两次恐慌，担心他的咳嗽有可能是从母亲那儿遗传下来的肺结核的前兆，但长到成年后，他的身体一直很棒。他肩宽体阔，结实健壮，这副强健的体格使他能够在贩奴生涯中忍受非洲和大西洋的种种艰难困苦。然而，经历了第三次和最后一次远航后，他的体质还是颇受损耗。他在海上写给波琳的信件暗示说，他在岸上被传染上恶性热病，他非常害怕会因此死掉。到达圣齐斯岛时，他已经完全康复了，这是比较特殊的例子。他写道：“有那么一两天，大家认为我生死难卜。”显然这是死神比较近的一次“叩门”，不过更近的一次已到眼前。

在牛顿开始预备第六次赴非洲、第四次做贩奴船船长的远航的两天前，他坐在家里和波琳一起喝茶，毫无缘由地，一股莫名的力量攫住他，使他瞬间瘫痪，就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在那一瞬间，我一下子被攫住，失去了知觉和行动能力，除了呼吸，没有任何生命迹象。我想这就是中风吧。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复原之后，我的脑袋里嗡嗡作响，疼得

厉害。”

这些话其实仍不足以传递出在这种紧急状况下牛顿和妻子受到的震动，18世纪的利物浦市还没有能够迅速赶到的救护车和医生。牛顿显然得了重病，这个29岁的汉子并没被剧烈的头痛和毫无原因的瘫痪吓倒，但瘫痪的原因仍然是个谜。牛顿从未得过癫痫或者中风，他也从来没有过中风的后遗症，心理影响似乎也不太可能。也许因为与波琳分离的时间太长，他在临行前有一定程度的压力，但对于一位远航船长来说，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它不可能导致一场突发中风。至少可以说，牛顿突然发作的疾病很难得到确诊。在随后的日子里，那些被咨询的医生对此也很困惑。

回顾往昔，牛顿说他突然发作的疾病是对祷告的一个回应。在岸上歇息的最后的几个星期，让他开始反思自己在贩奴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但他不是从道德或法律的角度质疑这件事。从财政上来说，这是一桩有吸引力的生意，尽管他在上两次远航中并未获得多少酬金，然而，不断增强的怀疑比职责本身的残忍更令他困扰。此外，他也不太情愿因工作需要与波琳长时间频繁地分开。他后来总结说：

在我热心于贩奴贸易的那段日子里，我从未对它的合法性有过片刻疑惑。我对它颇感满意……但当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看守或狱吏时，有时会因为这份职业竟然要对铁链、门闩和脚镣甚为精通而感觉震惊。基于此，我经常在祷告中呼求上帝按照他的时间为我安排一个更人性的职业，并让我不必再忍受长期离家的痛苦。

不管他之前做过怎样的呼求，摆在面前的事实是，按照医嘱，牛顿的确无法再从事贩奴生意了。他在发病后咨询医生，医生告诉他乘蜜蜂号远航非洲的打算不够明智谨慎。与约瑟夫·曼内斯特见面后，对方也同意医生的建议，于是牛顿辞去了船长的职务。不久，他就看到这次被迫辞职是何等幸运了——一年后，代替他乘蜜蜂号出航的波特船长在船上被起义的奴隶谋杀了。不过，牛顿当时被迫放弃贩奴生意还是颇感苦恼的，因为这意味着他失去了工作，身为一名无法出海的远洋船长，他面临着无法确定的未来。

失业、灵感与祈祷

牛顿待在家里的那些日子不太好过。他在陆地上找不到养家糊口的职业，这迫使他不得不认真地考虑重回海上做老本行，但健康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不仅他的身体状况不好，波琳也缠绵病榻好长时间，有些时候看着似乎已经奄奄一息了。不过，虽然有这些压力，牛顿在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指导者和布道家的帮助下，在信仰方面有了更深入的进展，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指导者就是著名的循道会领袖乔治·怀特菲尔德。

牛顿与上帝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与此同时，他与金钱的关系则越来越疏远。有大约十个月，牛顿没有工作，他渐渐对缺钱感觉焦虑，但这些焦虑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了解决。经过一系列超乎寻常的巧合后，牛顿竟然获得了一个正式职位，他开玩笑地将其称为“我的总督生涯”。这个职位让他获得了安全感、身份、一间舒适的办公室和 60 位听从他领导的下属，不过，这些物质优待并未改变他的生活方向——不断地亲近跟随上帝。

1754 年 10 月，中风后只过了几天，牛顿的身体就恢复健康了，但波琳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她的诉述暧昧含糊，医生无法明确诊断，认为有可能是丈夫突发急病带来的后续反应。牛顿回忆说：“她简直不堪一击，衰弱到几乎无法忍受任何人在她的房间里走动。她的状况越来越糟糕，我每天都有更多的理由变得忧心忡忡，恐怕诀别在即。”妻子病重不治的前景令牛顿深感忧痛，心里十分难过。在斯特普尼不从国教教堂，圣齐斯的亚

历山大·科拉内介绍他认识的一些新朋友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和教诲。

斯特普尼的牧师是塞缪尔·布鲁维（Samuel Brewer）。他不但成为了牛顿的良师密友，还鼓励这位热心渴慕的新成员去听一大群在伦敦和南英格兰的著名布道家讲“道”。那时，牛顿产生了一股巡游的热情，这股异乎寻常的力量推动他到许多教堂、小礼拜堂和其他属灵场所倾听圣经讲解。1755年上半年，他的日记里写满了类似这样的记录：“2月17日礼拜天，早晨5点赶往梅德斯通听福音布道”，“早晨5点赶往罗德伯拉夫临时聚会处听托马斯·亚当牧师先生讲解《马太福音》第5章，一场令人心旷神怡的讲道。上午听布鲁维先生布道。下午听詹宁斯先生布道。”

牛顿所有的礼拜天都四处奔走在不同地方参加敬拜活动，一天听三场布道，不但如此，他还热心地参与周末的服侍。他在日记里记录他在头半年的时间里拜访过40多间教堂、小礼拜堂和会堂。它们包括伦敦市圣海伦的主教门；在费特巷和弗利特大街之间的独立教会会堂；老宽街的品内斯大厅，他在那儿听独立教会牧师约翰·古斯（John Guyse）讲解《约翰福音》第10章，他认为“这是我听过的最出色的教义性的讲道”；但他对查塔姆附近的几个教堂却很失望，没听过一场好的布道。

牛顿听过的最精彩的布道出自乔治·怀特菲尔德（1714—1770），他是英国宗教大觉醒的领袖，也是其经常拜访的美洲殖民地颇负盛名的属灵领袖。18世纪中叶，怀特菲尔德及其福音传道伙伴约翰·卫斯理（同样是圣公会牧师）因为他们的循道宗教义——简单地说就是带着福音热情传讲上帝之道——受到英国圣公会领导阶层猛烈攻击。布里斯托主教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特别将矛头对准怀特菲尔德，判定他“所谓的热心……假冒不可思议的启示和圣灵的恩赐……真是可怕之事，极为可怕之事”。

牛顿在母亲的教导下一直相信在圣灵的感动下传讲“上帝之道”是一件好事。通过斯特普尼的牧师塞缪尔·布鲁维的帮助，牛顿非常高兴地得到一封写给乔治·怀特菲尔德的推荐信。1755年6月6日至7日，他们有三次短暂的见面，最长的一次谈了差不多15分钟。怀特菲尔德当时刚刚草就一批重要信件，准备寄往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没有多少空闲时间，但他还是给了牛顿一张参加礼拜天布道活动的门票。第二天早晨，当牛顿到达东伦敦穆尔菲尔德临时聚会处（Moorfields Tabernacle）时，他发现自己置身于千人之中，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聚会。在持续3个小时的敬

拜活动中，唱了20多首赞美诗。活动的高潮就是怀特菲尔德在赞美诗当中的讲话。牛顿回忆说：“以前我从未这样想过天堂里的事，并如此快乐地充满期待。”他对怀特菲尔德在“背景和叙述中展露出来的劝诫能力、激励、沉静、庄严和对信仰的确信”满怀赞赏。牛顿对这次听道经历的评价是——“最终，我带着喜乐离开。”

乔治·怀特菲尔德在这次主日敬拜中的影响是如此有力，以至于牛顿在好长时间里成了他的“粉丝”。他觉得相比于他的新英雄，别的传道人的讲道都枯燥沉闷至极，乔治充满灵性的雄辩口才令他目眩神迷，在余下的几天里无法吃饭，无法与他人交谈。他在日记中吐露说：“我似乎只对怀先生的布道有个人的依赖，似乎上帝只借他的口说话。”尽管有这种自我警告，牛顿还是在随后的两周里去听了怀特菲尔德的多场布道会。他对所听的道赞美有加——“我必须说：‘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这句话出自《列王纪上》10：7，示巴女王面对金碧辉煌的所罗门宫殿，如此表达她的震惊之情，这也传达出了牛顿倾听怀特菲尔德布道时受到的震动。复兴聚会十分狂热，有些场聚会有五千多听众在露天听道，不过牛顿仍然找时间独自祷告和默想。他的方式就是在靠近查塔姆、罗彻斯特和梅德斯通的肯特乡村散步。那片未受任何污染的美丽乡野被自豪地称作“英格兰花园”，牛顿说他能够指出“许多地方，我记得曾在那儿热切地寻求，欢喜地发现上帝的安慰临到我的心中”。

牛顿的内心需要找到一个宁静独处之地可以让他不受打扰地与上帝交流。当年在远航的商船上，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上找这样一个地方并不难，但在陆地上却并不容易。他也许会同意14世纪神秘主义者梅斯特·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话：“在所有的创造当中，唯有宁静与上帝最相像。”

在宁静与沉寂之地，牛顿祷告得愈加热切。他有两个迫切请求：一个是希望波琳能够从令医生深感困扰的疑难病症中康复，一个是他所说的“我的调职”，即他需要获得一份新的职业。

牛顿已经失业9个月了，尽管不工作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但缺钱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他最有希望获得也最适合从事的职业就是重新开始做贩奴生意。他不肯做此选择，倒不是因为道德缘故，而是因为他不喜欢被人叫作“狱吏或看守”。有一个人对他的拒绝深为理解，就是他的老朋友约瑟夫·曼内斯特先生。1755年7月，他帮牛

顿谋得了一个职位，这是上帝对牛顿祷告的完美回应。

曼内斯特为牛顿谋得的职位是利物浦海关稽查主管（Surveyor of the Tides），隶属于皇家海关。这个职位可以获得每年 150 镑的高额收入，管理 60 位雇员，还有许多额外的优待，包括在港口有一间大办公室和一艘可私用的驳船，有一位艇长和六位舵手。这个职位落在牛顿的头上经历了不少波折和巧合，仿佛一个传奇故事，所以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把这一切看作是上帝之手引导的结果。

牛顿获得任命一事开始于 6 月中旬，当时约瑟夫·曼内斯特听说利物浦现任海关稽查主管打算辞职，原因是他的父亲去世后留给他一笔要求他付上种种新责任的遗产。听到这个消息，曼内斯特开始试图为牛顿谋取该职。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份职位通常由赞助人来决定，于是曼内斯特给最有权势的赞助人写信推荐牛顿担任此职。

那位收到曼内斯特推荐信的人是索特威克庄园的国会议员托马斯·索尔兹伯里（Thomas Salusbury）。他是一位富有的地主，多年以来一直是利物浦一位重要的国会议员。索尔兹伯里同意了曼内斯特的请求，回信说他会给地方大臣写信任命约翰·牛顿担任此职。

在此期间，曼内斯特回到利物浦港，却发现他听到的是一则荒谬的传闻。现任海关稽查员科劳斯通（Croxtton）先生并未辞职，也没打算辞职。曼内斯特先生了解了事实真相之后无比尴尬，他意识到自己让索尔兹伯里陷入了困境，于是，他打算写信向议员先生道歉，让他不用再推荐牛顿。

道歉信还未来得及写，就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变故——科劳斯通先生死在了床上。前一天夜里，他还身体好好地在履行海关稽查主管的职责。他去世的消息让所有人深感震惊，同时也引发了对继任机会的激烈竞争。利物浦市长抢先一步，正式请求任命自己的侄子担任新的海关稽查主管。市长写了一封措辞精当的推荐信送交托马斯·索尔兹伯里议员先生，他对这个职位拥有重要的任免权。一般情况下，利物浦的国会议员不会拒绝利物浦市长的建议，因为在当地论资排辈起来，市长毕竟是比约瑟夫·曼内斯特重要得多的人物。也许议员并未对市长这种大张旗鼓地建立裙带关系心怀不满，但不管怎样，这封信到得太晚了。提议任命约翰·牛顿的推荐信已经从索特威克庄园发往地方大臣的府邸，托马斯·索尔兹伯里无法改变建议。四周后，约翰·牛顿被正式任命为利物浦的海关稽查主管。

整个事件——利物浦市民中流行的不实传闻、科先生的暴死、高层之

间的游说和政治阴谋等等——发生之时，牛顿身在伦敦。他只对这场传奇事件的开端有所了解，那就是约瑟夫·曼内斯特写信问他是否有兴趣担任此职。牛顿在日记中写道：“6月19日星期四。收到M先生的信，谈及职业问题。我在上帝面前默想了一两个小时，把这一切交托到他的手中，谦卑地恳求他赐智慧，为我选择。最后我写信告知我同意做这事。”

这封表示同意的回信开启了一连串的游说和巧合，让牛顿变成了利物浦的海关稽查主管。当他最终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细节之后，他相信是祷告的力量，是上帝之手成就了所有这一切。他写道：“我按照所期待的被提名了。我渴望获得上帝的这个礼物，一分钟也不耽误。”他补充了一个无法否认的结论：“这些事的出现对我是超乎寻常的，尽管这只是我个人历史许多片段中的一小段。”

循道主义与物质主义

1755年8月，牛顿赴利物浦担任海关稽查主管。波琳的健康状况仍然令人担忧，他只好把她留在肯特。尽管心中压着这样一块大石头，但他还是很快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包括检查进入利物浦的船只情况，并向他们征收适当的税费。

牛顿做海关稽查主管每周情况不一样，时而繁忙时而轻松，其实就是他与副手之间轮流工作。在他忙碌的一周里，他要乘那艘有6支桨的公务小船出海巡查随潮到港的船只。这些检查既艰难又疲惫，就像他在给妻弟约翰·卡特莱特的信中所说的那样：

上周我以海关稽查员的身份出海，到那些第一次到港的船上去，它们有的停在礁石边，有的停在近岸处。天气相当恶劣，但仍有许多刚到港的船只。无论白天夜晚，我都要注意潮汐的情况，到周末的时候，我已经疲惫不堪。现在轮到我享用平静的一周了，我只需查看并督促一些停泊在码头上的船只离开，根本不用坐船外出，这样我就会有足够的时间。

牛顿把宁静的一周形容为“更像是享闲差”，这让他有更充足的机会在信仰上进深学习。当他第一个礼拜天在斯坦利的浸信会教堂听了约翰·约翰逊（John Johnson）牧师的讲道后，他满怀感恩地评论说：“我希望自己能够赞美上帝，在利物浦至少还有一位真正的、健康的、有经验的福音

传道人。”但约翰逊并不适合每个人的口味。一位同时代的人认为他“基本上是一个一触即怒的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喜欢旅行，在神学上吹毛求疵、易挑起争端。”当时，牛顿觉得自己更喜欢贝热姆大街教堂的传道人约翰·奥顿（John Oulton）。不过，在参观了几个教堂后，他很快就对整个城市的属灵生活感觉不满了。尽管参加过浸信会的许多场主日崇拜，牛顿还是不愿意成为一名浸信会信徒，部分原因是他不认为全身受浸有何必要，他不想改变对圣公会的忠诚。

牛顿做的另一个决定就是离开共济会。他最初是利物浦主要的共济会分会的一名成员，但他对他们的仪式和被他看作有“如此多不道德之人”的群体感觉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太情愿地去了分会，我是最后一个去第一个离开的。我开始想，在那里没有什么意义。对此我深感厌倦……因此我决定悄无声息地退出。”

这次激发牛顿属灵生命成长的事件是，1755年9月，他崇拜的英雄乔治·怀特菲尔德来访利物浦。他在9月10日和14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与怀特菲尔德的14次会面，他不但倾听怀特菲尔德讲道，还与他见面、进餐和交流。9月11日星期四，是这场会见具有代表性的紧张的一天。牛顿在日记中这样描述道：“四点半钟听怀特菲尔德先生讲解《以赛亚书》25：4到五点……上午拜访怀特菲尔德，为时两个小时的私人会谈，非常舒服和满足。与怀特菲尔德一同进餐。六点钟听他讲解《希伯来书》2：3。”

像牛顿一样，乔治·怀特菲尔德从一开始就试图唤醒利物浦民众的属灵生命。他发现这是一座毫不敬畏上帝的城市，这让他忍不住想尽快离开，尽管这意味着他要缩短原本长达一周的系列布道计划。牛顿和其他人都劝这位著名的福音布道家留下来。当布道进程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两个人拿出更多的时间彼此相伴，牛顿被一些熟人戏称为“小怀特菲尔德”。牛顿在星期天早晨陪伴怀特菲尔德在圣托马斯教堂服侍时，会众们把他看作是怀特菲尔德的追随者之一。追随者的数目在持续稳定地增长，最后一天晚上，他看到怀特菲尔德的露天布道会已经聚集了四千多人。在听众中有牛顿的女房东，在房客的极力邀请下，她只好参加了一次早会。一开始，她满腹疑虑，但怀特菲尔德的口才将她完全征服了。牛顿回忆说：“她所有的偏见都被挪除了，她从内心深处接受了信仰。现在她对邻居们的责难和嘲笑都能忍耐接受，他们叫她循道会信徒，面对这种说法，

她似乎像我一样泰然。”

这封谈及女房东的信件第一次记录了牛顿把自己称作循道会信徒，这个称呼起源于当时人们对乔治·怀特菲尔德和约翰·卫斯理的早期追随者的嘲弄。用卫斯理的话说，他们的使命就是“让圣洁精神遍满大地”。在牛顿参加这场运动的年代，循道会仍然属于圣公会的一个分支。他们强调圣灵的影响力和因信称义的确据，但他们声称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律法。这很适合牛顿，他已经表现出不情愿加入一个新的教派，也不愿成为一名浸信会成员。他想成为一名复兴的圣公会信徒，而不希望做一个分裂的改革者。

牛顿转向循道会的部分原因是他个人对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崇敬，部分因为他的英雄的布道风格和布道内容，部分因为怀特菲尔德的信息主要传递的社会群体阶层——利物浦的穷人。这三个方面体现在牛顿于9月16日写给波琳的信中，那天是怀特菲尔德结束访问利物浦的日子：

W先生昨天早晨离开我们走了。我陪他从小路出城……在他身边这些天的交流远胜过在伦敦的一年。我听过他九次讲道，与他一起吃过三次午餐和一次晚餐，星期天他又请我和他一起进晚餐。我无法表达我对他的崇敬之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都能为他向上帝祈福。只有一天晚上，他不被那些赶时髦的人看好和认可，尽管他们中不少人都听说过他，而许多贫苦阶层的人却流着眼泪向他求问。

牛顿对社会上“贫苦阶层”的关注显然在增加，这在他的日记中有许多记载。他悄悄地在利物浦那些贫困、失丧和患病的人中做着善事；与此同时，他为病中的波琳的祷告也得到了回应。9月底，她在姨母的陪同下来到伦敦。尽管处在恢复期，她还是有足够的体力参加穆尔菲尔德临时聚会点的一两次活动，那里的布道是由循道会的主要讲员承担，尤其是乔治·怀特菲尔德。他给牛顿写信说他见过波琳了，并告诉他“听说最伟大的那位医生对她的医治比所有的药物都更管用”。牛顿对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但波琳姨母的看法却截然相反。她对外甥女与循道会成员频繁接触深感不安，她的社会地位使她强烈地反对他们。姨母警告波琳，她所嫁的这个人如今自称为循道会信徒，这会让她整日和洗衣妇混在一起。牛顿需要再一次向妻子保证说她的社会地位不会因为他对怀特菲尔德的基督教服务观的委身而被降低，他给波琳的信中说：“我从没打算要你和洗衣妇们在

一起。”他解释说他们的朋友圈将会包括那些教养良好和殷实富裕的家庭。不过，他又补充了一个条件，因为他们的信仰，“你当然也要多少背负起十字架，必须准备好被你的一些熟人所不齿。”

姨母的警告并未能阻止波琳·牛顿参与到丈夫照顾穷人和稽查工作的新生活中去。10月中旬，她已经恢复健康，乘船140英里北上，到达斯塔福德郡的斯通镇，在“贝尔和比尔客栈”与牛顿快乐地团聚。两天后，他们骑马走了65英里回到利物浦。牛顿说他发现妻子“健康强壮得远超出自己的想象”。

同样的表达用在牛顿的身上也很合适。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的健康状况和经济情况都极为糟糕，让他焦虑不已；如今，他精力旺盛，收入稳定。事实上，牛顿过去从未如此富有过，除了做海关稽查主管的基本工资外，他还从他所谓的“意外收入”中获益颇丰。这指的是那些来路可疑的特殊酬金和礼金，是远航船长和船主付给海关官员的，它们不算在税费里。过了一段时间，牛顿对这些“意外收入”的受贿的实质感觉忧虑不安，但在最初的两年里，他一直很高兴地将它们据为己有。他在给杰克的信中提到这些意外收入给他带来了100或150英镑。这些回扣一开始让牛顿颇为愉快。他享受着经济上的成功，同时还满怀善意地拿出其中一部分送给穷人。也许他深受约翰·卫斯理那句尽人皆知的名言的影响：“尽力地赚钱，尽力地省钱，尽力地施舍。”

重要的一年快结束时，牛顿幸福地拥抱循道主义和物质主义。1755年新年前夕，他给妻弟约翰·卡特莱特写了一封信，很满意地报告说波琳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他最后写道：“我们有许多要感恩的事，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健康、平安和富足。”

尽管在这封信中没明说，但在牛顿心中有一个想法正在酝酿成熟，他想要一个更大的祝福。他有一个新的计划，并为此祈祷。在日记中，他对此写道：“在这个地方，要努力开始建立一个宗教社团。”

利物浦的生活

牛顿关于在利物浦建立一个新的宗教社团的想法，源于他对“福音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小镇地位之低”的现状的担忧。在随后的两年里，他努力工作以改变地区状况和自己的性情，但这却带来了与城里那些远离团契生活的信徒之间的一些纠葛，同时也让他的内心产生了良心与金钱之间的争战，不过，牛顿解决这些争论焦点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声望。

18世纪50年代的利物浦是一座繁荣兴旺的滨海小城，有欧洲最繁忙的码头，是100条贩奴船的大本营。当地成千上万的居民依靠码头讨生活，他们当中没有几个人会为这座城市涉足买卖奴隶感觉羞愧，贩奴生意正是商业繁荣和城市自豪感的来源。埃里克·威廉姆斯博士（Dr. Eric Williams）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一书中记录了18世纪利物浦繁荣昌盛的景象：“1752至1771年之间，码头的关税提高了2.5倍……民间流传说，利物浦有好几条主街都用铁链做标志……海关大楼的红砖墙用黑人的头做装饰。”

尽管牛顿对奴隶制在道德上的邪恶性仍漠然不察，但他充分关注到了利物浦人道德水准的低下。1756年1月，他给乔治·怀特菲尔德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这里生活着四万多对信仰懵懂无知的人。这块远离上帝之地，必是上帝满怀忧伤观看之地。对上帝的不敬与漠然似乎正在将他们瓜分，外在物质的繁盛让所有阶层、处于所有地位的人变成了瞎子。

因着自己也成为城市里唯利是图的一员，牛顿开始忧虑他也在变得盲目。他注意到海关官员（包括海关稽查员）已经习惯了收取船主的好处费以增加收入，这说得好听些是收入不明，说得糟糕些就是受贿。他在日记中坦白道：“在这个新职位上，我开始收纳一些好处，这让我既悲哀又惊讶地发现，我竟如此爱钱，它是我内心深处所有罪恶萌生的温床。”发现自己嗜爱金钱并未能阻止他试图通过玩彩票大捞一把的行动，而且他郑重发誓要将还未获得的金钱的四分之一分给上帝。除了发财梦，他还发现自己深陷于“种种肉欲的邪恶心思”和“浓重的空虚之念”中。

牛顿抵挡这些思绪的唯一良方就是听道。但是，在对乔治·怀特菲尔德的一段评价中，他说，利物浦所有教会的牧师不是自己“幼稚和腐化”，就是“轻看和贬低耶稣”，因此，牛顿极力劝说当时有名的循道会牧师到这座城市来布道。但是因为循道会内部的分裂，这些来访还是带来了不少问题；不过牛顿自己在一段时间里在分裂中一边倒，这让他对约翰·卫斯理毫无回应。不过，随着1757年4月这位循道会共创者之一的牧师来访，牛顿改变了先前的负面看法。牛顿被卫斯理的布道和自我批判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在此之前，他一直对这位伟大的福音布道家抱以批评和排斥的态度。除了在卫斯理来访之时与他长谈布道内容之外，牛顿还研究了卫斯理的新作，其中包括一篇反对不道德的交易的论文。这本小册子令牛顿大为震动，促使他改变了他的商业生活。

约翰·卫斯理的劝诫促使牛顿反思自己是否履行了身为海关稽查员当尽的责任。他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我被迫自问，我是否在开始承担这个职分时立了誓言，拒绝拿任何酬金和礼金，但却随波逐流，这么做了。”经过自我反思和与至少两位他认可的牧师——塞缪尔·布鲁维和约翰·古斯——讨论过之后，牛顿于1757年夏天决定从此不再收取任何额外的酬金和礼金。这个决定一定让海关的同事们大为惊诧，因为他们一向认为这些回扣或“意外收入”是工作中正常的额外补贴。牛顿决定放弃这些补贴，并坚守自己的誓言，这让他损失了一多半的收入。不过真是感谢约翰·卫斯理，牛顿明确地感觉到自己的行为被引上了一条在道德和灵性上正确的新路。

当稽查工作量减少时，他的收入也随之降低。1756年，英国与其陆地上的敌人法国、西班牙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利物浦变成英格兰少有的几座在冲突中受害的城市。在著名的七年战争（1756—1763）中，法国海

军封锁了码头，掳掠了许多船只。

在封锁期间，牛顿有大量的闲暇时间。他用其中一部分时间陪伴波琳，用另一部分时间热心地研读圣经和神学作品。

1757年2月12日，约翰·牛顿夫妇庆祝结婚七周年。这对夫妻远未受到“七年之痒”的折磨，反倒仍然深深地相爱。他们搬进旧厅大街拐角爱德蒙大街的一处房子，这里处于市中心。21世纪，当地报纸《利物浦回响》(*Liverpool Echo*)的办公楼就坐落于此，并因此而闻名。在18世纪的家中，牛顿夫妇对自己的新的家庭生活安排感觉幸福满意。牛顿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他有了一间小书房，他通常每天早晨5点钟开始在里面阅读和祷告。在这个时期的记录中，他的祷告有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方面就是他可能过于爱自己的妻子了。他在祷告中谈及他的结婚纪念日时，说：“哦，主啊，您最知道我们长久以来是何等地以对方为偶像。”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尽管在这段文字的语境中，丈夫与妻子彼此崇拜并不算什么罪过，但追根溯源起来，偶像一词毕竟是个贬义词。让牛顿感觉忧虑的是他对波琳的爱有可能冲淡他对上帝的爱，他觉得他们两个人过于关注对方了，这就像司汤达为爱情所做的定义——“两个人的唯我主义”(egoisme a deux)。不过，牛顿的日记给人的印象不只如此——他将上帝放在了妻子的后面，因此他对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感觉烦恼似乎就不足为奇了。

牛顿的婚姻还有一个方面是令人困惑不解的，尤其是这件事在他的日记、祈祷词和信件中几乎从未被提及到。到1757年，他和波琳已经步入婚姻的第八个年头了，但他们从未说起过希望要孩子的事。这是因为他们打算一直不要孩子吗？或许他们因为一直没有孩子感觉失望？或许波琳因为长期生病用药导致她无法怀孕？对于这个问题，牛顿在多卷文字记录中几乎只字未提。这就留下了一个秘密，而特别不应忽略的事实是——牛顿通常在祷告和文章中对其他私密事务都是极为坦率的。关于这个秘密，有一条小小的线索在他的日记中有所显露，那里面多次提及利物浦的医生给波琳的高额的医疗账单，但未提及任何病症。医生也许通过诊断告诉波琳她无法生育吗？也许她对此过于失望和难过，不愿提及此事？我们不得而知。

除去家庭和与婚姻生活有关的事，牛顿对信仰的热情在持续地高涨。他继续每周参加好几场崇拜，寻找出色的讲道。他发现与其他的传道人相

比，他仍然更喜欢贝热姆大街浸信会教堂的约翰·奥顿，但他仍然拒绝成为浸信会的正式成员。在这个问题上，奥顿牧师与牛顿多少还有点儿“无益的争吵”。这位海关稽查主管的问题主要在于——他反对必须全身受浸才算受洗。牛顿说：“用一勺水还是一池水施洗，对我来说并非问题的关键。”但对于一名浸信会信徒来说，这可是个激怒人的观点，争论变得白热化了。牛顿在日记中写道：

我与奥顿先生一起喝茶，对于洗礼进行了一番无益的争辩。我希望自己能够避免这类争执，因为到后来，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无法再倾听或者表达任何新的想法了，我发现内心涌起了一股骄傲之情，促使我犯罪。

这种罪就是骄傲引发的愤怒。在有关神学和教义问题的争辩中，牛顿很容易被激怒，这要归功于他的广泛阅读，他在阅读中逐渐变成了一位令人不可小视的专家。

牛顿在这段时期研读的对她最有影响的作家是希波的奥古斯丁，其影响显而易见。牛顿的日记中常常闪现着奥古斯丁信仰自传《忏悔录》（*Confessions*）的风格和内容，他们两个何其相似。尽管相隔了大约15个世纪，但他们二人竟然具有同样的品性和祈祷的风格，在他们的文字中，都表现出与上帝亲密交流的热情；两个人都曾为胜过肉体的欲念进行过激烈的内心争战。牛顿非常赞同奥古斯丁的那句格言：“如果我们把同样的罪踩在脚下，我们就能造出一架罪之梯来”；两个人的母亲都对他们的信仰产生过至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奥古斯丁在《忏悔录》1章1节中的祈祷，一定深深触动了牛顿的心弦：“哦，上帝啊，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的里面，便永远不得安宁。”

对牛顿来说，缺少平安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如今，内心的躁动正在显露出来。他知道自己想服侍上帝，问题是如何服侍。他随时随地都与浸信会的人争辩，袒护循道会的不同派系，责备英国圣公会的自满。他早就在考虑成立一个新的宗教社团，甚至开始计划去实施了。1756年，他写了一本名为《关于宗教协会之思考》（*Thoughts on Religious Associations*）的小册子送给利物浦的牧师，每人一册。他渴望传讲福音，但没有教会愿意为他提供讲台。能够让他的躁动平息下来的就是奥古斯丁听到的那句话——“拿起来读！”

牛顿不但每天花大约三个小时读圣经，他还学习从原初写作的语言翻译圣经。他对拉丁语的熟练掌握让他进一步学习希伯来语和新约所用的希腊语。他依靠词典和注解的帮助进行自学，能流利地阅读希腊语新约圣经即七十士译本（希伯来语圣经最古老的希腊文译本）和旧约中大多数希伯来文经卷。1757年10月，他自己说“我能够毫不费力地读历史书和诗篇了，不过读先知书和某些困难的片断时仍然得时常依靠辞典。”

尽管牛顿内心深处对学术研究充满渴望，但在他勤奋学习圣经语言的背后，隐藏着他的一个计划，这是他学习的真正目的——在18世纪，对于那些未能熟练掌握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人，英国圣公会是不会按立他们为牧师的。牛顿学习语言的行为表明，他的内心正在逐渐地倾向于找机会成为圣公会任命的牧师，这部分是因为在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的带领下，循道会在国内掀起的复兴运动也大大地激励着他。就像牛顿在1756年3月28日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我特别地为利物浦这座小城祷告，如果主愿意，我们就可以站在圣公会的一边一同参与那正在四处爆发开来的伟大的启蒙运动。”

牛顿热切地希望在这场“站在圣公会一边参与的……伟大的启蒙运动”中发挥作用。但他无法确定这种渴望是出于上帝的呼召还是他自己的心愿。在焦灼的忧虑当中，他迈出了值得赞赏的一步——把圣职难题交给上帝。在日记中，牛顿描述自己“不知道我后来渴望达成的种种想法是出于圣灵恩慈的心意，还是己意与自负的结果。我把自己交给主，他在这一年里可能会向我指明一条路。”

圣职呼召

牛顿接受圣职的经历仿佛过山车一般起伏跌宕，其间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整整持续了6年。1758年，牛顿确切地听到上帝呼召他出来做牧师。然而，在那年结束之际，他经历了回应呼召的首次重大失败。

约克郡是英格兰最大的城市，就是在这里，牛顿先前对职业的疑虑重重变为确定无疑了。作为利物浦的海关稽查主管，在英法战争爆发期间，他的工作变得非常轻松。6月初，他携妻子到外地度了一个长长的暑假。穿过平宁斯（Pennines）后，他们在利兹市（Leeds）附近拜访了几位福音传道人，并与他们建立联系。詹姆斯·司各特（James Scott）是汉克蒙德威克城（Heckmondwike）独立教会的福音派牧师；哈瑞·克鲁克（Harry Crooke）是汉斯莱特（Hunslet）圣公会的教区牧师；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是利兹市不从国教教会牧师，他听了乔治·怀特菲尔德的讲道后获得重生。

在约翰·爱德华兹的邀请下，牛顿在利兹市那座被称为怀特小礼拜堂（White Chapel）的会厅开始了平生第一次面对会众的讲道，结果一塌糊涂。因为神经过度紧张，牛顿几乎说不出话来。后来，他在一封写给苏格兰神学生威廉·巴拉斯（William Barlass）的信中描述了这次讲道：

我试图即兴演讲……刚开始进行得还好，我一点儿也没害怕发抖……但只讲了10分钟，我就停滞不前了，就像汉尼拔站在阿尔卑斯山前那样。我什么也想不起来，脑袋里面一片茫然混乱。我仿佛站

在悬崖峭壁边上，不敢向前迈一步。我就那么看着会众，他们也看着我。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走下台去，离开人群，有些人在笑，有些人在哭。我的骄傲和自满变成了痛苦的羞耻。

对于牛顿来说，这一令人尴尬的场景带给他的后续影响远比那天早晨他智穷辞竭时更糟糕。他责备自己竟然会接受约翰·爱德华兹的邀请，竟然在一间不从国教的会堂第一次尝试讲道，竟然没有讲章，竟然遭到如此可耻的失败。这些残破的记忆碎片令他极为痛苦，他自述，“翌日，整整一天，我都深陷于恼恨和试探的旋风中无力自拔，那感觉简直无法言表。”

牛顿也许有理由认为他的灾难性讲道是一次独一无二的体验，他的传道生涯将就此结束。事实上，他所经历的正是那些年轻气盛、雄心勃勃的政治演讲家们常常经受的共同体验。不妨举一个20世纪政治家的例子，美国第37届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也患有同样的综合征。1928年，他在一次高校辩论比赛上突然忘了辩词。他也曾像牛顿一样深感羞耻，在紧张懊恼中退出学校辩论队，并认定他政治家的梦想永远地破灭了。拿牛顿与尼克松做比较应该不算过分，我只是想通过对比说明牛顿当时因讲道失败而深陷失望之谷并非绝无仅有。

牛顿沉浸在沮丧中的时间并不长。在那次灾难性的讲道两天后，他与汉斯莱特的教区牧师哈瑞·克鲁克进行了一次长谈，后者提供给他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实用性建议，这让他对那场灾难性布道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牛顿把克鲁克的建议记在心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开始明白，拒绝讲章的帮助是多么草率……多么冒险的举动。”

克鲁克与牛顿的这场谈话非常重要，不仅因为他重新激发了这位失败的传道人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他是第一个建议牛顿在圣公会接受按立的牧师，尽管他对《公祷书》的某些片段存有保留态度。牛顿后来回忆说：“与克鲁克先生的长谈让我重新燃起了向圣公会寻求按立的愿望，同时也改变了我先前认为难以克服的对待各种异议的态度。”

哈瑞·克鲁克（1708—1770）与牛顿在许多地方有共通之处，他对牛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克鲁克对奴隶贸易的认识极其清晰细致，因为他就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圣齐斯。更重要的是，克鲁克与循道会派来往甚为密切，与约翰·卫斯理多次会面。不过，他对循道会和圣公会之间越来越深的隔阂深感忧虑，因此决定对循道会的支持有所保留。他劝说牛顿也保持同样中立的立场，避免过分效仿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

1758年夏天，牛顿和波琳骑马在约克郡美丽的荒野和山谷闲游期间，他又寻找到了许多途径。他在哈沃什（Haworth）同教区牧师威廉·格林姆肖（William Grimshaw）成为朋友。一百年后，这里是勃朗特姊妹（Brontes）的故乡。拜访格林姆肖使牛顿有了另一位重要的属灵导师。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牛顿描述格林姆肖如何改变了他，使他从专注于对上帝的敬畏而开始明白了牧师的职责乃是“引领那些疲惫不堪、忧心忡忡的人向耶稣求助，在他那里，他们才可能找到心灵的安息”。

访问过哈沃什后，牛顿返回利物浦，在33岁生日^[1]到来之前用了六周时间对内心良知进行自省，看自己是否准备好做牧师候选人。他把这一自省按时序编辑成一本祈祷和反思的日记，他称之为《有关重要问题的遐思与疑问辑录》（*Miscellaneous Thoughts and Enquiries upon an Important Subject*），六十多页对开的手稿纸上大约有一万五千字。《遐思录》是一份值得关注的文件，它清楚地表明，牛顿是带着深刻的神学思考和严肃的职业精神投入到呼召的方方面面中去的。要知道，日记的作者从未进入任何一所圣经学校、学院或大学进行过神学学习，日记表现出他具有高深的圣经知识和成熟的属灵生命。它也显示出牛顿谦逊的品格，他的自省包括他决定降服自己全然委身于上帝。在21世纪，任何一位牧师候选人都会从研究250年前约翰·牛顿的生平经历中获益良多，因为《遐思录》是一份从未被出版或广泛引用的文件，虽然历经岁月沧桑，它至今仍然值得仔细地分析研究。

牛顿开始写作《遐思录》是在1758年6月23日。他在一篇公开发表的序言中提及他的措施方案，他想请上帝“来鉴察我的内心对于计划承担的伟大事业的本质、品格、难处和重要性的细密思考”，他为自我省察设了一个时间表，决定6个星期之后在8月4日他过33岁生日时结束。在这段时期，他决定严格按照时间表进行祈祷、默想、读经和偶尔禁食。他还要求自己通过效法一位有资格被按立的牧师的行为进行自测，“从今以后，要保存良心告诉我的任何事，以提醒我不配那个崇高圣洁的呼召。”在这篇论及方法的前言的最后一段，牛顿从圣经的四卷书中选择了四段文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检验自己是否适合从事圣职。这些圣经书卷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书信、《约翰福音》14-17章和《约翰一书》。

自省的第二天，6月24日，牛顿提问并回答了一系列以“谁是配得的？谁是有能力的？谁是充足丰富的？”等开始的问题，以确定一位牧师

需要拥有的各种品质。在确定了诸如“热情、勇气、勤奋、忠实、温柔、谦卑和舍己”等品格后，牛顿先是宣布，“哦，主啊，我必须承认，再没有哪个人像我这么不合适了，没有哪个人会这么不配”却要做牧师。然而，在这一天结束时，他热情洋溢地写下了这样的祈祷文：

主啊，如果你愿意，就请大大地怜悯这个卑鄙而不幸的人吧，他曾经被污秽的群灵捆绑伤害，流泪号哭全为自己……哦，主啊，呼召我，我就回应；差遣我，我就出行……让我知道你已接纳了我并鼓励我向前奔走。

在随后的一周里，在日记的开篇，牛顿开始与成为一位被按立的牧师的种种负面因素进行争战（“种种对立……责难与嘲笑……经历比他人更大的试炼”），与此同时，这也提醒他要从事这份工作就要受到经济上的限制，需要抛开“世事的缠累”。于是，他开始认真详查自己被呼召做牧师的证据。在引用圣经中许多例子证明上帝选择人总是“从最卑微和最无能的阶层”之后，他得出结论说，决定性的因素一定是“一种真实的呼召……一种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和拯救灵魂的真实愿望”，没有这个，一个牧师“就会像一只没有钟摆、失灵的钟表一样”。

这时，牛顿被自己想出来的一个难题抓住了——他应该属于哪个宗派。他发现自己没有确定的把握，“此前从未与哪个宗派联系过，或者加入其中过”，他说他要等待上帝对这个问题的引导，因为“它似乎过于重大，凭个人的心意无法确定”。牛顿长时间地默想《提摩太前书》4：16：“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他发现，对于一个忠实的传道者来说，主要的危险是自我中心或如其所言“自我”。他警告并激励自己要过一种行为端正、献身于上帝的生活，“否则，你一旦不够警醒，卑鄙的自我就会使你失去忠心，令你充满羞耻和哀伤。”在牛顿看来，传道者最高贵的美德就是谦卑。在结束对谦卑的默想之时，他祈祷能够拥有这个恩赐：

主啊，让我在自己的罪面前生出谦卑，让我在你的荣耀面前生出谦卑，让我在你的爱面前生出谦卑，因为我的确从未如此谦卑。我的骄傲源于无知……但愿我在自己的眼中一无所是，但愿我能够心甘情愿地渴望成为众人的仆人。

经过 42 天热切的自我反思、读经和祈祷，牛顿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他对自己的职业方向十分确定。1758 年 8 月 4 日是他的生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打算以一种严肃的、向主全然敞开、无条件地顺服的方式结束对这个问题的种种思考，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在阐明自己的顺服是“绝对完全和无条件的”之后，牛顿开始着手写下许多决心，每一条都以“依靠上帝的恩典，我决定”开头，大约有数百字之长。他要求自己遵循的生活原则包括祈祷、读经和默想等灵性操练细节，外在举止行为的庄重端正，在一切事务上都保持温和的态度，减少饮食嗜好。他决心在讲道中“用平实的语言表达朴素的见解”，而且坚持他所谓的“神圣真理的三个伟大分支”，他把它们定义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教导、关于爱的伟大教导和对福音圣洁原则的教导或者说是实践”。这些令人心生敬佩的种种决定相当具有挑战性且难于付诸实践，即使通读一遍都不容易，何况执行呢。把这些决定写下来之后，牛顿似乎也意识到了同样的问题。可以注意到，在那一天里，他没有经历“任何特别的现象”（比如情绪激动或者被圣灵充满），他用下面这段话结束了他在富于史诗意味的生日里委身上帝的承诺：

此时此刻，我要做出最后的决定；现在将近晚上 5 点钟。从早晨 6 点开始，我一直在禁食和祈祷中安静地等候主。从今以后，我获得了新生，我满怀感恩，谦卑地相信主已经接纳我的心愿，他将在自己看为合宜的时间指定我的工作，并赐给我恩惠、智慧和力量去实行。

不受《遐思录》的影响不太容易。这份文件有可能会因重复和冗长而受到责难，但是，对于这样一位大有前途的牧师候选人，一个用 6 周时间省察他就担任圣职所具有的优缺点的人，那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瑕疵。不过，从这种省察中，可以看出牛顿拥有极为突出的品格——成熟、真诚和谦卑。要知道，牛顿当时只有 33 岁，刚刚离开贩奴生意不到 4 年，他完全依靠自学。牛顿深邃的灵性生命及其智慧与热情逐渐说服了读者，就像说服他自己一样，即他的呼召是真实的，他的现实生活就是“生活、动作和存留”都在基督的里面。至于他何时、以何种方式开始过被按立牧师的生活，对于牛顿来说则是他面临的下一个难题。在 6 年的时间里，他屡屡遭受被排斥和被拒绝的失望。

注释

[1] 1758年8月4日是牛顿33岁生日。他原本出生于1725年7月。这里出现的7月和8月的差别是1752年采用新历法带来的结果。

第一次遭拒

做出成为牧师的重大决定之后，牛顿随后采取的行动就是在约克郡度过又一个巡游教会的假期。1758年秋，他再次拜访了此地的两位牧师朋友，并扩大了交往圈子，认识了几位新朋友，包括赫柏登桥的约翰·法塞特（John Fawcett，浸信会教友）、哈得斯菲尔德的亨利·维恩（Henry Venn，圣公会教友）和阿伯福特的本杰明·英格哈姆（Benjamin Ingham，摩拉维亚弟兄会教友）。与这些人交往带来的交叉影响表明了教会的多样性，这让牛顿逐渐看到了他所谓的“约克郡的复兴”。这种现象令他备受鼓舞，从他对此地属灵热情高涨的见证描述中可以看出这一点。牛顿在一封写给亚历山大·科拉内的书信里以喜悦洋溢的语气说道：

这里正在成为一个昌盛之地，仿佛上帝创造的伊甸园，福音之水汨汨而流，遍及每个角落。我并不是说每个教堂都在宣讲真理，也不是说在此地随处可见真理，但在很多方面，这里要比许多其他地方更均衡，无论是就数量而言，还是就特定群体中的工作深度而言，福音的确很有影响。

牛顿在约克郡的深入调查让他对某些宗派纷争和谩骂导致独立教会会堂四分五裂的状况异常反感。他对亨利·克鲁克声明说，他希望“尽可能地忽略我们彼此间的激烈争辩、冲突和分歧”，并补充说：

我真希望能够扬起上帝的旗帜，挥动圣灵的宝剑，不是抵挡名

称、宗派和异议，而是抵挡世界、肉体和魔鬼……有人告诉我因此（从人的角度来说）最好的剧场是在教区的教堂。

事实上，牛顿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在他的想法中，他一直不打算加入圣公会，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著名的教会法规第36条。它要求所有牧师候选人必须接受1662年《公祷书》的内容“与上帝的话没有任何矛盾”。牛顿以前就对《公祷书》感觉不满，尤其是1752年在非洲号上远航期间，他觉得这本书上的祈祷文语言太复杂，水手们理解不了，他对其敬拜仪式也存保留态度。然而，他在亨利·克鲁克的引导下逐渐改变了这些看法，后者指出他对《公祷书》上的某些段落（特别是有关洗礼和葬礼）的疑惑是毫无必要的。当时，对说服牛顿有影响力的另一个人是波琳。作为忠于圣公会的终生教友，她对丈夫参与敬拜和布道的那些教会中的不从国教教徒和独立派教徒一直侧目而视。波琳觉得不从国教教会单调沉闷，她抱怨他们的“安息日枯燥无味”，也许他们的会众也同样地单调无聊，因为参加这些会堂的人对她来说似乎是清一色的一类，许多人的社会地位低于她那个丰富多彩的卡特莱特家庭，这种态度后来在牛顿准备接受圣职任命的过程中成为相当具影响力的考验。

1758年秋末，牛顿走上了波琳和圣公会指导者亨利·克鲁克所认可的道路。他给后者写信说道：

我开始认为我上次与您的谈话是一件幸事，至少它似乎给我未来的生活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我热爱并尊重所有爱主耶稣的人，但就我的判断和倾向来说，尽管公理会也有许多有益之处让我感觉不错，但他们的方式还是过于狭隘了；同时有许多困难妨碍我参与到循道会当中去。

牛顿告诉克鲁克他正在预备圣公会授圣职的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考试，他还汇报说自己正在研究克鲁克推荐他阅读的一本重要的著作——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写的《基督教会组织法则》（*Of 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克鲁克对这位求教者的进步深感满意，他热情地举荐牛顿到肯派科斯教区（Kippax）做他的副牧师。这个副牧师职位由圣公会提供，牛顿要正式申请才能获得任命，此外，他还要出示一套三份由圣公会的“三到四名资深牧师”签写的人格证明。牛顿一开始就遭到了小小的挫折，他先找到利物浦的三位教区牧师，却遭到拒绝，因为他是“一

个与循道会纠缠不清的人”。不过，他还是及时地获得了需要的证明，把一切材料准备齐全。

11月14日，牛顿前往利兹，在那儿获得了亨利·克鲁克签署的职位授权书。参加完克鲁克教区教民的圣诗敬拜会，牛顿乘车到达伦敦。11月20日，他在上院见到切斯特主教。牛顿作为利物浦的居民去拜访他正合适，因为在那个时候，利物浦市是切斯特的主教辖区。不过，这位主教却彬彬有礼地拒绝了牛顿的申请，原因是——或者更像是一个借口——肯派科斯教区属于约克郡的大主教辖区。于是，牛顿与大主教辖区的主教预约见面。两位同名者相见了，结果却让约翰·牛顿甚为失望，这位也叫牛顿的主教同样拒绝了他的申请。他在签署日期为11月21日的信中向波琳讲述了这件事：

好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真想骗骗你说我到伦敦只是度假。昨天晚上我拜见了切斯特主教，他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我，却告诉我说那个职位不在他的辖区内，他无法提供实际的帮助，会面很快就结束了。不过，他在我的证明信上签了字，指点我去找大主教的助理牧师牛顿博士。今天早晨我去拜访他，他建议我去找大主教秘书，后者给了我所能想象的最温柔的拒绝。他已经把我的事情告诉给大主教了，不过，在支持教会的规则 and 标准方面，大主教是毫不通融的。

在这封信中，牛顿对波琳并未实话实说。他所说的“所能想象的最温柔的拒绝”事实上是一个粗暴的拒绝，无异于在牛顿的脸上掴了一掌。两位主教都用虚假的借口来打发牛顿。18世纪英国圣公会的“规则”即大主教引用的34条教规，明文规定牧师候选人必须拥有牛津或剑桥大学的学位。这个要求，借用莎士比亚的话，一直是“遵守不如不遵守更受人尊崇”。圣公会有大批教区牧师没有牛津或剑桥的学位，他们只是获得了主教的认可，因熟练精通圣经语言和经文而被任命为牧师。后来这作为一项内容被加入到了教规中。

牛顿的学识水平要高于许多大学毕业生，显然他遭到拒绝主要是因为他对福音派的热心和与不受欢迎的循道会联系过分密切。他自己一定也知道这一点，尽管他在给波琳的信中对此语焉不详。当时，英国圣公会出现的大分裂刚刚结束，分离出一支所谓的“狂热派”。这是那些经常去教会礼拜的英国国教徒用的一种蔑称，他们认为对信仰过分热心是件不体

面的事。那些想在露天会场而非教堂公开布道、传福音的循道会信徒被认为是最糟糕的狂热派分子。一位圣公会作家在名为《论狂热派及其后期增长的危险》(A Dissertation on Enthusiasm, Shewing the Danger of Its Late Increase, 1755)一书中说：“狂热派最终会被真正的宗教所毁灭……一个狂热派分子的性格中……通常具有惹人躁动不安的因素，伴随着一种渴望四处乱行和遭遇艰难的愿望，其目的就是要把人变成信徒。”

对于牛顿和他那些卷入约克郡复兴运动的朋友们来说，那种试图通过激情洋溢的福音布道使人归信基督的愿望是他们渴望成为牧师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牛顿给亨利·克鲁克写了一封不乏幽默自嘲的信，就主教和大主教对这个问题的责难用开玩笑的口吻写道：“几位伦敦的朋友告诉我，我因您的举荐试图获牧师之职是我遭到拒绝的主要原因。”在给这位举荐人的信中，他提及的这个真实原因就是克鲁克“无疑也因提供了那封对真理坦白和坚定的见证而令自己被某些人所厌恶”。此处的“真理”指的就是福音派基督教，未明言循道会是因为克鲁克从未说过要毫无保留地支持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然而，尽管“对循道会有保留”，在圣公会的主教们眼中，这也是一个污点。无论克鲁克还是牛顿，都因为狂热派的恶名遭到抵制。

对狂热派持怀疑态度的不仅限于主教群体，大多数参加圣公会礼拜的教徒对循道会派、独立派、公理会和不从国教教徒同样充满敌意，卡特莱特一家就坚定地站在这个阵营里。牛顿向切斯特主教递交申请的前夕，他在伦敦的一个亲戚丹尼尔·斯凯特利夫家中与波琳的父亲乔治·卡特莱特偶遇。这场翁婿之间的会面一开始很不愉快，这可以从牛顿写给妻子的信中看出来：

和布儒先生共进晚餐和茶点后，我就去拜访丹尼尔（斯凯特利夫），令我甚为惊讶的是，我在那儿竟然见到了你爸爸。我们两个都觉得很窘。他听说我正在打算转行做传道人，认为这就意味着要与那些不从国教教徒们混在一起了，这让他甚为难过。我们两个一晚上都过得很不自在，不过，当我向他解释之后，他似乎感觉满意了些。

事实上，波琳的父母一点儿也不满意。他们对女婿准备放弃在利物浦那份薪水优厚、颇富声望的海关稽查主管工作，偏要在约克郡做一个穷教区牧师觉得很难理解。乔治·卡特莱特表达了他对女儿生活水平下降的担

忧，随后，他提出了一个支持建议。他从罗彻斯特城附近一位牧师约拿单·索恩（Jonathan Soan）处得知有一个教区牧师的职位，卡特莱特听说索恩正在寻找一位新的副牧师，薪俸相当优厚（每年 50 英镑），这比哈瑞·克鲁克推荐的那份在肯派科斯的职位工资要高。

但这些帮助未来的副牧师牛顿提高薪酬的善意努力最终都变成了泡影，就是因为他与切斯特的主教和约克大主教助理牧师的会面不成功。牛顿未被批准成为合格的牧师候选人，他试图成为一名圣公会牧师的努力也泡汤了——至少当时是这样。对于这种结果，他异常失望，也不再在妻子面前假装坚强了。遭到拒绝后一个星期，他从伦敦写信给波琳表达了自己的苦恼，他写道：“事实就是，自从来到这个城市，我就陷入烦乱不安中。我无法写作、无法祈祷、无法有目的地交流……我的内心沉默、枯干、死寂。”

这些失望情绪可以理解，牛顿遭到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对待，然而，他仍执著地要做牧师，他希望另做努力以获得按立，但他完全想不到他竟然要一连多年遭受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严厉拒绝。

疑虑重重

在伦敦失败的经历之后，牛顿回到利物浦，他在故乡受到的对待则甚为复杂。利物浦的居民们听说他们的海关稽查主管远赴伦敦寻求圣职的消息时表现得相当激动，但他毫无所获地回来后，关于他遭拒原因的谣言就满天飞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未获圣职一事导致了许多流言飞语。”

有些说法不乏同情。在这个艰难时期，波琳成为丈夫的依靠。她刚刚听到牛顿的失望之情，就写信向他表达自己的爱意与支持。牛顿回信道：

当我了解到你对我近期的尝试抱以如此从容和顺服交托的态度时，我无法表达你宝贵的来信对我的安慰……这件事从一开始，你就起了重要作用，也许很少有女性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当怎样才能表达对你的爱和感激呀！

牛顿的幸福婚姻帮助他经历求职遭拒的风暴依然能够站立得住，但给予他更大帮助的是他对上帝的信靠。牛顿相信上帝“很快就会打开另一扇门”；不过，在此后的5年里，向他打开的那道门似乎只是通向“循道会”、“独立派”和“不从国教教派”。

最早为牛顿开门并表示同情的就是约翰·卫斯理。在利物浦两个人再次见面，卫斯理在日记中写道：

我和牛顿先生进行了一场长谈。他的例子极为特殊。我们的教会需要牧师学识丰富，因此要求他们受过大学教育。但有多少受过大学

教育的人却毫无学识！而这些人竟然能够被授予圣职！与此同时，这样一位学识丰富、行为端正的人却因为没上过大学就被拒绝授职！这真是滑稽之极！谁能相信一个基督教主教竟会制造这么荒唐的借口？

主教的借口导致了进一步的拒绝。1759年初，牛顿决定再次尝试申请圣职。因为在1758年12月第一次遭拒时未能与约克大主教约翰·吉尔伯特会面，牛顿在翌年2月给大主教写了封信，里面装着他的申请书。回信是毫不客气的回绝，甚至没有附加任何原因说明，信出自大主教秘书理查德·查普曼（Richard Chapman）之手，措辞简单生硬：“大主教认为你最好继续在上帝目前安排你待的位置上工作。”

尽管受到如此打击，4月份，牛顿还是给切斯特主教爱德蒙·吉内博士（Dr. Edmund Keene）提交了一份新的申请，他也回绝了他，这次的理由是吉尔伯特大主教先前的拒绝使他没有回旋的余地。牛顿写道：“如今，我只能求助于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了，我想如果那儿也拒绝我——我得做好准备——我就不再做此寻求了。”

牛顿对前景的悲观不无根据。据说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塞克（Thomas Secker）不愿意给那些同情循道会的传道人授圣职。为了避免这位大主教的拒绝使“英格兰所有的主教都失去回旋的余地”，牛顿决定不向坎特伯雷提交申请了。看起来，英国圣公会的圣职之门已经在约翰·牛顿面前紧紧地关上了。

1760年，约翰·卫斯理想让牛顿做一名循道会的巡回传道人。牛顿回应说：“尽管我很爱循道会教友，在任何场合都为他们遭受的不公平的诽谤进行辩护，并因此被人责难，但好像我还没到适宜加入其中的时候。”

他所说的“没到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在这句客气话的背后，牛顿没告诉卫斯理，他对那些在露天演讲的循道会传道人特有的“火热”激情缺乏敬意。他喜欢站在讲台上而不是大街上进行深入人心的神学布道，他更愿意在自己的教堂里向着自己的会众讲话的想法还与他想为波琳尽上责任有关。她的身体仍然比较虚弱，他无法忍受与她长时间分离。做一个巡回的循道会传道人周游列国，对他来说意味着得不断地与妻子分开，就像当初他做远洋船长时那样。最后，牛顿自己的身体也有些问题。他向卫斯理解释说：“做一名巡回传道人，我的身体不够强健，才智不够聪敏，那些年里，我的体质大受摧残。想到一天之中要在雨里骑马走上30多英里，通常会让我心烦意乱，我不太适合做这事。”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也会使牛顿不适合做循道会信徒眼中的牧师，这就是他过去做贩奴船长的经历。不过，后来成为废奴运动倡导者的卫斯理在牛顿成为一名循道会传道人一事上，从未把这点当作一个可能的道德障碍。这一点也同样被圣公会各教层人士和各种欢迎牛顿的独立派会堂、教堂人士所忽略。并非牛顿有意掩盖了自己的历史，相反，他经常生动地描述这件事，把它当作上帝的大能改变他的例证。也许卫斯理相信，就像牛顿所做的，上帝的恩典已经救赎了他的灵魂，并洗净他，使他可以成为一名牧者，不管他过去犯过怎样的罪。不过，一个更可能的解释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各宗派的教会领袖对贩奴贸易的邪恶性还缺乏认识，他们不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不人道的贸易。曙光还未照亮18世纪的英格兰，即使是基督徒的领袖们对此也仍显盲目。

当牛顿重返约克郡，再次造访了几处不从国教教堂和循道会教堂——他们早在两年前就热情地欢迎他，相信在牛顿自己的生活中，那道光亮正在引领他走向独立教会牧师这一领地。利兹市独立教会会堂提议为他授职，但被他婉拒了。他在哈沃什地区威廉·格林姆肖牧师的教区讲道，写信告诉约翰·卫斯理他已经获得了“作为一名循道会信徒才会获得的荣誉”，但是显然他仍旧不想正式接受这个职位：“目前，我必须保持不变，并努力在我的个人生活中尽我所能地发挥作用，直到我能看得更远。”

牛顿继续以自由传道人的身份踏上旅程，他的下一站是沃威克（Warwick），一个在考巷（Cow Lane）的独立教会会堂邀请他去做平信徒牧师。离开利物浦的海关稽查主管之职三个月后，他于1760年5月搬到沃威克。牛顿一开始对这个临时任命抱着极高的期望，在日记中将它与教会早期圣保罗在哥林多的传道相提并论。几周之后，他的认识愈加清晰，他承认“约翰不是保罗，沃威克也不是哥林多”。不过，他的讲道和精心的牧养还是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亨廷顿伯爵夫人是一位重要的不从国教资助者和新教堂的植堂人，她在一封致友人书简中赞扬在沃威克做牧师的牛顿很出色。考巷的会众非常乐意邀请这位临时牧师做他们的长期牧者。牛顿在日记中写道：“人们热切地期望——甚至急不可耐——我在他们中间定居下来。”

尽管牛顿返回利物浦，辞去了他的海关稽查主管一职，但他仍然犹豫了好几个月不知道是否应该接受沃威克的邀请，在这段紧急时期，这个问题一再被提起。最终，他还是拒绝了这个建议，本来差点儿就接受它。对

他的决定影响最大的是卡特莱特的亲戚、他最亲密的朋友们和他的妻子。卡特莱特一家强烈反对牛顿去做不从国教教会的牧师，他的妻弟约翰·卡特莱特说他“发疯了”。这激怒了牛顿，他在一封写给卡特莱特的信中措词强硬地说道：

我没疯。我打算搬到沃威克去住并不表明我是个疯子。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哪件事让我如此慎重地考虑并倾听建议……我深爱着你的姐姐。你我认识这么长时间，你认为我会置她的平安和幸福于不顾吗？

这封语气激昂的书信表明家中所有人的情绪都比较激烈。约翰·卡特莱特当时已经是一位成功的伦敦律师，对财富和社会地位野心勃勃。像他的父母一样，他对牛顿试图放弃海关稽查主管的薪水和妻子在利物浦的社会地位而到一家小型独立派教会牧养一群不从国教信徒感到不可思议，卡特莱特的强烈反对使牛顿在面对家族压力时深感不安。

除此以外，牛顿的那些属灵的知己也向他施加压力，劝他不要去沃威克。斯特普尼的塞缪尔·布鲁维特别提醒他要注意到会众内部的分歧；牛顿的那些属于英国国教的朋友如汉斯莱特的哈瑞·克鲁克和哈德斯菲尔德的亨利·维恩都建议他不要切断与圣公会的联系。这些教区牧师不想失去这位有望在未来成为英国圣公会牧师的同行，他们劝说他再等等，总会有某位开明些的主教接受他、为他授职的，但牛顿对他们的这番话并不相信。他在一封写给曼彻斯特独立教会牧师迦勒·沃赫斯特（Rev. Caleb Warhurst）的信中表示他不再抱有幻想：

我已经向圣公会做了很多，所以说——我不是出于愤怒或失望，而是确信上帝在那个时候让我处于失望之中必有其智慧和美善的心意；我相信倘若我曾如此热切寻求的认可此时过于容易地提供给我，我极可能——如果不是完全——无法接受。

这些强烈的措词很可以反映牛顿写作时的情绪，不过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事实上，牛顿正在扩大自己的选择范围。他在等待自己的时间，直到他确认上帝准备用某种方式把他派往某个地方去服侍。在一封标注日期为1762年7月30日的信中，他向自己的第一位属灵导师亚历山大·科拉内谈及此事时，表达了他最真实的情感：

我赞同您的想法，我的呼召还不清晰，因为我认为，除非能够确认这些渴望是出于上帝的旨意，是由他预备的事工，否则没有人能够完成它们。但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召唤——那种深切地渴望服侍上帝的愿望、曾经的经历与所有的天赋能力在在证明在合适的时候我会接到恰当的邀请或补缺。在此之前，我要安心等待。倘若上帝认为我不适合做这项事工，那也是好的。不过，对我来说，因为我那些微不足道的观点和计划迄今一直遭到否决而自动放弃自己的想法，这将违背我的领受、我的誓约以及大多数基督徒朋友的建议。

牛顿一直观望等候英国圣公会授职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理由是波琳希望他等待。这也许是出于她对家族压力的回应，或是出于她自己直觉的理性判断。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她都劝阻丈夫不要感情用事，劝告他耐心等待。若是听任自然，天性缺乏耐心的牛顿几乎必然会成为一名独立教会牧师，会在1760至1763年间接受来自利兹市、沃威克、汉科蒙德威克和利物浦那些大小教会提供的圣职。但是，在不从国教教徒举行的简朴的崇拜中，波琳感觉很不自在。她劝阻丈夫，尽管她从来不会公然反对他所期待之事。事实上，很显然，在1762年的春夏之际，波琳很不情愿地答应与丈夫一道去接受可能在利物浦独立教会的牧师职位。不过，既然妻子对此事表现如此冷淡，牛顿便无意接受这个任命。他在6月14日写给妻子的信中恳请道：

我一点儿也不想强迫你同意这件事。所以，我请求你一定要仔细考虑并求告主，请他带领我们两个。也许不久以后，这可能会得到你的赞许。我多么希望听见你这样说，这会让我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人：因为在这个悬置等待之际，我有时感觉真像在承受无力承担又几乎无法摆脱的重负。

这段话字里行间传递出的苦闷情绪鲜明地表达出牛顿处身两难之境的挣扎。他是一个多次受挫的牧师候选人，他对自己收入颇丰的海关稽查工作深感厌倦，他渴望成为一名全职牧师服侍上帝，而英国圣公会这边又显然不可能任命牛顿做牧师或执事。如果牛顿放弃圣公会转而成为一名独立教会牧师，此举又似乎有些欠妥，至少在波琳一家人看来是这样，尽管他们的反对意见更多地是针对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而不是属灵方面，但牛顿

对此却不能小觑。他非常清楚，不从国教教徒不被当地的贵族名流所接纳，甚至还会受到嘲弄，而他们正是礼拜天坐在圣公会教堂前排的会众。按照他们那种狭隘的基督徒等级观念，脱离国教而成为不从国教教会巡回布道者或牧师后，独立派的那些牧师最好的情况是成为同族中的穷人，最糟是情况则是成为有辱门第之人。面对这些说法，在加入这个边缘群体的行列之前，对牛顿而言，犹豫不决是出于人意的考虑，但他从未忽略一个想法——至高者可能呼召他去迈出这一步。

在一封写给约翰·卡特莱特的信中，牛顿总结了他的两难处境：“我讨厌丢脸或贫穷，但我对上帝的敬畏超过了这二者。这是不是有些荒谬？我希望让朋友们高兴，但我更渴望让那位替我而死的主欢欣。”

在取悦上帝和取悦波琳之间，牛顿又在痛苦的犹疑中徘徊了两年。这种挫败感最终结束源于他的生活受到两个意想不到的人的影响，他们是托马斯·哈维斯（Thomas Haweis）和达特茅斯伯爵（the Earl of Dartmouth）。

《真实的叙述》

如果没有托马斯·哈维斯，牛顿不会出版那本著名的自传《真实的叙述》（*An Authentic Narrative*），他也不会获得达特茅斯伯爵的扶助，也就不可能被任命为奥尼的教区牧师，自然他也就不会因此创作大量赞美诗。那么，对牛顿的生活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他何以会在牛顿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起到如此重大的激励和引导作用呢？

1762年，托马斯·哈维斯（1734—1820）在与牛顿相遇时，是一位有争议的圣公会青年牧师。哈维斯的父亲是英国西南部地区的律师，早在特鲁洛文法学校读书时，年少的哈维斯就深受福音复兴运动的热情激励。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在同学中组建了“圣洁会”（holy club），并最终被牛津圣玛丽·玛德琳娜教堂的约瑟夫·简牧师任命为副牧师。在做副牧师时，他认识了牛顿。尽管二人之间相差有11岁之多，但他们却很快成为莫逆之交。牛顿在写给哈维斯的信中说：“自从在牛津相见后，我对您就一直难以忘怀。我常在心中和贫乏的祷告中纪念您。”

对于哈维斯来说，他非常需要牛顿的“贫乏的祷告”，因为当时他遇到了麻烦。他们见面不久之后，哈维斯就遭到圣玛丽·玛德琳娜教堂的驱逐，起因是他过于狂热——也正是同样的品质（按照英国圣公会的标准这是缺点）使牛顿得不到任命。

从牛津的副牧师位置上退下来后，哈维斯到伦敦洛克医院做牧师助理。1763年，他开始给牛顿写信，在通信中，他的情感逐渐升温，这从

他给牛顿的信件的开首用语的热情程度上可以看出，在最初的几周里，开首用语由“亲爱的先生”渐次变为“最亲爱的先生”、“我亲爱的朋友”到“我最亲爱和尊敬的朋友”。

两人开始通信是缘于托马斯·哈维斯偶然看到牛顿写给约克郡的朋友约翰·法塞特的8封信，法塞特因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布道而归信，他后来成为赫柏登桥附近温斯盖特浸信会牧师。在这些书信中，牛顿向法塞特讲述了自己身为水手的冒险生涯，那些海上经历和信仰历程。哈维斯认为这些生动有力的个人见证书信具有公开出版的价值，牛顿对这个建议倍感荣幸，却又犹豫不定。他写道：

我能够理解您在那8封信中看到……一些独特的情节并想把它们出版的愿望，但是当您事先告诉我说您希望从我这儿拿到信是为了把它们传送到我所不知道的一些地方时，这让我简直不敢再多写什么了。

哈维斯打算出版牛顿的见证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书信。早在几个月前，两个人在牛津见面，这个年轻人在听牛顿讲述海难、贩奴生涯和被拯救的经历时，就已经深深地着迷了。他请牛顿把这些材料都纳入到见证文中，牛顿有些胆怯地回应道：

你说我在谈话中向你提起的一些事你在那8封信中没看到过。先生，我求你，别让我旧事重提，我没保留那些信的复制件，目前我也无法想起那些遗漏的片断和我向你讲述的各种细节。

这最后一句话从牛顿这方面来说有不实之嫌，因为他向来有惊人的记忆力，他也曾向许多人多次复述自己的故事。他这么说也许是因为他在努力应对哈维斯提议出版他的故事带来的挑战暗示，像许多做个人见证的陈述者或作者一样，会在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诱惑（自负、骄傲、引人注目）与以上帝为中心的要求（当众做见证、感恩和大声赞美）之间挣扎徘徊。在给哈维斯的第一封信中，牛顿就重点谈及了这些忧虑。在表明自己“恐惧之极”后，牛顿继续写道：“唉，你不知道我的心——倘若主不与我同在，很早以前，那个可诅可咒的自我就把我吞噬殆尽了，与其抗争是何等困难的事啊。”

然而，这些忧虑并未让牛顿耽搁太长时间，因为在信中，他紧接着

说：“不过，你还是指出了我的任务的实质，我应当尽力完成它。”他随后又让哈维斯来提醒他当初他们在牛津大学交流的那些素材，他认为应该把它们纳入到见证文中来，他说：“我对你关于这些事的回应非常高兴，如果主愿意的话，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我已经准备好听从吩咐了。”

牛顿是一个精力旺盛、效率极高的写作者，距哈维斯首次向他提此建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完成了 35000 字的《真实的叙述》。尽管该书的素材完全真实，但写作的风格却有点刻意，按照当时熟悉的出版惯例，牛顿运用了文学手法写作。他假托一系列写给哈维斯的私人书信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尽管两个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是为了出版以获得更广大的阅读群才通信的。从作者方面来说，这部实则写给公众的虚构的私人通信录，很容易地转移了对自我中心的指挥。在哈维斯（1764 年他做了奥德温科教区牧师）精心设计的销售策略基础上，这本书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他决定给牛顿的这本并非真正匿名的作品起一个长题目——《真实的叙述：某某生平中非凡有趣的种种轶事。与北安普敦郡奥德温科的哈维斯牧师先生的系列通信（应朋友之求）如今公开示众》[*An Authentic Narrative of Some Remarkable and Interesting Particulars in the Life of ***. Communicated in a Series of Letters to the Rev Mr Haweis, Rector of Aldwinckle, Northamptonshire and b Him (at the Request of Friends) Now Made Public* (London: R. Hett for J. Johnson, 1764)]。

这个冗长的题目是 18 世纪的标准体，无论在属灵内容还是商业广告方面都传递出了重要的信息。在一个宗教社会，诸如“忠实的叙述”或“真实的叙述”对于福音社团来说都是深具内涵的标志，表明这是一本关于归信经历的个人见证。有许多前人和后继者采用过类似的标题，如约拿单·爱德华兹的《忠实的叙述：上帝在北安普敦及近乡唤醒几百个灵魂归信的奇异工作》(*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in the Conversion of Many Hundred Souls in Northampton and the Neighboring Towns*, 1737)，《忠实的叙述：怀特菲尔德牧师先生的生活与个性》(*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the Reverend Mr Whitefield*, 1739)，还有托马斯·司各特(Thomas Scott)的《真理的力量：一个真实的叙述》(*Force of Truth: An Authentic Narrative*, 1779)。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些题目以及牛顿的标题中出现的许多精心选择

的词汇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他的作品具有被当时的出版者视为理所当然的畅销元素，即所谓的“故事好看”、“价廉而刺激”以及“幸运的骑士的情感故事”等等。牛顿同时代的两个作者采用的就是最后一种类型，他们是两个最终当众受刑而死的强盗。也许牛顿并没想让人因此联想到这两个人的性情与罪行，但无疑他们的回忆录标题与牛顿的颇具相似性：《詹姆斯·史密斯的奇异生活：一位著名的年轻大盗，受刑于苏别顿……他亲自参与所有抢劫活动的如实真切的叙述……当事人的自传》（*The Remarkable Life of James Smith, a Famous Young Highwayman Who Was Executed at Surbiton Common... Containing a True and Faithful Narrative of All Robberies That He Has Committed... Written by Himself*, 1756）；《死亡之书或真切如实的叙述：威廉·杜尔案件中著名的生死之争……作者在伦敦行刑场受刑……随即又临场赦免……作者在新门监狱亲口所述》（*News from the Dead, of a Faithful and Genuine Narrative of an Extraordinary Combat Between Life and Death Exemplified and Who Soon Returned to Life... the Whole Taken from His Own Mouth in Newgate*, 1740）。

著名的牛顿研究学者、教授布鲁斯·汉德马什（Bruce Hindmarsh）研究表明，18世纪大约有两百部作品题目都包含诸如“忠实、真实、如实的叙述”等字眼，皆出于堕落或可敬的作者之手。汉德马什相信牛顿的题目是为了吸引尽可能广泛的读者群——包括那些寻求感官刺激故事或拯救途径或二者兼而有之的读者。

托马斯·哈维斯在《真实的叙述》这一标题上做的工作可能比慢慢地吐露自己生活的作者牛顿做得更多。在二人的通信中，牛顿提议说他的故事“应该以他的结婚来圆满地结束，我要在那儿打上结束的标记”。在通信中间阶段寄给哈维斯的第11封信中，牛顿在谈及他与波琳最终结合后，引用圣经《诗篇》23篇中的诗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作为结束语。

倘若由此以那句著名的类似于“（王子和公主）从此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作为这个故事的结尾的话，那么这场叙述就远非“真实”了，因此，哈维斯劝说牛顿又增加了7500字，对1750—1755年五年多的生活进行了概括性描述。这段附加的内容里有许多生动的记录，包括第三次贩奴活动和以船长身份进行的最后一次远航，还有与波琳亲密相处的瞬间，以

及牛顿对自己灵性成长过程引人入胜的描述，先是在圣齐斯岛与亚历山大·科拉内船长后来是在英格兰与塞缪尔·布鲁维、乔治·怀特菲尔德及其他人之间的交往。在《真实的叙述》最后一章，有超过三个半自然段的重要内容是从牛顿的私人日记中摘录的，写日记是1750年他与波琳结婚后开始养成的习惯。

牛顿和哈维斯之间的通信以某种方式成就了一本非凡之作，它在商业和属灵领域都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它对福音团体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同时也成为一本大众畅销书，出现大量版本，分别是法语、荷兰语、斯堪的纳维亚语和10种英语版。在1764年初版30年后，又出版了8种美语版。它的畅销期很长，在将近250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再版。人们把它看作基督教文学中影响巨大的作品，它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使牛顿在福音运动中变成了一个民族的圣像。《真实的叙述》对公众产生的更为持久的影响是其内容激励了无数人的属灵生命，并且成为许多书籍、诗歌、赞美诗、戏剧、布道文和电影的蓝本。

《真实的叙述》能够成为一部如此成功有力的杰作，个中原因是它具有三个层面的故事结构——冒险故事、爱情故事和灵性故事，它们彼此交织构成了一个特殊非凡的形象。

冒险故事拥有一部流行畅销书的所有元素。一个家教良好的少年不甘忍受约束变成了一个野孩子，他“毫无来由地反叛”，坏到极点，丢尽脸面，被监禁，当众受鞭笞，落到18世纪皇家海军底层甲板做水手，肮脏破败的生活丝毫未能使其驯服。他随后的事迹更有意思了，被交换之后，他参与到非洲的贩奴生意中，他的坏脾气、诅天咒地的语言和被疑不忠惹怒了所有与其相识的人。结果，他被拘禁起来，被雇主及其黑人情妇当作白奴虐待。最终，另一个雇主解放了他，他尽情地沉溺放纵于非洲海岸的每一项邪恶活动中，直到被哄上船做一名归家的乘客，返回英格兰。

与此并行发展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在《真实的叙述》中，这位反英雄的人物虽然肉体贪恋贩奴船上的土著女人，但他的心早已完全献给了那位纯洁、年轻的英国恋人，尽管他在肯特第一次看见她时，她才只有13岁。最初，这只是一场单相思，空间的远离、家长的反对、身无分文、年轻的女方本人对此也缺乏热情等等都使恋爱无望，但这位平凡人物还是变成了一位罗曼蒂克英雄，他因担任船长开始从事一项获利丰厚的事业，从而克服了一切障碍，拥有了必要的成功机会，最终赢得了令其一生魂牵梦萦的

新娘。在婚礼的祝福中，他们幸福地结为夫妻。

与前面两个故事交织的是重要的灵性成长经历，一个对上帝决然抗拒并满怀抱怨的年轻人在大西洋激烈的狂风暴雨中变成了一个信徒。他的改变一开始就是旧的罪与新的信仰在他的内心发生的争战，经过多次的跌倒、失败和恢复，信仰得胜了。回顾往昔生活，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帝一直有一个计划要拯救主人公的灵魂，因此才会有系列特殊的巧合与机遇出现，如今可以证明，这正是上帝在他拯救之路上的守护。

这部三故事合一的自传因为在传奇故事中有黑暗与光明的经历对比，大大地激发了读者尤其是信徒们的兴趣。牛顿真实地描写了自己在捆绑与自由、狂暴与宁静、肉欲与爱情、和平与躁动、慕光与“趋暗”、跌倒与扶助、有罪与拯救之间的摇摆，偶尔他也会落入老生常谈，假装一本正经地追忆往事，不过，叙述带来的震动还是将读者带进作者心灵与肉体的争战中。在最深的层面上，它是一个远离上帝的人逐渐在上帝的里面找到平安的故事。正是牛顿对内心争战经历的真实描写才使这本名为《真实的叙述》有机会成为一本信仰文学的经典。

我们不完全清楚托马斯什么时候意识到他手边有一个将引起轰动的潜在出版物，但当他在1763年2、3月间收到牛顿手稿的时候，他一定对牛顿拥有成为作家的潜质大为兴奋，18个月后，1764年8月这本书才得以出版。哈维斯用了大量时间将牛顿的14封信反复抄录寄给一系列特选出来的接受者。哈维斯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传送手稿呢？一个解释是他正在寻找公众市场对该书的反应。不过，一个同样可信的解释是他复制分送多份手稿的目的是为了推进牛顿寻求圣职的计划，而远非让他做一个畅销书作家，这个结果就是——牛顿最终获得了按立。

终获任命

牛顿与托马斯·哈维斯的通信不但造就了《真实的叙述》，也帮助牛顿获得了按立。在1763年1月初次通信时，哈维斯问他是否仍想获得英国圣公会的按立，牛顿详细地陈述了五个要点回答他。

在这一点中，牛顿说他渴望成为一名圣公会牧师的愿望“像从前一样强烈”，但是因为过去经受的种种失望，他不想再朝这个目标迈进了，除非他自己和他那些“属灵伙伴”都确认上帝想让他继续争取。第二，他描述自己“不想特别从事某一宗派的活动”，但补充说如果他最先从不从国教信徒那里接到清晰的呼召，那他会接受这份任命。第三，牛顿承认自己对于英国圣公会的礼拜仪式有一两处保留意见；不过，他指出，他可以通过“对个人判断做点小小的牺牲”消除这点疑虑，以便符合按立的要求。第四，他不仅担心在圣公会里“几乎全民反对”福音派牧师，而且也忧虑于倘若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自我与骄傲的种子”有可能会深深地折磨他。最后，在权衡一番后，牛顿宣告说他仍然愿意到圣公会做一名正式的牧师，以使其牧养活动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他指出他的使命就是“传扬十字架上的基督”，因此，“恩典，白白得来的恩典一定是我布道的核心内容，我要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全世界——即便是对最抵挡上帝、心地最为刚硬、完全败坏的人，上帝也仍然充满怜悯。”

这种更倾向于圣公会的宣告对牛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几个月以前，他在给开勒伯·瓦德赫斯特（Caleb Wadhurst）的信中说他已经和英

国圣公会断绝联系了，即使日后它们提供给他职位，他也不打算接受了。3月，牛顿在给哈维斯的信中说他对新职位的认识比以前更清楚了，“我还是非常乐意接受圣公会真诚的按立，无论派往何地、扮演何种角色，上帝必会以某种方式显明出来，并提供做工的工价。”最后一句话里的“做工的工价”可以在牛顿早期的信件中得到谨慎的解释，他说他很满足于每年只拿40英镑的薪水。与他在利物浦做海关稽查主管的收入相比，这意味着物质生活水平的降低。

尽管牛顿当时的目标看起来很清晰，但它们很快就再次发生摇摆。利兹、哈利法克斯和曼彻斯特等地的独立教会纷纷向他提供牧师职位，他对此不免动心。他最渴望在故乡（他曾说过：“利物浦——是我所爱的地方”）担任一名独立教会牧师，在城里的会堂做一名正式传道人。他写道：“也许一直待在海关总局参与福音服侍也并非不可行。”哈维斯对这个想法明显地不置可否，他只在信的背面写下了他的评价：“牛顿想在利物浦定居——我敦促他先进入圣公会。”

1763年整整一年里，牛顿经受着接二连三的压力，波琳的身体虚弱是其压力的主要来源。他在一封写于8月份的信中说：“在过去的两三个星期里，她病得厉害，有些迹象表明她‘在地上的帐棚’正在被拆毁。”类似对妻子身体的忧虑也在此后的信中重复出现过，这些忧虑表明他们应该待在利物浦，但另一方面，牛顿又对自己属灵上的孤单很担忧。他给哈维斯写信说：“我接下来想做一个活跃的传道人，但我的情况在利物浦似乎并不乐观，在这儿我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温和宽厚、经历丰富、具有判断力、能够让我完全信任、敞开心扉的朋友……我真希望能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

哈维斯的友谊显然也经历了痛苦试炼。1764年2月7日，牛顿给他写了一封字迹凌乱的信，告诉说他极有可能到约克郡和兰克郡交界地一所长老会教堂去做牧师。牛顿显然也意识到自己最终的游移不定可能会激怒他的通信对象，于是他以一种深含歉意的语气写道：

您一定会责备我在国教和不从国教教会之间的踌躇游移吧，我真是无能为力了。你知道我多么倾心于圣公会，但它对我却那么遥不可及……与一位不从国教教会的讲员相比，圣公会牧师的角色往往更令人尊重，而且可以让我向更多的相识者尤其上层人士开口说话。

在18世纪英国圣公会中，上层人士很重要。在那个阶级意识较强的年代，贵族士绅是薪金赞助人和会众领袖。他们常常占据大教堂中最好的座位，它们分别被称作“乡绅之位”、“礼堂之位”或“赞助人之位”。教区牧师和主教经常会依从附近最大房产的所有者，倘若那位地主还是位爵士、准男爵或皇家贵族就更是如此。早在叛逆的青年时代，牛顿就对教会按照财富和地位赋予特权的做法深恶痛绝，不过，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能够获得按立，恰恰是一位重要的贵族、地主和政治家达特茅斯伯爵威廉·里雅各（William Legge）介入调解的结果。

达特茅斯伯爵在他所属的时代是少数几个对圣公会中初现的福音派倾向和循道会抱同情态度的大贵族之一。他从朋友、福音派追随者亨廷顿伯爵夫人那儿听说了牛顿，并收到过牛顿写给他的谈及圣职任命之艰难的一两封信。达特茅斯伯爵资助了一些才华横溢的福音派传道人，因此他在了解实情后，曾力荐托马斯·哈维斯去伦敦洛克医院做副牧师，他是那儿的赞助人。

达特茅斯伯爵是国王乔治三世的朋友，也是一位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他喜欢享用巨大的权力和任免权。在其生活的不同阶段，他曾经做过殖民事务大臣、商务大臣和牛津大学的高级管事，在与美国殖民地爆发战争时期，他是掌玺大臣。从政治舞台上退隐后，达特茅斯的生活动力就是他的信仰。他因信仰而生的博爱和热忱的虔诚众所周知，人们给他起了一个昵称“赞美诗歌手”。在美国，他为新汉普郡的达特茅斯学院提供大笔捐助，这所学院于1769年由皇家特许建立，最初属于公理会。在英格兰，他是许多所教会的薪金资助人，特别是那些在白金汉郡周边属其领地的教区。

达特茅斯提供薪金的一个地方叫奥尼，它是白金汉郡的一座交易小镇，距离伦敦大约60英里。1764年初，这里的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的带薪侍奉牧师打算离开；同年2月，达特茅斯伯爵把这份薪金提供给他 的被保护人托马斯·哈维斯。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哈维斯接到这份牧师职位之际，他也接到了2月7日牛顿的那封令人烦恼的来信，在这封信里，牛顿说他准备去做长老会牧师。

哈维斯做出一个果敢而无私的举动。尽管他自己也急于寻找一份英国圣公会的圣职，但他相信牛顿比他更需要。于是，哈维斯请达特茅斯伯爵把奥尼的牧师职位提供给牛顿以代替他。这个建议立刻获得达特茅斯的悦纳，他读过《真实的叙述》的手抄本后，就变成了牛顿的崇拜者。

牛顿接到哈维斯推荐自己去做奥尼教区牧师的信后，他不再犹豫了。他马上放弃了所有想做长老会牧师的念头，接受第一笔做圣公会按立牧师在行职期间获得的薪金。1764年2月26日，牛顿写信向哈维斯表示感谢：

真愿上帝给我能力能向您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并尽力而为好使自己无愧于您为我的缘故放弃的职位以及您对我的热情推荐。我毫无犹疑地接受……恳请向对我友善有加的达特茅斯伯爵转达我最诚挚的感谢。

牛顿此时正忧急迫切地接近目标，但还有最后一个障碍要克服，这就是找到一个愿意按立他的主教，这时达特茅斯伯爵的影响力再一次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1764年3月4日，牛顿接到达特茅斯的正式邀请函，请他接受奥尼的带薪牧职。他在利物浦用了一两天时间从支持他的圣公会牧师那里搜集他的品行证明书，随后到达伦敦南部，与哈维斯一起参加洛克教堂的服侍，并与达特茅斯共进晚餐。在伯爵热情欢迎他到来的阶段，关于按立一事，牛顿的心中一定产生过一丝怀疑，因为他曾写信给波琳，警告她说此事还未完全确定，她应该“对失望有所准备”。

失望适时地来到了。在一开始，有关按立的所有步骤似乎进行得很顺利，达特茅斯伯爵给切斯特主教爱德蒙·吉内写了一封有关牛顿的热情的举荐信，劝说这位高级圣职人员与他一同为一个曾经两度遭拒的牧师候选人的推荐信署名，对方勉强答应了。带着主教领地提供的推荐信，牛顿去见林肯教区主教约翰·格林博士，奥尼是他的所辖教区。达特茅斯事先已经拜访过格林，以确保牛顿能够得到这位未来主教的友善欢迎。这次初步的简短会面效果一般。格林博士以“谦恭有礼又坦率直接”的态度接见了牛顿，却又让他去见约克新任的大主教黑·德鲁蒙特（Hay Drummond），在举行授职仪式前夕他会在伦敦。

牛顿并未接到赴大主教办公室的预约通知，他与格林会面一个小时后就被安排上了。他跑了1.5英里才赶到那儿，结果迟到，这意味着只能受到大主教秘书的接见。他是理查德·查普曼（Richard Chapman），也是前任大主教约翰·吉尔伯特（John Gilbert）的秘书，早在5年前，他就曾拒绝授予牛顿圣职。牛顿相信查普曼对他的愿望怀有敌意，因此对查普曼用下面这句话来回答他丝毫不感觉惊讶：“先生，坦白地说，你自己知道

会像以前一样大失所望的。大主教听说了这件事，但对此无能为力。”

牛顿遭此拒绝仍未放弃。1764年4月13日，在这个喧嚣的日子，他再一次穿过伦敦的街道，在午餐前走进达特茅斯伯爵在圣詹姆斯广场的府邸。听了牛顿的苦恼之后，达特茅斯推迟了进餐时间，给约克大主教写了一封私人性的请求信。带着这封信，牛顿开始第三次奔走，这一次，他来到大主教的家，黑·德鲁蒙德博士接待了他，友善可亲的会面仍以牛顿的失望告终，大主教显然接受了理查德·查普曼的建议，不想把牛顿纳入到翌日举行的授职仪式中，他说“不能开此特例”。不过，这位大主教却坐下来给达特茅斯伯爵写了一封回信，向他保证林肯教区主教会按立他选定的奥尼教区牧师。

身心俱疲的牛顿把这封信转给了达特茅斯伯爵。与托马斯·哈维斯吃过晚餐后（哈维斯听牛顿讲述白天的种种遭遇后，在“一时激愤”中奔出家门），两个朋友对约克大主教的信件内容进行了无望的讨论，两人都觉得他的保证几乎无法相信。身为大主教，他自己拒绝为牛顿授职，怎么可能保证林肯地区主教会做这事呢？这个问题显然也令达特茅斯伯爵深感困惑，于是他决定介入此事。出于慎重稳妥的考虑，第二天他去拜访林肯地区主教，这位贵族的决心之大，消除了主教的犹豫踌躇。4月16日，牛顿与林肯地区主教再次会面，对方对他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神学问题考查，这个时候，这位牧师候选人大大方方地说出了自己对《公祷书》部分章节的保留意见。尽管如此，会面结束之际，主教还是“声称自己感觉很满意”。牛顿给波琳写信说：“他答应下个礼拜天在城里或者在巴克顿为我授职。赞美主！”

于是，1764年4月29日，在邻近亨廷顿的巴克顿，林肯地区主教的私人教堂里，约翰·牛顿获得了英国国教圣公会的圣职。按立仪式结束后，牛顿满怀喜悦和谦卑的心情立刻给波琳写了一封信：

噢，面对他的扶持与引导，我无论有怎样的热忱、坚信、忍耐、慎重和英勇都是必要的！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奉耶稣的名和能力。但愿这宝贵的名如膏油一般流入你我的灵中，但愿这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得胜的标记！

在牛顿长达7年的寻求按立之旅中，若按最令人烦恼的次序排列，英国圣公会当属第一，它因此显现出自己真实的弱点。接下来的那些虽然琐

碎得不足挂齿，但令人烦恼的原因却是主教会成员对牛顿早期与福音派狂热分子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往来、受其熏陶之经历的反感厌恶。令人奇怪的是，在牛顿与约克两位大主教、切斯特主教和林肯地区主教各自两次的会面中，这个话题似乎都未曾被谈及过。

如果牛顿因为“过于狂热”或者“过于福音化”而遭到这些教会领袖中的任何一个人的暗谴和怀疑，那么他差不多还能为自己找到很好的自辩理由，因为他并非宗教极端主义者。实际上，他与利物浦那些热血沸腾的循道会和浸信会牧师之间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对他们的激情演说既不崇拜也不效法。当牛顿立志传讲福音时，他是一个循循善诱的教师，而不是一个激情澎湃的鼓动者。在对教义的理解上，他是正统的中立者。在对社会阶层的态度上，他对人不能一视同仁。这种态度在他坚持并倾向于获得英国圣公会按立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急于让波琳及妻系卡特莱特家族跟随他的事奉。倘若他成为一名圣公会牧师，他们的社会偏见只能与他的属灵生命相一致。

这种社会背景和家庭压力使牛顿最终的任命程序不可思议地恰如其分，因为他的圣职不是由教会的属灵领袖赋予的，而是由一位世俗的政治领袖促成的。达特茅斯伯爵就是这段传奇的主角，他促使满心不情愿的主教们从对牛顿甩手不管到按手在他头上。

牛顿的圣职任命所具有的讽刺意味未能逃过 18 世纪重要的英国史学家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的眼睛。特里维廉对这段传奇故事有一段机智幽默的评价，他说：“达特茅斯伯爵是高级主教们的居所产权人，他获得了对约翰·牛顿的圣职任命权，而这位牛顿对宗教过分热心以至于无法轻易信任并委托他去教导会众——除非是为了取悦一位大人物。”

奥尼的第一印象

不难理解，牛顿在被按立之后感觉自己仿佛身在信、望、爱的包围之中。不过，这种得意还是被他个性中的谦逊减弱了，也被他可能面对的惨淡的现实生活的压力冲淡了。

倘若阅读牛顿就任奥尼教区牧师前那个阶段的书信，会发现他内心积聚着种种紧张情绪，其中大部分压力源自于他对如何忠实地服侍上帝、如何应对繁忙的教区事务和如何让自己熟悉英国圣公会的生活与礼拜仪式等的思虑。其他让他操心的事情还包括身为传道者自身的不足、他对金钱诱惑的惧怕和对波琳身体的担忧。还有一件事让他分外焦虑，他的《真实的叙述》预定在1764年8月出版，可以想见，对于一位准备出版平生第一本书的写作新手来说，迫在眉睫的出版时间定会令其辗转不安。不过，正是这件事注定使牛顿由一位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区牧师一跃成为一位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重要人物。

牛顿的谦卑在他赴奥尼前夕给波琳、亚历山大·科拉内和其他通信者的信件中表现出来。他给妻子写道：“如今，我差不多是蹒跚而行在美好的前程中，我要站在广大会众面前，要负责一个大教区的事务，要不断地回应定期和不定期的服侍要求，要宣讲我应该宣讲的并做到我所宣讲的。”

约翰·牛顿牧师被按立后的第一场布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败涂地。5月初，他回到利物浦，受邀在圣乔治教堂讲道，那儿的教区牧师曾经为牛顿的授职签署过证明信。城里的海关稽查主管成了牧师的消

息吸引了大批会众，但听讲者却分成了两派。“有些人喜欢但不少人厌恶^[1]。他们认为我讲得太长、声音太大、过于即兴草率。”他在给亚历山大·科拉内的信中这样写。这些批评他都用心听取了，为了获得良好的效果，他改变了讲道的风格。在此后的主日，他不但吸引了大批听众，而且大受欢迎。他给科拉内的第二封信中汇报说：“上帝在利物浦向我大施恩典，他赐我能力在成千上万人面前传讲他的真理，我满怀信心地期待，胜券在握一样地相信，我所接受的远远超过了我的期望。”

5月21日星期一，约翰·牛顿和波琳·牛顿离开利物浦前往奥尼。在这座城市居住了8年，与朋友们的道别不可避免地充满了感伤之情。牛顿给科拉内的信中写道：“临别之际，城里各阶层、各宗派的大批朋友都对我们的离开表示遗憾。”不过，他也承认他的离开并非完全是在赞许的氛围中的，在同一封信中，他告诉科拉内，他刚刚结束的布道还是激起了“一场准备对我的人品进行某种贬损攻击的事件”。

牛顿到达奥尼不久，再次遭到贬损，甚至更为糟糕。他最早进行的一次社交活动就是拜访邻近教区的一位牧师，但这位牧师显然未遵守“爱你的邻舍”的诫命，他极为粗鲁地接待了来访者。牛顿在日记中写道：“他对待我的态度极为轻蔑无礼，这是我第一次为着福音的缘故当众受辱。主啊，请教导我，使我配受这样的荣耀。”

牛顿遭受的敌意一定让他十分不安。对此应该如何解释呢？在利物浦，他因为过于“狂热”——这是一个虽然充满轻蔑却让圣公会脊背发冷的字眼儿——受到听众的质疑，但牛顿信奉的却是传道人有责任“毫无保留”地宣讲福音以唤醒罪人。当他听说某些缄默保守的听众在这种情境中对这个词儿感觉不自在，他应该不会感觉太惊讶。

牛顿受到奥尼邻近教区那位牧师令人不快的接待这件事让人不解，因为这里面散发出攻击性和非基督教的气息。仅就此事而言，也许教义的偏见和牧者的嫉妒是两个可能的原因。高级圣职人员与低级圣职人员之间彼此憎恶是18世纪教会交往行为的常态，牧师们的这种情绪可能在你来我往中有高涨之势。牛顿是一个被人怀疑偏向于循道会的福音宣教者，他在受到主教和大主教们的冷遇时就明白这一点了，当他受到同级教区牧师更粗鲁、更直接但同样恶意的对待时，他虽然深有感受，却已经毫不震惊了。对于这种侮辱，他的反应是——“主啊，请教导我，使我配受这样的荣耀”，这表明了他对登山宝训中那句“把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的令人

钦佩的忠实仿效。

邻区牧师在这次会面中爆发出来的“轻蔑和无礼”背后潜藏的正是他对牛顿的嫉妒。这种嫉妒的根源如奥尼居民众所周知的，牛顿是达特茅斯伯爵的人。这位当地贵族指定任命他，为他提供生活费用，那些俸禄、薪金带来的生活舒适度远超过邻近地区的带薪牧师，这自然使牛顿成为该地牧师妒忌的对象。他似乎对自己当时的授职可能引起的怨恨有所认识，他曾颇有先见之明地写信告诉波琳：“我明白，某些名人的支持与友爱很可能使一位牧师落入某种异乎寻常、始料不及的危险之境。”

幸运的是，在自己的教区，牛顿获得了当地会众的欢迎，比邻区牧师对他的欢迎热情得多。1764年5月27日，牛顿在奥尼主持带薪上任第一天的主日敬拜活动，他后来写道，教区居民给予了他“热烈欢迎”。

牛顿在奥尼首次讲道讲的是《诗篇》130：1：“主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从文本角度来说，这个选择很有意思。这是一首忏悔诗，据说深受奥古斯丁、加尔文、班扬和卫斯理的喜爱，它描述了如何依靠上帝的帮助从生命的低谷走向“丰盛的救恩”。对于牛顿来说，1748年3月21日在大西洋上，他乘坐的船受到暴风雨的袭击，几遭灭顶之灾，他如今正在让自己从那样的低谷中走出来。无疑，他在首次登台布道时就选择以自己为例讲解圣经，与会众共同分享一些个人见证。

在奥尼公开服侍三个主日之后，1764年6月17日，牛顿被林肯地区主教按立为牧师。这个从执事到牧师的任命是一种象征仪式，但它需要牛顿参加一次由主教委派的牧师主持的象征性考试，交一篇拉丁语的论文。牛顿在写给波琳的信中对这些程序进行了大致描述，并补充说当按立仪式结束后，“主教邀请我与他一起喝茶，并且友好地与我道别。”

随后的几周里，牛顿通过教牧工作和主日敬拜对其教区居民慢慢有所了解。他对奥尼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迟钝。他给科拉内写信说：“这儿的居民几乎都是穷人——穷困之地肮脏凌乱。”整个教区大约四英里长两英里宽，居住着500户人家和2000位居民。牛顿对此地经济贫困的强调毫不夸张，另一位同时代的居民把奥尼描述为“一个人口稠密之地，人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这里是工资低廉的手工业者和穷困潦倒的花边工人生活的集镇，后者经常需要排队领救济品；他们有时也在工厂里排队，花边制造工业衰退时就出现低工资和供大于求。就像在白金汉郡每位贵族名流在教区都有自己的位置一样，在奥尼镇，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职业阶

层，牛顿的职责主要是做穷人的牧师。

早在牛顿来奥尼做教区牧师之前，这里就已经播撒了许多属灵的种子。小镇上有清教徒、胡格诺新教徒、不信奉国教派教徒和循道会教徒。奥尼的清教徒曾经与国王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I）的教会组织发生过冲突。1639年，受到怀疑的奥尼教区牧师威廉·沃切斯特（William Worcester）带领大约12户清教徒家庭从小镇坐船出发，赶往新英格兰。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的索尔兹伯里定居下来，沃切斯特做了镇上的不从国教派牧师。17世纪后期，那些清教徒的同情者也从奥尼出发加入到教徒移民美洲的大潮中。

仍然是在17世纪，奥尼接纳了一批受法国天主教会逼迫逃亡此地的胡格诺新教徒。这些名为布里顿、罗宾逊和莱本的法兰西和法兰德斯的逃亡者们在小城里开始了花边制造的传统手工业。胡格诺派教徒与清教徒有共同的目标，他们与新教徒们联合起来，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国内战争时期奥尼是议会军队的驻军小镇。那个时候，奥尼的牧师拉尔夫·约瑟林（Ralph Josselin）曾被当地的历史学家描述为“一位坚强忠实的国会议员，克伦威尔的崇拜者”。

奥尼的属灵土壤最初是由清教徒、胡格诺教徒和克伦威尔派共同开拓的，不从国教的传统在这个地方生根、发展。邻区贝尔福德郡的约翰·班扬对此地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672年，班扬申请布道许可，并且“在奥尼镇约瑟夫·肯特家的谷仓”举行了多场宗教聚会。不知道这次授权许可聚会后，《天路历程》的作者是否还在奥尼讲过道，但班扬的密友约翰·吉布斯（John Gibbs, 1627—1699）是小镇上日益强大的不从国教教派的正式领袖。1715年，奥尼教区牧师亨利·艾略特（Henry Elliot）显然感觉压力过大，他在报告中说自己所在的是“分化严重、难以管教的教区”，有40%的居民参加不从国教教会的事工活动。

到了18世纪中期，不从国教教派在奥尼仍居强势，其中包括一位浸信会牧师和一位独立教会牧师，他们分别主持自己的主日崇拜聚会。1739年，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布道对这个小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循道会（当时它还是英国圣公会的一支，还未分别出来成为一派）此后变得异常活跃。那些循道会的同情者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群体，怀特菲尔德的巡回布道员经常在他们的聚会点讲道。

达特茅斯伯爵是奥尼英国圣公会牧者的薪金资助人，他充分地认识到

教区内部历史遗留下来的宗派纷争问题。这可能也是达特茅斯举荐牛顿做此地教区牧师的部分原因，因为身为一名国教教会牧师，他非常适合承担与不从国教教会、独立教会、浸信会及其他宗派之间建立关系的任务，也许能把他们都带回圣公会。

牛顿来奥尼之前就与独立教会建立了持久友好的关系，以至于他差点儿变成一位独立教会牧师。牛顿也吸引了循道会的成员，因为他公开感谢乔治·怀特菲尔德对他个人的恩惠。对这位于1739年来奥尼布道的著名的循道会传道人，他大加赞美，用牛顿自己的话来说，这是“福音的种子第一次被散播出去”。更为重要的是，牛顿对自己担负的福音使命非常清楚，他没有“天主教”或高教派^[2]那些可能引起独立教会或不从国教教会反感的种种倾向。基于这些原因，牛顿很快就被奥尼的教民们看作是一位联合者，得到了许多先前从圣公会分离出去的教徒的接受和赞赏。布鲁斯·汉德马什教授在《约翰·牛顿与福音派传统》(*John Newton and the Evangelical Tradition*, 1996)一书中写道：

牛顿与不从国教信徒们广泛合作，将他们的许多实践整合进自己的牧养活动中。在奥尼，他最初的声望不断提高，相应的事实是他能够把一切都奉献给追随者，在当地的聚会所里，他因此获得的额外奖励就是圣公会的人数不断地增加。似乎这个教区就是特别推荐给他牧养的。

当教区居民从牛顿那里获得温情之时，牛顿从教民那里也获得了同样温暖的感觉。在刚刚成为教区牧师的那些天，牛顿给科拉内写信说，上帝在奥尼的子民们“仿佛一群没有牧人的羊，身处离散的险境：他们没有寻找我，我也没有寻找他们，但主把我们引领到一处”。

注释

[1] 18世纪时，此处的“厌恶”(disgust)一词意思是厌烦、不喜欢(displeased)。

[2] 高教派(high-church)：圣公会之一派，重视教会权威及礼仪，与天主教相似。——译者注

教区牧师

直到在奥尼落脚，牛顿一家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才算结束，现在他明确地知道自己可以安息了。1764年8月4日，他步入生命的第40个年头，对自己的职业、教区牧师的薪金和牧师的职责，他丝毫不必忧心。通过写作，他已经成为一个大有影响、世所公认的基督徒名人。因此，他的牧师生涯的开始也是其新生活的开始，先前他经历了“奇异恩典”的丰满流溢，后来他以此为名写出享誉世界的圣诗。

1764年8月，在牛顿成为教区牧师四个月后，他的《真实的叙述》出版了。此书在书店一上架就立刻成了畅销书，六个月里再版了五次。在文学领域，它得到了评论家的喝彩，而且因桂冠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而名垂千古^[1]。在福音派团体中，这本书是深具影响力的归信文学作品，经常被各地、各个讲台和宗教杂志所引用。随着美洲教徒的评论和精华本的出版，牛顿很快获得了国际声誉。1767年，第一次在荷兰出版了至少五种欧洲语言的版本。

最令牛顿高兴的是它受到奥尼人的欢迎，一本本书很快传遍了全城。一小群人聚在一起听“一位有学问的人”（通常就是当地学校的教师）大声朗读，无论多么贫穷、多么没文化的人都能听懂和理解《真实的叙述》。牛顿给亚历山大·科拉内写信说：“人们使劲儿盯着我看，他们当然得这么看了。事实上，对他们来说我就是个奇迹，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如此。”

牛顿的惊奇感来自于他近乎孩童般的惊异——因着上帝所赐的恩

典，“邪恶如我者”竟然能够获得惊人的信仰改变。他很高兴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变成与教区居民相沟通的途径，或在布道中公开宣讲，或在牧养中私下交流。

牛顿每个礼拜天早晨和下午有两场主要的敬拜活动，礼拜天晚上在教区还有一场针对部分教民进行的非正规布道。在一周的其他时间里，他至少还要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讲道，这是职责范围之外的工作。圣公会在周日主要的礼拜活动就是晨祷和晚祷，大多数带薪侍奉的牧师每周只在晨祷或晚祷时间讲一次道，但牛顿却精力充沛，两场敬拜都会讲道，而且每次都持续一个小时。他解释说：“时间太短的话，我讲不完，自己感觉讲道内容不够充足；不过如果讲得时间太长，我也觉得不合适。”他通常在周日早晨向那些信仰坚固的信徒布道，下午教导的则“更多的是罪人”。针对这群听众，我们可以从1764年牛顿的讲道笔记中了解他的讲道风格：

在这里，有没有哪个人因为罪上加罪，而对怜悯失去信心，认为所有的盼望已然结束了的？——啊，绝非如此，看看上帝是怎样爱这个世界的——他是何等宽容的一位……上帝在福音书里宣告说所有相信他儿子的人都要获得赦免。难道你真的要拒绝倾听他的声音，漠视福音和属灵的救恩，让自己落入地狱的咒诅吗？噢，上帝我主，求你伸手阻止，愿你裂天而降，亲自触摸这石心，使它不再刚硬到底。

正如这段文字所表明的，牛顿满怀“狂热激情”向会众发出强烈的呼吁。在做牧师的最初几个月里，牛顿精心地预备激动人心的话语，这也许是对几个月前在利物浦首次讲道糟糕经历的一种反作用吧，当时会众认为他的讲道“过于即兴草率”，他为此深感不安。不过，在大多数敬拜活动中，面对自己教区的教民，他还是适时地发挥了自己“言简意赅”的长处。

无论牛顿在讲台上讲多少，他都会额外地与教民们一个一个地谈话，他是一位特别勤于探访的牧师。在早期那些写给达特茅斯伯爵的信中，牛顿说：“我通常用下午的时间去探访教民，一天能走三四家。”他强调说他决定要与每个人进行“单独交流”，一次一个小时，他建立了详细的约谈记录；每周他还在牧师府的书房里对几位教民进行属灵的教导劝勉。

牛顿在教区的事工是一项布道与服侍相结合的工作，却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无论是个人的穿着还是牧养的方式，他都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牧

师。与18世纪大多数教区牧师不同，在主日之外的时间里，他很少穿牧师服，而宁愿穿一件水手夹克衫。他衣着随意，谈话幽默风趣。邻区布莱奇特一位圣公会牧师威廉·科尔以相当轻蔑的口吻描述说他是“一个怪里怪气的人，不守规矩，没有一点儿牧师的样子”。这也表明牛顿的谈话方式幽默风趣并富有人情味，这是源于当年的水手生涯。在日常探望教民尤其是那些有困难的家庭时，他还是一位敏感和富同情心的听众。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在讲台上，我是他们正式的教导者，但我教导他们的东西主要还是来自于我在每周挨家挨户探访时与他们的交流中学习到。”

就像评论所言，牛顿是一个平易近人的牧师，他把传道与联络的服侍结合起来。在讲台上，他激情澎湃，但他从来没有高人一等和说教之嫌，他的仁慈温暖通过教导而发出光亮。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也不是一个废话连篇令人厌烦的讲道人。对那种一讲两三个小时的布道，他十分不满，他用朴实的言辞表述道：“过分冗长的布道会使人难以集中精力而想起家事，经常让人的思想从讲台上溜走，惦记着家中有可能烘蒸时间过长的甜点心。”在同一封信中，他转而他用他对农场的观察比喻说：“也许更好的方式就是像喂小鸡一样地喂教民，少量多次，要比那种填鸭式猛塞直到他们一口也吃不下为好。”

在奥尼，牛顿把他的“少量多次”哲学运用到了实践中。除了周日两次敬拜活动，他开始建立他所说的“聚会”，即教民们的小型集会。它们不是在牧师府就是在教堂后面一间闲置的房子里举行，那个被叫作“大宅”的地方属于达特茅斯伯爵。1765年新年，牛顿开始设计他的聚会计划，这是由儿童事工、青年事工和祷告事工交互而成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打算开设三场聚会，第一个为孩子，第二个为年轻人和慕道者，第三个是为那些经历较多且富智慧的人设立的祷告和分享会。我对第一个聚会尤为热心，认为它是必须承担的责任。”

儿童事工刚开始就赢得了开门红，有89个孩子参加了1765年1月17日的第一次聚会；第二次聚会又增加了44人。到了4月，人数增加到两百多，需要搬到教堂的圣坛边进行聚会了。对年轻人来说，牛顿是一位极富影响力的传播者。他给他们讲圣经故事，为他们写诗，教他们牢记圣诗，用寓言教导劝诫他们，为了让他们深切地记住那个浪子的故事，他生动地描述了自己早年的生活经历。他也讲解文学作品，大部分是不从国教的作者创作的。他把那些参加聚会的人的名字记在笔记本上，他说：“有

一大批不从国教教会的孩子在这儿，为了不让他们失去兴趣和勇气，我一开始用的是马森（Mason）的《教理问答书》（*Catechism*）。”^[2]

牛顿努力接近奥尼的不从国教信徒，同时继续其他已经开展的工作。除了每周四上午的儿童聚会和晚上的成人教导聚会外，同一天，他还在牧师府开设了一个定期的祷告小组。他说，这是“为那些信仰虔诚单纯的人预备的”。唱完赞美诗后，有些与会者会献上即时祷告，它们将会带来“普遍的属灵改变”。牛顿把那些开口祷告的人记录下来，无论何时，教区中某个新人变成了一个“祷告的人”，他都会在笔记中向上帝感恩。

第四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聚会，每周日晚上在牛顿自己家中举行。这个聚会包括“一个小时左右的祈祷和唱诗”，先前会有一个对特选题目比如属灵复兴的需要等进行自由回应的讨论。牛顿召集这个小组的初衷是组织一批挑选出来的信徒，不过，到了1765年秋天，参与者逐渐增加，有男女信徒70多人，聚会只好搬到大宅。考虑到人员数量的增加有可能会削弱属灵的质量，牛顿只好控制人数，以使小组只面对那些他认为对信仰极为严肃认真的人。在服侍的后期，他支持成立了一个在周一晚上为教区男信徒举办的聚会，以及一个在周日早晨6点敬拜活动开始之前的祷告小组。

布鲁斯·汉德马什先生在其《约翰·牛顿与英国复兴传统》（1996）一书中把这些祷告聚会形容为“牛顿服侍的精神中心”。这种表述应该能取得牛顿本人的赞同，因为他说，“再没有哪件事能让我的内心更坚强，让人们因着爱的纽带联合得更密切。”基督徒的合一是牛顿渴望达到的目标，他深受独立教会会堂和英国圣公会内部的纷争之苦，因此，在奥尼，他是一位医治者和合一者。偶尔他的普世联合的努力会带来麻烦。在1765年1月初教区儿童的聚会上，他给那些能流利地诵读圣经的独立教会的孩子两个奖励（6个便士和一本祈祷手册），这得罪了圣公会的一些人。到了下一次聚会，牛顿抓住机会在布道中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教会中存在的小小偏见”进行了批评，并且提醒说要抵挡“结党之灵的邪恶”。

担任奥尼教区牧师几个月后，牛顿充满能力的讲道、充满活力的牧养以及与不从国教信徒间进行的友好交往慢慢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的人数开始多了起来。1765年，教会只好沿着教堂中殿的北面再建一条新走廊，以容纳不断增加的敬拜者。人数增加的部分是一种自

然结果，部分是出于牛顿对不从国教信徒的感染与影响。约翰·迪瑞克（John Drake）本是奥尼独立教会牧师，却与这位圣公会教区新任牧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常参加牛顿的星期三聚会，他说：“牛顿先生对此地的不从国教兴趣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敬拜者人丁兴旺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潮慕牛顿的名涌来。许多人从教区外赶来，有些人来自邻近的贝德福德郡或诺萨姆顿郡的乡村，甚至偶尔也有从伦敦赶来听道的人。会众基本由来访者、不从国教信徒和固定的教区信众构成，尽管没有详细的统计数字存留下来，但每一部分的人数都在稳定持续地上升。

在牛顿的生活中，唯一一个没有得到良好增加的数字就是他的经济收入。官方提供的教区牧师薪水是每年 60 英镑，但这是一笔受到控制的收入一开始就被削减了，到他手里只有 40 英镑。被扣除的 20 英镑给了牛顿的前任摩西·布朗尼（Moses Browne）牧师，他仍然是奥尼名义上的教区牧师，尽管他早已经搬到 90 英里外的肯特地区，在布莱克海什（Blackheath）的莫登学院做本堂牧师。在 18 世纪英国圣公会，这种兼管多所教堂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正是这种安排使牛顿不得不努力应付开支平衡。不但如此，1765 年 11 月约瑟夫·曼内斯特的船厂倒闭，带走了他的生活依靠，他面临的困难更艰巨了。面对这场严重的打击，他的反应表明了他全然仰赖上帝的供应。他写道：

今天接到消息，我的朋友约瑟夫·曼内斯特在利物浦破产了，我明白我放在他手里的财产已然消失殆尽。这不是大部分，而是我的全部。对此，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在过去的日子里，主让他成为使我大得益处的器皿，尽管人出了问题，但主不会不想给我他认为必妥的。

牛顿相信上帝的预备会坚固他脆弱的财产，很快，一位重要的捐助者意想不到的出现证实了他的信赖。这个人就是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伦敦市一位富有的商人，同时也是英国银行的董事。桑顿是达特茅斯伯爵的朋友，1764 年 4 月，他与牛顿见过一面，当时牛顿正为自己的按立一事在主教和大主教们之间跑来跑去。显然，牛顿这段困难时期的状态对桑顿颇有影响。一年后，他赶到奥尼听牛顿讲道。约翰·桑顿亲自经历了牛顿的教牧事工，深受感动，他决定为这位奥尼教区牧师每年提供一

大笔奉献金。桑顿在给牛顿的信中写道：“您这样殷勤好客，把自己的房子向所有人开放，只为了款待——帮助穷人和需要者，我想每年定期给您提供 200 英镑，无论何时若您有事需要更多，我会马上送到。”

桑顿的慷慨解囊给牛顿的服侍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一年 200 英镑并未让他的私人财产有所增加，而是转到了教区的财政中，尤其使牛顿能够借此担负祷告会的费用，并向穷人施舍。这让奥尼成了一个财物资源格外丰富的教会，桑顿的捐赠一直很稳定，在牛顿任教区牧师的 15 年间，他为牛顿的事工提供了 3000 多英镑的赞助款。

从整体上来看，牛顿身为奥尼教区牧师无论在教牧还是属灵生活上都堪称典范。在当时，绝大多数圣公会领薪牧师在自己的职位上都表现出一种懒散、漠然甚或怠惰的态度，牛顿却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祷告生活和个人对上帝的奉献当中。“奥尼的里里外外都掀起了属灵觉醒和复兴的工作”——他写得很准确。就其自己和教区的数字记录显示，在牛顿任教区牧师的 3 年内，当地固定到教堂做礼拜的人数增长了 3 倍，从过去的 200 人上升为 600 多人。比这些外在的统计数字更重要的是，奥尼教民内在的属灵生命也在成长——这种成长不只发生在约翰·牛顿自己身上。

注释

[1] 华兹华斯的诗曾涉及牛顿，参见第 6 章。

[2] 即《为儿童编写的简易教理问答——简短的句子与回答》，作者是白金汉郡沃特·斯塔夫特的约翰·马森（1646—1694）。

迁居的压力：与波琳一同祈祷

牛顿身为教区牧师的 success 令其成为名人，他很快发现，不断有人向他提供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职位。在做教区牧师最初的几年里，他不得不对其中三个机会有所关注。第一个机会来自于北伦敦的汉普斯特，他并未认真地对待此事。那是他到达奥尼两个月之后，他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它，尽管波琳对这次迁居的想法很喜欢。牛顿告诉妻子，如果“只是出于我对你的爱”，那么他有可能接受这个提议，但他又坚决补充道，因为他已经“获得上帝将我们带到此地的充分证据”，所以“我不能纵容自己为了实现这个小小的愿望就迁居”。

第二个机会来自达特茅斯伯爵，这让牛顿在处理的时候颇费了些心思。这位就职奥尼的被保护人第一年的工作显然给达特茅斯留下了深刻而愉快的印象，他想让牛顿迁居到美洲承担更重要的事务。有一所声名显赫的美国大学，那儿的理事早已经在 新汉普郡 (New Hampshire) 用达特茅斯的名字 (尽管未征得他的同意) 命名了该校。达特茅斯希望在佐治亚州继续推广教育赞助事业，他在萨瓦那 (Savannah) 找到了一个做这件事的机会，那儿是佐治·怀特菲尔德开设孤儿院的地方，达特茅斯打算把这所孤儿院改造成一所大学。1765 年 11 月，他邀请牛顿到伦敦会面，提出请他做这家新机构的主席，并在萨瓦那生活。

牛顿意识到这项任命在前途上的重要性，这将使他成为一所新的美国大学的领导人。他最初听到这个建议时颇受吸引，但他非常谨慎地求问这

是否出于主的旨意。他写道：“这真是个伟大的建议，不过，必须有主的呼召并为我扫清道路，这样我才可能免于受到荣誉和利益的诱惑。”在祷告中，牛顿清楚地辨明上帝未呼召他去佐治亚；而且，波琳也对横越大西洋的长途航行和有可能遭遇到的暴风雨感到恐惧。这些因素共同促使牛顿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从伦敦给波琳写信解释说：“我对奥尼的热爱和你对航行的厌恶是我未接受这个提议的主要原因；不然的话，这是我最重要的服侍。”

第三个迁居别处开始新生活的提议出现于1767年，当时牛顿被提名到剑桥郡的康特汉姆地区做牧师。他很认真地考虑了这个建议，因为它是达特茅斯伯爵提出的，并得到了约翰·桑顿的支持。与奥尼教区会众（他们对可能失去这位大家喜爱的牧师感觉十分难过）一起，经过一段不乏痛苦烦恼的祷告后，牛顿于1月赶往伦敦，用“无可辩驳的无法离开奥尼的理由”说服了两位重要的赞助人。他提出的那些反对理由一定非常令人信服，因为牛顿竟然能汇报说桑顿“一点儿也没生我的气”，而且达特茅斯“也对我想留下来而不是立即离开的决定表示满意”。两天后，牛顿高兴地回到奥尼，在早晨和晚上的讲台上感谢上帝没把他派往康特汉姆。这段插曲进一步证实了牛顿与其教民之间存在着一条彼此相爱的坚固纽带。后来，在回忆拒绝到康特汉姆居住的情形时，他满怀感恩之情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情感：“我把它看作是我生活经历中最重要也最珍贵的释放，似乎对我来说，若非如此，我一定会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

在牛顿担任奥尼教区牧师的最初几年里，达特茅斯伯爵两次提议，约翰·桑顿也提过一次让他迁居别处任职，他们之所以提这样的建议，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牛顿的讲道应该被更多的人听到。在某种程度上，牛顿还是满足了这种需要。他通过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的敬拜吸引了整个北安普敦郡和贝德福德郡的会众，他出版了一本讲道集，接到英格兰所有教会的讲道邀请。1771年3月，他和妻子远行650英里赶赴特威德（Tweed）、威姆（Wem）和沃里克的利兹、哈德斯菲尔德、赫尔姆斯利、汉斯莱特、曼彻斯特、利物浦、贝里克郡等城镇按计划安排讲道。

牛顿需要为这种巡回布道提供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他很乐于追随同时代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那句建议：“先生，一个男人应该经常修护他的友谊。”从牛顿在旅途中拜访的教堂名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与过去那些在他艰难地“穿越旷野”寻求圣职时期支持和拥护他的许多牧师都

保持着联系。这些老朋友包括亨利·克鲁克和约翰·爱德华兹，就是在后者所属的利兹会堂，牛顿进行了第一次失败的讲道；还有亨利·维恩和詹姆斯·司科特，后者是沃威克考·雷恩教堂的负责人；还有其他许多人。这里的每个人都不只是他的私人朋友，他们全都是“热爱真理”的福音传道人，热心于使人悔改更新，他们帮助牛顿再次充满属灵的动力。像许多牧师一样，牛顿费尽心力地承担教牧工作之际，也会时不时地感觉疲惫和孤独。他需要一群激励他的伙伴，他们能够与他在同一属灵和智力层面上交流。牛顿在奥尼的教区里一直没有这样的一位朋友，直到9月份，有一个人搬来此地——下一章我们会介绍这件改变人生的大事。

在其他各个方面，牛顿与妻子都是密友和知己。波琳并不具备特别的智慧恩赐，她的灵性不像她的丈夫那么深刻和充满热情，不过，尽管身体一直不太好，她仍然是一位对牧师丈夫非常支持的妻子。她友善地对待一批批客人，无论是当地教民还是前来拜访的信徒，她都温和慷慨地接待他们。她爱她的丈夫，无论何时两个人分开，她的丈夫都给她写大量的信，来回应和表达他对她的爱。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宁愿在奥尼做一个无名牧师与你在一起，也不愿没有你在宫中做国王。你的温柔体贴不断地涌上我的心头，我的每个思绪几乎都有你……我敢保证我的爱历经风雨却从未减少过；是的，我保证它只会与日俱增。”这是他在结婚18年时对她的宣告。5年后，他的感情又得到了加强：“没有你我总是有点儿局促不安。没有你的那间屋子看起来空落落的，说这话的人不是一个卑微的仆人而是一个丈夫，他说这样的话不是在新婚的蜜月，而是在结婚23年之后。”

牛顿对自己婚姻关系的最大忧虑就是他恐怕自己对波琳的爱有“崇拜偶像”之嫌，因为许多时候他对她的爱超过了对上帝的爱。甚至在1790年妻子去世之后，他因此而生的烦恼仍未消失。不过，在此之前的20年里，牛顿时不时地仍相信他在抵挡“拜妻”之罪上还是有所进步的，这一点从他1770年给波琳的信中可以看出：

我一直记得，若你不在我身边，太阳似乎不过是徒然地发光，所有的造物似乎不再存在。我对你的爱从未减少；许多年的彼此交流让我对你的爱越来越深，我真希望主能减弱我对你的偶像崇拜倾向，因为我常常迷失在你里面。

牛顿对波琳的爱无论是否有偶像崇拜的倾向，他的书信都表明，从他

早年求爱到结婚，他对她的一腔衷情始终如一，未曾消退过。不过，作为彼此相伴的夫妻，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两个领域是他们一直未能良好沟通的，这就是祈祷和读经。

俗话说“一起祷告的人才能一起生活”，对于约翰·牛顿先生和太太来讲，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愉快，但一起祷告时却很笨拙，他们的书信中经常会对这种笨拙的情形进行些许描述。有时，牛顿对妻子关于祷告的教导具有一种警告的意味。1768年，他写信给她：“不要给小信留地步，要以温柔的心和信靠的灵去祈祷。要警醒自己的动机，它们狡猾而多变。不要放任自己找理由懒于祷告和读经。”

不过，如果从上述表达中得出波琳不够虔诚、懈怠则是错误的。事实上，波琳有自己的祷告生活，但不同于丈夫的祷告。牛顿对此颇为惊讶，他写道：“当我在你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本小书，看见你已经开始把圣经中一些片段写出来，好引起自己的注意，尤其在我读了你在书页前边写下的两段祈祷文之后，那天，我的心一下子融化了。”不过，他随后还是因波琳未能完成那些祷告和“向空洞的推理妥协”而对她进行了一番暗含责备的教导。牛顿似乎发现，给自己的伴侣提供书面指导比与其直接对话容易得多。他向波琳坦白说：“在这方面，我是一个古怪的矛盾者。再没有什么能像你的属灵幸福那样占据我的内心了，但说起它们时我却常常张口结舌。”

承认了这件事后，他发现自己和任何人谈祈祷的事都比和自己挚爱的妻子谈容易得多，他向上帝乞求说：“让我们能更为自由地交流吧。”他以这样的句子结束了这封信：“让我们一起努力打破彼此之间的壁垒，好使我们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伙伴。”

从以上深透激烈的段落可以看出，约翰·牛顿和波琳夫妇是生活的伴侣，却不是祷告的伙伴。还有一些领域他们二人无法互援互助，尽管他们彼此相契相爱。也许问题在于牛顿的属灵生命和知识传播能力过于强大了。他可以站在众人面前传讲福音，可以通过写作影响普通读者和学识丰富的神学家，但与妻子独处时，他的演说和创作的思想有时显得层次太高了。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有必要回顾一下牛顿在奥尼的祷告生活和写作生活。

祈祷与 《教会史》

牛顿的倾心祷告和学术研究共同构成了他在奥尼的早期生活。他的学识使其有能力写一本重要的有关教会历史的著作；他的祷告是其服侍的核心。甚至在他更加专注地投入于更为急迫的传道与教区事务时，这两个活动仍然加深了他的属灵经历。

牛顿的个人虔诚生活被完整地记录在日记中。日记表明牛顿每天早晨5点起床，至少要花上两个小时读经和祈祷。他写道：“唯有他是生命之源，其余的都是我们打上来装在桶里的水。”不过，有许多天，他发现“打水”也是一件难事。正如他经常承认的，一个人祈祷时，他的注意力很容易游移。为了击退这种漂浮倦怠的思绪，他想出一个办法，先是大声朗读一段经文，然后让自己投入到当时的情境中。他回忆说：“有时我会假想让自己参与一场想象中的谈话，有时我会受邀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与上帝进行的谈话式的祈祷通常是口头的，但有许多被改写记录在日记中了。从纸页上布满的流畅的圣经式文句，可见它们一定出自牛顿滔滔不绝的倾诉。他很少沉思冥想，也很少像一些具有艺术倾向的人那样，喜欢以虔诚的想象的图景或图像来代替祈祷的言词。在祷告时，牛顿的语言如激流奔涌，它们经常直接地表达对上帝的感恩，感谢他赐的怜悯、平安与恩慈，它们传达出牛顿与上帝进行深入灵交时心灵所受的影响。毫无疑问，在奥尼，牛顿以上帝仆人的心态与感情来依靠他。他写道：“我常常发现，祈祷是我的现状的指针。那真的就是天国之门。”

当牛顿开始环绕奥尼周围每天散步时，他对天堂之门又有了新的感受。他热爱大自然，喜欢白金汉郡的美丽乡村，这里有一条贯穿三个教区的乌斯河，他养成了沿着河边漫步的习惯。散步之时，他全神贯注于沉思冥想中，经常无意间走到邻近的乡村或者他牧养的教民的房屋前。这些沉思冥想并不是对一篇经文或诸如良心自省类具体操练的正式思考。它们是自由流动的体验性的默想，他描述说，“我们可以对那些在我们内心和身外流经的一切进行观察，这就是我们所言的体验”。

牛顿把周六晚上的散步称为“严肃的漫步”。在冬天，这就成为他的“严肃的退修时光”。他把这当作一个机会，回想自己前一周的罪和过犯，同时也为第二天带领教会的敬拜做预备。在圣餐主日之前的周六，他在灵性上的预备内容更深刻，时间也 longer。在祈祷中，他让自己的虔诚侍奉全神贯注于基督爱的救赎上，相信圣餐中的饼与葡萄酒是上帝与人立新约的象征标记。牛顿认为，在准备接受圣餐时，应该让自己通过对上帝同在的感知而获得深刻的灵性的释放。如果没能做到这点，那么无论在预备还是带领圣餐时，他都会因“纪念基督舍命之爱”信心不够完全而自责。

尽管自责和忏悔是牛顿祈祷生活的重要特征，但他因罪得赦免和灵魂得救而生出的火热信心超越了它们。对得救的感恩表达是其信仰生活的主导，尤其在某些周年纪念日更是如此。他从不曾忘记在每年3月21日进行特别的祈祷，1748年的这一天是他在大西洋的狂风暴雨中度过的“重大转折的日子”，他从此开始了朝向归信的信仰之旅。8月4日生日这一天，他通常把它当作确定委身进入服侍的日子来纪念。在其他重要的日子如与波琳的结婚纪念日（2月12日）、她的生日（2月2日）和新年，牛顿也会进行额外的祈祷。他习惯于通过数算和感恩来纪念这些大事。

有件事很有意思，牛顿在祷告中对个人救赎历史的里程碑式纪念日的关注似乎超过了对教会的重大节期比如圣诞节、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等的关注，也许“自我”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他？果真如此，那他一定在自己的祈祷中把它隐藏得很好。同样，对一个牧师来说，他对自己的得救和对基督的复活感觉同样重要，也有导致误解的危险。从牛顿的祈祷日记中得出上述结论恐怕有失公允，不过，的确很难对布鲁斯·汉德马什先生所做的颇为明断的总结提出质疑，他认为：“牛顿过于关注自己的属灵传记，无情地审视内心的罪，时时地沉溺于自己的情绪中，他的祈祷有时迷失在一种唯我中心里。”

牛顿不应该被苛责为一个唯我论者或者沉溺自我者，因为他完成《真实的叙述》之后又开始了下一个重要的写作计划，而他原本并不情愿去着手写这本书。这本名为《基督教会史回顾》（*A Review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的书源起于1763年他与老朋友托马斯·哈维斯的几次谈话。早在被按立为牧师之前，牛顿还在利物浦做海关稽查主管时，哈维斯就鼓励他从福音派的观点出发写一本教会历史以供讨论之用。牛顿一开始不想接手这么大的写作计划，他抱怨说自己已经“弓弛琴怠”了。不过，经不起哈维斯的劝说激励，他还是开始阅读各类专家推荐的大约60本教会史。除了文献外，牛顿还研究了英国博物馆里保存的许多原始资料和早期手稿。就在他准备着手动笔之时，他的作家生涯被按立牧师打破了。不过，一旦他在奥尼定居下来，他又重新投入到这个庞大的历史写作计划中了。

牛顿在一篇3000字的简介中清晰地介绍了《基督教会史回顾》的写作目的。他对许多早期的教会史著作深感不满，指责它们“不过是一部在宗教的旗号和诫命下充满个人欲望、偏见和利益观点的历史”。牛顿并未把教会主要看作是一个由人建立的外部机构，他认为教会是一个建立于耶稣教导的基础之上圣灵同在的内在的团契，以证明“恩典的教义是以敬虔为标准的教义”。他写道，就他的判断来说，这是“一个适时为福音派的基督教进行辩护的工作，以消除那些过往的著作对它的诡辩和诽谤。”这个写作动机一定是牛顿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他因自己的福音派立场在前十年里遭受了许多的诽谤攻击。

在《基督教会史回顾》的初稿中，牛顿对英国圣公会的治理方式与初期教会的治理方式存在差异提出批评。托马斯·哈维斯和达特茅斯伯爵联袂力劝作者，身为一名圣公会的牧师对如此存争议的观点进行明确表态恐非明智之举。最终，牛顿接受了这个建议，他给达特茅斯写信说，自己已经“用一把剪刀修正了先前写的初期教会的治理方式，没有一点儿保留，每行都删掉了。”

谨慎地删除了上述内容的《基督教会史回顾》最终得以出版，著作分为两部分。卷一包括基督教初期从天使报喜到耶稣升天，结束于公元1世纪。在这一部分里，牛顿把基督教看作是一个神圣的启示，是关乎个人的，它本于耶稣基督且借着耶稣基督而成就，牛顿在这当中看到白白赏赐的恩典的荣耀应该能够“让灵魂完全复归于上帝的恩慈与形象”。他相信这种复归包含三重因素，白白赏赐的恩典使获罪之人因信称义，继而使人

成圣。下面的这段文字是牛顿对福音信条的最好概括：

无论何时何地，白白赏赐的恩典和因信称义的原则受到基督教会的普遍认同，根据强调的明了程度，基督教的实际运行方式在相应的程度上获得了繁荣。无论在何处，它们因人的论证推理和权宜之计而导致衰落或弱化，或者出于好心——尽管有被误解的恐惧，唯恐它们遭到滥用，或者出于调整福音以使其更适合这个世界的败坏口味的愿望，但结果往往在实践中产生了一种持续的衰退。只要基督的福音能够无伪地继续传扬下去，可以看到，对于每个可贵的目的它都是丰富无比的；但是当人的智慧被附加到上帝完美的事工中，无异于为无数伤害打开了一扇大门。

卷二包括更多关于那些“无数伤害”的材料，教会初期第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充满了迫害和异端。在一篇题为《论耶稣基督使徒的榜样与典范圣保罗的人格》的文章中，牛顿描述了这位伟大使徒身为纯正福音的监督“既未因海难而软弱，也未被任何花言巧语所迷惑”。在论及圣保罗的服侍时，牛顿描述了马耳他的那场海难，那正是作者自己经历的远航传奇的生动回音。从牛顿对保罗的谦逊的强调中可以看到二者人格的相似性，谦卑是任何一个宗派的牧师都当效法的美德。牛顿认为“傲气的基督徒”就像“清醒的醉汉”或者“慷慨的守财奴”一样属于矛盾修辞法，他举保罗为例，认为他“心存谦卑……充满力量及其他一切的恩典”。作者随后把圣保罗的性格与本书的目的联系到一起：

我们这部史书的目的就是展现教会在每个阶段的状况，我曾试图在圣保罗常常面对诸如此类的境遇（例如受到误解和敌对）中描绘他的性格，以使我更接近这个人物；他宣称所有在基督耶稣里虔诚度日的人都要遭受迫害，如此，我们可以预料，当人类的本性和世界照其所是地继续下去时，这一切也将如此出现。

在《基督教会史回顾》两卷书的开始处，牛顿先写了纯正福音教会的早期原则，而后准备讲述当时继任者们的历史；不过，他未能完成这项计划，它被穿插进各个分册当中了。这部著作未能续写完的原因可能要归于作者的谦逊。牛顿后来解释自己未能续写完该书时说“我读得还不够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教会的其他事工如牧养信徒、创作圣诗、讲道和写信等

等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压力。1769年《基督教会史回顾》出版的那段时期，这些事工正变得异常重要，因此不必惊讶有些事必须得放弃。也许放弃这本书更容易些，为了将来续写卷册进行的学术研究与牛顿其余那些繁重的事工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

因为牛顿过早地放弃了续写，《基督教会史回顾》一书并未被看作该领域中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不过，即便是截取的片段，在约翰·牛顿的生活中，这本书仍很重要，原因有三：第一，它更清晰地表明了作者对福音派基督教的个人委身，表明他的神学思想集中于教会是否持守因信称义这一信仰原则；第二，这本书表明牛顿有能力进行出色的学术工作，他的研究对教会起源的历史分析透彻精辟；这种出色才能也获得了后来历史学家们的认可，他们确实深得牛顿之惠。第三个原因就是认识到《基督教会史回顾》的重要性在于它催生了后面的模仿者和跟随者。其中最重要的是约瑟夫·米尔纳（Joseph Milner）的名作《基督教会史》（*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1797），在牛顿的著作出现差不多30年后出版。米尔纳对这位奥尼的前任牧师大加称赞，他在简介中写道：“牛顿先生的历史书卷早已闻名遐迩，其价值已经被虔诚和有识之士们所认可……熟读其富于启发性的《基督教会史》，它第一次向我指明了这项工作的意义。”

对牛顿来说，这本书能够成为约瑟夫·米尔纳著名的三卷本教会史（詹姆斯·斯蒂芬先生说“若无此书，英语民族的道德和宗教取得的某些改革成果就会轻易消亡”）的灵感来源是相当大的荣耀，其他同时期的评论和评价也是这样。

也许，对《基督教会史回顾》给予最高赞美的评价来自1767年初牛顿在亨廷顿遇到的一位新交，他这样评说：“我认为，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该书所具有的伟大的观察力及文风无与伦比，远超过罗伯森（Robertson）或吉本（Gibbon）。”这位新交就是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一位天才诗人，他们之间的友谊对约翰·牛顿在奥尼做教区牧师的后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与考珀的友谊

威廉·考珀是18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1767年，他与约翰·牛顿初次见面时还是一个毫无名气、居无定所、没有职业的人。他们的相识迅速发展为友谊，这使两个人的生命产生了最为深刻和积极的友爱联系。没有牛顿，考珀不可能从精神困境中恢复健康，出版他最好的诗作；没有考珀这位曾经的房客、隔壁的邻居和平信徒助理牧师，也许牛顿会不堪承受繁重的教牧负担，他也不可能开始创作《奥尼赞美诗》（*Olney Hymns*）。这本圣诗集是他与考珀共同努力的结晶，他们创作出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歌曲，其中被广为传唱的就是牛顿的名作《奇异恩典》。这份友谊对英语圣诗和诗歌创作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不过，其中个人情感和心理状态的传奇色彩也是相当突出的，在威廉·考珀的生活中尤其如此。

牛顿和考珀的社会背景正好处于两个极端。1731年，威廉·考珀出生于一个交际广泛、前程似锦、有口皆碑的家庭。他似乎注定要投身于法律界。他的祖父斯宾塞·考珀（Spencer Cowper）是英格兰首席法官，斯宾塞的哥哥艾尔·考珀（Earl Cowper）是英格兰大法官兼上议院议长。他的父系有著名的法律界人士，与之相匹配的母系则有著名的基督教神职人士。威廉的母亲闺名叫安·多恩，先祖是17世纪诗人和圣保罗教堂的副主教约翰·多恩（John Donne）。威廉的父亲、牧师约翰·考珀博士是牛津默顿学院的董事、破产法的督察、贝克汉姆斯特管理财产和税收的教

区长，也是国王乔治二世的私人教堂牧师。

拥有这样一份家谱的青年威廉理所当然会得到正规的法律专业教育。从威斯敏斯特学校毕业后，他在法学协会会所研读法律，以获取律师资格。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堂兄为他谋得一个差事，安排他到上院去做立法机关议事录的秘书。在他就任这个薪水不菲的闲职之前，他需要参加在上院进行的面试，回答一些正式的问题。一想到这场问话，考珀就惊惶失措，以至于精神错乱。他曾三次企图自杀，家人只好把他送到圣阿尔班斯（St Albans）科顿医生的疯人院。在科顿医生的照料下，两年后，考珀完全恢复了，他搬到亨廷顿当地教区牧师夫妇莫尔莱（Morley）和玛丽·尤文（Mary Unwin）家寄宿。考珀很喜欢尤文一家，他与他们共同生活了两年多。他从具有福音派精神的莫尔莱接受每日的信仰教导，与他的孩子们关系密切。在给姑母茱迪丝·马丹（Judith Madan）的信中，考珀把自己说成是“这户人家的一个养子”。

1767年夏天，这家人遭遇了一场悲剧——莫尔莱·尤文牧师从马上摔了下来，因头骨开裂而死。那时牛顿正巧来访亨廷顿，他的口袋里装着约翰·桑顿一位剑桥的亲友理查德·科耶斯（Richard Conyers）医生的介绍信，要送给尤文一家。当牛顿带着介绍信赶到此地时，他发现自己身处哀悼的悲泣中。他安慰尤文的遗孀玛丽·尤文和她的“养子”威廉·考珀。牛顿对这个伤悼之家的第一印象就是“在对福音的信仰和盼望上，他们有一种属灵的共鸣”，他们对他的同情也深表感激。对福音信仰的共同兴趣使两个人很快接近，他们愉快地一起进行长时间的散步、谈论名作、交流生动有趣的话题。牛顿发现玛丽·尤文和考珀想要离开亨廷顿，他马上提出要帮助他们在奥尼找一个住处。考珀给姑母茱迪丝·马丹写信说：“牛顿先生看样子真的非常想让我们和他做邻居，我敢说我们也真是非常希望能得到这么一位牧者的看顾。”

在拜访了亨廷顿的尤文一家三周之后，牛顿写信给考珀（他把信封上的收信人姓名错写成了“威廉·古珀先生”），向他描述友好的睦邻关系，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到了两处适合租用的房子。一处是在奥尼的市场，另一处是在爱姆伯顿附近的乡村。波琳·牛顿推荐他们去奥尼中心那座有五个房间的屋子，一年租金12英镑。唯一不太令人满意的是需要做些修理和粉刷的工作。不过，牛顿说：“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能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你们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是一个极为友好的表态，因为牛顿夫妇自己临

时居住的房子比他们的教区牧师府要小得多，随着前来拜访的信徒人数增多，牧师府正在装修扩大。在诚挚地邀请考珀和尤文一家到奥尼与他共同居住后，牛顿在信的结尾处说他和波琳“高兴地期盼着与你们成为邻居，并愿意尽我们所能使你们的居所里里外外都舒适宜人”。

牛顿极力邀请并安排尤文一家和考珀与自己同住，其原因还是很有意思的。提供帮助的初衷是出于对这个丧亲之家的同情，和对福音派基督徒的热心，不过，牛顿还有一个更私人化的理由促使他极力劝说他们搬到他所在的教区来住。许多年后，他写道，玛丽·尤文和威廉·考珀的到来让他“有了两位美好无比的朋友，在这个小城中，他们的陪伴让我的生活变得活跃……在这儿，原本没有一个人能让我获得交流的愉悦和满足。”

一开始，与新房客相伴而来的也许算不上愉悦与满足，而是拥挤忙乱；这些压力在牛顿 1767 年 9 月中旬的日记中微露端倪：

9 月 14 日：考珀先生、尤文太太和尤文小姐从亨廷顿搬来此地。

9 月 15 日：一天主要与客人们在一起。

9 月 16 日：饥肠辘辘、狼狈不堪的一天。

导致饥饿和狼狈的部分原因是牛顿的主妇不在家，她不得不搬到乔治客栈去住，好为尤文一家和考珀还有一位男仆腾出房间来。不过，5 周之后，当教区牧师府被粉刷收拾干净完以后，这种四分五散的状况就结束了。10 月底，牛顿搬回已经扩大的牧师府。像许多人一样，搬家总会出现一堆麻烦事，其中包括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突袭，也许可以把它称作“搬家热病”，波琳和玛丽·尤文在搬家那天同时病倒。牛顿在日记中写道：“10 月 23 日星期三：真是意想不到，亲爱的波琳和尤文太太竟然双双病倒。我只能把一切完全交托到上帝的手中。”10 月 24 日，他在给达特茅斯伯爵的信中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伯爵为他们提供了装修费用。他写道：

我们昨天搬回了牧师府……非常感谢阁下为我提供了如此舒适的居住处所……我从两位亨廷顿的朋友那儿收获颇多，他们现在是我们的客人。我不知道还能从哪儿找到两位像考珀先生和尤文太太那么愉快可亲的人。

牧师府获得的另一个物质上的收益，牛顿认为也需要向达特茅斯伯爵

解释清楚，虽然费用不多，但在装修账单上这是一笔不同寻常的支出。牛顿用了6先令8便士在书房里手绘了一段圣经经文题词。这段题词如今已褪色：

因我看你为宝为尊：但要记住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華你的神将你救赎。

牛顿就花费了不菲资金在书房壁炉上方手绘这句经文向达特茅斯伯爵进行了一番语含玩笑的解释，他写道：

这些选自《以赛亚书》43：4和《申命记》15：15的经文是贯穿160封书信的核心。有人劝我说阁下您会认为这6先令8便士的投资不算浪费，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让我时时想起自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能够居住在奥尼的牧师府里其实是多么地不配。

在同一封信的另一段，牛顿详细地描述了新装修的牧师府其宽敞舒适与他21年前在普兰提内岛上遭阿莫斯·科劳囚禁时所居狭窄凄凉之处的强烈反差。“倘若阁下1746年前后去过普兰提内岛的话，现如今重回奥尼，您就会对我彼时与此时之反差深感惊异的。”他又补充说，他之所以从《以赛亚书》和《申命记》中摘取这两段经文，就是因为他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忘记上帝如何将他从悲惨的境遇中救赎出来。

牛顿对早年遭遇的回顾也是促使他与考珀的友谊发展密切的一个因素。他们两个都在年仅6岁时失去母亲，学业生涯格外地痛苦——牛顿是因为那些粗鲁野蛮的教师，考珀则是因为常受高年级学生的欺侮；此外，两个人还在其他方面具有相似性，牛顿曾经受过普兰提内岛的囚徒之难，考珀则在圣阿尔班斯的疯人院里经历过病痛之苦；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基督信仰带来的改变和对福音的热爱。不过，相对于牛顿把自己完全委身于上帝而拥有的坚强信心，考珀却因精神疾病的困扰而信心虚弱，18世纪人们把这称作“忧郁症”，也就是21世纪人们所说的“抑郁症”。

牛顿以基督徒的同情和切实的鼓励帮助他的客人走出抑郁的低谷。到达奥尼最初的几个月里，考珀仍然离群索居，脆弱胆怯，牛顿带他在教区周边散步、骑马、探访教民，这大大地增强了他的自信心。尽管牛顿仍然没学会正确地拼写这位房客的名字，但他在1767年秋天的日记中，写满了诸如“今天一天与几个灵性饥渴、愿意思考的信徒进行美好的交谈。古

珀先生和我一起去的。”不久，这种陪伴就转化成合作了。考珀对圣经甚为精通，牛顿于是开始把他当作无佣金的平信徒助理牧师。考珀一开始就服侍奥尼那群贫苦的花边织工，日渐边缘化的手艺让他们的工资迅速下降，从而导致许多人家陷入贫困。考珀的牧养探访很快就扩及教区所有的穷人、病人和受难者，这位从圣阿尔班斯疯人院里出来没多久的人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同情。这份工作会让考珀得到很好的疗治，但问题是他很容易无精打采和精力不足。一位传记作家这样评论他：“考珀，终其一生，缺少个人的自发性，他只有在外界压力的推动下才会有所行动。”

在牛顿温和的推动下，考珀成了一位成功而且工作努力的平信徒助理牧师，教民们通常称呼他“考珀先生”或者“考珀老爷”。除了这些牧养事工外，考珀还开始带领每周两次在大宅举办的教会会议中的祷告，来分担牛顿的工作负荷。一开始，考珀当众大声祈祷时会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可是当他一旦熟悉了自己的助理牧师职责程序，他似乎就成了一个满有恩赐的祈祷带领者。有人记录说奥尼会众中有一个人这样说——“他曾经听过许多人的祷告，但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考珀先生的祈祷。”牛顿对这位新助显然也有极高的评价，他赞扬考珀具有——

……一种因体察细致而令人温暖、因博览群书而心思严谨的生动的想象力。不过，这些才能与他从那位伟大教师的学校里获得的能力相比并不足道。在谦卑、单纯、献身于上帝和清晰地明白福音真理方面……我认为他简直无与伦比。

牛顿和考珀惺惺相惜。他们的合作日益默契，互相激赏。在教义方面，考珀主要是从属灵的长者而不是英国圣公会那里得到教导，因此，对于牛顿试图超越宗派之间的樊篱，经常联合奥尼的浸信会与独立派教会共同协作的愿望，他非常赞同。1768年6月，牛顿与其他三位不从国教传道者轮流在一处讲台布道，考珀将此事写给了姑母，他说：

倘若奥尼不同宗派之间的高墙能够在四处倒落，现出一片平地，那真是让人高兴的事。这儿的大部分不从国教信徒，至少那些认真严肃之人，他们完全忘记了我们的礼拜堂有尖顶这回事，而我们也没在意他们的礼拜堂没尖顶这回事。

积极地投入并分担牛顿的事工使考珀获得了精神上的平静。1767年，

他在一封写给姑母茱迪丝·马丹的信中以愉快的口吻描述了自己的感觉：

主把我带到这个遍地棕榈树和活泉的地方，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我由此更理解了主的恩慈之浩大。他把这块土地放在我心中，让我渴望参与到他的侍奉中，与他的子民同住，满怀恩慈地赐我盼望：他所爱的仆人牛顿以无比的善意和友爱收留我们在此地，并让我们受到他的服侍，他是何等智慧和忠心的圣事的管家啊，这是令我感激不尽的祝福。愿我们在天上的父赐福我们的灵魂丰满兴盛，好使我们得享充盈恩典，整整一天我们就是在不断地寻求和探讨上帝之国中度过的。

考珀所描述的“充盈的恩典”指的是在牛顿家中的经历，他和玛丽从亨廷顿带来的两个仆人最终都归信了。除了牛顿的仆人和花匠，在整个奥尼，只有不多的几位做家务的佣人，因为此地以低收入人群为主，雇佣仆人的家庭不多。牛顿和考珀很高兴在每天早晨的家庭祷告会上，如今凡在牧师府里居住的人，无论虔诚的基督徒还是忠实的仆人，都站满了楼梯上下。

1768年春天，在牧师府暂住5个月后，玛丽·尤文和威廉·考珀就搬到了果园旁边，这座位于奥尼市场的房子已经装修收拾好了。他们的新家与牛顿家的距离就像众所周知的那句表达——扔一块石头那么远，两家的后院被横穿邻居阿丝普瑞太太家花园的一条小路分隔开。为了能够找到一条捷径到达对方的住宅，他们付给阿丝普瑞太太一年一个金币以获准从果园中穿行。如今，在奥尼，这条获得通行权的小径穿过一片被称作“金币区”（Guinea Field）的空地。显然，两个朋友在这中间花费的每个便士都是值得的，借用这条便利小径，他们每天花许多时间在一起。在这种日渐深厚的友谊中，不难发现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拥有共同的兴趣。

牛顿和考珀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丰富的才智，对俗世和属灵知识充满热情；他们都能熟练地使用拉丁文和希腊语，对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相当熟悉；他们都是高产作家，创作体裁包括书信、诗歌、散文和圣经注释。他们严肃认真又轻松活泼，他们的交流幽默、生动，正如康格里夫（Congreve）^[1]所言，“从戏谑到庄重，从活泼到严肃”。他们尽情地享用美餐和长时间的散步，骑马畅游在白金汉郡和贝德弗德郡的美丽乡野。不过，全然爱主和服侍主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在睡眠之外，他们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了牧养和关爱灵魂的事工上。他们每

天都有严格的祈祷和研经的属灵操练，他们在其中彼此坚固。1800年，牛顿在好友的葬礼布道会上说：“我不知道在地上还有哪个人能像考珀先生这样在圣经和良心问题的探讨上让我如此满足。”30年前，两个朋友开始合作进行的一场崭新的创作，注定要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丰富基督教的敬拜，这就是《奥尼赞美诗》的出版。

注释

[1] 康格里夫：17世纪英国作家。——译者注

创造力与危机

按照牛顿的说法，在奥尼创作赞美诗的动力来自于“一种想要提升基督徒无伪之信的渴望”。不过，这一创作断断续续拖延了十多年，一首首圣诗才被编辑进一册圣诗集子里。1773年，两位作家的创作活动被严重地打乱了，这一年，考珀陷入了一场新的精神疾患中，多次试图自杀。这本最终以《奥尼赞美诗》（1779）而闻名世界的圣诗集经历了一段漫长、艰难的孕育过程，其间有信心十足、波澜起伏，也有危机重重。

由于牛顿的日记缺少1768—1773年间的内容，故没有记载确切表明他何时正式开始与考珀合作创作赞美诗。早在考珀来小镇之前，牛顿就对圣诗创作极为关注，把它当作事工的一部分；对于一位18世纪英国圣公会的带薪牧师来说，这并非寻常之事。考珀这位新的平信徒牧师助理是一位热爱圣诗写作的人，他鼓励牛顿在这份事工上积极推进。第三位帮助支持者是玛丽·尤文，她有一副美妙婉转的好嗓子，经常带领大家唱赞美诗，尤其是在每周四于大宅举办的儿童聚会上更是如此。正是牛顿的实践活动使孩子们参加聚会用心学唱赞美诗，并使之成为他们信仰教导的一部分。那些在各种聚会中传唱的赞美诗标志着教会一年四季的变化，同时也是当地许多节日庆祝和重大场合的亮点，比如1769年庆祝周二成人祷告小组搬入大宅最大的房间就属于这类大事。为了表达在这种场合中的庆祝，牛顿和考珀分别写了一首特别的纪念性圣诗，这就是编印在《奥尼赞美诗》第二集中的第43首和第44首。不过，在当时，它们属于一次性作

品，只是为了庆祝周二祷告小组搬入扩大了的新居地而创作。

将牛顿和考珀两人早期创作的赞美诗进行比较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对于研究两位作家的文学技巧和圣诗创作意图等方面，它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观察点。牛顿的纪念性圣诗标题是《扩大会众祷告空间》（On Opening a Place for Social Prayer），以“主啊，我们软弱的灵魂向你呼求”起首，全诗的用词表达了一种清晰的主题使命——以欢喜的祷告祈求上帝赐福。这些语句包括请求“用心祈祷”（第二行）、“你爱的标记”（第三行）、“圣洁的平安、爱与和谐”（第四行）以及“让我们的恩惠增多”（第五行）。圣诗结尾以振奋人心的呼唤邀请罪人前来充满这间屋子，接受赐福恩典的福音：

但愿福音的欢喜声
伴随恩典的大能
唤醒许多有罪之人
同来此地聚集重逢

从最后这段可以看出，牛顿圣诗的特点是朗朗上口、易于传唱，但缺少考珀圣诗中的诗意；同样是这件事，考珀的纪念性圣诗题目是《耶稣，你的子民在此相聚》（Jesus, Where'er Thy People Meet）。显然两位作者都同意在作品中应当包括一次呼召，以激发属灵的复兴并激励更多的人进入教堂。考珀同一主题的圣诗最后一段在语言的力量上较之牛顿的作品要略胜一筹：

主啊，我们只有寥寥数人，你依然不离不弃；
你不曾塞耳不闻，也不曾缩短膀臂；
哦，愿你裂天而至，就在此时；
让一千颗心完全属你！

正如我们在稍后一章会看到的那样，牛顿偶尔能够写出传唱世界两百年（还可能更多世纪）的不朽之作，但从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公平地说，他只是一位简单的词作者；而从合作伊始，考珀就是一位不简单的诗人。不过，在来奥尼之前，考珀还算不上一位一流诗人，他的信心无疑来自牛顿的鼓励，可能牛顿的勤勉对他也具有督促的力量。

据考珀在奥尼的传记作者托马斯·怀特（Thomas Wright）所言，直

到1771年，考珀才正式决定与牛顿合作创作《奥尼赞美诗》。8年之后，在出版前夕，牛顿执笔写了该书的前言，他说尽管基督教信仰是出版这本圣诗集的动力和主要目的，但并非唯一目的。牛顿写道：“它同时也是对一种亲密珍贵的友谊的永恒纪念。”他告诉达特茅斯伯爵，“亲爱的考珀先生和我”之间的友谊使他们“想要通过一起创作赞美诗从而留存一份对彼此关爱的纪念”。逐渐地，他们在这个活动上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彼此激励为成人和儿童在大宅举办的每周聚会进行圣诗创作；部分原因是因为唱诗是崇拜活动中的一种实验，似乎很得教民喜爱；还有部分原因是，对于属灵的教导，圣诗可能是比较好的说明材料。两位天才作家的合作，加上一位颇具鉴赏力的听众，尤其当时在循道会、浸信会和独立教会信徒中普遍流行的英语圣诗创作风潮的兴起，种种因素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的奥尼汇融于一。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两位诗人的相互激励。在交谈中，牛顿和考珀的创作灵感经常奔涌而出，因而，对他们来说，前言中所说的为创作圣诗集而产生的“原初构想”最终变为真正的合作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尽管无法确切地知道《奥尼赞美诗》是如何开始的，但是在1771年和1772年间，他们的创作效率相当高。在这最初的两年，考珀写了60多首圣诗；牛顿的创作则更多些，可能他没像考珀那样因为受到抑郁症的困扰而离开过写作。1773年1月，一场被称作“风暴”的事件改变了他的生活状态，并最终因此结束了两人的合作。对考珀来说，这场风暴如何酝酿成形，如何最终爆发为一场自杀，在他与牛顿的友谊中，这是一个传奇，它说明了挽救之重要。

1770年，威廉·考珀的弟弟约翰·考珀牧师去世，年仅43岁。好多年来，两兄弟之间一直存在着精神冲突，因此约翰的疾病让威廉的平静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约翰是一个优秀的古典学者、牧师和一位自由派的英国圣公会教徒。他反对哥哥改变信仰和为牛顿做平信徒助理牧师进行福音工作。不过，当约翰·考珀拜访了奥尼、在教堂参加敬拜活动、听过牛顿的周日布道之后，尽管表面上他表现得很淡漠，却开始阅读福音派作家的作品并研究改革宗神学。1770年上旬，长期的哮喘和肝部溃疡使约翰病人膏肓，威廉匆匆赶到弟弟的病床前。他后来欣喜若狂地告诉牛顿（他一直在奥尼组织祷告会用祷告托着兄弟俩），在最后的日子里，约翰接受了福音真理。弥留之际，约翰与病床边的哥哥谈及福音派的基督教，激动

地讲述自己在奥尼的经历，并说如果他能活下来，与牛顿谈上哪怕一个小时他也会心满意足的，他把牛顿称作“圣徒”。牛顿听到这个消息后，写道：

想起你的弟弟时，我的心中充满深情……在他生病的过程中，我分享也理解他心中的牵挂，我更加地敬重他，那不但是因为他对我何其宝贵，而且我知道我们都是何等地热爱真理！如果现在能在奥尼接待他会多么让人高兴啊，如今曾经害怕彼此伤害的障碍已经被挪除了。

尽管威廉·考珀对于这种和解欣喜非常，他相信自己的弟弟在福音的真理上已经与牛顿达成一致，但约翰·考珀再也没能回到奥尼。他以温和微弱的声音称呼牛顿为“圣徒”后没几天就去世了，他的逝去使威廉的神经异常脆弱，以至于无法参加约翰的葬礼。精神上的压力陡然增加，约翰遗留的大量债务等问题又让威廉陷入了财政窘境。1771年，考珀的两位堂兄也相继去世，家族接连发生的变故诱发了考珀的抑郁症。有某些迹象表明牛顿对朋友所处困境的反应。1772年7月9日，他给波琳写信说：“亲爱的考珀先生仍像先前那样陷入深深的忧郁中，他昨晚祷告时让我读《希伯来书》2：18，但我并不认为他因此感觉好转了。”

摘自《希伯来书》2：18的文字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牛顿和考珀所祷告的事项，这段话是这样的：“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此时，难道令考珀深受试探的困扰极难抵抗吗？倘真如此，它究竟是什么呢？奥尼城有不少人认为他们知道答案的根底，许多关于“考珀先生”和“尤文太太”的谣言开始在小城四处游走。如今，流言里通常用“那个事儿”来指代这两个人。他们一直住在同一座房子里，人们经常看见他们相伴而行。尤文太太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却仍然“屈尊”做家务，烧饭、洗衣、收拾屋子。她是一个容貌俊美的女子——而且只比考珀大7岁。这些听起来有鼻子有眼儿的谣传没多久便被添油加醋地散播各处了，这些流言很可能是捕风捉影。玛丽·尤文是一位令人尊敬、无私和敬畏上帝的寡妇，她对考珀的忠心完全出于纯粹的母爱。不过，在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养母养子关系后，1772年，两人的关系发生了令人惊异的进展——他们开始谈婚论嫁了。这场与婚姻有关的谈话非常严肃，因为牛顿

对此甚为了解，并给予他们祝福。那么究竟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威廉·考珀和玛丽·尤文怎么会如此突然地产生了恋情呢？也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就在秘密地进行着吗？或者他们谈婚论嫁就是为了平息奥尼城里那些令人不快的传闻？

无论如何，即将举行婚礼带来的压力显然让考珀原本就有的心理疾患愈加严重了。1773年1月1日星期五，他在教堂听完牛顿的早晨布道一两个小时，绕着奥尼的田野独自散步时，经历了一场可怕的预感的冲击，疯狂的诅咒使他再一次想上吊自杀。在他的内心还未完全被黑色的绝望包围时，他挣扎着想用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信仰。他冲回家中，拔出笔，写下了一首赞美诗，许多人认为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从属灵角度，它都是一篇杰作：

上帝的行为何其神秘

他伸手铺张奇迹

他蹈海踏浪而行

他坐在风暴当中

在遥不可及的矿藏深处

他的技艺从无失误

他珍藏光明的图案

按照神圣的旨意行事

那敬畏你的圣者，鼓起新的勇气

浓云何等令人生畏

他的怜悯之大，必要击碎

你头顶的祝福

虚弱的情感无法判断上帝

唯有信靠他的恩典

在愠怒的天意背后

他藏起了一张笑脸

他的计划必将迅速成熟

延展进入每个小时
 花蕾也许深含涩苦
 花朵必将清香甜蜜

愚盲者必要犯错
 细察他的作为也是枉然
 上帝是自己的转述者
 他会让一切全然显露

写完这些值得纪念的诗句后，“可怕的浓云”就来了，考珀的内心一下子堕入疯狂的深渊。在1月1日到2日之间的深夜，他噩梦连连，不断出现幻觉。在可怕的幻梦之中，他得出一个疯狂的结论——上帝命令他像亚伯拉罕抽刀结果儿子以撒那样结束他自己的生命。显然他忽略了圣经中一个关键环节，上帝亲自介入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但考珀却打算听从这个幻象中的命令。他的自杀企图受到玛丽·尤文的阻止，她在凌晨时分派人去叫牛顿。到达果园旁边后，牛顿对朋友的境况深感震惊。他在日记中提及当时的情景时用“紧急处置”一词来表达。在18世纪，这句短语用在考珀身上意味着他正处于“出血”的危险状态。^[1]当时的场景就是有血流出来，这可能就是出于自戕同时也包括歇斯底里。牛顿一定试图安抚过他的朋友，但一直没有任何效果。在此后的日子里，考珀不断地受到幻觉和疼痛的折磨与困扰。对此，牛顿在1773年1月的日记中有简洁慎重的记录，这些选段清楚地表现了考珀深陷悲惨的抑郁症的漩涡之中：

1月2日 星期六：我今天的时间和心思完全被果园旁边发生的令人震动和紧急处置的事宜所占据。大清早就有人来送信，我赶到那儿，真是无比震惊，心痛不已。上帝的行为何等神秘难测啊！

1月3日 星期日：早晨又有人来报信——又是令人伤恸的场面。别人告诉我后来情况更糟。

1月5日 星期二：我今天尽可能拿出足够的时间完全陪在考珀先生身边。我们今天一起散步，也许每天都会这样吧。我现在几乎没什么空闲时间，但是为这件事抽出时间来是绝对必要的。

1月6日 星期三：和昨天一样忙。我现在每天早晚在两所房子里举行家庭崇拜。风暴依然猛烈，但我知道上帝就在其中。

1月12日 星期二：上周的探访让我痛苦非常，但现在愉快多了。每一天阴影都在渐渐消褪。

1月16日 星期六：今天，随着诱惑重现，我们的希望迅速化为泡影。

1月22日 星期五：我亲爱的朋友仍然行走在黑暗之中。我几乎无法想象一个满有上帝的恩典和怜惜的人会如此痛苦。

1月24日 星期日：凌晨4点，我们被一声吓人的尖叫惊醒，从床上起来，叫声来自果园那边。我在那儿待到8点，威胁的时刻虽然已经完全过去，但现在事情仍然有许多。

这些对考珀的疾病进行的流水账式的记录表明，他在1773年1月整整一个月里开始陷入了抑郁和绝望之途。此处提到的“诱惑重现”是这段旅程中最令人悲痛的一段。这种诱惑无疑指的是考珀的自杀冲动——牛顿在日记中对此未直接写明，因为在18世纪自杀即便未遂也算是一种严重的罪。这种潜在的悲剧悬挂在考珀的头顶就像一把不断出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2月最后一个星期发生了许多事，其中一件事让考珀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上帝站在他的床边用这样的句子宣告他最后时刻的到来——“*Actum est de te periisti*”，考珀把它译为“对于你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你已经死了”。

考珀在这次和其他许多次相似的幻觉过程中都不致毁命，这要大大地归功于牛顿。尽管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最近有两位考珀的传记作者指责奥尼教区牧师是个虚伪的宗教狂，对朋友的精神疾患多多少少都负有责任，这种推理如果不说是荒谬也让人无法苟同；而同时代人的证据却表明作为现实生活和属灵的帮助者，牛顿为考珀付出了很多。在1773年前三个月里，牛顿每天都拿出几个小时陪伴那位痛苦的邻舍，无论白天晚上，他经常随时会被尤文太太叫到考珀的床边。4月，考珀和玛丽·尤文搬到了牛顿的牧师府，再一次成为他家的长住房客。这次客居的时间长达13个月。有这样一位性情反复无常、具有自杀倾向的考珀长期与他们同住，夫妇俩一定深感压力和紧张，但牛顿仍然毫无怨言地承担了这份重任。

60年后，某些怨言最终由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1774—1883）第一次说出来，他编辑1835—1837年出版的考珀五卷作品集，其中包括一篇传记。骚塞对福音派素有敌意，他嘲弄牛顿对考珀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认为他是考珀深受精神疾患折磨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因为考珀早在认识牛顿之前许多年就深受自杀倾向的困扰。

也有人声称，同时代人提供的引人注目的证据表明，牛顿根本不必为考珀后来的衰颓负责，反倒应该为考珀在奥尼 1767—1772 年之间的康复负责，诗人曾经自述说他在这个时期的生活是最幸福、最繁忙也是最安宁的。但也没必要像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那么极端，他严厉谴责骚塞的传记“严重缺乏从谎言中分辨真理的能力”，认为这些对牛顿的攻击简直令人不可忍受。

第二个考珀传记作者是大卫·塞西尔（David Cecil, 1902—1986），他对福音派和牛顿都抱有轻蔑和贬低的态度。在《受伤的鹿》（*Stricken Deer*, 1944）一书中，他用“粗鲁、荒唐、幼稚、狭隘、怪异、笨拙、粗心、无情、生硬、俗气、粗鄙和可笑”等词语来形容牛顿，并用讽刺的语调解释这些缺点：“只有一位上帝，约翰·牛顿是他的先知。”无论塞西尔如何运用 20 世纪的观点对牛顿进行人身攻击，对于 18 世纪奥尼城这位满怀爱心忠诚照顾朋友考珀的人来说，这其中一点相像的地方都没有。考珀的精神崩溃使牛顿直接面对持续的危机冲击。考珀精神疾患最严重的阶段持续了好几个月，这让牛顿忙得团团转。在承担繁重的牧养工作的同时，他又是朋友的房主、监护人和男性护理员。接待考珀和玛丽·尤文和自己住在一起，牛顿为此遭到了不少批评指责。他们在牧师府的出现越发地促进了谣言在奥尼的四处散播，谣言甚至传到了约翰·桑顿的耳中。桑顿是伦敦的商人、英国央行董事，他一直为牛顿提供每年 200 英镑的慷慨资助。桑顿向牛顿施压，让他把两位房客从那个地方赶走，不要以牺牲自己的“所有体面”为代价，考珀和玛丽·尤文的关系就像“一条藏在草中的蛇”。桑顿进一步建议说如果这两人不离开教区，那么牛顿就应该离开他们，搬到果园旁边的房子里去。牛顿拒绝了这个建议，为两位房客的名誉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不过，我们还是能够从他 1774 年 5 月 28 日的日记中看到他的轻松：“我亲爱的朋友尤文太太和考珀先生自去年 4 月 12 日来家里客居，今天搬回他们自己的住处去了。这足以证明他在某些方面已经大有好转了。”

考珀确有好转，不过他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恢复期。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一直深居简出，很少到果园外面的地方去。在院子里，他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每天阅读、写诗、做园艺，乐于与一大群小动物为伴，其中为首的是三只温顺的野兔。

考珀仍然享受着牛顿的陪伴，牛顿每天沿着那条联结着两所房子

的“一金币小径”来看望他，不过这时它已经变成了一条单行道。两个朋友仍像从前一样一起交流和祈祷，但他们的友谊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已经发生了改变。

考珀仍旧是基督的信仰者，但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没能顺服上帝的旨意而是偏行己路，以致与上帝分离，因此，在奥尼，他无法重新回到教堂，也无法重新开始不拿工资的平信徒助理牧师的工作。他的赞美诗创作也像牧养侍奉一样停了下来，甚至连近邻那些花边工人他也无法再去探访了。对朋友决定断开一切敬拜和侍奉上帝的工作，牛顿颇感不解，但他把这理解为是精神疾患带来的后遗症。1775年8月，在一封从斯特普尼写给老朋友塞缪尔·布鲁维的信中，牛顿把考珀的疾病描述为“对我来说是极为神秘的……一场巨大的考验。但我希望自己在上帝的权柄、智慧和爱面前能够学会（尽管我是一个笨拙的学习者）对所有空洞的理由和因不信而生的抱怨不随便发言”。

在考珀患抑郁症最严重的那些年，牛顿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心。事实上，考珀深受折磨、多次自杀未遂都是因为牛顿在床边持久的照顾，他努力扶持这位烦恼苦闷的诗人，使他免受噩梦、幻象和幻觉的影响。

他们的友谊使牛顿成为一个仁慈友爱的基督徒的典范。不过，尽管牛顿在朋友精神状况最糟糕的时候承担了全部重担，但他也从这份友谊中收获颇丰。在考珀状态尚好时，他的美好陪伴和内心的诗意曾激励牛顿写出更富于创造力的作品，那是他单靠自己难以企及的高度。考珀生病时，牛顿不断地创作以增加《奥尼赞美诗》的内容（281首圣诗中考珀只占67首），这超过了他原本的计划。可以说，尽管这份友谊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曾经令他伤痛难过，但是没有考珀，牛顿不可能完成《奥尼赞美诗》；而没有《奥尼赞美诗》，也就不可能有《奇异恩典》。

注释

[1] 当时《牛津英语辞典》（第3卷481页）对 dispensation 的解释就是“出血”（a distribution of blood）。

《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如此甘甜，
我罪竟蒙赦免。
昔日迷失，今被寻回，
盲眼重又得见。

如斯恩典，令心敬畏，
解脱万千忧惧。
归信伊始，恩典即临，
何等奇异珍贵。

冲决网罗，历尽磨难，
我已踏上归途。
恩典眷顾，一路搀扶，
引我安返故土。

主曾许诺，降福于我，
圣言信靠不移；
此生此世，托庇于主，

与主不弃不离。

身心可朽，生命可绝，
 圣殿巍然不毁。
 寄身其间，平安喜乐，
 人生圆满丰沛。

大地即将，如雪消融，
 太阳终会陨落。
 唯有上帝，与我永在，
 声声唤我依托。^[1]

这是约翰·牛顿所创作《奇异恩典》的原稿，是被全世界传唱最多、记录最多也最受欢迎的赞美诗。无论圣诗还是世俗歌曲，再没有哪一首歌能像它这样被大量地翻录（仅在美国就被翻录过 3000 多次），能如此频繁地演唱（在大众场合一年至少要被演唱 1 千万次），能跨越世界 6 大洲，能传唱如此长久（至今已经 234 年，还将继续传唱下去）。每一天，它都在这颗星球上唱响，从家族的哀悼会到私人的庆祝会，它以丰富巨大的情感力量触及人心。有几亿人聆听过并喜欢演唱《奇异恩典》，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首诗歌的创作起源、创作目的、创作结果及创作历史。

因此，作为约翰·牛顿的传记作者应该能够回答一些有关《奇异恩典》的基本问题，比如：牛顿在什么时候、因着什么原因构思了这样一首诗歌？他是如何创作的？是谁又是怎样点燃了他的灵感火花？作为一位圣诗诗人，他的才能和技巧是什么？为什么牛顿的诗句不但对基督徒而且对非信者也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奇异恩典》的构思有一部分起源于 1772 年 12 月末，当时牛顿正在为教民预备 1773 年 1 月 1 日的新年布道讲章。在 18 世纪，为准备布道而创作赞美诗，大多数牧师对这种想法还不太认同，但牛顿在这个信仰传播领域却是一位具独创精神的改革者。早在两年前，他就已经开始尝试（作为一名英国圣公会带薪牧师）创作“会众的赞美诗”这种极为特殊的活动了。这种活动源于牛顿对圣公会使用的主要宗教书籍钦定本圣经和 1662 年《公祷书》的认识，他发现未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很难理解书中的词语和句子。由于他在奥尼的会众大部分是花边织工、农夫、酿酒工人、铁

匠、木匠和其他手艺人或者小商小贩，所以牛顿认为，如果他能通过表现所讲经文的朗朗上口的赞美诗进一步阐发他的讲道，那他就能帮助他们理解明白圣经的内容。

在奥尼牧会初期，牛顿使用的是其他作者如艾萨克·沃兹或者约翰·卫斯理、查尔斯·卫斯理为同样目的创作的赞美诗。第一批通过圣诗来接受圣经教学的就是教区里的儿童，大约有二百多个孩子每周四早晨会在村镇边上那间大宅（达特茅斯伯爵弃置不用的宅第）里举行聚会。当牛顿发现专心学习和高唱赞美诗对孩子们属灵教育的帮助是何等有效时，他将此扩展延用到成年会众当中，他们每周三次在大宅举行祈祷会。尽管唱诗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但它还只能偶尔在奥尼的教堂中使用，因为18世纪英国圣公会很反感在圣殿中演唱韵文圣诗（被配上了乐谱的圣经诗篇）之外的歌曲。

尽管有这些限制，尽管遭到许多邻区牧师的反对，牛顿仍然在教区的祈祷会上把圣诗当作敬拜和布道教导的一种手段。1765年，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小群体，安息日晚上，喝完茶后，他们会到我的房间来。我们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祈祷和唱诗。”但若不是因为1767年诗人考珀的到来，他的这部分事工将只会停留在偶尔或不定期的活动这一层面上。

从上一章里我们知道，考珀变成了牛顿的密友、智慧的知己和圣诗创作伙伴。从1771年到1772年，他们为一个月举行三到四次的祈祷聚会分别创作新的赞美诗。无疑，两个合作者彼此激发了对方的创作热情，但他们从来不是竞争对手，因为牛顿知道考珀作为诗人的创作天份远超过自己。牛顿把自己的朋友看作是一个诗歌天才；相反，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爱好者，炼词造句只是为了唤醒奥尼的平民大众。

这种为上帝和教民服务的观念是牛顿创作圣诗的主要目的，他无意于取悦上流社会和具有良好文学修养的读者。在《奥尼赞美诗》前言中，他对此清晰地表述道：

尽管我没打算用有意的简单粗糙冒犯品味高雅的读者，但我的确不是为他们而创作。倘若我所服侍的上帝喜悦使用庸才如我者，让我有资格服务于他所选定的那群软弱贫苦之人，并且让那些鉴赏力极高的人也不会感觉太反感，那么我就有理由感到满足了。

尽管在引文中他对“鉴赏力极高的人”不乏微讽，但牛顿仍然希望他创作的圣诗不会令他们不快，不过，他自谦为“庸才”实则却是个天才。正如他在解释圣诗创作过程时所说的：

对于一位擅长将散文改写为诗的作者来说，在创作合宜于赞美诗的风格和方法方面，他有可能比一位诗人获得更大的成功，至少更容易成功。如果创作目的是为了公众敬拜或适于普通百姓使用，那么它们应该是“赞美诗”而非“颂诗”，应该更多地关注到诗的简洁、朴素和轻松，而诗的形象与风格，说实话，则应该得到慎重的渲染和筛选。

牛顿在圣诗创作中自觉地避开了那些夸张的语言和诗句。他是一位坦率为末流公众写作的二流抒情诗人，他希望创作的圣诗每一行都能让教民们朗朗上口、耳熟能详，因此明白晓畅和简单朴素是牛顿圣诗创作技巧的两大基石。在此基础之上，他建立了一套自己的韵律、节奏、句法和特选的词汇。《奇异恩典》完全符合牛顿对赞美诗创作的要求，从而成为成功之作。其诗句的韵律节奏如此清晰明了、众所周知，无需更多的评论说明；不过，有一点引人注意的长处是，《奇异恩典》有146个单词，其中单音节的词就有125个。

牛顿作为一个擅长歌词创作的作者，其艺术技巧难以企及，但它们只是《奇异恩典》灵感的次要来源，《奇异恩典》有两个源头——圣经文本和个人见证。

在动笔创作《奇异恩典》之前，牛顿就决定在1773年新年元旦的讲坛上宣讲《历代志上》17：16—17。这些诗句以大卫王向上帝的祈祷开始。此前不久，先知拿单告诉大卫上帝应许要让他和他的后代永远做以色列的王，上帝的慈爱祝福永远不会离开。大卫惊异于上帝彰显与他如此大的爱，他祈祷说：“耶和華上帝啊，我是誰，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耶和華上帝啊，你看顧我好像看顧高貴的人。”

无疑，牛顿在上帝对大卫王的恩慈和上帝对他的恩慈之间看到了属灵上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罪魁中的罪魁，他们都经历过狂风暴雨的不同寻常的传奇人生，他们都是不配上帝怜悯、拯救和施恩的对象。

牛顿选择1773年元旦这天作为一个日期以详细说明种种比较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他有个习惯，他把每个元旦都当作一个灵性自省的纪念碑，

但是这一次对他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碰巧出现在厚厚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在过去 21 年里，牛顿一直以这种方式记录着自己的思想。他的第二本日记是 1756 年在利物浦开始写的，那是一个四开大小 300 页的装订本。1772 年 12 月最后一天，他的厚重的日记本也到了最后一页。显然，在临近日记本用完的最后几天里，他又重新回顾了一番 1756 年以来的流水记录。在 1756—1772 年间，牛顿已经走了很远。当他开始在日记第一页写下第一笔时，他刚刚摆脱贩奴生意两年。因此，当他重新评价这段生活经历时，不难明白，他一定对上帝在他生命中的作为满怀感激之情。他用这样的词句总结自己的情感：

1772 年 12 月 31 日。在这些日子里，我经历了多少事！主用着怎样的方式来带领我啊！他向我显示了何样的神奇！这本笔记马上就写完了，我要为明年预备另一本笔记了。主啊，请悦纳我在以往岁月中对您的赞美，让我将未来的一切托付给您，祝福所有可能阅读这些文字的人们，让他们从中看到您的恩慈和我自己的罪恶。阿们阿们。

牛顿为奥尼教会预备的元旦布道讲章也是对 12 月 31 日日记中同一主题的拓展。在讲章开篇，他重点谈及上帝对他过去行为的怜悯宽恕，他对此的感恩；随后，他借用大卫早在 3000 年前的那句修辞性反问“主啊，我是谁？”也发出了同样的询问。他在刚刚创作的赞美诗中以自述的口吻清楚地回应了这个问题。因此，他声称公开显明的罪人“被这个世界的王弄瞎了眼睛”，直到“主的怜悯临到我们这群既不配也不寻求的人身上……但在他恩典的力量胜过我们之前，我们的心门一直紧紧地向他关闭着”。

牛顿经常以自己强有力的见证来形象地说明上帝的恩典之大，甚至早在 1758 年他第一次在约克郡不从国教教堂布道时就这么做了。如今，在创作《奇异恩典》时，他开始运用一种新的媒介——圣诗创作——在 6 段简短的诗句中把圣经的真理与自己的灵程经历形象化地融合在一起。

在《奇异恩典》中找到圣经的依据并不困难，灵感源起于牛顿用《历代志上》17：16—17 的内容预备的讲章。诗句开篇的“昔日迷失，今被寻回，盲眼重又得见”与福音书有清晰的联系。在浪子的故事中，那位父亲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路加福音 15：24）在《约翰福音》9：25，一个被耶稣治愈了的盲人告诉法利赛人说：

“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在后面的诗句中仍然可以找到有关圣经确据的相应回响。第4段中的“托庇”——“盾牌”（shield）很可能是从《以弗所书》6：16中“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的比喻中借用来的；第5段中的“圣殿”——“在幔中”引自于《希伯来书》6：19；第6段中大地如雪消融的景象来源于《彼得后书》3：12所描述的“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就像这些引用的经文所表明的，毫无疑问，《奇异恩典》是一位对圣经真实信靠的作家受圣经激发灵感创作的赞美诗。

这其中也有牛顿真实的个人见证。在诗作原稿中，第一人称——我、我的——出现了15次，这些人称代词并不能表明牛顿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他如此使用它们是为了以自己的信仰与得救的经历形象化地表现历史上无数个从起初到现在获得上帝拯救的信徒的经历。

《奇异恩典》对个人性维度的表现可以在牛顿大量的私人书信和日记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比如，他在1752年8月9日写道：“我不知道上帝为何要施恩于我，但有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后来，他在自述时认为自己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你的怜悯之深竟然能够宽恕如朱红丹颜之罪，你的恩典之大竟然能够柔化铁石心肠，胜过最顽固的恶习”。同一年，他给友人书信的末尾处这样写道：“我曾经深陷绝望的邪恶与惨境之中无力自拔，却被奇妙地释放拯救。我在思考他的作为时，似乎只能满怀惊奇地强调说：‘一个罪人竟得着如此浩大的恩典！’”

除了圣经和个人经历是《奇异恩典》灵感的来源外，牛顿创作这首圣诗的第三个动力是他希望能够回应公众的需要。并非所有聆听牧师在1773年元旦讲道的奥尼人都能完全理解《历代志上》17：16—17中大卫王所得恩典的含义，但牛顿的绝大部分听众却能明白《奇异恩典》的中心思想，它把圣经经文以更清晰、更简洁也更个人化的方式转述了出来。

还有一个个人维度在《奇异恩典》的创作中可能起到作用。在创作圣诗时，牛顿总是全心全意地满足会众的需要，有时这些需要是普遍性的，有时则是个人性的。1773年元旦，有一个人极需要明白上帝的恩典之大足以拯救罪大恶极之人，这个人就是威廉·考珀。抑郁症使他的精神陷入疯狂的漩涡，以至于他在几个小时后试图自杀。考珀发疯的主要原因是他从骨子里害怕上帝会不顾他的信心弃绝他。牛顿对朋友关于上帝弃绝人的偏执的悲观想法了解得非常清楚，他竭力劝导考珀说上帝的恩典是普遍的，绝不会从一个信徒收回，但抑郁症封闭了诗人对真理的理解能力。牛

顿一定很希望《奇异恩典》的内容（尤其是前面三句）能够消除考珀的恐惧和心灵的盲视，使他从精神疾患的危险与网罗中摆脱出来，投入到上帝恩典的保护中吧，倘真如此，那么他的期望并未实现。就像斯蒂夫·特纳（Steve Turner）在《〈奇异恩典〉：美国最受欢迎歌曲的故事》（“Amazing Grace”: The Story of America's Most Beloved Song, 2004）中所说的：“这似乎很不同寻常，那一天是牛顿第一次教大家唱这首圣诗，也是考珀最后一次参加教会活动……当牛顿写诗时，他难道记起了考珀吗？当他在布道词中做激动人心的保证时，他难道正在思虑朋友的衰颓吗？”

尽管“奇异恩典”有“激动人心的保证”，但考珀在听过1773年新年布道会后仍然没能感觉安心。不过，这首圣诗从此开始却激励了成千上万人的心灵，这个故事是如何发生的，约翰·牛顿若是知道一定会无比惊奇。

注释

[1]《奇异恩典》的中译版本较多，此处《奇异恩典》的歌词中译文录自网上赞美诗精选。——译者注

《奇异恩典》的影响

《奇异恩典》从奥尼小镇传遍全世界，从默默无闻到闻名遐迩，无论牛顿还是英格兰人对此都未做过任何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牛顿或者他的同时代英国人认为《奇异恩典》是一首与众不同甚至独一无二的歌曲。在此后 34 年的生活中，牛顿也从未在日记中重提这首圣诗；而且最直接的影响是，它差点儿成了牛顿创作的最后一首赞美诗。考珀的疾病带来的波折动荡使牛顿大受损耗，完全投入到看护之中，停止所有圣诗创作长达数月之久。失去一位天才诗人和合作者，牛顿毫无灵感。他写道：“有时一想到没有了他，我就无力再迈出一步，我甚为忧伤和失望，只能将竖琴闲挂柳树上。”

那年快结束的时候，牛顿有了第二个想法。他重新恢复了圣诗写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作了大量作品，没有再从考珀那里汲取任何灵感。1779 年，他出版了两人的合作成果《奥尼赞美诗》。就像在下一章将说到的那样，这本圣诗集立刻变成了一本畅销书，并且成为 18 和 19 世纪英语赞美诗创作繁荣的主要催化剂。不过，《奇异恩典》在这次繁荣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太重要，也没有人把它当作教会人士聚会时选唱的重要圣诗。在《奥尼赞美诗》中，它排在第 41 首，用了一个平淡的题目——“信仰的回顾与展望”。要是没有下一个 120 年，它永远不可能在英伦诸岛的教堂会众中流行开来。

尽管《奥尼赞美诗》作为一本圣诗集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迅速再版了40次，但《奇异恩典》作为一首单独的赞美诗几乎未引起任何关注。在18—19世纪的英国，它在其他印刷出版的圣诗集中只出现过一次。这唯一一次是在1780年的精装赞美诗集中，它在亨廷顿伯爵夫人赞助建立的独立教会小教堂里使用。亨廷顿夫人是著名的福音派信徒，被称为“循道会的圣特蕾莎”。她的赞美诗集属独家经营，标题上明确标称“赞美诗精选：专为亨廷顿伯爵夫人教堂公用，伯爵夫人自选”。相反，在1780—1900年间，英国圣公会广泛采用的52本赞美诗集中没有一本收入了《奇异恩典》。在自己的国度，这首圣诗毫无名气。在19世纪末叶，《赞美诗辞典》（1892）的编辑者约翰·朱利安致力于英语赞美诗的工作，他察觉到这种对《奇异恩典》“漠然”的态度，他以贬抑的口吻说道，“在大不列颠，它不为当代编辑者所知，在美国它却广为流行，而这远不是牛顿作品的典范之作。”

英国人对待《奇异恩典》的漠然源自于英国人对待宗教的慎重态度。尽管圣公会严禁在圣殿中唱赞美诗的禁令在19世纪初被解禁，但国内的属灵文化仍然保持着对宗教“狂热”的警惕——即使是在最一般意义上使用这个字眼。除了浸信会、循道会、摩拉维亚弟兄会和其他独立教会信徒支持的相对比较少的不从国教教会，在英格兰，主流宗教传统上认为在赞美诗演唱中流露过分热情或情感的敬拜仪式是不合宜的。

然而，当《奇异恩典》在牛顿的家乡日益衰落之时，它却在大西洋彼岸被广为传唱。这种普遍流行缘于美国拥有的非常不同的宗教文化，那些教堂的会众，尤其是最南部的信徒特别喜欢投入全部的热情演唱赞美诗。牛顿的歌词如何与他们的情感产生共鸣，从而使《奇异恩典》变成一首伟大而著名的圣诗，这是这个故事的重要部分。

《奥尼赞美诗》第一次出版是在1790年的纽约，第二版也是在同年同地推出，第三次印刷则是在18世纪末的费城。第一本收入《奇异恩典》的大众赞美诗集是1789年北美改革宗荷兰教会出版的诗篇和赞美诗精选。有一些新英格兰的赞美诗集很快把《奇异恩典》纳入其中，到了19世纪30年代，牛顿的诗歌已经在所有重要教派的教堂中传唱了。这首圣诗在奋兴会中普遍流行，许多人在这种集会上悔改信主。《奇异恩典》之所以如此普及，是因为它是从悔改中涌流出来的属灵情感的火热表达——对往昔罪恶的悔恨、对上帝的感恩、对上帝赐福的新生命的欢喜。

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宗教复兴运动，往往伴随着音韵和谐的复兴音乐，

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福音音乐。今天《奇异恩典》的用词和配乐是密不可分的。这种统一是如何达成的呢？这个过程约翰·牛顿丝毫未参与，所有一切可能都是由他早年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那些奴隶的后裔们做成的。

牛顿写《奇异恩典》和他创作所有赞美诗一样，头脑里并没有旋律。他只是一个作词者，为那些大家熟悉和具备各种旋律变化的曲调配词。18世纪70年代，在奥尼的大宅，这些配乐通常是英国民间歌曲，为参加祈祷会的儿童和成年人所熟知，但寻找一个适合歌词的旋律的过程与其说是为了音乐毋宁说是为了教导。奥尼那些敬拜活动的带领者们，比如玛丽·尤文，她提供的音乐教学法只是为了牢记牛顿的歌词，以帮助会众理解和消化赞美诗中的属灵含义。

在美国复兴运动中，福音音乐与福音歌词间的配合并无主次之分。至于《奇异恩典》的词曲相配则被认为是出于天意，浸润着神秘与浪漫，而且许多人都相信这是上帝亲自指导的结果。

现在《奇异恩典》一直采用的曲调被称作“新不列颠”（New Britain），没人知道它的出处。1835年以前，它从来没与圣诗联系在一起过，它突然流行源于一位著名的圣乐作曲家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他是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歌唱教师。他编写的那本曲调动听的歌集《南方之韵》（*Southern Harmony*）第一次出版就为牛顿的赞美诗歌词配上了如今为人所熟悉的旋律。在此之前，这首赞美诗的歌词被配以不同曲调传唱，但是因为《南方之韵》自1835年出版后10年内销售了60万份（这个数字令人惊讶，因为当时美国人口只有230万），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了《奇异恩典》歌词的固定配乐。

在《奇异恩典》的传奇史上，威廉·沃克的地位仅次于约翰·牛顿。他在南方旅行时开始编辑搜集来的乐曲，凭着一双敏锐的耳朵，他把旅行中听到的音乐记录下来；他也在现存的赞美诗集中进行挖掘，有些曲调与他在《南方之韵》中为牛顿的歌词编配的旋律颇为相似。为歌词配曲的实际过程可能只是一种猜测，因为众所周知的“新不列颠”的调子在19世纪初的美国南部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旋律。不过，在猜谜活动结束之际，再没有谁像斯蒂夫·特纳那样对威廉·沃克“显示的真正的才华”如此赞赏了：

不但歌词与音乐所需要的空间紧密配合，而且音乐更强化了歌词的内容。仿佛曲调一开始就与歌词一起写好了似的。“奇异”背后的

音乐令人油然而生敬畏之感，“恩典”背后的音乐听起来十分优美。在忏悔的转折处有一个上升点，似乎作者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开始，正要进行一场勇敢的宣告，而当他承认自己不过是盲目瞎眼时，曲调就相应地下降了。

因为威廉·沃克在《奇异恩典》的传奇中所起的作用，人们把所有的荣誉都赋予了他。但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只是一个技艺熟练的编撰者，一段神奇地出自美国南部文化中的旋律的普及者。那是谁的文化呢？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是非洲—美国文化，其宗教传统中包括从罪大恶极的生命转为充满感恩的生命等关乎信主的许多深情动人的歌曲。这种非洲—美国的福音旋律的搜集以种植园歌曲而闻名，这是沃克主要的来源之一；人们自然能够通过追根溯源从这套曲子中找到《奇异恩典》的旋律。不过，这些源流最鲜明清晰的标志也许不是在此阶段的美国音乐而是在美国文学中找到的。

1852年，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出版了经典的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其中一段极富于启发性且具有史实色彩的文字就提到《奇异恩典》。在小说第38章，受尽屈辱的黑奴汤姆躺在余烬渐熄的火堆边，经历着“属灵的危机”。在自己的苦难中，他看见了那位受苦的基督的形象，他听见一个声音告诉他总有一天他也会满披荣耀。以下这段就出自《汤姆叔叔的小屋》：

汤姆仰望满天星斗，这些永恒之物静默无声，仿佛天上的众使者俯看着人类；他唱起了一首歌颂胜利的赞美诗，在过去快乐的日子他经常唱起它，这歌声打破了寂静的夜空，他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放声高歌——

大地即将，如雪消融，
太阳终会陨落。
唯有上帝，与我永在。
声声唤我依托。

身心可朽，生命可绝，
圣殿巍然不毁。

寄身其间，平安喜乐，
人生圆满丰沛。

这里出现两处引人注目的创新，使得 1852 年《汤姆叔叔的小屋》版的《奇异恩典》不同于 80 年前即 1772 年牛顿《奇异恩典》的原始版本，其中第一个差别是，两段赞美诗开头“身心可朽，生命可绝”与“大地即将，如雪消融”的次序发生颠倒，这也许是由于哈里特·比彻·斯托（她的姐姐是一位著名的公理会赞美诗作家）的文学感觉，她想表现汤姆从基督神圣的异象中醒转过来内心的激动慌乱；或许斯托将诗节颠倒是为了反映 19 世纪早期非裔美国人敬拜的真实情况，黑奴们在沿袭种植园先祖们口头传唱的赞美诗时，经常会弄乱诗节的次序。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创新是《汤姆叔叔的小屋》为《奇异恩典》增加了一段全新的结尾诗节。这段新的结论性的诗节并非出自牛顿之手，而且在先前任何一个《奇异恩典》的版本中都不曾出现过。这段以“天堂盛景，垂世万载”开始的四句诗已经在非裔美国人的敬拜活动中被口头传唱了近半个世纪，它们是从当时经常在弗吉尼亚传唱的著名圣诗《耶路撒冷，我的快乐家园》(Jerusalem, My Happy Home) 中选取的一段。这段被当作《奇异恩典》结尾句的诗节是由爱德温·奥赛罗·埃克塞尔 (Edwin Othello Excell, 1851—1921) 最后确定的，他是一位著名的复兴运动人士和敬拜带领者，他的传记作家描述说“他浑身充满了音乐，似乎他曾经吞下去一个管乐队”。1910 年，埃克塞尔出版了一本畅销圣诗集《加冕礼赞美诗》(Coronation Hymns)，首次在牛顿原来创作的前三节后加入了新的诗句。这个混合版本成为 20 世纪人们公认的《奇异恩典》的样式。

20 世纪中叶，《奇异恩典》从福音歌曲变成了流行歌曲，这场运动的先驱是米哈利亚·杰克逊。1947 年 12 月 10 日，米哈利亚为阿波罗唱片公司录制了《奇异恩典》，它给收音机前的听众、那个时代购买录音带的民众和后来改变了政治意识的美国黑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米哈利亚·杰克逊是小马丁·路德·金的朋友和支持者。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他在金领导下的为获取公民权的游行示威集会上演唱《奇异恩典》。杰克逊写道：“在那些动乱的日子，我演唱《奇异恩典》，把它当作获取神奇保护的圣符，它有驱除危险的能力，一个让天使降临的秘诀……我不敢确定它在教堂大墙外……密西西比的公开会场上也会有神奇的效果。但我次次都蒙福。”

另一位在“教堂大墙外”演唱《奇异恩典》的偶像级歌手是茱迪·柯林斯（Judy Collins），她把这首圣诗当作她1970年专辑《鲸鱼与夜莺》中的最后一曲。1971年1月，柯林斯演唱的《奇异恩典》单曲在排行榜中上升到第15名，在《广告牌》杂志连续11周名列最受欢迎的40首歌曲中。柯林斯说这首歌“是抵挡死亡、反对狂野战争的神圣法宝”。这表明，作为一首赞美诗，它的政治用途正在增加，被反对越战的各派所使用。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奇异恩典》的录制出现了大量新的变体。令人印象最深、难以忘怀的一个版本是苏格兰皇家近卫龙骑兵团的风笛演奏，它曾经荣登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第1名，在美国音乐排行榜中攀升至第11名。曲调沉郁哀婉的风笛版演奏使人们对《奇异恩典》产生了新的认识——它的忧伤舒缓适于在悲悼的场合使用，于是，它被广泛用作葬礼圣诗。最初这么使用它的就是茱迪·柯林斯。1992年1月，她在儿子克拉克自杀去世的追思会上演唱了《奇异恩典》。1999年7月，在为小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 Jr.）举办的追思弥撒上，这首圣诗成了纪念活动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例子使这首圣诗不断反复地传唱成千上万次。不过，也有证据表明，《奇异恩典》也经常欢喜快乐的教会崇拜、婚礼、洗礼、周年纪念会中使用，在某些重要的公众场合从棒球赛开场到国家哀悼日，人们都会唱响这首圣诗。就后者来说，曾有两次历史性的悲剧事件纪念会演奏过《奇异恩典》，一次是1986年“挑战者”号航空飞机失事，多名宇航员牺牲；一次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纽约世贸大厦废墟中3000人殒命。

从当代的历史和应用来看，《奇异恩典》有时会被称作“美国的属灵国歌”。作为对经历恩典的一种朴素的赞美，这首圣诗超越了重重界限，在全世界广泛地被传唱。在这种意义上，它不仅被基督徒也被犹太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和无特别信仰人士所传唱。

倘若约翰·牛顿得知他在大约225年前为奥尼教民创作的圣诗今天已经流行于全世界，他当年为了给乡村布道提供例证而创作的赞美诗竟然会成为一首全球性的圣诗，他一定会惊叹不已。尽管《奇异恩典》有那么杂乱的产生背景，在流行期间又有那么多的变体，但这丝毫也未降低约翰·牛顿原创诗作中包含的三种最高贵的品质——朴素的语词、美好的情感和诗人对恩典之灵性的深刻理解。

赢得友谊和影响大众

在奥尼的最后几年，作为一个属灵智者和福音领袖，牛顿的名声得到了巴克汉姆郡教区之外的认可。他的事工在几个方面不断地受到重视，其中包括与国内平信徒和牧者之间友谊联络的扩大、书信往来的增多以及牛顿的作品尤其是《欧米克隆》（Omicron, 1771—1774）和《奥尼赞美诗》（1779）博得赞许和认可。

牛顿在与人友爱相处方面颇有恩赐。在妻子波琳和三位居家仆人的支持下，他把牧师府变成了一个好客之家，接待大批长途跋涉前来拜访的客人。这当中，最重要的一位客人就是汉娜·威伯福斯太太（娘家姓桑顿）。她是牛顿的赞助人约翰·桑顿同父异母的妹妹，她和哥哥一样，是一位热心的福音派信徒。1764年，汉娜·威伯福斯与牛顿第一次见面。她和丈夫抚养了侄儿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他9岁时父亲意外去世，他便在温布尔登的伯伯家中长大。这位威廉·威伯福斯日后变成了赫尔市（Hull）的国会议员，并成为废奴运动领袖。早在学生时代，威廉就与伯母汉娜去过奥尼的牧师府，那儿的主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牛顿与威廉进行过一番长谈，主要谈及信仰，谈他如何从一位奴隶贩子转变成上帝的仆人。类似的话题牛顿对许多客人都讲过，但这番谈话对年轻的威廉·威伯福斯的影响之深远简直无出其右，正如下一章将要表达的，约翰·牛顿和国会议员威廉·威伯福斯后来的联系就体现在那场对信仰、政治和历史都极为重要的废奴运动中。

尽管有许多平信徒像威伯福斯一样兴致勃勃地赶到奥尼来拜访牛顿，但他的常客多数是牧师，是一群福音派的教区牧师或者像他们自己喜欢自称的那样是福音真理的宣讲者。在18世纪的英国圣公会，他们属于弱勢群体，有时还会受到各种攻击。对他们来说，寻找一位属灵的伙伴和同道是很自然的事。牛顿作为传道人和作家的名望使他在18世纪70年代中期福音运动中成为一位元老级人物，因此，有一批固定的牧师来访者从远至康沃尔郡和苏格兰的地方赶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群体。他们中包括预备领受圣职的申请人、来自独立教会的牧师和圣公会中自由派和福音派两派的牧师。

这其中一位自由派的牧师就是托马斯·司各特（Thomas Scott, 1747—1821），他强烈反对福音派的教义。尽管他们在神学观点上有严重的分歧，但牛顿却逐渐地赢得这位同事对福音真理的福音派观点的支持。司各特原本想挑起一场激烈的辩论，但牛顿却以友爱和为他祈祷来回应这件事。1779年9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昨天与司各特先生一起喝茶。两年前，我们就通信往来了好几个月，我自那时起就满怀坚定的期望，看到您的恩慈良善在发挥作用，我是何等地欢喜快慰。尽管他的观念那时仍处于黑暗之中，他差不多拒绝所有的建议，但我知道您已经赐予了他一颗诚实的心灵，我期待这是您更深的恩典的标志。现在，他似乎得到了光照，并对福音最重要的部分有所理解，我相信在您的手中，他必会成为一个大用途的器皿。

托马斯·司各特果然被证明是“一个大用途的器皿”。在他后来的生涯中，他成为一位著名的福音派作家、布道人和圣经注释者，同时也是英国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和英国教会传教士协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创建人。司各特偶尔也在奥尼教堂布道，这使他最终于1781年成功接任牛顿成为奥尼的教区牧师。

牛顿对托马斯·司各特的影响是他努力以福音服侍许多来访者和通信者的一个典范。当这种影响日益增加时，书写大量信件对他就变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18世纪70年代中后期，牛顿处于疲惫、躁动和属灵倦怠期，他的教牧活动和更广泛的事工一起增加，令其难以招架。他在1773年的日记中记录了低谷时期的一个瞬间——“平静之下，一切都是冲突纷

乱的”。在充满挫败感的痛苦的呐喊中，牛顿给朋友威廉·布尔写信说：

繁杂之事太多，我很少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来信需要回复，访客需要接待，事工需要参与。我有好多羊和小羊需要照管，生病的和痛苦的灵魂都被主所珍爱……在各种各样的事务中，我刚过中午，夜晚就来临了；就我的工作状态而言，刚刚不过是周二，一周就结束了。

这些压力有一部分是牛顿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从一位私人通信者成为一位公众的书信牧师，这就是《欧米克隆》的出版。

《欧米克隆》最开始是牛顿以个人名义回复大量公众来信，他们就普遍存在的问题向他寻求属灵建议。这些信件随后被匿名发表在一本福音派期刊《福音杂志》(*Gospel Magazine*)上。从1771年到1774年，这本杂志陆续刊出了26封这类署名“您的朋友和福音的执事 欧米克隆”的回信，这种匿名方式在福音派的群体中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一位早期的书信读者是约翰·贝里奇(John Berridge)，他立刻认出了作者是谁。他写道：“欧米克隆就是牛顿先生。他戴上了一副面具，却隐藏不了他的面孔。简洁有力又坦率真诚的文风泄露了这位奥尼牧师的真实身份。”

欧米克隆(即希腊语 Ω)，又称作牛顿，是一位知识渊博、感情激烈的大叔。许多信徒向他寻求有关教义或者生活经历的个人指导，他通常在《福音杂志》的专栏中对一些大家共同感兴趣的事进行回应。

《欧米克隆》的特点就是以文学体裁表述正常且共同的属灵感受，其中融合了朴素谦逊的率直和巧妙得体的坦白。这种谈话体的文风与牛顿同时代人塞缪尔·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的书信有所呼应，不过，在神学本质上，它们更接近圣保罗的牧养书信。

要理解《欧米克隆》为何会赢得如此众多的读者群，我们有必要检视第10、11和12封信，这一系列信件分别命名为“论苗的恩典”、“论穗的恩典”和“论饱满的子粒的恩典”。它们是牛顿对信徒在属灵生命成长中经历的几个关键阶段的思考，它出自《马可福音》4:28的经文——“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子粒”。

牛顿在三封信中讨论的问题是有人在属灵成长之初，都处于原罪之中，因此凭借自己的努力无法接受上帝的恩典。然而，因着某些个人化的经历或者环境比如一场突然的变故、一种祈祷的体验或者悟性的灵光闪动

等等，个体就能够开始靠近耶稣并接受恩典。不过，尽管“在一种全然陌生的情况下因某种对灵魂的光照”而使个人大受震动，但他仍然对恩典保持着孩童般天真烂漫的状态，牛顿把这种人标称为 A。“A”被召唤趋近上帝，其方式和原因令人几乎无法理解。牛顿写道：“A 处于萌芽期，他的信心虽然微弱，但他的心却是温暖的。他很少敢冒险像一个信徒那样思考自己，但他观看，感受，并做那些若非主同在就无人能行的事。”

第二封信的题目是 B 或者“穗的恩典”，指从孩童样的欲望过渡到成年人的冲突挣扎阶段。牛顿描述说 B 要接受来自上帝的击打和试炼，当 B 经历试炼和试探时，他会纠缠于那些显然曾经令牛顿大为困扰的新的罪中，比如“属灵的骄傲、依靠自己、虚荣的信心、人意突发的信念和一连串的邪恶”。逐渐地，B 看到上帝的试炼和圣灵的工作正在“一个让他更深地认识自己和上帝的过程中”训练他成长。一旦开始理解了上帝的无上的恩慈怜悯，B 就学会了如何更深地去爱和宽恕他人。当 B 到达爱和宽恕的阶段时，他的心灵结构就会变得完全，他就会停止自夸、抱怨和责备他人。这时，他将准备好进入 C 或“饱满的子粒”阶段。

在系列书信的第三封中，牛顿描述 C 处在一种沉思的状态，这意味着他接受了自己全然依靠上帝并认识到自己全然软弱。C 使自己的意志降服于上帝的旨意，他全心关注默想的只有基督的荣耀。C 这么做时，他就在谦卑、灵性、爱上帝和温柔待人方面有长进。他既是圣爱的对象，也是圣爱的典范，在永恒的荣耀中他日益成熟。牛顿在第三封信中总结道：“幸福的 C！他的劳苦、疼痛和磨砺很快就要结束了，不久他的愿望就将得以满足，爱他救赎他的那一位将接纳他，并对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没有哪种阐释能够如实地传递牛顿在三封书信中对恩典进展阶段的表达，它们丰富地运用了圣经中的意象，而且具有一种便于实践的力量。在这些书信中，牛顿表达了他对灵程重要阶段的理解，那就是理想的基督徒的旅程就是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上帝为中心。尽管牛顿试图不在书信中暴露个人经历，但无疑，他还是十分依赖自己的经历和洞察力的。很明显，牛顿在第二封信中谈及 B——一个身处冲突挣扎中间阶段的灵魂时，他使用第一人称的频率要远远高于其他两封使用第三人称居多的信。这表明牛顿在写作过程中把自己当作了角色 B——一个仍然在上帝的试炼中挣扎战争的属灵行者，而远非 C——一个已经到达更安定也更单纯的恩典庇

护所的完美的朝圣者。

牛顿收在《欧米克隆》中的书信不只是对恩典的阶段和状态的分析。1773—1774年间，有26封信发表在《福音杂志》上，通常都位居重要位置，这些信仰题目包括“论试探”、“论属灵的盲目”、“给一位大病初愈的朋友”、“论福音的阐释”和“论与上帝的灵交”。1775年，这些被印刷出版的书信一下子就有了好几个版本，其中包括荷兰语版本。这次成功给牛顿带来了很大的鼓励，他进一步扩展了给公众的信，把它写成一本更厚的书，书名为《心声或内心的倾诉：真实通信录》（*Cardiphonia, or the Utterance of Heart: In the Course of a Real Correspondence*）。1779年7月24日，在开始整理这部书稿之时，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已经着手校订我的书信，如果上帝看为合宜，我就把它们编成下一本书出版。我反复阅读多次（原稿转录或复制品），感觉真是羞愧无比！唉，那些被我轻易解释给他人的真理对我自己的影响是多么微弱啊！拿我向别人提供的建议和警告来省察自己，真是亏欠多多啊！

尽管牛顿的羞愧绝对真实，但他在属灵传播方面展示出极大的才华。他最先在影响巨大的《真实的叙述》中采用文学形式出版私人书信，这种文体在今天看也许不乏造作之嫌，但在18世纪的读者眼中却相当自然，就像我们今天读社评和杂志特写一样。牛顿终其一生共出版了500多封信，这使他成为英国关于信仰问题的重要的福音派评论家。在这方面，他开拓了一项崭新的事工——通过出版书信进行属灵指导。

牛顿的书信〔其中部分信件是以第二个假名——维基尔（Vigil^[1]）书写的〕对专家和普通民众具有同样的吸引力。这些专家很喜欢到奥尼去拜访牛顿，其中包括来自赫尔的学者艾萨克（Isaac）和约瑟夫·米尔纳（Joseph Milner），从哈德斯菲尔德搬到耶琳的教区牧师亨利·维恩·哈利·特里劳尼（Harry Trelawney），从牛津搬到奥尼居住的牧师候选人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贝尔福德班扬聚会所的牧师约西亚·西蒙斯（Josiah Symonds），还有同样来自贝尔福德的摩拉维亚弟兄会的牧师约瑟夫·福斯特-巴哈姆（Joseph Foster-Barham）以及来自北安普敦的浸信会牧师老约翰·里兰德（John Ryland Senior）和小约翰·里兰德（John Ryland Junior）。

牛顿与浸信会、循道会、摩拉维亚弟兄会和独立教会信徒之间进行频繁的联系与合作，对于英国圣公会的牧师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在奥尼，牛顿不断地与城里其他教派的领袖共同分担服侍，尤其是刚刚被按立的浸信会牧师约翰·萨特克利夫（John Sutcliff）和公理会牧师约翰·怀特福德（John Whitford）；牛顿也经常到雷切斯特、贝尔福德、麦尔顿·莫伯雷和北安普敦的独立教会为会众讲道。这些活动使他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地区福音联盟的关键人物。在这个联盟中，他最亲密的朋友就是新港—佩格奈尔（Newport Pagnell）独立教会牧师威廉·布尔，此地是白金汉郡的大镇，距离奥尼南部6英里，有2000位居民。

在同一年——1764年，布尔和牛顿开始各自就任新港—佩格奈尔和奥尼的牧职。两个人在传福音的使命和个人性情上有一种天然的相互吸引力，两位邻居原本很可能迅速成为朋友，但据布尔的儿子托马斯所说，因为“起初不实的传言”使两人有十多年彼此冷淡。一旦不实的传言被澄清，冷漠迅速化解，转而成为牛顿生活中最温暖的一份友谊，仅次于他与威廉·考珀之间的亲密关系。

尽管创作了丰富的作品与讲章，牛顿仍感觉自己才智有限，这可以追溯到他正规教育的缺乏。他曾经用多年时间通过自学以补足学校教育，但他仍认为自己比不上那些科班出身的人。正像他深受考珀卓越的头脑吸引一样，他也受到了威廉·布尔的吸引。布尔多才多艺，神学知识渊博而且性格乐观。他和牛顿都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对福音的热爱、共同的幽默感和对烟斗的嗜好。在18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成了密友。牛顿给布尔写信说：“我爱您；我喜欢您的陪伴，因为我相信主通过您向我的内心说话，所以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看到您。”布尔后来以同样的深情表达他们的友谊的特质，他写信给牛顿说：“有时我认为没有人爱我，这让我非常沮丧。但我知道您是爱我的，我敢确定约拿单对大卫的爱也不会超过我对您的爱了。”

牛顿和布尔之间的亲密友情之核心体现在祷告、读经和神学讨论上，这也是一种关爱的友情，因为布尔每到深冬就容易变得消沉和忧郁。牛顿会很巧妙地借用揶揄、大笑和在长谈中快活地享受烟斗等方式帮助朋友从那些情绪中走出来，牛顿约布尔见面时曾在几行打油诗里抓取了这些有趣的细节：

B老兄衔着通神大烟斗

坐在最喜欢的树荫下头
真是快活无比精神抖擞！

幸福、快乐和玩笑是他们友谊中令人愉快的因素，与之相平衡的是，在承担重要的布道、创作和神学研讨时，两个人的彼此陪伴还带来了相互的激励。从1779年5月开始，布尔经常在奥尼大宅的祈祷会上做教导；牛顿经常会在多卷书信集中把友人教导的主题收纳进去，这包括他给布尔本人（写了120多封信）和给其他人的书信。这位来自新港—佩格奈尔的牧师对奥尼的教区牧师影响之大令波琳·牛顿忍不住揶揄丈夫说：“我觉得布尔先生成了你的教皇。”

威廉·布尔当然与任何一位教皇都没什么相似处，他后来在新港—佩格奈尔建立了一间以加尔文神学为基础的不从国教学院，他在牛顿的生活中起的作用很像一位父亲。牛顿一度身陷众多事务的重负中，他要进行创作事工，承担牧养的任务，善意地接待大量的来访者，他需要鼓励和指导。布尔帮助他把这些事工分门别类、排列优先次序。正是因为有了布尔的鼓励，牛顿才在事务日程中重新开始赞美诗的创作。1773年1月2日也就是牛顿最著名的圣诗《奇异恩典》第一次在奥尼唱响之后的次日，考珀试图自杀，结果，这项创作事工停顿了好长时间。

在考珀试图自杀和情绪抑郁的日子里，牛顿一直看护他，偶尔会鼓励劝勉他的朋友与他重新联手进行赞美诗的写作，但考珀拒绝了这些建议，他写道：“别要求一个像我这样遭受绝望折磨的人创作赞美诗吧，我无法吟唱主的诗歌来拯救自己的生命。”牛顿最终接受了考珀的决定，他独自一人劳作，编辑那本已经为人熟知的《奥尼赞美诗》。1779年2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慈爱的主，今天，我祈求您祝福我完成这些圣诗，好赶在周一把赞美诗集拿去印刷。满有恩慈的上帝啊，愿您悦纳这些作品。我真诚地把它奉献给您和对您的服侍，我相信您的圣灵必将扩大它的影响。无论我自己、我所有的还是我所做的，一切都出乎您，因为我自己真的是一无所有。

约翰·桑顿是牛顿的慷慨的赞助人，正是在他的鼓励之下，《奥尼赞美诗》的印刷发行工作才得以迅速推进。他承诺支付印刷费用，并分发首印的1000册诗集，这个举动在那些一向对赞美诗毫无兴趣的书商和购书

者当中产生了多米诺式的影响。《奥尼赞美诗》初版售价 2 先令 6 便士（约合现在 50 分或 12.5 便士），一年之内就突破了 5 版。牛顿在简介中说他希望这本书能够“促进真基督徒的信心并得到慰藉”，这个目标以令人炫目的方式实现了。1779 年初版之后的 100 年间，《奥尼赞美诗》出现了 40 多个版本，印制了 50 多万份，在英国圣公会内外广为流传。在英国圣公会对待圣诗演唱采取新的态度方面，这本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正像牛顿自己那样，这本书也吸引了各宗派广泛的读者群。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奥尼赞美诗》成为浸信会、循道会、路德宗、独立教会、福音派教会甚至天主教信徒崇拜仪式上的标准诗歌本。1849 年，罗马天主教赞美诗作家弗雷德里克·费波尔（Frederick Faber）在论及《奥尼赞美诗》对他自己的教会产生的令人惊奇的影响力时说：

它的文学性略显不足，诗律也过于单调，但实际上，简单重复的韵律反倒往往表达得更充分；其魅力似乎也正在此。天主教徒经常在《奥尼赞美诗》的诗句中找到虔诚的沉思和意外的喜悦。

天主教对赞美诗的批评如文学性“略显不足”和“诗律过于单调”等等都属公平之论，因为《奥尼赞美诗》是一个混合的产物。牛顿的大部分作品很可能都是急就章，所以不难理解该书虽收录过他的 281 首圣诗，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已经被人们忘记了。有些圣诗几乎就是打油诗；相反，所收录考珀的 67 首圣诗（标明字母 C 的）却都是高水平之作。然而，作为一位赞美诗作家，牛顿却能够享受超越巅峰的荣誉，这在前面的章节中，通过对《奇异恩典》具有的非凡影响力的分析就可以看到。人们也普遍认为从作品的深度来看，它也是牛顿创作的最高成就。牛顿的许多圣诗崇拜者还会把诸如《耶稣之名何等甘甜》（How Sweet the Name of Jesus Sounds）、《愿救主基督之恩降临》（May the Grace of Christ Our Saviour）、《我的心，你要安静！》（Be Still My Heart!）等放到最受欢迎的圣诗排行榜中。当然还有不少人相信从神学和文学角度来看，牛顿写得最好的赞美诗是《有荣耀的事乃指你言》（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它通常被配以牛顿同时代作曲家弗朗兹·海顿（Franz Haydn）谱写的曲调庄严的《奥地利》（Austria）演唱。在那段音乐安排中，如果不以吸引会众多少来比较，那么《荣耀的事》就其卓越而言至少与《奇异恩典》是不相上下的。在《奥尼赞美诗》的第一部分中，这首排在第 50 位

的圣诗标题是《圣经选段》(On Select Passages of Scripture)。这首赞美诗是牛顿在阅读《以赛亚书》33章、《诗篇》87篇和132篇后从圣经中得来的创作灵感。这四段最常被演唱的诗句让人看到牛顿作为一位令人难忘和大有能力的圣诗诗人偶然一现的天赋：

有荣耀的事乃指你言，
上帝之城啊锡安，
他的话永不改变，
他建立你做他的居所；
在古老的山石之上，
谁能摇动你的平安？
拯救之墙环绕你周围，
面对敌人你必欢笑无畏。

看哪，活水滔滔如河，
从永爱奔涌而出，
充充足足喂饱你的儿女，
一切的惧怕尽皆消除：
永生之河滋润了干渴，
还有谁会软弱仆倒？
主所赐福的恩典，
代代涌流永不干枯。

在每一处居地起停，
都必看见云火之形，
它们在荣耀和荫蔽处，
昭彰主的同行：
白日云柱晚间火柱，
它们的旗帜炫目鲜明
每当他们祈祷俯伏，
他就赐吗哪自天而临。

锡安城的教主啊，

我是你恩典的子民，
 就让世人叹息或嘲笑，
 我因你的名得荣耀：
 这世界的情欲必将失色，
 所有的夸耀都将败落；
 唯有锡安的儿女知晓
 真实的欢喜和永恒的至宝。

任何一个人在演唱或思考这首 18 世纪英语圣诗杰作时都一定会发现，很难否认这首作品有可能得到了上帝的恩典与灵感祝福。1779—1780 年间，当《奥尼赞美诗》修订再版时，《欧米克隆》（1774）和《心声》（1780）也从印刷机上一本接一本地印出来，很自然地，他们的作者约翰·牛顿在福音派信徒和全世界其他基督徒读者中正在赢得持久上升的美名和影响力。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在奥尼的名声却遭到了重挫，原因是他卷入了一系列地方和国家的争论纠纷之中。

注释

[1] Vigil 英文原意为“守夜”，它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拼写不同。——译者注

卷入政治？

牛顿最初卷入国家纠纷源起于 1775—1776 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批评他的人认为他反对战争并同情美洲殖民者；事实上，至少在私人通信中他态度是较为公正无私的。战争开始之初，他给约翰·桑顿写信说：“在我看来，两边都有让上帝不悦之处。”不过，一旦他创作了一首赞美诗，描述英格兰试图镇压“罪恶大陆”上的起义行动，其罪行将带来至高者的圣怒，他的对手们便开始找他的麻烦。牛顿必须从这种麻烦中脱身，因为他赖以生存的奥尼教区属于达特茅斯伯爵。伯爵是诺思首相的内阁成员，战事爆发时任美洲殖民地事务大臣。无论怎样解释或误读牛顿关于战争的立场，这段插曲都让人明白，牛顿的政治良知是在当时的争执中被唤醒的。

1775 年 5 月 31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晚上，报纸报道了新英格兰的战况，两边都死了不少人。我恐怕这只是哀痛的开端。唉，但愿我对自己的所见所闻能有合宜的表现。”这篇日记开头指的是在康科特（Concord）和列克星顿（Lexington）的战役，第一场重要战事发生在马萨诸塞省民兵组织与托马斯·盖格将军在波士顿司令部指挥的四支英国兵团之间。美国独立战争突然爆发，牛顿显然感觉应有“合宜的表现”，因此他建议教区居民每周到大宅参加一个额外的聚会为战事祈祷。尽管时间定在了凌晨 5 点，但奥尼城内仍有 200 多居民参加了祈祷会。牛顿评论道：“尽管我们在 5 点钟举办聚会，但赶来参加的人比晚上聚会的还多。”在下一个礼拜天，6 月 11 日，他通过讲台宣召更多的参与者加入特别为战争祈

祷的聚会。他写道：“晚上，我对这个国家过去和目前的情况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概述，号召大家参加我们周二早晨的聚会，让他们了解当前危机的重要性。为这次活动创作了第 207 首圣诗。”

牛顿创作的这首圣诗后来在《奥尼赞美诗》第二集中标明为第 64 首，他在其中清楚地表明了反战的态度。其标题为《写在美洲战争爆发之日》(On the Commencement of Hostilities in America)，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八段表达了基于圣经的反对信息：

黑云沉沉压城
 风暴即将来临
 啊！唯愿藏进方舟
 躲避震怒雷声！

看那天使满面悲戚
 扬手擎举降灾之杯
 满盛圣怒倾注
 邪恶满盈的大陆！

瘟疫已经爆发
 战火已经燃起
 付上血与利的同胞
 如今抗击的是自己的兄弟

愿我们同心合意
 在宝座前俯伏屈膝
 为国为教会 为我们自己的罪
 流泪哭求忏悔

这首赞美诗中最富戏剧性的词语出现在第二段。牛顿在注释中清晰地标明，那位正从一只大碗里倾倒圣怒于“邪恶满盈的大陆”的受命天使出自《启示录》16 章开始的段落。在这段圣经经文中，从殿里传来极大的声音命令天使把盛上帝圣怒的碗倒在地上，以审判他们流圣徒之血的罪。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个观点，牛顿在注释中还指明，第三段的瘟疫典出《民

数记》16:46:“因为有忿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要知道,牛顿写圣诗的目的是为了教导,对圣经经文进行深入解释,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有些奥尼教民会认为他们的教区牧师在圣诗中所说的上帝的愤怒审判将临到英格兰,因为它流了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血。

在此之前,牛顿在自己的生活中从未扮演过政治人物,他的性情和倾向使他成了一个稳健的中立者,头脑清醒冷静,不爱出头,甚至身处教会的纷争中依然如此。但是在这首圣诗中,他却因政府和英国圣公会(它是国王和政府在面临危机时坚定的支持者)在镇压美国殖民地的战争中各自所起的作用,而公开谴责他们的罪行。牛顿何以会如此呢?

奥尼及周边地区人民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情绪日益高涨,这种情绪中有一个历史背景。17世纪,牛顿在奥尼的前任教区牧师威廉·伍斯特放弃此处的教职,移民到新英格兰。他离开的原因就是对英国圣公会等级制度不满。为了寻求更大的宗教自由,伍斯特成为马萨诸塞省索尔兹伯里市第一位牧师,他早年在美洲殖民地一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他于1662年去世。奥尼许多居民的后代都举家跟随伍斯特到新英格兰,并在那儿定居。这些移民在奥尼教民与马萨诸塞省的起义者之间建立了家庭纽带及宗教和政治上的友好联系。

在马萨诸塞省,起义者与英国军人之间不断发生小冲突。1775年初春,几千名起义者包围了盖格将军的大部分队伍,控制了农村。不过,英国政府派出了4500名新兵援助盖格的被困部队。士兵们越洋到达美洲后,战事显然开始升级了。这个消息使奥尼城内外的政治热度陡然升温。此时有传言说牛顿的好友、北安普敦附近的浸信会牧师约翰·科莱特·里兰德因为在讲道中反对战争被抓进新门监狱,这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里兰德被捕入狱的消息并非真事,事实真相是,国王的使臣到北安普敦指责里兰德在讲坛上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发言过于随便。这个警告也许会阻止反战派的讲道,但里兰德身为一名自由公民和当地浸信会学校的教师,他并未因此缄默。一位同时代的见证人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告诉牛顿的第一位传记作者约西亚·布尔(Josiah Bull),他当时还是一名小学生,曾听到里兰德猛烈地抨击战争,他“神情激动,大声疾呼”,告诉孩子们说:“如果我是华盛顿将军,我将召集身边所有的官员,歃血为盟,拔刀出鞘,美利坚不独立誓不罢休!”

里兰德对战争的看法显然比大多数宗教领袖更直白坦率,不过,白金

汉郡浸信会教堂和不从国教会堂的会众们从本心上也是支持美洲反殖民战争的，对之持同情态度。众所周知，牛顿与浸信会、独立教会和不从国教牧师们的合作频繁，对他们高昂的反战热情颇有共鸣。奥尼公众的看法、浸信会信徒的情绪和个人的良知都促使牛顿强烈地反对战争，所以很容易明白他一定会对美洲的被殖民者抱有同情。他除了在《奥尼赞美诗》第64首《写在美洲战争爆发之日》中有所抒发外，还以审慎的态度表达了对英国政府政策的直接批评。不过，他与那些向来不够审慎的不从国教信徒的关系还是过于密切了。此外，奥尼凌晨5点的新聚会对战事进行的祈祷也成了争端，因为参与这个针对战争而设立的临时祈祷会的教民在马萨诸塞省的亲友们正在英国士兵的炮火下奔逃。牛顿的密友威廉·布尔的孙子约西亚·布尔评论说：“最荒唐的传闻都是在祈祷会中产生和流传的。”无论荒唐与否，传闻流传之广足以到达达特茅斯伯爵的耳中了。身为诺思首相的内阁成员，他听到奥尼那所自属巨宅正在变成一处控诉战争的论坛，且是以祈祷方式，肯定很不满意。牛顿知道了领主的担忧之后，开始做了一个为避免伤害而有所保留的举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写信给达特茅斯伯爵为自己涉入政治并加入控诉战争者一事进行了自辩，我相信主使我热爱和平与温柔，我希望在那片大陆上平静生活的人们也能获得这些。”

牛顿不单单要向达特茅斯伯爵自辩，因为他坚持反战也受到了当地人的批评，并惹来麻烦。几周之后，牛顿写信给他的领主，他感到有必要在讲坛上为自己辩护。1775年10月1日礼拜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讲道时，我为自己和那些不合时宜地偏向美国的人们受到的指控进行辩护，这些指控是因为早晨的祈祷会而向我们发出的。”

同情与“不合时宜地偏向”美国人两者之间的差别还是比较模糊的，从《奥尼赞美诗》第64首的诗句中可以看到，牛顿的态度似乎更倾向于“不合时宜地偏向”被殖民者，至少在战争开始初期如此。不过，那些在早晨5点祈祷会上表达极度反战观点的会众对牛顿可能也产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从性情上来说，他是位忠君者。身为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他常常会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支持“国土平安”，并在每个礼拜天用《公祷书》上的话为国王乔治三世祷告，内容包括请求上帝“坚固他使他征服战胜所有的敌人”。因而，牛顿不得不在政治声援和牧师职责中间的狭窄小道上艰难行进。

无论如何，他必须通过书信调整自己与达特茅斯伯爵的关系，回答别人对其“干涉政治”的指控，他向领主的保证显然很成功，因为他在1776年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因着上帝慈爱的恩典，我从达特茅斯伯爵和舍勒（Serle）先生（他也为同一原因写信给牛顿）处收到回信”“使我从最近受到的指控中摆脱出来了。正是您，主啊，保守我的心性并使我在人的眼中得赞许。”

无论牛顿是否卷入了政治，他在美国独立战争初期的行为都使其就政治问题学习了一些重要的功课。这些功课让他在下一次事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他的良知告诉他必须对一个政治问题发表意见，这个问题就是——废除奴隶贸易。

家庭生活与健康烦恼

牛顿在奥尼的那些年非常繁忙，他很难在波琳身边做一个细心体贴的丈夫。不过，尽管他的工作压力很大，波琳又疾病缠身，他们却拥有一份堪称典范的基督徒婚姻，扎根于爱、祈祷和对他人的服侍之中。波琳是丈夫事工的坚定支持者。身为家庭主妇，她总是盛情地款待牧师府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作为满怀同情心的倾听者，她照料那些情绪低落的人，比如处在烦乱中的威廉·考珀或者丧亲的汉娜·威伯福斯，显示了极大的善良与温柔。1774年，牛顿夫妇收养了成为孤儿的侄女贝琪·卡特莱特（Betsy Catlett）为养女，这些品德在波琳身上转化为一种母爱。1776年，波琳的父亲乔治·卡特莱特生病时需要医疗看护，他来到牧师府，在那儿住了半年后去世，波琳同样表现出孝敬的品德。在来来往往各样事务中，约翰和波琳夫妇享受着相契相守的婚姻，但它也仍然难免紧张、压力和短暂的分离。

与身为基督徒领袖的丈夫日渐显明和增长的声望相比，波琳·牛顿毫不引人注目。后人无法看到波琳的肖像或者对她的描述，然而，牛顿同时代人偶然留下的线索也表明他们无法看清楚牛顿眼中的波琳。那些感觉困惑的观察者中有一位叫威廉·杰（William Jay, 1768—1853），是巴斯独立教会牧师，他在自传中写道：“牛顿先生对妻子眷恋之极。有些人对此很觉奇怪，因为对他们来说，她似乎并无多少魅力。”

然而，情人眼里出西施。在牛顿的婚姻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约翰认

为波琳无论外表还是心灵都很美，而波琳则把丈夫约翰尊为属灵指导；不过，他们的默契体现在感情层面而非知识层面上。波琳并未受过良好的知识教育，她的书信不可避免地让人以为她——借用 18 世纪的表达——缺乏头脑，换个更现代的说法就是幼稚肤浅，但她却以信心弥补了书信内容的散漫无序，其书信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她对丈夫的爱和对上帝的信靠，这两点足以让牛顿深感幸福了。他对婚姻关系产生的唯一而持久的忧虑是他有时把亲爱的妻子放得位置太高了，有偶像崇拜之嫌。

多年来，奥尼牧师府有无数客人往来不息，他们肯定会不时地给牛顿的家庭生活带来紧张感，因为波琳经常要扮演客店荣誉老板的角色。那位逗留时间最长的客人——威廉·考珀深受牛顿夫妇的喜爱，牛顿描述在他自己、波琳、考珀和玛丽·尤文之间日益深厚的友情时用“四人组”来表达。甚至在诗人多次试图自杀和发生其他相关事件之时，牛顿夫妇没有一个人对他流露出任何抱怨的神色。考珀的姑母茱迪丝·马丹给牛顿写信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因为侄儿的病况给照顾他的人带来了负担，她说：“不知道您、牛顿太太和尤文太太因着你们对他的照顾承受了多少难处。”“但愿你们给予的每个安慰都化为无限的祝福回报在你们自己的身上。”

一个意想不到的祝福来到已入中年仍膝下无嗣的牛顿夫妇家中——他们收养了一个孩子，她叫贝琪·卡特莱特，5 岁大，是波琳最小的弟弟乔治的女儿。1774 年 12 月乔治去世，年仅 32 岁。牛顿在日记中写道，他的妻弟“留下一个大约 5 岁的美丽孤儿（母亲两年前去世了），如今，我们全然依靠主，清晰地听见他召唤我们欢欢喜喜地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抚养。”这种欢喜是真实的，不过也可能令人惊讶，至少牛顿完全明白在步入 50 岁的老年时期（按照 18 世纪的标准）抚养一个孩子要面临的挑战。尽管牛顿的日程表安排得极其满，妻子的身体状况也异常糟糕，但牛顿夫妇仍努力面对挑战，将一腔爱意倾注到对贝琪的抚育之中。在牛顿最早写给贝琪的一封信中，他详尽地描述了他在伦敦的旅行，结尾处的表达细腻而动人：

我祈求主赐你智慧和恩典，我相信你总会发现，在我的签名中，你可以期待的不仅仅是我的名字，还有我的心，我的爱和我的关怀。

深爱你的父亲
约翰·牛顿

1776年，牛顿把贝琪送进北安普敦的玛尔塔·特琳德（Martha Trinder）学校。贝琪当时7岁，她这么小就被送进寄宿学校有两个原因。一是牛顿也希望情愿出钱让养女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奥尼的乡村学校比较封闭，而特琳德太太的私立学校在当地享有盛誉。女校长玛尔塔·特琳德，人称“大家庭教师”（Governess），是北安普敦约翰·里兰德所在浸信会教堂一位优秀的会友。牛顿经常在里兰德组织的聚会上讲道，他见过特琳德太太，人们对她执教女生之“家”的方法颇多赞誉，牛顿对此早有耳闻。1776年8月3日，牛顿把贝琪送进学校后，在日记中写道：

到北安普敦，把亲爱的孩子留在特琳德太太那儿。我依赖她对孩子的照料，但更主要地仰赖亲爱的主的恩慈……我祈求让贝琪在那个家中与许多受您恩待的孩子们建立最初的蒙福的关系。啊，我希望您把她托付给我，而她能够被您亲自教导！

贝琪很小年纪便被送进寄宿学校的第二个原因是得为75岁的祖父乔治·卡特莱特倒出一间牧师府的房间来，她的祖父和养母波琳·牛顿都得了重病。

牛顿1776年的日记中到处都有对波琳健康恶化的警报和危机的记载，她多次大病，从“头晕目眩”到令人绝望地濒临死门。当波琳患上带状疱疹时，牛顿发现自己的信心经受了严重的试炼。9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亲爱的妻子深受一种叫作带状疱疹的疾病的折磨……这种病不起眼却令人疼痛难耐，弄得我们两个整夜整夜不能入睡……我说我信赖您，顺服您的旨意，但小小的试炼就足以证明我的信心和忍耐何等地微弱了。”

波琳患的病并非“小小的试炼”。那一年里，她至少有四次濒临死亡之门，有时会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力量击倒，就像牛顿在1776年11月19日日记中描述的那样：“昨晚，亲爱的妻子打算上床休息的时候突然头痛欲裂，仿佛她的生命和感觉立时就会消失一样。哦，天哪，我万万没有想到会这样！”

牛顿不但担忧妻子的身体，对岳父乔治·卡特莱特的健康状况也深感忧虑。波琳1775年11月回克拉朋探望他。糟糕的身体和恶劣的气候使她在那儿耽搁了十周多，直到1776年1月，她才带着生病的父亲回到奥尼，他在牧师府度过了世上最后的6个月时光。

牛顿也许对乔治·卡特莱特在府上久居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这位老

人极端保守，有时会为宗教问题而大发脾气。他非常不喜欢牛顿主动与教区内的浸信会信徒密切交往，卡特莱特家族所有人对这个教派都持怀疑态度，甚至波琳对丈夫的浸信会朋友都侧目而视，她从克拉朋给牛顿的信中尖锐地指出：“我宁愿做循道会教徒也不想当浸信会教徒。”

波琳的信里经常有这种偶然一现的片断评论，因为它一般都与上下文的内容脱节，所以往往不会让人产生太多感觉。不过，她的书信的主调是对丈夫的爱慕与思念。在1775—1776年冬天，两人分开10周之时，她从克拉朋给牛顿写信说：

最最亲爱的，我已经离开你10个星期73个日夜了。那天晚上，我梦见和你在一起，那是多么快乐的半小时啊……今天收到你珍贵的书信，我高兴极了，就像从前你每次来信一样，不过我的心一直在怦怦地跳，恐怕你会到约克郡去……我太自私了，我希望尽可能多地陪在你身边。你一定没想到我会这么不讲理吧。也许我下次能写得再好点儿，不过我遇到了不少让我失望的事，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表现更得体。如果我能仰望上帝，每件事都会好起来的。

在信中，波琳经常会提到她从传道人那儿听到的教导和他们援引的经文，时不时地也会具体地问及她不在时家中的情况——“查理还在照看我的小花园吗？恐怕我的天竺葵、报春花和康乃馨在雪里会烂掉呢，但也没什么办法。”随后，她会为丈夫祈祷——“愿上帝祝福赏赐你一个美好的明天。愿你的灵魂被大大浇灌滋润，愿你有能力传达上帝的旨意。”

1776年2月2日是波琳47岁生日，牛顿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对这件事的思考：

今天是我亲爱的妻子的生日。主啊，感谢您单单为我预备的这份赐福，把她带入这个世界，让她成为我后来生活的转折点，成为我现世幸福的主要部分和源泉。我赞美您，您的恩慈，您特别把她留给我，为我设立一连串奇妙的旨意。您使她成为我心灵所能构想的主要愿望。

结婚26年之后还能给妻子如此热情洋溢的称赞，这清楚表明约翰·牛顿是一个幸福的丈夫。在灵性、神学和知识方面，牛顿只能与好友们一起交谈，而无法与波琳交流，但这一事实从未令牛顿感觉有任何烦恼。他

在工作中获得了成就感，在婚姻中则找到了不同的满足感，它们共同成为其生活的两个支撑点，而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就是上帝的同在。牛顿不断地感谢赞美上帝在自己的婚姻中所给予的神圣的帮助。在一封写给波琳的信中，牛顿以这种方式表达他的感恩之情：

从结婚那天开始，我的爱就一直在不断地增长，至今仍然如此。它曾经就像一粒橡子，如今却深深地扎根，繁衍生枝，仿佛一棵老橡树。倘若没有上帝的祝福浇灌，它绝不可能有此结果。

如果说在他们总体上可谓幸福的婚姻生活中有哪些磨擦的话，那就是波琳对丈夫工作得过于辛苦而忽视自己的健康感觉担心。从他们的通信中偶尔找到的一些线索表明，对于牛顿独自一人在书房里工作太晚这件事，她可能唠叨得比较多。这些忧虑不是无理取闹，因为牛顿奇迹般地创作出大量的书信、布道文和其他作品，并在晚年赢得了工作狂的美称。不过，牛顿以不容辩驳的态度对波琳的抗议不予接受。1775—1776年冬天，波琳在查塔姆期间，牛顿在一封写给她的信中解释说：

我很容易放纵这个“自我”，所以别担心我压榨他，使他过度劳作。我需要刺激而不是束缚。你常常认为我做得太多了，我更经常看到我需要忏悔，相对来说，我无论如何都是个懒惰无用的仆人……我应该经常抓住任何机会以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无论通过言语还是写作，都是为了让自己的更勤勉以弥补失去的时间。

牛顿自言“懒惰的”或需要“刺激而不是束缚”的说法并非实况，除去某些偶尔低落时刻，他似乎能够承担极为繁重的工作，但并不因为他有一个好身体。

不过，1776年秋天，牛顿遭遇了一次挫折，他的大腿上长了一个肿块，医生诊断说是肿瘤。在麻醉剂还未出现的18世纪，伦敦盖伊医院的外科医生施行的切除手术非常痛苦，牛顿却以他所谓“说得过去的冷静和信心”度过了手术。他显然恢复得不错，不到两周，他就在伦敦一位朋友的教会讲道了。

家中其他成员的健康问题则更为严重。乔治·卡特莱特的身体一直虚弱，75岁那年他在牧师府去世。牛顿在葬礼上布道，并在奥尼的教堂墓地埋葬了岳父。与此同时，波琳的健康状况显著地恶化。牛顿对妻子的病

痛深为忧虑，他对上帝的信靠之心受到挑战。1776年12月3日，他在日记中反问到：“为什么我对你的怜悯、力量和关怀缺乏信心？”三周后，他所抱怨的“灵里患病”在教堂突然发作，达到高峰，是波琳引起了这段不快的插曲。波琳感觉稍微好转，就说她要参加12月26日礼拜天晚上的团体敬拜，但她没出现，牛顿简直魂不守舍。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看到她的身影，却没找见她，再加上其他一些分心的事给撒旦留出了机会，我心中充满了焦虑和不信，我相信自己从不曾在讲台上这么心神不宁地度过一个小时。无论祷告还是讲，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1776年临近尾声之际，对波琳健康的过分担忧分散了牛顿的注意力，这时又出现其他一些事件也影响了他的事工，教堂和祷告会的人数迅速下降。他在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似乎都在越变越糟。大宅的人数在减少，到教堂来听道的人也非常少。”一周后他再次发出同样的抱怨，这一次，他发现参加聚会的人数下降是因为他正在受到“轻视和抛弃，那些从前来听讲的人现在都到别的地方去了”。

相当多数量会友离开他进入浸信会教堂，这给牛顿带来的忧患不亚于他对波琳健康的忧虑。也许很自然，他开始推想是否到了搬离奥尼的时候了。

离开奥尼

牛顿打算离开的想法虽然受到奥尼教堂和大宅祷告会人数下降的影响，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位教区牧师与教民之间的关系在 18 世纪 70 年代后期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非常令人不快也令人意想不到。

牛顿与奥尼的教民之间彼此尊重的关系可能在 1777 年秋天第一次出现裂痕。10 月，小城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火灾，烧毁了大约 15 间房屋。尽管牛顿当时远在伦敦，他仍然迅速赶回，安抚失去财物的人，为火灾事件特别创作了一首圣诗，启动了一个由约翰·桑顿和其他朋友慷慨解囊建立的救济基金。大火显然是由于不负责任地误用烛火造成的，牛顿在讲坛上批评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极力主张在烟火节（Guy Fawkes Day）当天禁止举办传统的当地庆祝会，包括手持烟火和蜡烛绕城游行。

牛顿认为这个建议会得到城里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但他的介入却受到奥尼一小群人的积极对抗。11 月 5 日夜里，在庆祝盖伊·福克斯阴谋以火药推翻国王和议会被发现的节日时，“一群野蛮、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喝得醉醺醺地穿城狂欢，一路上打碎了许多窗子。牛顿对此异常震惊，他在日记中以戏剧性的语言记录了当时的场景：“这个对抗和蔑视的邪灵，我以前从未见过。晚上，大街小巷充斥着恶魔之子，他们在城里到处狂呼滥叫，气势汹汹……我的房子受到严重的威胁。”

这群乌合之众走近牧师府是牛顿在奥尼生活岁月中最糟糕的时刻。他

的权威受到嘲弄，他的房屋安全遭到可怕的威胁，而这都来自于他自己的教民。当闹事者在牧师府和教堂之间的空地上游行时，牛顿决定不出面迎战，而是用一种不光彩的手段收买了他们。他在一封写给约翰·桑顿的信中描述了这段插曲：“我被迫派一位送信者去乞求和平。我的口信内容和软，并给了暴民首领一个先令，以求得保护。我们总算能平平安安地睡觉了。唉，‘不要在迦特报告这事’吧，这事让我羞愧难当。”

牛顿不需要感觉羞愧，但他的确需要对此忧虑，他真正面临的问题是改变教区年青一代对他的态度。1764年，当他以新任教区牧师身份进入奥尼时，他受到了满含敬意的欢迎；13年后，他发现自己竟然遭到无礼的嘲弄。牛顿感叹老一代人的逝去，他们是更懂得尊重的一代人。他评论道：“我活着埋葬了一代值得信赖和托付的老人。”他把许多新人看作是“布道的证据”。更早的时候，他在一首圣诗的诗句中描绘了他们的反叛状态：

愿你怜悯无数青年
他们身体年轻心存恶念
愿你的圣灵和真理
显明他们灵魂的本相

有一些当地的旁观者认为牛顿应当为奥尼年轻居民令人不满的属灵状况负部分责任。有些人抱怨他把太多时间用在教区之外了，还有一些人对他们作为属灵领袖采取的平等主义方式表示不满。18世纪，许多圣公会的带薪牧师对会众颇为疏远冷淡，那种家长制作风与平等主义风格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反差。在那个阶级意识浓厚的时代，英国乡村社会中的教区牧师地位仅次于当地的治安官，牛顿却鼓励平信徒参加事工和祷告会，这个举动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的，同时，他以随和、坦率和可亲的态度与教民相处。在盖伊·福克斯之夜的那场事件之后，牛顿的一些朋友提醒他，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他对愚民过于亲近，过分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过于鼓励他们在大宅和村舍的聚会中发言了”。

牛顿的权威遭到破坏可以用“亲密生轻蔑”这句老话来解释，布鲁斯·汉德马什教授在著作《约翰·牛顿与英国福音传统》一书中对此观点深表赞同。汉德马什以学术化的表达分析了牛顿在福音运动中的贡献，他指出牛顿——

……培养了一种大众的宗教文化的生活方式，他表现出对教会权威和教区秩序的轻看，他在教区的教堂内建立了一种“小教会”，间接地承认不从国教的合法性。这些主张与那种认为会众和牧者间建立应顺服与家长权威之关系的观念相悖。起初，牛顿的性情似乎很适合加尔文主义非服从性的当地传统及独立手工业者们的行业活跃性，最终，这却导致了他的失败。

人们对牛顿在奥尼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还有其他一些解释，一个说法是他面临着来自浸信会和公理会教堂日渐强大的竞争。18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两个教派任命了两位颇有天分的年轻布道人约翰·萨特科利夫(John Sutcliffe)和约翰·怀特福特(John Whitford)。他们都比自己的前任牧师更有能力也更有活力。10年前，奥尼大批不从国教信徒离开自己的教会去听牛顿布道，如今，同样的这群不从国教信徒又开始蜂拥转回了自己的“老家”。

第二种说法则更为深刻，认为牛顿在奥尼大获成长，而奥尼却并未与其一同成长。尽管他努力地投身于探访和其他牧养工作，但他的才能已超过一名教区牧师应具备的了。做了15年教区牧师后，他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赞美诗作者、国内知名的布道家和福音派贤哲，但其大部分成就受到的却是奥尼之外世界的认可，“先知在本地不受欢迎”，牛顿正是一例。

不过，英国各地向他发来的无数讲道邀请却证明牛顿已广受悦纳。从他的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出，18世纪70年代，他每年都会接到大约40到45场的讲道预约，其中大部分是在他自己所属的白金汉郡、贝德福德郡和北安普敦郡。他也是伦敦的常客，在那儿，他一年至少要做12场客座布道。此外，他还在西部内地、兰开郡(Lancashire)等地做巡回布道，尤其在约克郡，那儿有他许多属灵的朋友。

这种活动为他赢得了许多仰慕者，所以可以想见，牛顿会接到加入新教会的邀请。1775年，他在接到一个教区的邀请后，很认真地考虑过要到伦敦南部的德普特福德(Deptford)，但是当他听说自己的老朋友理查德·康耶斯先生(Richard Conyers)想去那儿做教区牧师时，他马上退了回来。1776年，他本来很有可能搬到约克郡的哈利法克斯港(Halifax)，但得做一个“在生活上寻求奉养的牧师”。第二年初，牛顿有更大可能搬到赫尔市，他斟酌良久后确定自己会去，于是将这个�息告诉奥尼的会

众，“人们表现得异常感伤”。牛顿对搬家的事感觉“焦虑和痛苦”，当另一位牧师得到任命后，他才轻松下来。

这些未能成功的搬离计划一定曾经让牛顿在奥尼日渐不安。早在烟火节之夜事件发生前，他就已经有此意图了。因此，许多仰慕他的人纷纷提议说现在到了离开的时候，他对这种想法也逐渐积极起来。

1779年9月19日，牛顿收到一封改变一生的信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亲爱的朋友提供了一个仁慈的建议——让我不明就里（a hurry of spirit）”。这位朋友就是约翰·桑顿。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先生，

我今天在报纸上读到普拉姆崔博士去世的消息，我知道没有谁像奥尼教区牧师这样更适合填补他的空位了，我很高兴地想知道是否我能够提名请您赴圣玛丽伍尔诺斯就任，并为您的转会（您的搬离）做好准备，您到伦敦来往，由福斯特先生^[1]照看您的教会。请代向牛顿太太和果园旁的朋友们致意。

我是您深爱的朋友

约翰·桑顿

于克拉朋

1779年9月18日

尽管牛顿对这个建议的细节感觉“不明就里”，但他对这件事的大体状况并不感觉惊讶，他的老朋友和赞助人约翰·桑顿已经在大声地呼唤他——到离开奥尼的时候了！事实上，这只是因为18世纪70年代末期，桑顿资助的教区牧师中还没有一个闲职无位的，牛顿也从未转过教会。桑顿有一个计划，他打算用钱买下教堂的署名权或者为牧师提供薪金，其方式像商人获得财产那样。不过，桑顿获取教堂署名不是出于利益而是为了有计划地实现在重要教堂的讲坛上培植有能力的福音传道者（即福音派牧师）。牛顿是一位理想的候选人，圣玛丽伍尔诺斯为他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机会。这座教堂位于伦敦市中心，周边临近英国央行、邮局、伦敦交易所和股票市场，步行即至。尽管教区内只有150户人家，但在此地传福音会对商人团体产生影响，这立刻引起了约翰·牛顿的兴趣。尽管薪水并不是他首先关心的问题，但对于每年付给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区

牧师 260 英镑的薪酬，他也不能了然无视，这个数目比他做奥尼教区牧师薪水高出了 6 倍。因此，在接受这个建议之前，他并未犹豫太久，但他仍然先向上帝祷告此事。接到桑顿来信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想我在这个新的机会——试炼也会很大——中看到了您的恩慈，但在我生活的这个阶段，这个安排似乎是我心所愿的。主啊，让我不要错误地理解您的呼召。您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在这段日记旁边，牛顿标注了《箴言》10:22：“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正如日记所记载的那样，选择这句经文表明，牛顿充分显示了自己人性的一面，圣玛丽伍尔诺斯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吸引他，对此，他充满感恩。

除了向主祈祷之外，他还和波琳讨论了这个提议；在接受建议之前，他还与果园边的邻居威廉·考珀与玛丽·尤文交流了此事。他们对这位朋友打算搬离、日后密切联系的机会减少这一前景感觉很是难过，但他们仍然极力劝说他接受这个建议。从牛顿的日记中可知，他的朋友们很高兴“这个呼召来自于您而我应当顺服执行”。9月21日，他写完了这段记录：

我是一个可怜的被造物，曾经在非洲做奴隶，但至今为止，您却赐我许多荣誉，高抬我，如今又把我放在一个更重要、更突出的位置上。主啊，请指教我，使我能够谦卑；也求您保守我的可怜的教民，并让这次分离被您洁净成圣。

不过，奥尼教区的教民们对教区牧师即将离开一事似乎并不像他自己那么关注。在聚会上，当牛顿告诉大家他将离开时，有几个人流了点儿眼泪；他也注意到，在临时祈祷会后，他宣布这个消息时，没有人“坚持要我留下来”。至于他希望看到他“可怜的教民”得到一个合适的替代者，支持他选定的继任者的努力却不幸地未起任何作用。牛顿推介的继任者是托马斯·司各特。自从牛顿通过祈祷说服他离开自由神学之后，几年间，他在福音派群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司各特的自传《真理的力量》(*Force of Truth*)被看作那个时期福音派文学的主要贡献；他也像牛顿那样成了一位著名的福音传道人，受到全国各地教堂的邀请。尽管牛顿能够赢得达

特茅斯伯爵和奥尼那位拿薪水却不露面的教区牧师摩西·布朗尼的支持，但对于新牧师司各特的任职，奥尼的教民们仍然满怀敌意。牛顿对他们拒绝他的建议感觉很受打击。他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让我深感惊异和难过的是，我发现他们竟然强烈地反对司各特先生，他们对您最爱、最看重的人竟然如此轻蔑，我担心他们会产生更大的攻击并挑起争端。”

在会众和即将离任的牧师之间，司各特的反对者们散布了令人不快的气息。这一变动看起来就是对牛顿的轻慢：教区从附近的克利夫顿选了一个名叫本杰明·佩格的牧师做继任者，而牛顿认为佩格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结果证明这果然是一场灾难，佩格与会众争吵、贪污教堂工人的工资、殴打妻子。几周之后，佩格被辞退；牛顿再次邀请托马斯·司各特到奥尼做教区牧师。最终，牛顿被证明是正确的，但这场分裂的骚乱过去后不久，奥尼教堂里的敬拜者就缺失了不少。

尽管牛顿在奥尼最后几个月充满了不快的经历，但这些离职前的紧张状况并未贬低牛顿在这座小城16年教牧生涯的全部记录。无论按照何种标准，牛顿都是一位出色的教区牧师。他以勤勉、富于想象力和灵感的方式带领自己的羊群，他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引进了儿童教育，并在大宅举行各种成年人的祈祷会。这种方式让参加周日敬拜的会众人数陡然增加了三倍，从原来大约两百人上升到六百多人，以至于不得不在教堂增加一条新的通道，并将牧师府进一步扩大。至少牛顿在任的早期和中期，这些聚会为奥尼带来了属灵的活力，使教区许多人的信心得以坚固。牛顿通过讲道给予会众充足的属灵滋养，利用特别创作的《奥尼赞美诗》来进行简明易懂的布道。他的讲章表明他是一位富于影响力的、卓越的上帝之道的宣讲者，他对与人交流“好消息”这件事充满福音派的激情。牛顿的方式可能是说教的，但牛顿本人却是一位温和、幽默和细心的牧人式的主仆。他探访教民的家庭，格外地殷勤和体贴，除了给予属灵的教导之外——感谢桑顿的财力支持——牛顿还经常向那些需要的人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因此，从各个方面来说，他的事工是有力的，这全赖其个人的祷告，这些都在他的日记里有精确的记录。任何一个阅读其日记的人都会得出结论说牛顿的秘密在于祷告。他的谦卑、感恩和自省以及为人代祷的生活使他与主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并推动了他个人的思想和公共事工的每个方面。

如果说牛顿在奥尼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在神圣的事业上出现的人的失误。也许他在写作和更广泛的传道事工上用力太多，没能在任职后期

给予本教区的教民以更好的带领；也许有那么一两次，他因自己的善意而过分涉入了国家和地区的纷争中；也许他不能经常平衡身为牧师的尊严与个人谦和之间的关系，但是从这其中却可以看出牛顿以基督为中心的灵性，他的一切言行都是由此而出，所以这些失误都只算是瑕不掩瑜。相反，牛顿 16 年对上帝和奥尼教民的服侍充满了圣洁的成果，以至于两百年后，它仍不断地激励着许多牧者追随他在教区中的榜样。

牛顿在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举行了告别仪式。1780 年 1 月 13 日的日记表达了他对自己奥尼岁月的最后评述：

今天晚上，我在奥尼的服侍就告结束了。主啊，让我赞美您这么多年里的恩待，我知道在这里，您看顾、保护、支持、接纳我，我希望自己为主所用。若我们身处试炼，那我们会拥有更多的安慰。

仪式第二天，牛顿离开奥尼，赶往伦敦开始他在新教区的工作，也翻开了生活的新的一页。

注释

- [1] 亨利·福斯特（Henry Foster, 1745—1844）是著名的福音派传道人，曾定期在伦敦市圣安东林（St Antholin's Church）教堂做教导。1779 年秋天，牛顿与福斯特进行了为期两周的互换讲道，两人都需要在对方的教区短暂逗留。

到达伦敦

牛顿到伦敦任圣玛丽伍尔诺斯新牧师一事受到英国议会上院内部的反对而被推迟，这种延迟主要是程序上的障碍，而不完全是由于对牛顿个人的敌视。不过，这毕竟是件让人烦恼的事，这提醒他，从他困难重重的按立至今，英国圣公会内部对福音派人士任职的争议并未减少。

这种延迟是上院的布鲁克勋爵，即后来的沃里克伯爵的一个请愿导致的。在亲戚菲利普·布威斯·布鲁克的煽动之下，布鲁克勋爵准备反对约翰·桑顿通过为圣玛丽伍尔诺斯提供牧师薪金来任命他自己提名的人。这一表现为一个警告的反对，依据的是针对圣职人员任命的正确程序进行的晦涩的法学讨论。不过，隐藏在警告后面的真实动机是试图阻止一位福音派牧师拥有泰晤士河北部伦敦一个教区的控制权。这个警告性意见正式递交给伦敦主教区代理主教的时间是1779年7月15日，但几个月后，它就遭到主教管区法庭的否决。同年12月，牛顿被安排做教区牧师的形势就很明朗了。1779年12月7日，牛顿给威廉·布尔写信说：

昨天主教向我介绍了圣玛丽伍尔诺斯的工作制度，明天我将就任——也就是说，我将掌管钥匙和敲钟绳，从而拥有生活的各种权利和好处。奥尼城的教区牧师如今移居异地，被安置在教区牧师众多的伦敦市。当我在普兰提内岛上忍饥挨饿地苟且偷生时，我何曾想到会是这样啊！

1779年12月19日星期天，牛顿在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堂第一次主持周日敬拜仪式，他宣讲的经文是《以弗所书》4：15：“用爱心说诚实话”。在这篇最著名的讲章中，他向教民们简述了此次拖延的原因，他一开始便对“真理”一词进行解释：

圣经是真理的大宝库，在你们面前打开它是我一生的事业与愿望。上帝的真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不可添加，也不可减少，否则必受惩罚。为了适应我们周围人的流行口味而对这一真理的某方面加以掩饰或软化，这种种努力不是为了避免不快就是为了博取我们这群凡人的好感，却一定是对上帝至高权威的一种侮辱，也是对人的的一种背叛。我的良心作证，在你们中间，我的本意就是讲说这一真理。

在具有挑战性的开场白后，牛顿继续宣讲《哥林多前书》13章的内容，他清楚地说明，身为教区牧师，倘若他“没有用爱心”宣讲真理，那就像圣保罗所说的只是“鸣的锣”、“响的钹”一样全无益处。在简述了他将在某些困境、烦乱和痛苦的属灵领域中提供帮助之后，他更多地讲述了个人的经历。他请他的新教民为他通过“用爱心说诚实话”拯救他们灵魂的事工祷告，并最后总结说：“请记住，我一度对福音充满了轻蔑和敌视，但今天却在宣讲它；我此刻站在这里就是上帝受苦的明证。”

牛顿的首次讲道就获得了会众的热烈欢迎，但一个印刷商的错误却破坏了他试图扩大影响的努力。他嘱咐把讲章的复印本送到教区的每户人家，所有的收件人都应该免费得到。然而，印刷商却因商业目的而自作主张，对牧师的讲章每份收取6便士。这个数目显然过高（通常印刷一张纸的费用顶多是2便士）以至于引起不满。牛顿一开始深感耻辱，后来以一种玩笑的方式从尴尬中解脱出来，谈起印刷商时，他说：“让我们共同分担这个错误吧，他收获金钱，我收获谴责。”

不过，谴责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因为牛顿很快便让自己成为一名受到普遍欢迎的福音传道人。他每周3次在圣玛丽伍尔诺斯讲道，包括例行的周日敬拜。1780年5月，他重新尝试当初在奥尼大宅举办的活动，在周日晚上的讲道开始前加入赞美诗和祈祷。到了夏季，许多人慕名来到教堂，牛顿描述会场“满得像一只鸡蛋”，会众中只有极少数人是他的教区居民，因为在炎热的季节他们大多数人都到乡村的府邸去了。

牛顿偶尔也会非常想念乡村生活，这从他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可以

看出：

啊，我有时真希望能在森林、草场、溪边和灌木篱墙周围待上一两天，听听鸟儿在树丛里唱歌，在绵羊和小羊中间走来走去，或者站在小山顶上一棵老橡树的树荫下。在奥尼，我就是这样生活的。伦敦真是不一样啊！不过，不说这些了！奥尼已经过去，现在是在伦敦。是主把我带到这里的……我很满足。

牛顿大可以为更好的理由感觉满足。在他就职几周之内，整个伦敦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听他布道，人数之多使得那些定期来聚会的会众不免抱怨自己的座位被陌生人占据了。教堂管理员把这些抱怨转达给牧师，并提出了一个颇具独创性的建议以解决问题。他建议出其不意地邀请其他布道人来圣玛丽伍尔诺斯布道，以此减少会众的规模。牛顿向妻子描述了这场谈话，谈到满怀焦虑的教堂管理员时说：“他认为如果人们无法确定是否会由我讲道，那么他们就不至于蜂拥而来了。”牛顿对这个打算阻止人们来听他布道的想法感觉很有趣，但还是婉言谢绝了。相反，他倡导自己教区的教民“与陌生人愉快相处”；而后，为解决人太多的问题，他采取了类似在奥尼时的办法予以补救，在楼内又建了一条通道以容纳更多的人。

圣玛丽伍尔诺斯最早的牧师府被邮局占用了，于是牛顿在查尔斯广场第13号租了一个房子，距离霍克斯顿教堂一英里远。他的新家是一座三层楼的大房子，至少有6间卧室、一间地下室和一座花园。他、波琳还有养女贝琪可以住得很舒服。不过，搬进新家的时候还是不免麻烦，波琳因为“搬家的喧闹”病了一个月；牛顿自己也乱得一塌糊涂。他告诉老朋友威廉·考珀，搬家已经“让我差不多发疯了。我的心思、书籍和文章全都乱七八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找它们”。不过，1780年4月，他还是安置妥当了。他写信给考珀，描述查尔斯广场上的树和周围的乡村景色：“靠近花园后面的地方看起来像你们的草场那么绿，那些正在反刍的母牛也和乡村的母牛们差不多。”

在给另外一位老友威廉·布尔的信中，牛顿表达了他对新家的满足感，他把它描述为“一座美好、舒适的住宅，有一片相当开阔的地方，脱离了伦敦的烟气。步行一英里左右到教堂对健康十分有益”。

不过，在牛顿初到伦敦居住的前几个月里，仍然有两件“对健康有害”的事打扰了他。第一件是他在自己家门口的台阶上出了一次意外；第

二件事是爆发了一场骚乱，他的房子差一点就被暴徒们夷为平地。

这场意外导致他摔了一跤，胳膊因此脱臼。牛顿被查尔斯广场新居门外的一块石头绊了一下，摔在一截短杆旁边，杆子砸到他的肩膀上。伤处非常疼痛，但牛顿满不在乎，写信给威廉·考珀说他认为这“就像一次管教，但属于轻柔、仁慈的那种”。牛顿也注意到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身体受伤的意外，在他 55 年的散步、骑马、航海和在非洲做奴隶的经历中，他从不曾有过这种意外。

1780 年初夏，伦敦爆发了一场骚乱，许多城市居民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健康和安全的威胁，牛顿的家也在其中。这场骚乱的高潮就是著名的戈登暴乱，暴徒中那些肇事者和纵火者狂暴地冲进霍克斯顿，牛顿在一封写给威廉·布尔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在周二和周三夜里，暴乱带来的破坏甚为恐怖。每天夜里我们都能从后窗看见有六七处可怕的大火燃起。周三和周四，军队到达，拯救了全城，否则，我相信，现在到处都是废墟了。”

牛顿对这场暴乱充满不祥的预感，他认为“当前与 1640 年国内战争时的情形没有太大的差别”，引起这场大动荡的原因是一个名为“新教徒联合会”（Protestant Association）的小组运动。1778 年，他们在乔治·戈登勋爵（George Gordon）的带领下与天主教救济会（Catholic Relief Act）相对抗。1780 年 6 月 2 日，一个由 6 万人组成的新教徒联合会游行队伍开进了下议院，人群高喊“打倒教皇！”游行队伍分散开来施暴，他们破坏了几座天主教教堂，冲击英国央行，推倒新门监狱的门，抢掠天主教徒的房子，几天之内，暴乱就遍及了伦敦的整个市区。

有三百多人在暴乱中丧生，牛顿对暴乱的规模及起因深感震惊，他对那些居住在其教区的大量天主教家庭的安全问题非常担忧。他批评新教徒联合会运用了“错误的热心”，他以笔发问：“这是爱的果子吗？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希望做成的吗？人子来，难道不是为了拯救人的生命而非为了毁灭人的生命吗？”

新教徒联合会的有些成员希望牛顿能够成为他们的同盟，但他们错了，在暴乱之前他就拒绝加入他们的组织。当要求他谴责教皇制度时，牛顿反驳道：“我了解许多教皇陛下，不过我曾经遇到过的最坏的教皇就是自我陛下。”在后来的创作中，牛顿特别赞美他尊敬的天主教作家。他在《辩护书》（*Apologia*）中问道：“如果像芬乃伦（Fenelon）、帕斯卡尔（Pas-

cal)、克斯内尔 (Quesnel) 和尼科尔 (Nicole) (还可以提及更多) 这样的人都不算真正的基督徒, 那么我们还能到哪儿找配得此称呼的人呢?” 牛顿反对一切的偏执, 这也是其讲章和创作内容中显现的特点。

在戈登暴乱的回顾分析中, 牛顿评论说:

就天主教会对国家城市状态的影响而言, 我没看出它有多么大的危险……我无法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个天主教徒不能像我一样有权利凭着自己的良心敬拜上帝, 尽管他在教导孩子时可能有错误。在良心的问题上, 我无法认同迫害与束缚。1780年的暴乱使新教徒在天主教的 国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但我认为对于我们的民族性而言, 它是一个耻辱。

1780年还发生了一件注定要对不列颠的民族性产生至为深远影响的事, 这就是21岁的威廉·威伯福斯在赫尔市10月的普选中当选为新的国会议员, 得以进入下议院。牛顿一直与威伯福斯的伯母汉娜保持着密切持久的联系, 他听到威廉如此年轻就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消息非常高兴。不过, 倘若牛顿知道, 当年那个与伯母一起到奥尼牧师府来拜访他的认真严肃的男学生如今是伦敦著名俱乐部如“怀特和布达”的赌桌边流连忘返的常客时, 他未必会那么高兴了。威伯福斯后来自述说, 任国会议员最初的几年里, 他虚度光阴, 一心追求享乐, 狂妄自大。他回忆说: “任国会议员的第一年, 我什么也没做——没有其他目标, 我最宝贵的目标就是我自己的荣誉。”

威伯福斯与牛顿再次见面是在1785年, 这次会面带来了重大的结果。18世纪70年代初, 威伯福斯还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议员, 对于国家大事还没有多少个人性的参与。与此同时, 牛顿在教会中的影响力却在持续地增长, 他表现出卓越的布道与写作才能, 名声如日中天。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堂的会众越来越多, 固定参加礼拜的人数大规模地增加, 令人惊奇不已。牛顿写道: “我在布道中直率、平和地宣讲自己的感受, 不与任何人进行直接的对抗。因此, 无论是圣公会的信徒还是不从国教的信徒, 加尔文派还是阿明尼乌派, 循道会还是摩拉维亚弟兄会, 我相信有时天主教徒和贵格会信徒也会安安静静地听我布道。”他也注意到“我的服侍范围正在扩大, 同样我也在更多的领域被使用”。这指的是日益增加的“家庭布道”活动, 即在伦敦各界重要人物的家中进行的属灵交谈。约翰·桑顿经

常邀请商界和金融界的朋友来家中赴宴听牛顿宣讲福音；汉娜·威伯福斯在格林威治的家中挤满了热心的听众，听牛顿针对班扬的《天路历程》进行的系列布道。他们只是两位代表，有大约二十位男女东道主定期邀请牛顿来家中向朋友和邻居宣讲福音。

作为一位声名日渐远扬的作家，牛顿也获得了伦敦的家庭和教会之外人士的认可。尽管主要是在奥尼创作的，但牛顿写作和参与编写的三本书在到圣玛丽伍尔诺斯的几年中成为牛顿知名度提高的因素。《奥尼赞美诗》（1779）因着前面所说的原因，对英语赞美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考珀的《诗歌》（*Poems*, 1781）对英语文学的影响也不小。牛顿是这两本书的编辑，也是前言的作者，他与考珀的合作以及他在前言中对考珀的基督教精神的评价给人留下了鲜明印象。《心声》（1781）的出版使牛顿在大都市里拥有了福音派贤哲的名声。

如前一章介绍的那样，《心声》是牛顿匿名出版的书信集，但作者的匿名期并不太长，也没打算特别努力地隐瞒那些收信人的身份。不久，书信集中那些被含糊地称作“A先生”或者“牧师B先生”的收信人就被专家们找到了原型，他们的真实姓名被公之于众。他们都是福音派信徒圈中的知名人士，如达特茅斯伯爵、托马斯·司各特牧师、约翰·里兰德牧师、汉娜·威伯福斯太太和威廉·布尔牧师。在同一个圈子中，《心声》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书信中流露的属灵智慧也获得了更多的喝彩和欢迎。这本书出版了好几个版本，包括威尔士语、德语和荷兰语的译本。牛顿在该书出版前夕给威廉·布尔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心声》的预期，事后证明非常具有预见性：

我对手边的《心声》深感快乐……你可以从中看到我最好和最糟糕的方面。不过我宁愿你看到真实的我，否则你也许会猜想我可能是什么样。它看起来很像能畅销广传呢，我非常高兴，愿主以祝福相伴。如果书信集能够安慰受伤者、鼓舞失意者、坚固摇摆者，那么，我真为他使用我成就自己的荣耀而欢喜无比。

牛顿的公共创作事业实际上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荣誉。不过，在他的生活中，还有一个个人性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属天的荣耀，这是一种可资效仿的基督之爱的行动。1782年，他和波琳决定再收养一名12岁的孤女，进一步扩大家庭，这个女孩患上了致命的肺结核。

家庭、朋友和《辩护书》

历史上评价牛顿的生活与事工时，经常低估了他的两种恩赐。第一个是他对家庭的热爱，第二个是他的个人友谊。他在伦敦新生活的早期岁月充分地表现了他的两种恩赐，当时他的家庭人口和朋友圈都有所扩展。

1783年，约翰和波琳的家随着第二个养女的到来而扩大，她就是12岁的伊丽莎白·坎宁安（Eliza Cunningham），波琳的妹妹伊丽莎白·坎宁安（娘家姓卡特莱特）和丈夫詹姆斯唯一存活下来的女儿。坎宁安一家有三个孩子——约翰、苏赛和伊丽莎白。不幸的是，全家人都得了18世纪最可怕疾病——肺结核。两个年长的孩子和孩子的父亲在18世纪80年代初去世，留下了伊丽莎白和伊丽莎，她们是波琳·牛顿的妹妹和外甥女。

牛顿和坎宁安一家许多年来关系密切，《奥尼赞美诗》中有一首圣诗（即书中第9首“雅各的天梯”）就是牛顿写给詹姆斯和伊丽莎白的，当时他们从肯特搬到苏格兰，他们在费福郡继承了一处房产。坎宁安一家的过早离世对约翰和波琳二人的情感和实际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83年2月，孀居的伊丽莎白·坎宁安太太打算从苏格兰到伦敦，目的是离自己的姐姐和姐夫更近些。但她的身体极度虚弱，承受不了这样的折腾。她的肺病愈发严重，显然她只能再活几个月了。在最后阶段，伊丽莎白最不放心的就是唯一幸存的孩子伊丽莎的未来生活。1783年3月，牛顿把伊丽莎带回自己的家中，这大大缓解了伊丽莎白的忧虑。牛顿夫妇全身心地欢迎伊丽莎的到来，希望把她当作养女来养大，与贝琪成为一对

姐妹。伊丽莎搬到查尔斯广场后不久，牛顿就给伊丽莎白写了一封信，报告新的家庭关系何等美好，这一定给这位濒死的妻妹带去了安慰：

我要告诉你伊丽莎是我们的孩子了。在我们看见她之前，就已经这样安排了，不过要让她按照自己的心愿变成我们的孩子，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她丰富的情感、乐于助人和温柔文雅的态度深得我的喜爱。说到她的健康，尽管她经常发烧，但我想她比来的时候好多了。我希望她不会太遭罪，不过她的忍耐力超过我的想象。我对她的主要心愿就是愿主亲自对她的心灵说话，带她走向自己，被他完全拥有。这样，她在12岁还是120岁去天堂就不那么重要了。

从牛顿书信中的最后几句话可以推断，伊丽莎·坎宁安自己的肺病也很严重。在此后两年半的时间里，牛顿竭尽全力挽救她的生命，花了不少钱请大夫，投入大量时间满足伊丽莎在医疗和属灵上的需要。不过，他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减少对第一个养女贝琪的关爱之情，他说：“我发现自己有足够的空间提供给两个人，不至于厚此薄彼。我深爱着这一个，对另一个的爱也不比从前少。”

家庭医生本纳莫大夫（Dr. Benamor）建议让伊丽莎呼吸新鲜空气并进行海水浴，这是治疗肺结核的一种办法，于是牛顿到海边去了几次。他们经常住在一位新朋友沃尔特·泰勒（Walter Taylor）的家中，他是一位成功的海军工程师，住在南安普敦附近。几次去作客之后，伊丽莎的健康状况有明显好转，牛顿非常高兴；他高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重回南安普敦让他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他写信给他的房东说：

很久以前，1736年的时候我就住这儿（指南安普敦），那时我还是个少年水手。我的父亲是一位船长，载着一船的小麦去西班牙。那是我第一次航海。我很喜欢回想多年前的往事，我希望那时自己的状况与现在之间的反差能够让我受到震动……回望这条奇异的旅程，是主带领我走过旷野。

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让人想起《奇异恩典》中的一句话（“恩典眷顾，一路搀扶，引我安返故土”），也让人想到，永远以一颗感恩的心回应上帝是牛顿生活的主要特征。即使在伊丽莎生命垂危、忧伤哀痛的境况下，他

依然满怀感恩。

在伊丽莎白病情恶化时，人们对她的照料和看护越发地精心了，不过，她的身体虽然在衰退，灵性却越来越成熟。约西亚·布尔记录了约翰和波琳夫妇如何“被她（指伊丽莎白）的甜美温柔的性格所感动，他们非常喜悦地见证了她在信仰学习方面的进步”。牛顿每天早晚都在祈祷、读经和灵性学习方面指导她。

1785年8月，牛顿再次带伊丽莎白到泰勒在南安普敦的家，在那儿住了6周，进行臭氧和海水浴治疗。这一次，治疗毫无效果。伊丽莎白回到伦敦后没几天就一病不起，咳出大量浓痰，呼吸极为困难。

牛顿生动地记录了伊丽莎白临终的日子，面对死亡的逼近，她的平静安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疼痛难耐，她却不断地感谢护士和牛顿夫妇对她精心的照顾。在养父为她祈祷、读圣经的段落、唱赞美诗时，她微笑着倾听、点头。医生最后一次来看望她，问她感觉如何，伊丽莎白回答说：“真是幸福无比；如果这就是死，那死真是一件快乐的事啊。”她为自己的葬礼布道词选了一句话——“那些死在主怀里的人有福了”，随后与表妹——也是她的朋友——一起做了祷告，并告诉他们说：“看哪，主预备的死之床是何等地舒适呀。”牛顿以生动鲜活的笔触记录了她最后的时刻：

下午大约5点钟，她希望我和她再一同祈祷一次。我的祷告的确是从心里发出的。祷告结束后，她说阿们。我问她：“亲爱的孩子，我说出你的心意了吗？”她回答“嗯，是的，”随后又补充道：“我还想说的是，为什么他的车轮迟迟不到呢？我希望他赐我耐心等候他的时刻。”这是我听见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几分钟后，1785年10月6日下午，伊丽莎白·坎宁安去世了，年仅14岁零8个月。在生命最后的两年半里，她与收养她的约翰·牛顿之间建立了真挚深厚的感情，牛顿对这个养女的照料和怜惜也无出其右。她离世时，他正在查尔斯广场第13号的花园里蹒跚而行，为她祈祷，这时，他被告知：“她走了。”他与波琳赶到伊丽莎的床边，牛顿说：“我们都跪了下来，我真心真意地感谢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赐给她丰盛的恩惠，以如此温柔的方式将她带走。”

孩子的离世经常是那些忍受丧亲之痛的父母的生活转折点，伊丽莎的

去世使牛顿深受打击，但他们的生活却是转向更为坚定牢固的信心。牛顿在一封写给沃尔特·泰勒太太的信中这样解释说：

我们回家之后，主就为我们做了一件大事，他为可爱的伊丽莎派了一辆爱车，我们差不多看着她乘车而去。她离开的方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轻松万幸之感。从某个方面看，这件事就像撕裂了我们的身体；但从整体上看，我们觉得更应该赞美而不是抱怨。我现在每天都会为她多多少少地流几次眼泪，但是感谢主，没有一滴眼泪是出于悲伤。我亲爱的波琳也同样得到奇妙的支持。

伊丽莎的死坚固了牛顿的信心及他与家人的关系，似乎也坚固了他与旧友新知之间的关系。他始终与奥尼时期两位亲密的老朋友威廉·考珀和威廉·布尔保持联系。他们经常在信中言及何等想念他，这些表达一定很让他感动。

牛顿的离开让考珀颇受打击。1780年3月，他给波琳写了一封伤感的书信：

牛顿先生甫一离开，牧师府就变成了一个让人忧思难耐之地……今晚，我在花园散步，看见炊烟从书房的烟囱里袅袅升起，我自言自语道，从前这就说明牛顿先生在家，但往日不再了。

牛顿也以一腔深情回应这种感动，他在随后一封寄给考珀的信中说对方的信“让我们的眼泪夺眶而出，但这是因友爱而流出的欢喜之泪……离开奥尼，我的感觉非常复杂，但让我们最感伤的就是与你和尤文太太的分离”。

尽管分隔两地，两个朋友仍定期通信。他们的通信主题包括奥尼的教区新闻和伦敦的文学争论，尤其是对考珀的侄子马丁·马丹（Martin Madan）的著作《多性生殖》（*Thelypthora*）^[1]进行的热议讨论。牛顿编辑了考珀的第一本诗集《内殿律师威廉·考珀的诗集》（*Poems by William Cowper of the Inner Temple*, 1782），牛顿在创作最新的一部属灵书信集《心声》（1783）时，考珀大大地鼓励了他。牛顿给考珀写过许多激情洋溢的书信，在其中一封信中，他对考珀说：“我发现读你的来信是莫大的愉快，而写信给你更是如此。因为读信带给我的喜悦使我希望能够凭着友情推断，我的信也能使你享受到读信的喜悦。”

牛顿的创作也把他带入另一份友谊中，这就是曾对伦敦同时代人产生巨大影响的女性之一汉娜·莫尔（Hannah More），著名“蓝袜子集团”（the Bluestockings）的领袖，这是一个由女性文学精英组成的团体。莫尔是一位诗人、剧作家和支持爱德蒙·伯克的政治活动家，一位机智健谈的女士，深得塞缪尔·约翰逊、贺瑞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和伦敦著名团体其他名流的赏识。但汉娜·莫尔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才华和显赫的地位，她成了一位信仰探索者。正在这时，她读到了《心声》。她问道：“我特别喜欢这本书，里面充满了重要的宗教体验……我在其中只看到了明智理性且一以贯之的虔诚……作者是谁？”一旦她知道了作者的身份，她便不顾一切地跑去找他，随后写道：“今天，我到城里去听大有能力的牛顿先生布道，然后出来和他一起坐了一个小时，带了满满两口袋的布道讲章回家。”

1787年，汉娜·莫尔第一次访问圣玛丽伍尔诺斯，这让她对宗教产生了新的兴趣。她减少了社交活动，更多地投入到福音事工中。当莫尔与牛顿的友谊和交流愈加深入时，她开始参加在克拉朋约翰·桑顿家设立的福音小组，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克拉朋联盟”（the Clapham Sect.）。在小组成员和牛顿的鼓励下，莫尔开始了教育改革家的生涯，她写了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并将后半生投入到使穷人的子女有机会进入基督教学校的活动中。受到牛顿在18世纪80年代的创作与布道的影响，汉娜·莫尔将自己的生活目标导向了基督徒的服务与教育。

18世纪80年代初期，深受牛顿影响的另一个基督徒教育事业是建立了一所招收独立教会牧师和传道人的学校。这是牛顿的老朋友威廉·布尔的想法，他一直与牛顿保持着定期的书信往来，并成为牛顿在查尔斯广场住宅的常客。他们一起策划办学，这就是著名的“不从国教学院”（The Dissenting Academy），他们劝说约翰·桑顿为之投资。在新港-佩格奈尔的布尔家中，学院成为培训不从国教牧师的成功的教育中心。牛顿参与了学院起初的创建，帮助设计了第一阶段的全部课程。他为不从国教学院写了一份文件《预备牧师的学业计划》（*Plan of Academical Preparation for the Ministry*），他建议学习的课本包括异教徒和清教徒的著作，作为一位圣公会的牧师，他有一股异乎寻常的开明精神。

他投身于帮助威廉·布尔建立不从国教学院的后果是他自己成了批评性传言的靶子。有些批评者宣称他已改宗成为不信奉国教者，他混迹于圣

公会中有令人怀疑的原因，特别是想得到大笔薪金。

这些流言令牛顿心烦意乱。1784年，他出版《辩护书》（*Apologia*）以图驳斥那些批评。该书由4封长信组成，是一位圣公会牧师（他自己）写给一位独立教会牧师（海克尼城的塞缪尔·帕尔莫）的。他在信中声明他“在内心里并不是一个不从国教者”，他反驳说他留在圣公会并非图其便利或者有钱，而是出于信任。他说：“我宁愿被认为犯了错误，但不愿被看作虚伪。”

《辩护书》是一篇热情洋溢地支持圣公会的文章。它一定让牛顿的某些不从国教的老朋友感觉惊讶，他们可能会记起他当年申请圣职时的重重困难，他曾经对圣公会主教失望透顶。也许牛顿对戈登暴乱中不从国教新教徒的狭隘观念导致的恶劣行为感到更加失望吧。无论何种原因，《辩护书》对圣公会来说都更像是一个胜利宣告而不仅仅是一项辩护。在书中，牛顿提到自己之所以做圣公会牧师有两个首要原因即自由与效果。关于自由，他把独立教会的牧师比作“一队士兵，每个人都必须统一行动，保持步调一致，做同一个动作”。相反，他声称“圣公会的牧师是没有这些限制的。我们在爱中彼此联络，而不是依靠体系。我们持守同样的主要原则和目标，但每个人可以单独或独立行事”。

牛顿第二个支持他对所选宗派忠心的主要论点是他所谓的“更有用的可能性”。他采用数字指出，18世纪英格兰有一万多间教区教堂，但是只有几百间独立教堂，他声称圣公会在圣灵的复兴下会有更多的机会为基督赢得灵魂。

对于一个对手来说，从牛顿的《辩护书》里对他提及的两个首要论点寻找缺口并非难事，但人们很难反驳他的辩护词的结尾部分，他因着“最初的开端和上帝的引导”已经被带入圣公会，而这是他个人的信仰。一个具有怀疑心态的旁观者可能会证明说，在牛顿于1758—1764年间申请圣职时，好几位主教和大主教都在他面前狠狠地关上了大门，这很难说是出于上帝的心意。不过，牛顿却相信申请圣职中的拖延是出于上帝的计划，目的是教导他谦卑、智慧和顺服。他相信自己最终得到圣公会的按立表明“我跟随上帝的呼召并遵行其旨意……仿佛天使被派来告诉我当如此行似的”。

也许因为身为圣公会牧师，这种自辩听起来多少有些刺耳，牛顿对那些老朋友和该书题献的“对不从国教感兴趣的牧者们”对《辩护书》可能

产生的反应还是充满忧虑。事实上，他们大部分人对此都保持了沉默，也许是因为他们——比如威廉·布尔——一向偏爱牛顿，对他的直率都深为理解。不过，伦敦有一位著名的不从国教牧师亨利·梅奥（Henry Mayo）博士起来抨击他，出版了一本书，对《辩护书》进行了逐句逐行的批驳。还有一位匿名攻击者写了一首讽刺诗《为国教辩护之补充》（A Supplementary Apology for Conformity），其中包括这样一段话：

去吧——谄媚赞助人或者奉承他婆娘
生意就成交，饭碗就得保。

还有一位温和的批评者，就是牛顿的老朋友北安普敦的约翰·里兰德，他写信说他很遗憾看到牛顿比以前更像一位国教信徒了。对此，牛顿后来的回答是：“我认为自己不是更像一个国教信徒了，而是的确更不像一个不从国教信徒了。”约翰·牛顿在伦敦的事工势头猛进正是对其宗派立场的一种准确的描述。

事实是牛顿在圣公会中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甚至在福音派中，他也是自成一类者（*sui generis*）。他的对手们试图把他归类到诸如循道会信徒、清教徒或者加尔文派信徒，但牛顿却不那么容易被归类。一位高派教会批评者曾经问他：“请问，牛顿先生，您是加尔文派信徒吗？”牛顿回答说：“嗯，先生，我不太喜欢用任何单独的宗教名称来称呼自己。您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这位高派教会牧师说：“因为，有时我读您的著作、听您讲道觉得您是个加尔文派信徒，但随即又觉得您不是。”牛顿回答说：“嗨，先生，我的加尔文派倾向比别的更多些，但我在著作和布道中运用加尔文主义就像我此时用这块糖一样。”说着，他夹起一块方糖，扔进茶杯里，搅拌几下，然后总结道：“我没有把它单独和全部地给出来，而是加以混合和稀释了。”

记录这场谈话的是威廉·杰（William Jay），巴斯市独立教会牧师，另一位由约翰·桑顿资助薪金的人。伦敦有一大群福音派基督徒，他们是牛顿的圈子中的一部分，杰是其中一位成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汉娜·威伯福斯及侄子威廉都是牛顿在上流社会中的朋友。牛顿很喜欢到威伯福斯在格林威治的家中拜访，在邻近的花园散步，他称那里“几乎在地球上找不到相媲美的地方”。他还有一位定期来拜访的朋友就是南安普敦的沃尔特·泰勒，他从前是一位海军工程师，后来做阿巴乌·巴（Above Bar）

公理教会的执事。当这些老相识们到伦敦来的时候，他们经常会住在牛顿在查尔斯广场的家里，这里和奥尼的牧师府一样，是最好客的家庭。牛顿给威廉·考珀写信说：“从早餐开始到就寝，我们不断地有客人来访。”这些来访者都是福音派的优秀牧师，比如克勒肯维尔（Clerkenwell）圣詹姆斯教堂的亨利·福斯特牧师、剑桥圣三一教堂的主任牧师查尔斯·西蒙（Charles Simeon）、克拉朋的教堂牧师约翰·维恩、贝德福德·劳的圣约翰教堂的教区牧师理查德·塞西尔等。塞西尔在 25 年后牛顿的葬礼上讲道。所有这些朋友都比东道主年轻。他们非常敬重牛顿，以至于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讨论小组，它给福音派世界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个小组就是著名的“折衷派社团”（the Eclectic Society）。

注释

[1] 对《多性生殖》进行的争论起因于其作者在面对伦敦日益严重的卖淫问题时，倡议将一夫多妻制作为一种婚姻选择，这对基督徒读者提出了挑战。

折衷派社团与 《弥赛亚》

在牛顿作为伦敦福音派领袖的生活中，基督徒之间的交流联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初，他通过自己的私人交往并在自己的家中殷勤招待开始这种活动；不过，随着他的重要地位的上升，他的联络网也变得更组织化了。1783年，他成立了一个定期的讨论小组，由福音派领袖和具影响力的平信徒组成，在同年年底，它被称作“折衷派社团”（the Electic Society）。它在当时曾激发了英国教会传教士协会、《基督教观察者》（*Christian Observer*）杂志和其他宗教协会的灵感，并因此闻名遐迩。折衷派社团成立最初的几年里，牛顿在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使他在福音派群体内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折衷派”的含义很难确定，辞典提供的主要释义是“选择的”、“多样的”和“不附属于任何公认学派的”，但这些界定都无法完全恰当地描述这个于1783年1月16日在伦敦市阿尔德门大街“城堡与猎鹰”客栈举行首次聚会的小组。看起来很有可能，年长的牛顿（他比小组其他创建者大了20岁）是召集人，他有经验，曾经在奥尼和利物浦创建过类似的小组，对于非正式的属灵讨论会充满热情，这些都赋予了他特殊的领袖地位。牛顿对小组的前两次聚会非常满意。1783年2月28日，他给老友威廉·布尔写信说：

我们在“城堡与猎鹰”的新组织前景大好。我们现在有6个人，昨晚又选出了第7位会员。我们先喝茶，然后由一段短祷引入一场大

约持续 3 个小时的交谈，事先有一个话题，我们很少有冷场的时候……我想这是我曾参与过的最有意思也最富教益的谈话。

三位与牛顿一起参与创建折衷派社团的成员是亨利·福斯特、理查德·塞西尔和埃利·贝茨（Eli Bates）。福斯特经常在奥尼教堂讲道，在牛顿 1779 年搬往伦敦时曾在那儿做过临时的教区牧师，他是柯芬园（Covent Garden）朗埃克教堂（Long Acre Chapel）一位年轻而出色的福音派牧师。后来成为牛顿传记作者的塞西尔在贝德福德·劳的圣约翰教堂传道，吸引了大批会众，他独自承担了那座礼拜堂的租金。贝茨是建团成员中唯一一位平信徒，他是牛顿的老朋友，曾经出版多部著作，包括一部关于清教圣徒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研究著作。牛顿在福音派群体中的特殊地位使他能够吸引这三位大有恩赐的人参加这个新的讨论小组。随后，他们为社团召集了 12 个左右拥有相同属灵追求的成员，其中大部分会员是圣公会的牧者，不过也包括循道会、摩拉维亚弟兄会和其他独立教会牧者以及平信徒。

这个属灵社团的特点就是程序简化、属灵讨论严肃和成员全心投入，所有这些特质都可以在约翰·牛顿的性格中找到，他的温柔谦和倘使不是催生了这些特质，也一定对它们的存在有所帮助。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这个气氛和谐的聚会每周一晚上举行。参与社团的伦敦成员几乎带有强制性（缺席者要罚款 2 先令 6 便士），乡村成员要坐车赶到城里参加聚会，限制更多。牛顿在给爱丁堡一位年轻的通信者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写信时，描述讨论中散发出的自由的精神气息：

我对那些集会、参议会、宗教大会、委员会、议会以及董事会等等向无兴趣，在我看来，牧师们的联合会应该是自愿自由的。因此，在伦敦的定期聚会中，我们面前放着 10 杯或者 12 杯茶，每个理由提出出来后，大家都会研究讨论、询问并给出建议，但一个人甚至整个群体的情绪都不会约束任何一个人。

折衷派社团讨论的题目和主题涵盖面非常广，它们包括圣经注释与应用、牧师的职责、国家重要事件、神学的一般性问题以及基督教会与福音事工的重要联系。

讨论的水准非常高。牛顿在社团聚会前几年记录了自己的谈话。比如，关于 1789 年 8 月 17 日的话题——“对于一位研究神学的年轻牧师来

说，最好的教学方法是什么”，他表达了自己的几个理由。

他说：

一位牧师和一位单纯的演讲者有所不同，他的目的是拯救自己和听众。作为一个身在罪性和恩典影响之下的个体，研究圣经，看是否能够按照原意应用……要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境况、气质性情和服侍的界限，要恰当地分配自己的时间。要让阅读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而不是生吞活剥。在沉思和创作中寻找准确的目标。谨慎行动，时时祷告。

在社团持续聚会 15 年之后，其中的一位成员约西亚·普莱特（Josiah Pratt）牧师开始对会议进程进行详细的记录。尽管牛顿当时已经 73 岁了，但那些保留下来的记录表明他依然强健，依然是一位在讨论中拥有话语优势的参与者。1798 年 1 月 22 日的聚会记录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表明他的参与风格。那天晚上的话题是“如何引起会众子女的兴趣”。理查德·塞西尔以一种今天可能称之为“煽情”的方式开始了讨论。他先是对年青一代教民的糟糕行为抱怨了一番，然后解释说不得不借用“恐怖的比喻”向青少年们讲述故事，使他们保持安静，他特别采用着火的房子的比喻来解释救恩。牛顿显然对这种教育方法并不认同，因为他说：

唯有让儿童感觉愉快可亲的东西对 6 英尺高的孩子来说才是最合宜恰当的。尤其是使徒在孩子中间的方式就是：“我不知道别的，在你们中间只知传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若是以心不在焉的态度和孩子们谈论上帝，那么一切都是徒然。但他们可以思考一个曾经是孩童此刻在天堂里的人，要仔细察看基督所有的生活和圣经中所有有关他的历史段落。

牛顿参与社团讨论会的大多数发言在实践指导和属灵智慧方面都是金玉良言。1799 年 6 月 24 日，小组成员讨论的话题是“如何为布道做最好的预备”。牛顿的观点如下：

最好的预备就是不要过分忧虑。忧虑会妨碍活泼和功效，导致很少依靠圣灵。不要说教。瞄准良心就像士兵瞄准敌人的脸。要想到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讲道。这种想法会把我们带到作为道路、真理和生命的主的面前……要显现出基督的伟大品格……别太关注亲爱的

自我。

为了形象地说明最后一点，牛顿给小组会员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位圣玛丽伍尔诺斯的会众在他从讲坛上下来时夸奖他的服侍，对他说：“先生，您的表达真是精彩极了。”牛顿对此回应道：“先生，在您之前，魔鬼早就这么告诉我了！”

几年之后，折衷派社团吸引了一批在福音派领域中最出色最耀眼的明星，其中包括剑桥圣三一教堂牧师查尔斯·西蒙；克拉朋教区牧师约翰·维恩，他同时也是克拉朋联盟中有影响的人物；深受欢迎的圣经注释学者托马斯·司各特；弗利特大街圣布莱德教堂牧师乔治·帕特里克（George Patrick），他在伦敦的布道吸引了最多的会众，平均每次礼拜活动有1500名敬拜者。这些牧师对广泛的话题讨论之兴趣超过了只限定在神学范围中的争论。几年之后，社团离开了自己的重要传统走向了教会，其中一个成果就是在1802年创办了颇具影响力的《基督教观察者》杂志；另一个成果是开展了基督徒宣教的海外事工——一个先前被圣公会忽视的活动。此活动早在1799年折衷派社团创建非洲和东方宗教使用的聚会中就已经得到了推动，牛顿是开创者之一。1813年，社团变成了英国教会传教士协会（CMS），最后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宣教组织之一。在基督教群体内部，社团取得的成就获得了重要的认可，被认为是带来改变的一种灵感动力。马尔库斯·娄恩（Marcus Loane）在其著作《牛津与福音派后裔》（*Oxford and the Evangelical Succession*）中指出：“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对于最高贵的牧师和所有最具影响力的平信徒来说，它很快变成了伟大伦敦的中心。后来谈及的圣公会进行的某些伟大运动其实都是从这个小组的讨论中产生的。”

20世纪中期，第二折衷派社团成立，人们可以从其影响力的表现上加强对第一折衷派社团影响力的评判。第二折衷派社团由约翰·斯托得牧师（Rev. John Stott）建立，他是伦敦兰涵（Langham Place）万灵学院的牧师，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福音派作家。

约翰·斯托得复兴了折衷派社团，他认为牛顿最初试图给年轻的福音派牧师提供机会去“彼此进行宗教方面的交流……并研究属灵真理”是非常重要的。1955年4月，他从兰涵万灵学院向当时住在伦敦附近的40位牧师当中的22位福音派牧师发出邀请。第二折衷派社团初期的几次聚会很快就人满为患，会员们只好在泰晤士河南北两岸分两个小组聚会。10

年间，在整个英国，第二折衷派社团有 1000 多名会员，有 17 个小组定期举办活动。

2007 年 1 月，约翰·斯托得接受本传记作者的访谈时说，他之所以重建折衷派社团，就是为了让年轻的福音派牧师们有机会进行非正式的交往、坦率地讨论并在一起祈祷。这个复兴社团的唯一规则就是会员必须接受圣经的至高权威，避免玄奥的神学争论。所有的讨论都是私人性的，但社团的存在方式却是公开的。斯托得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帮助稳固教会内部保守的福音派人士的地位，社团中的交往可以帮助个别牧师有信心持守传福音的呼召。”这个 20 世纪的目标早在 18 世纪就已经得到折衷派社团会员尤其是约翰·牛顿本人的热情的证明了。

尽管折衷派社团进行神学和基督教方面的讨论也很重要，但牛顿毫不妥协地坚持要全力以赴把福音传给圣玛丽伍尔诺斯最广大的会众。他善于捕捉时事话题，时刻准备着把他的布道与当前的事件与纪念会联系在一起。这种结合的出色例证就是在演出亨德尔的《弥赛亚》(Messiah) 时他做的 50 场阐释性的系列演讲。1785 年，伦敦举办乔治·弗雷德里克·亨德尔 (George Frederic Handel) 一百周年诞辰纪念庆祝会，这是牛顿开始这个充满雄心壮志的布道计划的推动力。庆祝会主要部分的特色就是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和首都其他颇负盛名的地点举办几场公开的《弥赛亚》演出，有时会有 500 多人的歌手和乐队演奏家出场。人们深深地沉迷在对这个大型音乐盛典的幻想中，大不列颠有几千人长途跋涉地赶来看演出，当时《弥赛亚》的独唱演员就像今天的电影明星一样享有盛誉。

牛顿非常喜欢《弥赛亚》的音乐，他有可能听过作曲家本人指挥的宗教剧，亨德尔在 1759 年去世之前，经常在音乐厅和教堂中演出；牛顿有可能也会在查尔斯广场家中客厅的那架大键琴上弹奏过他最喜欢的《弥赛亚》的独唱曲和宣叙曲。不过，在《弥赛亚》演出的第一场布道会上，牛顿敲响的却是警示的音符。在勉强承认这部以基督为中心的宗教剧演出“在目前的生活中有可能是提供给人以最大最强的满足感”之后，他严肃地警告听众不要沉溺于音乐的享受而忽略了它的属灵含义，这是一个严重的——如果不说是亵渎神圣的——错误。他宣告说：“如果那些经常观看宗教剧的大部分人明显地从来不为救世主的爱所感动，也从来不被他的命令所影响，那么，恐怕这和滥用上帝之名与真理没什么不同。”

再没有谁像牛顿一样如此努力地在《弥赛亚》的音乐与属灵维度之间

保持平衡了。关于这场宗教剧的讲章印了 600 页，差不多讲了 30 个小时。欲对其阐释风格与内容予以简要具体的了解，不妨看看他对《弥赛亚》开篇的独唱曲的处理，此处选自《以赛亚书》40：4：“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山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

牛顿说这句话当中的“一切山洼都要填满”象征的是耶稣跟随者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和状况，但他却以恩典高举他们。他说：“他向穷人传福音，将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拯救罪魁，向被人看为卑微和卑鄙之人敞开希望和救恩的大门。”相反，这句话当中的“大山小山都要削平”形容的是弥赛亚如何因人的骄傲和荣耀而遭受屈辱轻蔑。按照牛顿的说法，耶稣看到“人们通常追求羡慕的财富在最令人羞耻的光照中显现出本质上的虚浮”。至于预言所说的——“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它表明耶稣基督将“柔化固执的人心，驯化他们坚硬的灵”。

在圣玛丽伍尔诺斯的会众中，一定有几位——如果不是一些——曾经听过《弥赛亚》开场的独唱曲的人，他们会记得这样的神学解释。牛顿采用这样的解释具有异乎寻常的非传统性，甚至如他的朋友和敬慕者威廉·布尔所指出的——“在第一场布道中有一种我不喜欢的情绪”，他写信责备牛顿“不应该把旧约的章节应用到耶稣身上，除非它们在新约中被清楚地大量引用。我认为我有进一步可靠的圣经依据可以反驳你的表达。”

牛顿对这样的批评不置可否。尽管他一定知道，采用被布尔所诟病的解经法，他扩延了圣经的常规阐释，他通过以下这段结语总结了对“一切山洼”（在 50 场有关《弥赛亚》的布道第一场中提及）的阐释，坚持抨击由那群灵性愚钝的人提出的将《弥赛亚》世俗化的主张：

那些倾听《弥赛亚》的人要好好地回想，当这些段落被演奏时，你是被其中的思想所感动，还是只是着迷于音乐本身，对歌词却并不太在意，似乎它们无甚意义。然而，它们却正是上帝的伟大真理。愿这些此刻呈现在你面前的句子能引起你认真的思索。

牛顿的理论建立在大多数参加《弥赛亚》百年纪念会演出的人仅仅把它当作一首世俗的音乐来体会，但这个结论未免有点儿过火。18 世纪的英国拥有优秀的基督徒和经常去教堂的信徒，任何人在倾听亨德尔的神圣杰作却不从中领受某些属灵上的激励是不太容易的。当然，《弥赛亚》的

曲作者和词作者查尔斯·詹宁（Charles Jennen）两个人都希望它能成为一部有影响效果的宗教剧。从当时的新闻报道与日记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包括《弥赛亚》对国王乔治三世属灵影响的描述，都可以表明其产生的影响是真实而普遍的。

所以，牛顿对《弥赛亚》只可能起到世俗影响的悲观想法也许是一种个人想象。事实上，当他按序进行50场布道阐释时，他的怀疑似乎消解了一些。他进行的第36场布道是关于“哈利路亚大合唱”，他指出，如果人们能认识到合唱中歌词的真实与力量是取自《启示录》11:15“他（基督）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全国将很快会旧貌换新颜”。

也许，牛顿对这出宗教剧进行的马拉松式的布道热情确实是源于他想把《弥赛亚》百年纪念的盛会变成传福音的机会，尽管他在讲台上讲的话有时听起来令人感觉刺耳，但他成功地吸引了大批会众从教区之外来听他传讲圣经的话语，而且也让亨德尔的音乐获得了广泛的普及。

牛顿一生从未使用过那些现代的术语如“传福音的机会”（*evangelistic opportunity*）和“拓展式布道”（*outreach event*），但是对于他重点侍奉的圣玛丽伍尔诺斯会众来说，这种表达却是再恰切不过了。他从不曾忽略过教区中的穷人，而且经常走访当地新门监狱的牢房。不过，他看到，他的教会坐落在伦敦富人区的市中心，这会让他有特殊的机会把福音传给那些在周边居住或工作的富裕而具影响力的人。

牛顿与教民中更富裕的人群相接触的结果是，他相信富人和穷人一样都需要听到福音。不过，他也意识到，要说服富有的成功人士走进教堂是一个困难的挑战。为了适应这个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群体，牛顿开始为他们做简短的布道，宣称他正在仿效圣保罗“在什么人中就做什么人”，并用“奶”而不是“干粮”喂养那些有权势的听众。

尽管牛顿有时也会吸引有权势的政治人物来听他布道，在他们当中有伦敦的市长阁下——他的办公处所、府邸就在教区内，但牛顿从不曾试图把圣玛丽伍尔诺斯的讲坛变成一个影响政治的讲台。牛顿对其他有此倾向的牧师持批评态度，他指出：“就我而言，我没有转向政治家的诱惑。”尽管他经常保持这种自我否认的论调，但讽刺的是，在牛顿任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区牧师5年之后，他却突然意想不到地变成一位国会议员的密友、固定的通信者和属灵导师，而这位议员注定要成为英国政治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名字是威廉·威伯福斯。

威廉·威伯福斯的导师

没有威廉·威伯福斯，18和19世纪初的英国国会就不会成功地通过废奴法案；而没有约翰·牛顿，威廉·威伯福斯也不会如此热心地投入这场运动中。正是牛顿在1785年劝说这位年轻的赫尔市国会议员不要放弃政治生涯贸然进入教会服侍，也是这位曾经做过贩奴船船长的牛顿以确实的证据支持威伯福斯向贩奴制发起猛烈的进攻。尤为重要的，正是牛顿以基督徒的信心为威伯福斯的政治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协作同盟，使他在废奴提案多年里屡遭失败、屡陷绝境之时，仍能不屈不挠地坚持到底。

在这种背景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牛顿与威伯福斯的关系在历史与属灵两方面的重要性。不过，约翰·牛顿在威廉·威伯福斯的生活中作为导师、知己、战友和亲密朋友的作用经常被低估，所以重新翻看先前那些未出版的书信和日记，有必要对牛顿的影响力进行重新评价是很有必要的。

两个人的合作开始于1785年12月2日，当时约翰·牛顿是伦敦市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堂的教区牧师，他收到威廉·威伯福斯写来的一封古怪的信件。信中强调因为涉及国会，所以要特别保密，否则本不必以如此方式要求安排一场秘密的会面：

我希望与您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我心中满怀疑虑，不知是否应该向您敞开自己，但所有不敞开的理由都是出于骄傲。我确信您会保守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请求以及我的拜访，直到我亲自揭开谜底……

再者，请记着我必须秘密前往，因为会议厅的长廊如今人人都可

以进入，国会议员的面孔已经为众人所熟识。

牛顿收到这样一份请求信一定不免惊讶，他有十多年没见过威伯福斯也没接到过他的信了，但高瞻远瞩的牛顿不难猜出信件背后隐藏的交流内容，因为他是威伯福斯家的老朋友，在威廉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认识他。18世纪70年代，他在奥尼做教区牧师时，汉娜曾经带侄儿威伯福斯拜访过他。当年的小男孩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位26岁的政治家，他经赫尔市国民议会选举进入下议院。不过，就像牛顿所意识到的，威廉·威伯福斯议员已经远离了虔诚的伯母汉娜教导他的严肃和道德的生活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言，到达威斯敏斯特后，他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进入议会第一年我毫无作为——没有任何目标”，这是他自己最初的政治生涯的描述。相反，他变成伦敦社交界的宠儿，一位经常在圣詹姆斯街区如“怀特与布达”这样的俱乐部赌桌边出现的常客，他所承袭的财产、美妙动人的歌喉和与年仅26岁的首相威廉·皮特的亲密关系为他赢得了上流社会的尊敬。不过，1784年和1785年夏天，他在赫尔文法学校读书时的老师艾萨克·米尔纳陪同他周游欧洲，那时他的观念开始有了转变。在威伯福斯眼中，米尔纳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他是一个深谙世故的人”。倘若他早知道那些见多识广中包含对福音派的倾向，他未必还会邀请这位老教师陪他进行假期游历。但是，一旦米尔纳的信仰观念在他们法国之行的交谈中不时地流露出来，两个朋友便开始就信仰和圣经的真理进行了许多讨论，他们还开始研究希腊语的新约圣经和一本流行的福音派图书——菲利普·道得里奇（Philip Doddridge）的《信仰在心灵中的跃升与长进》（*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 in the Soul*）。

1785年，在第二个暑假结束之际，威廉·威伯福斯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念头，以至于内心发生争战，他认为也许他应当脱离国会议员这个世俗的身份，而进入教会做一名服侍上帝的牧师。他相信他必须在两种生涯中做一选择，便决心极为细心谨慎地处理这件事。首先，他打算离弃先前那种精于社交却对政治无动于衷的生活方式；其次，他想让自己有一段离群索居的静思时间，好好探究一下他的职业问题。他把自己的处境向几位朋友包括威廉·皮特做了解释。首相在给威伯福斯的回信（哎，他的后代不再将之据为己有了）中用四个段落建议他慎之又慎，并主动提出要同威伯福斯进行单独会面谈论这个困扰他的问题。皮特写道：

你一定知道我会很自然地想到那促使你如此思考的道德或信仰动机。不过请原谅，我还是忍不住想表达我的担忧，觉得你不过让自己受到了原则的蒙蔽，过分倾向于此，而无法与你自己的目标相调和，无法把你的价值与才干充分地展现出来并使他人和自己获益。然而，我仍然希望我对此不必过分担心，因为你自认有信仰的人不是忧郁分子，也不是狂热分子（循道派）。既然如此，又何必采取那种几乎不可避免要使内心陷于忧郁和盲目状态的离群索居呢？倘若一个基督徒需要在多种关系中行动，那么难道他一定要把自己从众人中脱离出来才能做到吗？的确，基督教的原则和实践活动非常单纯，但它不是单一导向沉思冥想，它也指向行动。

皮特写给威伯福斯的这封充满挑战意味的书信署名日期为1785年12月2日。就在同一天，威伯福斯给牛顿写了那封措辞模糊含混的请求信，希望能够与他秘密地进行“一次认真严肃的交流”。也正是在这一天，威伯福斯在日记中满怀信心地写道：“再次决定去找牛顿先生。这会大有益处，他一定会为我祈祷，会与我这个难于决断之事进行讨论。”

威伯福斯的内心争战与动笔写信都是在12月2日的信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首相提议在唐宁街10号与他进行一次重要的私人会谈，信件从英国政府的白厅传到众议院这位国会议员手中，两处相距大约600码，这使威伯福斯必须加快速度。看来，他当天早些时候收到的皮特的信件是促使他急于请求与牛顿见面的直接原因。

约翰·牛顿不太可能知道威伯福斯想要和他谈论的“自己内心的紧张与疑虑”会与首相的通信有关，牛顿并不知道那封信最后一段的内容——皮特向威伯福斯提出了一个正当的质疑，是基督徒式的沉思还是基督徒式的行动，才是最适合威伯福斯遵循的。不过，牛顿从威伯福斯的书信内容清楚地看到他正处于烦乱之中，伤感的语气和对秘密的强调都暗示出他的情绪和精神状态的躁动不安。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呢？牛顿完全能够猜想出4种理由。首先要追溯到1771年他做奥尼教区牧师时，自他与威伯福斯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就一直在为他祈祷。牛顿似乎预感到当年那个11岁的少年有一天会成长为他的忠心仆人，因此在汉娜·威伯福斯来访后，他写信给她说：“我希望他（威廉）有一天会从生命之泉中汲取喜乐，就像被主亲手种植的一棵树，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经历主对他的栽培、建立和安慰。”

其次，自然是因为他与汉娜保持的亲密友谊。牛顿对威伯福斯在两年前与艾萨克·米尔纳在属灵方面的探索早有耳闻。再次，牛顿清晰地记得自己的归信历程，当他为罪悔改，最终与耶稣基督建立了个人性的关系时，他所经历的痛苦与欢喜。最后，对18世纪圣公会的教会与政府的各种方式了解甚多的牛顿知道，一位前途远大的年轻国会议员倾向于循道会的信仰方式将会遭遇极大的压力。牛顿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重读了这封请求会面的书信，他明白这位年轻的写信人正经受着重大而紧急的灵性危机的折磨，因此他立刻安排在当周晚些时候与威伯福斯见面。

1785年12月7日晚，约翰·牛顿和威廉·威伯福斯相见，这次会面结果最终表明这是一场最具公共重要性和政治意义的重要会面。然而，会面之前的氛围像间谍活动似的颇具秘密性。那天，牛顿坐在家中满怀焦虑地等候这位客人的到来，而威伯斯特比他还要焦虑，他在牛顿居住的查尔斯广场周围徘徊了两圈儿，在海边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两遍，方才敲门。进屋后，他立刻受到牛顿最热烈的欢迎，随后二人开始了深入的交谈，牛顿提供的智慧建议最终改变了历史的行进路线。

威伯福斯在第二天的日记中描述了这次会面带给他的影响：

我在广场旁边徘徊了一两圈儿，劝自己去找老牛顿——与他交谈对我影响很大——他让人感觉非常舒服自然。他告诉我他一直都在期待并相信上帝有一天会带我到他那儿去……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发现内心宁静而平和，我更加谦卑地仰望、更加虔诚地渴慕上帝。

“老牛顿”当时60岁，比这位来访者大了34岁零20天。威伯福斯对他讲述自己在属灵和政治方面的烦乱状态，用词同他12月1日给威廉·皮特的信中所表达的差不多。牛顿对他的现状充满同情。牛顿清晰地记得那种新归信者良心觉醒带来的激烈震荡，他描述了自己37年前在“灰狗号”货船的甲板上经历灾难后归信带来的心灵动荡，并送给威伯福斯一册解释此事的《真实的叙述》。牛顿用个人的真实经历向这位朋友保证，圣灵能够激发人心更新，带来生命的变化；伴随这种属灵上的智慧忠告，他还提供了同样明智的政治上的劝告。牛顿强烈建议威伯福斯不要退出政界，不要抛下首相和其他政府部门的朋友，而要做一位基督徒政治家来服侍上帝。

许多年后，威伯福斯详细地回忆了这场会面，在自传的某部分记录

如下：

我的内心痛苦得无以言表，我想这种痛苦几乎是无以复加的。我想找的第一个让我打开心扉的人就是考珀的朋友——善良的老约翰·牛顿，我在伯父威廉和伯母汉娜家住的时候，经常去听他布道……牛顿对我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善意和体贴，并告诉我他一直惦记着我，从未停止过为我祈祷……在谈话中，他建议我目前要避免与太多宗教界的熟人往来，反倒应该保持与皮特的关系，继续在国会中工作。

牛顿在给朋友威廉·考珀的两封信中都记录了与威伯福斯的谈话。在第一封信中，牛顿描述说“我相信这件事总体上将被证明是重大而幸福的事”，考珀收到此信对这种表述茫然不解，显然牛顿受到威伯福斯出于保密心态的影响而语焉不详。后来，他向考珀承认说他“涂抹了一些已写好的句子，避免信件有可能误投或落入不法者手中”。

不到一个月，这些关于保密原则的担心就烟消云散了。1786年1月，牛顿在第二封写给考珀的信中谈及威伯福斯时更为坦率直接了：

我们又有了几次谈话。我判断，他现在毫无疑问走在正确之路上。他的能力无疑相当强，再加上他的地位和关系等因素，这些都有可能为他提供足够的空间使他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我愿主祝福既是基督徒又是政治家的他。这两种角色少有相似之处，但却并非不能共存。

劝说威伯福斯继续留在“正确之路”上，让他把基督徒的生命与政治家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是约翰·牛顿牧师生涯的巅峰时刻。在与一位满怀属灵热情且大有潜力的年轻的准牧师的会面中，这位老牧者提出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建议。倘若牛顿劝告威伯福斯离开政坛，投身于他所认为的呼召即进入教会事奉，那会发生什么事呢？那将是英国政治和国会历史的损失，尤其对废奴事业将是根本性的破坏。

从威伯福斯的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与牛顿的会面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这位老者的指导越来越热情有力，这位年轻人的信仰也越来越委身。威伯福斯很快就成为圣玛丽伍尔诺斯的会友，在12月接下来的三个礼拜天倾听牛顿在教区讲坛上的布道，还参加了每周

三的周间课程。12月20日，威伯福斯建议牛顿把他们的谈话转达给汉娜·威伯福斯。两天后，牛顿告诉威伯福斯他伯母的反应，说：“我今天看见威伯福斯太太了，她流下了欢喜的眼泪。她说你可以相信她会严格地遵循你的要求。”

这些要求就是一再地强调要保守秘密，不过，此事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在随后的几周里，威伯福斯越来越频繁地需要牛顿的劝勉建议，很快，他们就不再担心彼此交往会引人注意了。

新年之前，威伯福斯定期在周六到牛顿家拜访，他也定期参加周日的教堂礼拜。在这段时期，有那么几次，归信的欢喜被他个人的怀疑所削弱。威伯福斯在日记中吐露说自己觉得“……非常难过，一切都没有意义。比从前更冷——非常不幸”。1786年1月2日星期一，他写道：“拜访牛顿，备受感动：他安慰了我。”

两周后，牛顿在圣玛丽伍尔诺斯做完周日的礼拜服侍后，与威伯福斯一同到他在温布尔顿（Wimbledon）的家中。他们一起吃晚饭，牛顿在那儿住了一夜。牛顿14岁的养女伊丽莎·坎宁安四个月前去世了，这件事一直让牛顿心情沉重，他向威伯福斯倾诉了自己的丧女之痛，当面给他朗读伊丽莎去世后他书写的个人感受。威伯福斯受到了深深的震动，他在日记中说牛顿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宁静与幸福：他读着那篇关于可怜的养女之死的文章，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这些亲密的交流使两位朋友之间的友谊愈加深厚。那天，他们一起为伊丽莎祈祷之后，在温布尔顿公园里散步了好长时间。当时，威伯福斯已经把他与伦敦著名的福音派牧师之间交往的顾虑抛到了九霄云外，就像他与牛顿在公园里公开散步后在日记中满怀喜悦地写下的：“真希望能听见自己现在被公开宣布为一个循道会信徒：愿上帝应允这是在真理的意义上被宣称。”

1786年初，牛顿在许多方面对威伯福斯进行了指导。一个是读书建议。3月，牛顿送给威伯福斯一本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的《忏悔录》（*Confessions*），并推荐他阅读约翰·班扬创作的三本书《耶路撒冷罪人得救》（*The Jerusalem Sinner Saved*）、《靠近耶稣基督》（*Come and Welcome to Jesus Christ*）和《罪魁所蒙的丰盛恩典》（*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牛顿还向他推荐了约翰·弗拉维尔（John Flavel）的全部著作、理查德·艾莱恩（Richard Alleynes）的《对未归正者的警告》（*Alarm to the*

Unconverted) 以及理查德·巴克斯特的《呼召》(*Call*)。牛顿还带威伯福斯拜访了一些福音派牧师,尤其是托马斯·司各特,他刚刚到洛克教堂任牧师。威伯福斯出现在伦敦最著名的福音派礼拜堂,这在牧师和会众当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亨利·维恩(Henry Venn)是克拉朋的前任教区副牧师,他听说此事后,激动地给朋友写信说:“威伯福斯先生到教堂来了,从头到尾听完了讲道。他真是放弃了不少东西啊!”

威伯福斯放弃了过去那种参加俱乐部、赌牌和奢侈舒适的生活,在牛顿的指导下,他开始过一种模范的新生活——每天祈祷、读经、认真地研究道德与政治出版物。1786年3月21日,牛顿告诉威伯福斯他和家人很快就要离开查尔斯广场搬到科尔曼街的新家去,那里离圣玛丽伍尔诺斯更近。牛顿在一封特别强调友爱深情的信中说:“我希望到那时仍能经常在家里看见你,就像在这儿常常见到你一样。无论何时,你都是最受欢迎的客人。总有伟大的事务要讨论、伟大的计划要实施、伟大的前景要谋划,这样用掉的几个小时在我们相见时过得就像几分钟那么快。”

威伯福斯事先预约的拜访和相互的讨论显然越来越经常,也越来越不正式了。4月,牛顿给他年轻的朋友写信说:“你让我对你不要拘礼节,已经很有效果了。”随后,他又补充了一段温暖感人的话:

上帝已经给了我许多朋友,我在心中为所有人都留出了空间。但在我看来,那个更大的空间为你而预备,你是唯一的那个。虽然我们相识短暂,但除了你,几乎没有人能让我借用贺拉斯的话来表达我最诚挚的友爱之情——*Excepto quod non simulesse, caetera laetus* (我们的内心充满欢喜,尽管你——我们的朋友离得那么远)。

在优美的句子和拉丁文诗句的背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牛顿对威伯福斯的承诺既亲密无间又心甘情愿。他帮助这位年轻的国会议员找到并坚守在那条困难重重的“正确之路”上,把宗教信仰与政治侍奉相结合是牛顿的目标。他完成了它。因此,正是牛顿帮助威伯福斯度过了生命中最微妙最脆弱的阶段,人类将永远对牛顿的作为深怀感激,因为这种指导很快促使两个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废除奴隶贸易的运动中。

与威伯福斯通信

威廉·威伯福斯与约翰·牛顿先前未出版的书信在两个人的深厚友谊中放射出耀眼而崭新的光芒来。从他们在1785—1786年间的会面谈话和书信往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若不是牛顿在关键时刻对威伯福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有可能脱离政界进入教会服侍。也是由于牛顿的影响，威伯福斯才一直坚持在威斯敏斯特作一名国会议员，并确信他的道路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在写给威伯福斯的信中，牛顿的语气表明他是这位年轻国会议员的属灵导师，以祈祷和可行的建议支持他，在每一封信的末尾都真诚地祝福他。对这位朋友遭受的政治压力，牛顿予以深切的关注，他经常引用圣经的话语，希望能够激励威伯福斯。在一封信中，他列举旧约中三位官员作为威伯福斯效仿的榜样。1786年5月，威伯福斯提议的《选民登记法案》(Voter Registration Bill)引起国会的震动。在此期间，牛顿写信说：

亲爱的先生，我的心与你同在。尽管我不在你身边，但我仍然能够理解你的处境之重要和艰难。愿上帝赐予约瑟、摩西和但以理的智慧也降临在你的身上，不但引导并赋予你能力处理政治事务，更使你在动荡变化与喧嚣扰攘的包围中仍然坚持依赖他并与他通畅地交流。

在1786年和1787年中，威伯福斯经受着铺天盖地一般的“动荡变化与喧嚣扰攘”，因为在这两年里，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废奴事业中。他与

约翰·桑顿、托马斯·克拉克森 (Thomas Clarkson)、查尔斯·米德尔顿 (Charles Middleton) 先生以及克拉朋联盟其他成员之间的通信是引起情境复杂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是他与威廉·皮特的政治对话。不过，正是他与约翰·牛顿的友谊激发他做出最有名的宣告——支持废奴运动：“全能的上帝在我面前放下两个伟大的目标：阻止买卖奴隶和改革社会（道德）风气。”

威伯福斯在私人日记中记录了这段著名的话，当时是 1787 年 10 月 28 日深夜，他与牛顿整整一天都在一起。从这段文字的上下文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位朋友就当时奴隶贸易进行的讨论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标志着三个进展。

第一个就是威伯福斯写在日记起首处的一句象征性的声明——对他来说，以基督为中心的献身就是全然投入到废奴运动中。第二个进展就是第二天——10 月 29 日威伯福斯给支持废奴的教友派运动领导小组写信请求他们的援助。这封请求信在 10 月 30 日他们举行“促进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后更名为“反奴协会”）的会谈中被记录下来。这份文件开首写道：“财务主管报告说他接到威廉·威伯福斯的信，先生请求能尽快了解到奴隶贸易方面的信息。”一个小组委员会开始为国会议员提供相关信息，这成为国会废奴运动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渠道。

第三个进展来自牛顿。两人见面的四天后，他动笔给威伯福斯写了一封信，自称“关于上次谈话后的一点心得……”。牛顿的这封信标注日期为 11 月 1 日，这封信非常重要，因为它表达了威伯福斯正在忧心挂虑着的三件大事。第一是他在原则问题上的让步应该把握到何种分寸以改变反对者的偏见，赢得他们对其新事业的支持；第二是他应该如何应对不公平的欺侮、谩骂和其他责难，他知道这一切必会在废奴运动的过程中出现；第三件令他担忧的事是他应该如何能在政治运动领袖的世俗生活与献身于上帝的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牛顿与威伯福斯在周日交谈之后，在星期四写了这封长信，他尝试着回答了以上三个问题。对于第一个提问，牛顿的回答并不充分，他只是声明此事“极为重要”，然后重申说：“为了赢得那些对我们有偏见之人，或者最低限度让我们能够利用他们的影响帮助我们推动那些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做好的美善计划，我们能调整自己多少以改变他们呢？”

牛顿在这里对“偏见”一词的使用非常有意思，在该信后面的段落

中，它的含义变得更加清晰了，他预料到威伯福斯在废除奴隶贸易的运动中必会受到那些持偏见者的诽谤和烦扰，预言威伯福斯必将遭受谩骂、侮辱和“世俗的指责与厌恶”的攻击，而后，他在这段末尾引用了那句苍凉的预告——“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牛顿在信的第二部分指出威伯福斯身为基督徒领袖当遵循的生活原则。它们包括要当众承认上帝的呼召，成为一个宗教团体或传讲福音的教会的成员，最重要的是避免世俗性的“娱乐”。这最后一个词在18世纪更为贬义，不过甚至在当时也没有几个人能像牛顿那样把它界定为“想法子消磨时间并且拒绝反省”。也许他觉察到，这个年轻人不但知晓而且能够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他也许有必要更进一步提供建议，告诉威伯福斯他仍有不计其数的机会表明他的信仰并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严峻苛刻、不善交际的人。

从这封信可知，在他们以前的会面中，牛顿显然扮演着一位长者的角色，是年轻人的道德和属灵导师，他以满腔的热情和深情来完成这个任务。在11月1日写给威伯福斯的信的开头，牛顿说他们打从第一次见面两人的关系就十分亲密，以至于——

……在陪伴某些我十分热爱和尊敬的人时，我感觉自己很想从那种缄默沉闷和尴尬不安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在我看来，似乎没有哪个地方能让我像与你在一起时这样放松自在、无拘无束地思考，这样毫无顾忌地交流了。

信中最后一句表明牛顿与威伯福斯的友谊既亲密又坦率。不过，牛顿的信总是围绕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向威伯福斯反复重申，上帝对他的高举就是选择他为英国的公共生活服务。一个早期的例子可以说明牛顿对此事的确信。1788年春天，威伯福斯得了一场重病，医生对他的病很不乐观，但牛顿却对这位朋友的康复充满信心。当他听到病人转危为安的消息后，他写信给威伯福斯说：

当你身处幽谷之际，我的希望远远超过我的忧虑。上帝已经赋予你愿望与机会，就是去努力促进英国的政治、道德和信仰的社会保障，并赐给我合宜的说服力，告诉你他高举你也必要扶持你，使你成为大众的祝福。我以谦恭喜悦的心情期盼着你像精金一般熬炼出炉。

威伯福斯投身的废除奴隶贸易的事业好比是寻找精金，但是熬炼成功需要历经艰难。当时因为与一般人的愿望相抵触，1795年3月，这场运动经受了最激烈的一次反对。自1796年1月开始，威伯福斯的废奴提议在国会遭到17次否决。作为动议的提出者，威伯福斯对此深感绝望，有一段时间很想放弃他的战斗。这时，一封来自牛顿的书信一定让他深得安慰，它提醒他看到上帝的主权：

先生，你为穷苦的非洲人争取利益，这种行为可谓高贵。我相信你必会得到奖赏。不过，我也相信，现在这件事被交在了一个更高者的手中。倘若人类长期不清理他们的伤口，我相信主会自己做。我毫不怀疑，如果反对派最近牺牲了你的动议，那就证明它是我们的西印度群岛失利的前奏曲……不过，在做结论之前，我愿意让你的内心留下一个更有力的印象——主在掌管。他知道人心。他正在按照最佳方案实施他的伟大计划，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

威伯福斯不断地接到牛顿的信件，在这种鼓励和祈祷的支持中，他大为感动。因此，他经常在回信中这样说：“亲爱的先生，请别放下您举起来的手。”1788年写这封信时，他正准备开始在国会中提出废奴议案，他说：“请为我祈求，因着神圣的恩典有能力抵挡并胜过所有反对拯救方案的对手。我所行的路特别陡峭艰难，充满危险，但奖赏却是属天的荣耀冠冕。”

尽管在威伯福斯和牛顿的通信中有许多地方涉及废奴运动，牛顿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请看下一章），但这绝非两位朋友共同努力的唯一一项重要的事业，他们还曾共同致力于争取在运囚犯移民到澳大利亚或新荷兰（当时的叫法）的“第一舰队”的船上，派遣一位牧师随行前往。牛顿身为圣公会的老牧师，唯有他认识到，在一块新的未知大陆上安置囚犯的惩罚性派遣意味着一个伟大的属灵的机会。他游说威伯福斯发挥他作为国会议员的影响力，确保有一位牧师随第一舰队出行。在提议派出专职牧师时，牛顿推荐了他提名的福音派牧师人选，他就是理查德·约翰逊牧师（Richard Johnson），牛顿向威伯福斯推荐时说他的宗教观“朴素、完整而谦逊”。牛顿就此事还游说了约翰·桑顿，在他的协助下，威伯福斯说服了皮特。这次介入的结果是首相下令，理查德·约翰逊被任命为博坦尼海湾（Botany Bay）新殖民地的牧师，1787年与第一舰队所载的囚犯同

航。看到澳大利亚在过去 225 年里基督教的发展，可知牛顿的先知先觉何等重要。1786 年 11 月 15 日，牛顿给威伯福斯写信说：

借着你，在南半球，令福音广传已经有了一个可喜的开端。有谁能告诉我们，因约翰逊先生远赴新荷兰（即澳大利亚），将会发生何等重要的事呢？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是件小事。一块奠基石与矗立其上的大厦相比是极其微小的，但它却是整个建筑的开端和保证。

牛顿和威伯福斯为国内和海外的福音事工奠定了好几块意义重大的基石。1793 年，在南安普敦，一位福音派教区牧师被任命到圣迈克尔教堂和众圣徒教堂任本堂牧师，这是威伯福斯受牛顿之托与大法官商谈的结果，大法官是牧师薪俸的赞助人。牛顿给威伯福斯写信说道：“我无需告诉你这对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城市有多重要，倘若这些居民或者其中任何两个人能够被一位忠心传讲福音的牧师所获得。”牛顿有许多次以各种方式向这位具有影响力的朋友、国会议员发出呼吁。在威伯福斯的帮助下，福音派的牧师也能够被派往远至约克郡和康沃耳郡的教区了，但仍然出现过一次失利。1795 年，牛顿所在的伦敦市相邻城区圣海伦的主教门教会的执事们想要一位福音派的带薪牧师，但他们害怕候选人古恩牧师（Gunn）遭到林肯主教的否决。牛顿给威伯福斯写信请他就教会执事们的选择和主教好好谈谈，他说：“我绝对相信，如果古恩先生能够当选就任圣海伦的牧师，这对你最渴望推进的事业会有极大的帮助。”但两个朋友的游说努力还是以失败告终。不过，在其他方面，他们的事业仍然兴旺发达，特别是在印度（在威伯福斯写信给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后）有好几位牛顿认识的福音派牧师被任命派往孟加拉差传会（Bengal Mission）。威伯福斯对海外基督教差传会如英国教会传教士协会和基督教知识促进会（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Christian Knowledge）的发展都非常有兴趣，这主要应归功于牛顿在通信中对他们的工作的介绍。

也许书信往来中出现的最重要的插曲是在 1796 年 7 月威伯福斯写给牛顿的信中，他说自己正在考虑从公共生活中退出来。如果威伯福斯得到的回应是支持他离开国会，那么这对废奴运动将是一场毁灭性的损失。幸运的是，牛顿强烈建议威伯福斯继续坚持完成他的政治生涯。他在 1796 年 7 月 21 日的回信中说，威伯福斯最近在赫尔市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其实是上帝赋予他更多工作的一个标志：

倘若采取合适的措施使你继续待在国会里之后，你仍被排挤在外，那么你就不会这么悲伤了。你应当仰望至高者的手，要看到这是上帝的提示，主在那儿并未给你太多的托付。从这个角度我认为，你本应满怀感恩接受你的退隐（辞职），但我希望这是一个永久性的标记，表明他还没辞退你呢。

牛顿对威伯福斯渴望安静地度过个人生活，避开“那些令人厌倦和烦恼的事务”表达了同情，随后，他继续提醒通信对象，他的职责就是推动上帝的事业，为民众谋福利：

你在议院拥有一个席位可能带来的所有益处目前还无法一一计算，但一个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榜样甚至这个人的在场对其他人都可能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尽管这未必当时就能看到。你不仅仅是约克郡的代表，你更是伟大荣耀之主在那个许多人都不认识他的地方的代表，这是一个机会，你要在他们面前展现你是将你所理解的信仰当作事业，它才是真正的成果。

牛顿用普遍现象和个别例证来提醒威伯福斯，他已经在奴隶贸易活动的改变（尽管它仍然未被废除）和其他领域比如向澳大利亚或称新荷兰派遣传牧师等方面取得了成效：

尽管你仍然没能在孜孜以求的废除奴隶贸易议案上取得完全的胜利，但这项事业仍然在向前进；因为你的动议，目前英国的奴隶状况无疑已经得到改善。同样地，我相信如今在新荷兰的约翰逊和马尔登（两位福音派牧师）也会感谢你，我坚信尽管在那儿已撒的种子和正撒的种子并不令人乐观，但荣耀的上帝会看顾它们的生长。

牛顿在信中最后的呼吁是基于他将威伯福斯和但以理相比较：

你生活在艰难恶劣的环境中，你需要更加地警醒和祷告。不过，就像你所知道的，无论你需要帮助还是需要寻找一个地方，我都愿意把大利乌王对但以理所说的话也说给你听：“你所常侍奉的上帝，他必救你。”但以理同样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也处身于危急的环境当中，但他相信上帝，他就在职位上忠心，因此，尽管他四面受敌，他们却无法胜过他。

很难想象还有谁能写出比牛顿更睿智的书信劝阻威伯福斯放弃退隐之念了。他提醒威伯福斯要看到当时奴隶贸易变革之路所取得的成效，这对威伯福斯继续坚持废奴运动这一最高目标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他用但以理来作比较（“同样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真是再恰当不过。尽管从故事层面看，威伯福斯并未经历过但以理的流亡，也未被扔进狮子坑，但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他在国会议院中成了一个孤立者；更糟糕的是，他因反对皮特的某些政策而被当成反对党。因此，牛顿选取了这些与其相关的圣经人物恳求他留在国会以成就主的旨意，牛顿用一篇吁请的文字来回应他的通信者。11年里，这是第二次，他以睿智的劝导说服威伯福斯不要离开国会，继续坚守在那儿以完成上帝的旨意。

在他们长期的通信中，正如许多信件所表现出来的，牛顿大多数时候的角色是一位长者和经验丰富的教师，而威伯福斯虽然颇具影响力，却无疑是一位受教的学生。不过，两位朋友之间的彼此看望和通信近12年后，他们的位置却产生了翻转，至少在牛顿的眼中是这样。这要从1797年威伯福斯出版他称之为“我的宣言”的书说起。这本书承袭了当时的长标题风格，叫作《在我国上等与中产阶级宣誓入教的基督徒当中盛行的信仰实用观点与真正的基督教之差异》（*A Practical View of the Prevailing Religious System of Professed Christians in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in This Country Contrasted with Real Christianity*）。威伯福斯送给牛顿一册新书样本，还有一封言辞漂亮谦逊的信笺。这位羞怯的作者写道：“我无法设想您会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把它全部读完，所以我建议您只需浏览一下第三和第四章，也许就能得出结论了。”

牛顿对这个认为他只需浏览《真正的基督教》两第三章即可的建议抱以戏谑式的怀疑，他抗议道：“亲爱的先生，的确，我有许多要事要办，但是您怎么能认为我会满足于只是随便翻翻您的书呢？”此外，他不但全部阅读了，而且还读得津津有味，他高度赞扬《真正的基督教》。他在一封信中告诉威伯福斯：“我相信它是当代最有价值最重要的出版物。”他在另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每个家庭都应该有这本书。”

威伯福斯相信，在该书中提到大多数上等和中产阶级的信仰不符合真正的基督教有可能让他们感觉受到冒犯，但牛顿的赞赏却证明他的教导是正确的。《真正的基督教》变成了一本大畅销书，在5个月的时间里，在英格兰重印了5次，被译为4种外语，畅销海外。

《真正的基督教》的成功至少有两个方面要归功于牛顿，即在该书出版前10年中他对威伯福斯属灵上的引导。威伯福斯在《真正的基督教》中提出的“基督教的独特原则”大部分来自牛顿的信仰原则，强调要深切地忠实于圣经和圣灵引导的属灵更新。牛顿在下一封向作者表示祝贺的信中说：“你不但坚固而且拓展了我的几个重要观点。”他甚至说在反复阅读3遍之后，他仍然能够从中找到更多要学习的东西。

牛顿与威伯福斯的通信还有最后一个特点应该被提及，牛顿在许多信件末尾处都以祈祷和祝福不断地鼓励威伯福斯。这些语言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似乎有些做作，但在彼时彼境中，威伯福斯很可能被牛顿停笔处的那些祈祷式的美妙言辞所感动：

愿主祝福保守你，亲爱的先生，愿他使你像一座水气滋润的园子，永不枯竭的泉源流遍你所有的沟渠。

我特别为你祈求，愿主赐你智慧、恩典和力量好使你能够承担这个重要而艰难的职分。

愿主安慰你的劳苦，赐你渴慕的心愿意为他人的益处而工作，愿他以智慧、恩典和安慰充满你的灵。

我的心常与你在一起，我的贫乏的祷告也会经常记念你。愿主加倍赐你他的灵使你得着优势，并挪除你周围的种种艰难险阻。愿你在他的平安中喜乐，愿他借用你来影响、推动并祝福更多的人，使他们获益。

非洲众多奴隶的福祉是威伯福斯和牛顿通信和交流的长期话题，也是他们投身于废奴运动的核心动力。牛顿对这场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在关键时刻影响了威伯福斯。不过，牛顿也以自己的方式成了一位最具影响力的运动参与者，他有前贩奴船船长的特殊经历，他以一位见证人的身份在公众面前积极支持废奴事业。

废奴运动参与者

1788年1月，牛顿出版了一本轰动性的、极具影响力的小册子《对非洲奴隶贸易的思考》(*Thoughts Up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成为废奴运动的公开参与者。在此前的几年里，他曾私下就这个题目坦率地发表过看法。1840年，罗伯特和塞缪尔·威伯福斯编辑出版了父亲的通信集，他们在前言中写道：“我们尽可能地搜集了牛顿先生关于这个题目的看法。”他们继续说：“他（指牛顿）对自己早年参与的这种邪恶行径一直深感懊悔，威伯福斯先生多次说，‘在每次一个半小时的交谈中，他没有一次不提及这件事。’”

懊悔是牛顿决定出版《对非洲奴隶贸易的思考》一书的动力之一。他在小册子开头一段写道：“我希望它能够成为经常让我羞愧地反省的题目，我曾经积极地参与过这种贸易，这项如今令我魂惊魄颤的活动。”他声明说，即使他的证词有些多余，“然而我的良心要求我必得通过当众忏悔以去除自己的羞耻。”

牛顿的证词在改变公众的意见以推动废奴事业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准备编写小册子时，他自己心里清楚这个动机，因此这本小书将政治、道德和人道的呼吁巧妙地融汇在一起。

牛顿提出奴隶贸易的“第一宗罪”就是英国海员的死亡问题，这说明他颇具政治头脑。要知道，一个海上国家，国会传统上要优先保护海员和水手的安全，牛顿在小册子中谈及第一个论点时便开列了一份冷酷的目

录，列出贩奴船上导致英国人死亡的各种因素——恶劣的天气条件、非洲瘟疫、不治之症、奴隶的故意投毒和奴隶暴动，牛顿说一年内会有 1500 名海员死亡。不清楚这个数字是如何统计出来的，但牛顿亲身经历过他所描述的种种危险，这个数字应当具有可信性。

《对非洲奴隶贸易的思考》的第二个论点认为这种生意必然带来腐败堕落的影响，应当受到道德谴责。牛顿指出：“我不知道还有哪种捞钱的方式——就连在马路上抢劫也不能像它这样势必磨蚀人的道德感，夺取人心的温柔与慈悲，使人像铁石一样刚硬，冷酷无情。”写作时，他把 1750—1754 年的航海日志放在旁边。英国船队每年运送超过十万的奴隶，他详述了他们遭受的残忍可怕的折磨与虐待的细节。

在对“残酷的鞭笞”、夹指钳和对暴动的男性奴隶施以令人发指的酷刑进行简略却可怕的描写后，牛顿对非洲女性的境遇予以特别关注。他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妈妈怀抱婴儿被赶上一条装奴隶的大艇，划艇赶往奴隶船的途中，婴儿的哭声打扰了大艇上的大副，他威胁让孩子闭嘴。最后，这个大副怒不可遏，他亲自让孩子闭上了嘴——从母亲怀里一把掠过婴儿，丢进了海里。

描述完这个极其恐怖的故事之后，牛顿随即反问道：“难道只有孩子才有此遭遇吗？”他随后又讲了一个更加悲惨的故事，因为淡水不足，100 名成年奴隶被扔进了海里。在下一段中，他指出这种暴行是出于保险的目的，“好使保险商承担损失，不然，死在船上的奴隶造成的损失必须由船主来承担。”有人说小册子中这些特殊的故事属于道听途说，牛顿斩钉截铁地宣告说，这些是“人所共知不容辩驳的事实”。对于船上经常出现的对女性奴隶的性虐待问题，他多有涉及，而且证据确凿。他写道：“当妇女或者少女被带到船上时，她们赤身裸体，浑身发抖，满脸惊恐，被寒冷、疲惫和饥饿折磨得筋疲力尽。她们经常遭到白种野蛮人放荡而粗鲁的强暴。”

他随后的目击报告更清晰地说明了这点：

可以想象一下，猎物已经分配完毕放在某处，只待提供合适的机会就可以预订了……没有人会想到要请求同意……据我所知，我们许多舰船允许（如果不说是鼓励）采取诸如此类的对待方式——她们（非洲妇女）被毫无限制地抛给新来者，满足他们的肉欲。

牛顿在青年时代也是那些新来者中的一个，他隐瞒了那些奴隶遭受性虐待的细节，尽管有这样一些句子比如“这并不是一个能说得出来的话题”或者“为了读者的缘故，我不想详述某些细节”，但是显然他从叙述中过滤掉了最恶劣的虐待。在小册子中这一部分的末尾处提及对非洲女性奴隶进行性剥削的问题，牛顿向那些在自己的英国女性家属面前为这些行为辩护的人士发出挑战，他写道：“的确，如果贩奴支持者们试图在那些生活在幸福国度的妻子和女儿面前，或者在那些有自己妻子和女儿的人面前为此辩解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哑口无言。”

那些希望抵制这种观点，听任奴隶贸易继续进行的人的理由部分地来自于这一荒唐说法：对欧洲人来说是残忍对非洲人来说未必就是残忍。牛顿说，这是基于他们相信“非洲妇女是黑色人种，属于野蛮人，她们对文明人中间流行的美好情感全无知觉”。

牛顿拒绝接受这种种族主义的谬论和那些以赞美之情谈论此观点的人。他写道：“我要以最强有力的措辞来驳斥他们。我在这些人们想象中的野蛮人中间长期生活，交往甚多。我经常在他们的城镇安睡……我对舍布罗岛（Sherbro）的妇女非常熟悉，我曾经见到过许多端庄且优雅的女子，她们媲之英国女性毫不逊色。”

牛顿坚持认为，在诸如个人尊严和荣誉方面，非洲女性应当获得与欧洲女性一样的尊重，这种观点在那个时代无疑具有革命性。不过，在这场废奴运动中，他、威廉·威伯福斯及其他领袖人物都知道，他们不但要颠覆商业行为导致的对非洲人的错误认知，他们更要结束牛顿在小册子最后一行中宣称的“非洲奴隶贸易这样充满无与伦比的邪恶、残酷、压迫和破坏力的”商业活动。

牛顿的《对非洲奴隶贸易的思考》无论在商业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小册子立刻取得了成功。它被两大著名书商圣保罗后院72号的J.约翰逊和帕特诺斯特·劳大街的J.贝克兰德印刷和发行。他们显然对这位作者的畅销潜力很是看好，因此在1788年1月26日出版的那天，两位书商联手为《对非洲奴隶贸易的思考》一书做了一个大广告，连续三天在大众报纸上做宣传。这种销售策略不同寻常，也取得了相应的效果。尽管小册子售价高达1先令，仍然大为畅销。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个主题是对1787年12月威伯福斯的宣言在更高层面上的时事解读，威伯福斯正准备在下议院新一轮的会议中提出这个议案。

这场争论导致的结果是公众读物中出现了大量废奴主义者的写作。牛顿的小册子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它既是目击者的真实报告，其作者又颇负盛名，而且它与国会的进程紧密相连。牛顿自己对这些潜在的联系因素早有预见，书出版前，牛顿写信给老熟人北安普敦浸信会牧师小约翰·里兰德，他写道：

你是自由和人类的朋友，听到我的那本关于非洲奴隶贸易的小册子（我希望一周或10天之内它能出版）正在印刷，你一定不会感觉遗憾。身为目击者，我能够书写这个题目，而且我曾经长时间积极地投身在这种活动之中。如今，在国会将要召开会议涉及此事之前，我认为自己理应大声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在信的下一段，牛顿吐露说他没从《思考》一书中获取一分钱作者版税。他写道：“我的小册子将售价1先令，我不会从本书获取丰厚回报，因为我已经将其拨付主日学协会（Sunday School Society）使用。”4个月后，牛顿在书出版后又给约翰·里兰德写信评估《思考》一书的影响：

我已经让那本反贩奴的小册子扩大了发行量，但我希望我的出版只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证明我是一个称职的而非偏颇的目击者。目前公众的普遍看法是反对这种商业活动。这种活动还不能立刻被取消，但我期望它会逐渐减少，直到最终停止。

牛顿在这封信中使用“目击者”一词是很有意味的，因为它可能表明他事先已经与威伯福斯讨论过，在下议院特别委员会要求对奴隶贸易提供证据时他出席的可能性。1788年1月，威伯福斯建议在下议院和枢密院共同的委员会面前召证人作证。不过，证人实际上是由委员会成员选择的，其中一些人可能从未听说过约翰·牛顿牧师年轻时代曾经做过贩奴船长。为了保证牛顿的专家身份能够为听众尤其是那些议员们所广泛知晓，“促进废除奴隶贸易协会”积极投入行动。这个意志坚定的著名废奴社团决定在1788年1月29日的会议之前买下所有未卖出的牛顿的《对非洲奴隶贸易的思考》。这个社团还决定要求再加印3000册。因此，《思考》一书出版仅三天就全被买下，这一定让牛顿的出版商约翰逊和贝克兰德欣喜若狂。根据这个社团的文件记录，它当时买下了全部3580本小册子，在11月17日转售或发送了3570本，仅为自己的目的留下了10本。

“促进废除奴隶贸易协会”的文件记录说最终在 1788 年 2 月 5 日把牛顿的《思考》送到了两院每位议员的手中，是按时精心分送出去的。记录提及小册子时还表明，2 月 18 日，在威伯福斯提出废奴议案之前，所有的议员和贵族都收到了它。牛顿身为废奴运动参与者的第一本出版物很自然地到达恰当的人的手中，在某一天，这些恰当的人 would 希望面见他。

在 2 月第三个星期，牛顿收到了枢密院让他做证言的邀请。这个由皇家高级顾问和内阁成员构成的小组由首相率领，在圣詹姆斯宫听取贩奴贸易的证词。牛顿在接待室等待作证时，很惊讶地看到首相亲自前来迎接他。威廉·皮特是国王的首席大臣，他彬彬有礼地护送前贩奴船船长约翰·牛顿进入举行听证会的会议厅。牛顿把这种特殊的礼遇归功于威廉·威伯福斯的影响，他在随后一封表达感谢的信中说：“我认为应当把这归于您的善意，皮特先生亲自迎接，并把我介绍给枢密院。”

在回答枢密顾问官们（他们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财政大臣、下议院发言人、海军大臣和首相等）的提问时，牛顿提供了几个有关奴隶贸易的黑暗残酷但引人注目的事件。他说自己在舍布罗河流域购买过几百名奴隶，每次运回船上两三人。他从非洲和欧洲的贩奴者手中购买奴隶，但他的一个结论是“有相当多被卖到舰船和渔船上的奴隶是被绑架和抢掠来的”。

一位委员问牛顿，是否奴隶们表现出“对被卖为奴很担心或者不情愿”？

牛顿答道：“他们经常一见到海就很担心，他们以为他们会被买来吃掉。”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非洲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举止，牛顿回答说：

当地人未与欧洲人来往时都非常善良温和。如果他们认为欧洲人从心里在乎他们的利益时，他们自然会勤劳苦干，容易管理，但是奴隶贸易有一个倾向就是以残忍冷酷的方式对待当地土著和被雇佣者。

在说到贩奴船上的情形时，牛顿毫不客气，他说在对待非洲人方面，英国水手比其他国家的海员更冷酷更残暴。他解释说，一艘 100 吨的英国奴隶船通常会装载 200 多名奴隶，“通常戴着枷锁，时不时地被锁在甲板上”，人员拥挤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高死亡率。他做大副首航时，他所在

的商船布朗罗号运载了 220 名奴隶，在从西非到南卡罗来纳的三周行程中，有三分之一的奴隶丧生，这个死亡率被认为是正常的。不过，在他第三次和最后一次以贩奴船船长身份参与的航行中，在他所在的新船非洲号上，没有一个人死亡。牛顿说：“但我不曾葬过一个白人或黑人。”在写给枢密院的一封补充说明信中，他对他的证词予以解释，指出零死亡率“可能是当时知道的唯一的例子”。他把这归因于这个事实——他当时奉命限期离开几内亚湾，因此在船上还未装满奴隶时，他就得启航。牛顿说：“我载着买来的奴隶启航赶往西印度群岛，原先装载 220 名奴隶的船上装了不到 90 人，这个数目对我的商船来说正合适。我从前都是装满了买来的奴隶之后才离开，毫无疑问，我应该对通常船上因为拥挤造成的死亡负主要责任。”

尽管不清楚牛顿的证词对枢密顾问官员们究竟产生了何种效果，但他关于奴隶贸易的著作和布道讲章显然对更为广大的公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要感谢“促进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对他的协助，这个团体后来更名为“反奴协会”。这个著名协会的一位成员理查德·菲利普斯（Richard Phillips）曾经请牛顿找考珀为反奴隶贸易写首诗。考珀一开始拒绝了，他说：“我无法不带着满腔忿恨去思考这个主题，这让我的精神很受影响，我无法沉静下来写出诗句。”不过，牛顿用一种更具摧毁力的武器来支持菲利普斯，他在一封信中讲述了他熟识的一位贩奴船船长亲口告诉他的可怕暴行。1788 年 7 月 5 日，牛顿在给菲利普斯的信中写道：“我和一位船长同行，时不时地从他嘴里听到一些残暴的细节。”他在信中说：

惩罚那些被他判了死刑的可怜的奴隶有两种办法，我至今难以忘却。他把那些人绑到一起，把其中的一些人切成一块一块的肉，也就是用一把斧子先砍下他们的脚，然后是膝盖以下的小腿，然后是大腿；再用同样的方式砍他们的手，然后是肘以下的手臂，再然后是肩膀，直到整个身体只剩下一段躯干，仿佛被削掉所有枝杈的树干；最后，砍下他们的头颅。在整个进程中，他不断地把那些发出恶臭气味的四肢和脑袋扔到那群瑟瑟发抖的奴隶中间，他们被铁链锁在主甲板上。他用一根细细的软麻绳捆住其他奴隶的脑袋的上半部，水手们把这称之为找点，这一点使绳子松到恰好可以塞进一根短杆，通过他不断地转动短杆，绳子越勒越紧，直到最后把他们的眼珠勒出来。当厌烦了对他们的折磨后，便砍掉他们的头。

当牛顿给菲利普斯的信在委员会成员面前被朗读出来时，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使人深受震动。有人问牛顿为何没把这段船长对奴隶实施的变态虐行写进自己的小册子《对非洲奴隶贸易的思考》中，牛顿解释说：“我没把它写进去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是我曾知道的这种暴行中的唯一一例，我也希望它是我曾听说过的唯一一例。”他又补充说，他未提及此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对读者情感的考虑，现在说出来，是因为受到“那些建议他讲出此事的朋友们所做的令人尊敬的判断”的影响。

牛顿对奴隶贸易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这为他赢得了许多朋友。1790年，在多次拖延和受阻之后，下议院的特别委员会传他作证。委员会发言人让他“谈谈买卖奴隶的情况”。5月12日，牛顿成为明星证人。以国会议员威廉·杜宾先生（William Dolben）为首组成的12人左右的贵族委员会，其中一些人明确支持奴隶贸易，他们就威廉·威伯福斯曾经提出的相关议案向这位前贩奴船船长予以广泛询问。

牛顿曾经5次航海至非洲海岸，其中3次以贩奴船船长的身份航行，他早已因此树立了自己作为证人的权威性。他从描述他所遇到的当地土著的性格品质开始。

国会议员提问道：“你对黑人的性格品质怎么看？”

牛顿回答说：“舍布罗人具备一定的文明水平，通常很友善，在他们未被欧洲人欺骗过之前，他们是可以信任的人。我曾经在他们当中过得非常和平安全，当时，我是那个地区唯一的白人。”

另一位国会议员问道：“你如何看待非洲，当地人与欧洲人交往时是使他们更为文明了呢，还是让他们更堕落和卑鄙了呢？”

牛顿回应道：“他们通常在行为举止方面会变得更糟糕，就像他们对我们的认识一样。”他继而描述英国贩奴商如何利用欺诈、偷窃和绑架的方式夺得奴隶，而且不付任何成本。他补充道：“最擅长玩弄骗术的人在商业活动中被看作是最机敏最聪明的人。”

当提问从陆地上的买卖奴隶转入奴隶在海上商船中的待遇时，牛顿的证词变得更加具有震撼力。

他告诉委员们：“在塞得满满的船上，奴隶们的实际境况非常恶劣。”他解释说他们得“一直戴着铁链，挤在小房子里……几乎无法呼吸”。

一位国会议员问道：“通常会用什么方式惩罚奴隶？”

牛顿答道：“大多数时候是用鞭子狠抽，某些长官还会额外使用夹指

钳。”不过，他没告诉委员会的是，在他自己做奴隶船长官时，他只对暴动的非洲奴隶才动用夹指钳。

关于鞭打，牛顿提到了某些奴隶船船长也用同样残暴的方式对待英国水手。

他说：“再没有哪种商业活动能像非洲奴隶贸易这样使水手遭受如此没人性的虐待，我曾亲眼见到那些因为生病或懒惰而遭毒打的人，他们会被活活地殴打致死。”

一位大受震动的提问者问道：“奴隶贸易怎么会造成这种后果呢？”

牛顿说：“以冷酷的方式对待黑人真实或者假定的需要，这会让人的人心肠逐渐地变得麻木冷漠，使得大多数人对同伴同类遭受的痛苦毫无感觉。”

他随后说得更为清楚明白——这种对他人的痛苦毫无感知的冷漠继续蔓延到贩奴船所抵达像安拉瓜和查尔斯顿这样的港口，在那里他们把“货物”从船上赶下去在奴隶市场上拍卖。

也许牛顿在下议院特别委员会面前所作证词的高潮就是当他被问及：“在售‘货物’时，可曾想到要避免让家庭成员彼此分开？”

“从不曾想到过这一点。”牛顿答道。在证词结束之前，他略作停顿，说出最令人寒心的一句结论：“他们被生生分离，就像绵羊与羊羔被屠夫分开一样。”

在国会议员面前谈论奴隶贸易的屠杀性质和暴行是牛顿的一个任务，他以无可抗拒的威力和影响力完成了这项任务。他的著作和他作为目击者出具的反对贩奴贸易的证词分量极大，这是因为他拥有毋庸置疑的真实、令人尊敬的克制力和道德的权威。这些品质使他与南伦敦的威伯福斯小组的祈祷者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就是著名的（最初曾受到蔑视的）克拉朋联盟。在与他们的合作中，尤其在1787—1790年间的废奴运动中，牛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他的废奴事业却因一件悲伤的个人事件而中断——他亲爱的妻子波琳去世了。

波琳去世

在牛顿公开参与废奴运动斗争的那些年，他的个人生活因为波琳身患癌症而蒙上了阴影。她长期患病并因此去世，这对牛顿来说是最大的试炼。牛顿胜过痛苦的方式表明了他与上帝之间建立的坚固崭新的关系。

在30多年里，波琳的身体一直很虚弱。她丈夫把她的身体痛苦统称为“多种慢性病”，这让她经常一连几个星期躺在床上不能动。不过，在身体健康的阶段，这些疾病只是一些小点缀。因此，在1788年以前，波琳通常的身体状况属于时好时坏，但此后，她感觉胸部越来越疼。

当年10月，波琳把自己的症状告诉了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她事先没和丈夫说看病这件事，但拿回来的诊断结果异常糟糕：医生在她的胸部发现了一个肿瘤，有“半个甜瓜”大小。他明确指出这是无法手术的，他能给患者提供的唯一药物就是频繁使用鸦片酊控制疼痛，她得尽可能地保持安静、不活动。在随后的半年里，波琳的肿瘤让她疼痛难耐。不过，从1789年4月开始，疼痛突然消失了，但她的身体状况却在不断地恶化。对于妻子从疼痛中摆脱出来的事，牛顿是这样解释的——“仁慈的上帝垂听祷告伸手安慰了她”，然而，波琳日渐衰败的状态使他愈发确信医生的准确预测。

从1789年春天到1790年秋天，面对死亡的逼近，用丈夫的话来说，波琳的信心表现得“可堪效仿、乐观……令人惊奇”。她在圣经每卷书的每一段都做了标注，她研究艾萨克·沃兹博士的赞美诗，在《奥尼赞美

诗》中标出自己最喜爱的圣诗。但是在1790年10月，她突然恐惧死亡，信心大失；她对丈夫变得异常冷漠，她的困惑继续蔓延，她对圣经的真实性和上帝的存在失去感应。当死亡日渐临近时，她从前的信与爱发生了戏剧性的颠覆。牛顿被妻子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所扰乱，他描述说，“这是我经历的试炼的最高峰……真的很难忍受。”

波琳·牛顿的怨恨与怀疑的衰退也像其萌生一样，都让人料想不到。经历了大约两周的混乱，她突然重新获得了上帝的安慰，对丈夫重生眷恋之情。对于天上的父和地上的配偶，她再一次充满感恩。1790年11月，她的身心都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但她仍然鼓足力气表达她对丈夫的同情与理解，就在这时，他们两人都经历了悲哀的猛击。

这场击打就是克拉朋联盟成员约翰·桑顿的去世。在过去的30年里，他是牛顿最慷慨的赞助人和最能够激发其灵感的朋友。没有桑顿的扶持，牛顿永远不可能成为圣玛丽伍尔诺斯的牧师，他的书籍也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他在奥尼的事工也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从私人方面来说，牛顿和威伯福斯的联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桑顿的作用。正是桑顿对废奴运动充满仁爱的领导，使得克拉朋联盟在新教教会和政界都获得了极大的影响。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约翰·牛顿都有足够的理由赶赴约翰·桑顿的追思会。

但在桑顿葬礼的当天，牛顿仍在犹豫是否应该赶去参加，因为他觉得那天早晨波琳也危在旦夕，他希望在她弥留之际自己能守在她身边。但波琳坚持让丈夫出席最重要的朋友的葬礼，她催促他说：“请务必去一趟吧，别担心，你不在身边，我不会出事的。”

波琳只比约翰·桑顿多活了近一个月，但这段短暂的日子却是其生命中最为严酷的考验。她几乎无法看和说，她的神经脆弱到极点，无法忍受房间里出现的哪怕最细微的声音，甚至丈夫的呼吸对她也是种打扰。12月12日星期天，牛顿打算离家去教堂讲道。他跪在波琳的床边流泪祈祷，害怕这是最后一次看见她活着，他说：“如果你心里像我确信的那样非常平安，你就抬手示意一下，这会让我很安慰。”波琳抬起手回应他，并且摇动了几下。

这个信号令牛顿深得安慰，他离开家到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堂做礼拜。那天，他回来得略晚，波琳的语言表达能力、视力和听力都完全丧失了。没有了这些感觉能力，她拼命地喘气，开始大声呻吟。12月15日星期

三，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晚上7点45分，牛顿给家庭医生米尔曼街的贝纳莫大夫写了封信，告诉他波琳已经处于最后的弥留之际。信中说：

亲爱的医生：

今晚6点半左右情况出现变化。她的脸明显抽搐——哼叫的声音比较大，但身体和手脚并未动弹过——目前她无法表达任何信息，但她的理智清醒，这让我们越发感觉痛苦。我真希望她遭受的折磨能快点儿结束，但主有自己的时间，他的时候是最好的。

牛顿在妻子的床边守护了两个小时，他深深地知道，在生离死别之际，哀伤悲情可能会把他淹没，但他仍然惊异于自己竟然能够脱离丧妻之至痛。他在给几位密友的信中叙述了这种体验，在给杜斯博瑞的马太·保莱牧师（Matthew Powley of Dewsbury）的信中，他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是的，感谢仁慈良善的主！他使我经受这一切，他也支撑我承当这一切。”他如此描述波琳弥留时的情形：

我手里握着蜡烛，坐在一边看她，两个半小时后，我看见她呼出最后一口气。那时已经快到夜里10点了（12月15日）。我随即与当时在房间里的仆人们一起跪在床边，感谢主把她带走。而后，我回去上床休息，好好地睡了一觉。在她健康地活着时，我很少睡得这么好过。

这是约翰·牛顿在妻子逝世之后表现出的最初的精神状况，其不同寻常令许多同时代的观察者们大为惊讶，也深受震动。面对波琳的离世，悲伤的他不但需要安慰，反而立刻睡了一个好觉，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早晨，牛顿起床后便继续投入到教区事务工作中，这包括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讲道；而此时，波琳的尸身就停在家中等待下葬。牛顿的日程表中满满地安排着要探访的病人和朋友的姓名。他在一封写给威廉·布尔的信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说：

我难道会一蹶不振吗？难道会沮丧绝望吗？难道会不吃不喝吗？难道会夜不成寐吗？我难道会心神不宁、骨肉消瘦以致说不出话来吗？不，根本不会这样。主给了我力量，我很坚强。我的公共事务不会受到干扰，也许我的布道从未像那段时间那么大有能力。这都是主做的，这一切在我自己的眼里和在朋友们眼中都甚为奇妙。事实

上，某些认识我的人不会这么想，反倒会指责我冷漠无情呢。

当牛顿宣布说他将在1790年12月26日于圣玛丽伍尔诺斯举行的波琳葬礼上进行布道时，抱怨指责之声越发多了起来。会众中有些人显然认为，一个丈夫在妻子的葬礼上发表长篇大论是冷漠之举；另外一些人则害怕这场挑战太大，牛顿有可能会崩溃。许多时候，丧亲的牧师当众发言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过，牛顿的布道一开始虽然因悲伤而颤抖，但随即便成为大有能力的宣讲。托马斯·狄布汀（Thomas Dibdin）是一位年轻的见证人，他回忆说：

我记得那时我还是一个15岁左右的小伙子，跟着叔叔去朗伯德大街的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堂听著名的牛顿先生（他是诗人考珀先生的朋友）在妻子葬礼上的布道。牛顿多年以来就得了声音颤抖的毛病，他穿着那个时候的正装、戴着假发。他曾经而且一直有能力吸引会众。一开始，他的声音微弱而从容，但是随着情绪的激动，他的思想和言辞的力量似乎也在同时加强；泪水从他的脸颊滴落下来，他的行动和表情有时具有一股异乎寻常的气质……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讲解的是《哈巴谷书》3：17—18：“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

对于波琳的离世，牛顿当然不会欢欣喜乐，但他却满怀哀伤地感谢上帝对她一生的赐福。在她去世之后，他在日记和其他札记尤其是周年纪念日中，反复地表达这种感激之情。他的感恩就表现在他从《哈巴谷书》中选录的这段经文。他以前从未在布道中讲过这段文字，这种忽略是有意为之。早在25年前，牛顿就特别准备在波琳的葬礼上选取这段经文布道——“倘若我比她活得长，而且能够开口宣讲”。

尽管这场布道未被全部记录下来，但当时人们的叙述提到了它的两个主题。其中一个为牛顿对妻子的描述。他告诉前来送葬的人们，要让他说她的优点是不合适的，相反，他要诚实地提及她的缺点和毛病。这些所谓的弱点（诸如她对他过分忠心）听起来如此正面，以至于一位会众威廉·杰对此揶揄道：“倘若这就是她的主要缺点，那么她的优点是什么呢？”

牛顿把自己在波琳葬礼上的布道写进了1790年12月26日礼拜天的日记中。开头写道：“今天晚上，我为最亲爱的地上的伴侣做了葬礼布道。

如我所愿，教堂里挤满了人，但毫无匆促忙乱之嫌，人们像羊群一样专心安静地倾听。”

从牛顿的摘要中可见，其布道的主要特色就是感恩上帝赐给波琳尘世的生命，并对她的永生充满期盼。他写道：

如今，我可以发自内心地说，因您的名得的祝福，您都将成就。此刻，因您的恩典，我在地上最牢固的纽带已经断开了，但我仍愿意继续活下去。感谢您施恩使我心爱的人从死里复活，这让我的丧亲之痛得以舒解。愿她的生命是您的荣耀，也是我的安慰。愿您的恩典充满她的心，愿您引导并守护她在永恒中的生命。噢，愿您祝福她，愿您的手牵引着她。

妻子离世后，牛顿在许多信件和日记片断中写下了类似的充满感恩与祝福内容的句子。他常用两个类比来描述自己的感受。一个比喻是波琳曾是“上帝提供的贷款”，另一个比喻是波琳是使他的生命发生转折的“枢纽”。还有一个比喻相较而言更痛苦，妻子去世是“一道伤口”，需要愈合。

牛顿一向是个对生活经历中的重大纪念日予以勤勉记录的人。在日记中，他在波琳逝世周年纪念日书写感恩的颂词，特别写赞美诗纪念她。1792年12月15日，他创作的纪念性圣诗的开篇即言：

她的香膏，满有慈怜，舒缓我的疼痛，
愈合我的伤口；
喜欢多事的记忆略略一试，
又让它怦动不已，血流不息。
她何等了解每根线的温柔
它们在我心上缠绵不休；
在最深的痛处
那根尖利的刺，如何能拔出！

波琳逝世第二年的周年纪念日，牛顿写在日记中的文字表明他的伤痛依然未减，但被一种更为深邃的情感所缓解。他确信，他的丧妻之痛使他与上帝的关系更为亲密了。在表达了他希望自己不会徒然遭受痛苦后，牛顿写道：

我难道不是感觉到自己与世界相隔得更远了吗？我难道不是奔向您更为亲密地同行的目标了吗？……您让我存活下来，我本来不是像一头野牛绊在网中，就是带着一颗破裂的心沉沦沮丧。但这两年里，单单因为有您的扶持，我几乎没有哪一刻会觉得空虚无聊。

牛顿用以填补空虚时光的方式之一就是出版了一本他与波琳的通信集《与妻书》（*Letters to a Wife*, 1793）。与他从前的大多数作品不同，这本书获得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甚至那位对他不乏溢美之词的19世纪传记作者约西亚·布尔（威廉·布尔的孙子）也承认说公众对这部书信集的意见“颇不一致”，他对作者公开“那些仅凭世俗聪明就能使他小心地避开公众视线的细节”而未感到任何不妥表示不解。

事实上，对于《与妻书》因缺乏慎重会招致批评一事，牛顿早有预见。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的，他决定出版这本书信集的用意就是想感恩上帝、赞美波琳，同时形象地描述一种以上帝为中心的婚姻之圣洁。倘若还有一个额外的动机的话，那就是——再写一本畅销书。和牛顿其他的作品一样，《与妻书》也获得了成功，一连再版多次。据说大部分购买者是女性读者。牛顿的朋友、与其共同创办折衷派社团的理查德·塞西尔在一篇生动幽默的评论中责怪作者书里辑录的写给妻子的信爱意过分浓厚，必然令丈夫们大为烦恼，塞西尔写道：“夫人人们会被他（牛顿）迷住，我们无法确定是否会因为我们无法写出这么殷切动人的书信而失去夫人们的尊敬。”

用“殷切动人”一词并不能准确表达书信的风格特色以及牛顿与妻子之间关系的实质，牛顿经常用“盲目崇拜”这个贬义词表明自己的弱点——把波琳放在了一个过高的位置上。尽管任何一个客观的读者在阅读其私人日记时都会得出结论，认为牛顿对上帝的热爱远远超过他对配偶的挚爱，但牛顿自己却总是担心他把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位放错了地方。

无论牛顿在心中把波琳理想化还是偶像化，其差异都表明他对她的表情是超乎寻常的。在经历了7年的求爱和40年的婚姻之后，牛顿对波琳的爱慕中仍然洋溢着一位热恋情人的激情。某些同时代的人发现，牛顿对自己配偶的赞美之热烈令人费解，因为从一位中立的旁观者角度来看，波琳似乎在容貌和智识上都没什么突出之处。牛顿也许认为第三方很难欣赏到波琳的美好品格。1792年，他给威廉·威伯福斯的信中有一段文字涉及到爱妻，牛顿写道：“一份幸福的婚姻仿佛品尝一只菠萝，蕴藏其中的

种种感受无法言传，只能通过经验才能获得。”

也许这个菠萝比喻放在波琳身上也很合适。从表面上看，她似乎多刺且无吸引人之处，但在婚姻家庭内部，她却是一个甜蜜可人、可爱可敬的妻子。身为人妻，她得到了丈夫的赞美尊重，这个男人在她活着时真诚地爱慕她，在她离世后深切地思念她。

暮年与余响

牛顿在老年时著作甚丰且极具影响力。按照 18 世纪的标准，当时人的预期寿命大约是 45 岁左右，他却颇长寿，在 70 岁时仍然充满活力。尽管他不断地同与日俱增的衰老虚弱对抗，在日记中他多次提到他即将与（他多少是这样认为的）那位造物主相见了，然而事实证明，其生命最后的 20 年却正是他进行巡回布道、建立影响深远的友谊和写作重要书信最富有成效的阶段。

牛顿一直在圣玛丽伍尔诺斯担任教区牧师，忠心耿耿，每周日和周三早晨布道两次。因为有助理牧师的支持，他的牧养的担子减轻了不少；他也得到了特别是在夏季来访的牧师的协助。不过，他似乎从不曾有过利用这些援助去休息或者度假的想法，他通常会利用周期性的假期让出伦敦的讲台而到各地旅行，在多处讲坛上布道。

在 18 世纪 90 年代整整 10 年中，牛顿以一名巡回传道人的身份周游各地，这对于一位健康逐渐走下坡路的老人来说非同一般。每年，他都会在 7 月、8 月和 9 月赶往英格兰南部和东部，面对颠簸的旅程，他毫无难色，一天至少两次传讲福音。他对一座名叫里汀（Reading）的小城怀有特殊的感情。1797 年夏，他对此地进行一年一度的造访时，在这里陷入繁忙之中。当时该地的居民正以为再也听不到福音布道了，因为一位深受会众欢迎的福音派教区牧师 W. B. 坎东甘（Cadogan）去世了。73 岁的牛顿以令人叹服的精力填补了这段空白。在给威廉·布尔的信中，牛顿描述

了他在里汀的活动，他写道：

人们饥渴异常，主让我大有能力并且甘心奉献。时间有限，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我从不曾在一个地方如此频繁地布道，在教堂里讲了五次，在扬格先生的学校讲了两次，每天早晨在瑞先生家、每天晚上在我们某个朋友家的大房子里讲道。

牛顿的日程安排得如此繁忙令威廉·布尔大为惊讶，早在几个月以前，他就对这位老朋友的健康状况颇不乐观。布尔说：“他（指牛顿）看起来很是苍老，比我上次看到时更胖了。”不过，虽然对自己越来越糟糕的视力和日渐虚弱的身体状况了解得非常清楚，但牛顿对自己的布道活动仍然很乐观。1797年11月，他给布尔写信道：

在我这个年纪，拥有这样少见的健康和体力，我相当满足。我从不曾像现在这样自由从容地讲道。感谢主，让我像一个老人一样地做事了。我相信也盼望主能够为圣玛丽教堂赐下比从前更多的恩慈话语，带出见证，这会让健康获得双倍的功效。每周三教堂差不多都坐满了，主日的时候则会变得相当拥挤，而且，我们还有一大群人数日渐增长的渴慕寻求的年轻人。

牛顿与年轻人的关系是其产生持续影响的重要因素。通过克拉朋联盟，他与那些日见成长的年轻的福音传道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络，被他们正在引领的属灵复兴所激励。1795年，牛顿写道：

这个时代比过去好多了。许多地方都在宣讲福音；在伦敦我们已经使它广为流传；我们的许多大型城镇曾经一度落入黑暗之中，如今已然获得真光。……我无法想象在1740年一个小小的教区牧师能够作为一名福音传道人驰名全国；但今天，我们却可以如此做到，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但我相信这样的牧师不会少于400人。

牛顿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其众多追随者中的一位——约翰·坎贝尔牧师。他们经常一起进早餐，一同参加团契小组，这个团契中还包括克劳狄·布坎南（Claudius Buchanan）、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和威廉·杰。在牛顿的鼓励下，布坎南和凯里成为赴孟加拉的出色的宣教士，而杰后来则以巴斯市阿盖勒教会的福音派牧师而知名，他担任此职达62

年。这三位年轻的福音派牧师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都受到了保护和支持，正是牛顿把他们推荐给了那些颇具影响力的朋友约翰·桑顿、亨利·桑顿和威廉·威伯福斯。

威廉·杰很好地描摹了与牛顿共进早餐的气氛。他们开始做一个祷告，牛顿的祈祷具有“异常简洁却鲜明有力，对一天的情绪都有影响”的特色。饭后，牛顿喜欢抽烟斗，“以一种极为轻松、自由、丰富、愉快且具启发性的方式”开始一般性的谈话。杰这样描写身为主人的牛顿的风格：

他从不会让人感觉沉闷、阴郁或者拘谨……其性情之美好使他越发地令人愉快，时不时地爆发出活泼机智的火花，而且十分幽默……有时他也会表现出极为古怪的滑稽来。有一天，一只苍蝇停在他的隆准（鼻子）上，他伸手轰苍蝇时打了一个大喷嚏，他马上说：“现在，如果这只苍蝇写日记的话，他会说‘今天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地震’。”还有一次，我问他睡眠如何，他立刻回答说：“我像一块牛排——一翻过来就熟了。”

还有一次谈到1788年约翰·罗素（John Russell RA）为他画肖像的事，也表现了牛顿式的自嘲风格。这幅肖像画得很逼真，但绝无美化之嫌。牛顿戴着平底假发，面庞微胖，下巴宽厚，红光满面。不过，在皇家学院展出时（这是牛顿唯一一幅肖像），它却赢得了许多喝彩。最终的买主约翰·培根（John Bacon）对其颇欣赏，他认为它“在力度和效果上堪可比肩伦勃朗”。几年后，培根邀请牛顿共进晚餐，他问客人是否仍然喜欢这幅肖像画。牛顿回答说：

我想我可以证明这幅画一定和我很像，因为当时我坐在一边看见镜子里映出自己的脸。累了打呵欠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镜子里没把我那张歪脸照出来——原来那是一幅画，不是我在镜子里的脸，而我还想当然地以为那是我自己呢。

牛顿的谈话不但风趣好笑，而且充满父爱情怀，那些年轻的伙伴经常把他看作是一位属灵的父亲。25岁的克劳狄·布坎南就是这么看的，他在1791年写给母亲的信中这样谈及牛顿：“即使是我的亲生父亲，也不会比他更在意我的幸福了。牛顿先生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并且一有时间

就邀请我和他共进早餐。”

把牛顿当作父亲的布坎南在信件署名中自称是“挚爱着您的儿子”，但他还只是那位圣玛丽伍尔诺斯教会牧师通过书信进行属灵指导的众多通信人中的一位。就像使徒保罗在生命最后的几年中写信成为其事工的重要部分一样，老年的牛顿也通过书信传递最重要的信息。对那些需要获得建议的人，他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敏感。最经常得其教诲的收信人之一是康沃耳郡附近朗塞斯顿地区林肯霍恩（Linkenhorne）的J.科芬牧师（J. Coffin），牛顿给他写过68封信。在一次通信中，牛顿表现出对宗派分门别类的不以为然。他在1795年的信中写道：

我要再说一遍，要以祈祷之心读经，要贴近重点——人的邪恶、重生、救赎和圣言教导的必要。倘若一个人获得了重生，恨恶罪，信赖救赎主所赐的生命与恩典，我不在乎他是一个阿明尼乌主义者还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倘若一个人未获重生，那么他无论自称何名，他也什么都不是。

牛顿的才能就在于他经常在他的教牧书信中以凝练的句子精当地表述福音的信息。1799年，牛顿写信给威森太太（Mrs. Wathen，国王乔治三世的眼科医生的妻子），表达自己对“近乎得救的迹象”的看法：

首先要有忧伤痛悔的心。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的本性充满了骄傲，而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其次，一颗单纯正直的心会让人脱离欺哄和虚伪。那些罪得赦免的人有福了，在他的心中没有诡诈，他是全然敞开和无伤的。第三，要有温柔怜恤的性情。如果采纳了我的良药，一个像狮子一样的人也会立刻变成小羊。他不会轻易挑起争端，反而会与人和谐相处；他不会任意发怒，不会隐藏怨恨，他会活在宽恕之中，并因此在遇到任何反对者时都乐于宽恕。第四，要有仁爱、恩慈之心，并甘心努力与我们天性中的自私相对抗。第五，要有这样的心志——以平安之心开始生活，能够弃绝世界及其琐碎的诱惑，渴望借着基督与上帝交流。

牛顿是在南安普敦附近波斯伍德·格林（Portswood Green）的一间屋子里写的这封信，他把那儿看作是“第二个家”，这是他的朋友威廉·泰勒的房子。他在这儿的洗衣房召集周围乡村的村民来聚会，据说他们在当地教

会中缺乏真正的福音教导。牛顿对这种状况评论说：“唉！饥饿的羊群找吃的却没人喂养。”为了有所改善，他每年8月都去拜访泰勒一家，在他们家进行了许多场布道。他也利用波斯伍德的宁静时光整理他的书信集，在日记中写下长篇反思。1800年8月3日是个礼拜天，后来知道这是牛顿倒数第二次拜访此地，他面对“满满一屋子，我认为不下三百”的人讲解《以赛亚书》42：16。第二天是他75岁的生日，他回顾一生的生活与工作，评价道：

8月4日星期一

今天是我的生日。如今我已经76岁了。哦主，我拥有怎样的一生啊！这一生充满了多少神奇的转折啊！多少次九死一生！多少回意想不到的变化。多么明显的证据啊，过去我是那么一个内心充满虚伪与邪恶的人，而您却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忍耐与怜悯待我……

我满心羞愧地想起，在我知道您的名之后，我依然犯下那些重罪、对抗您的真光、滥用您的美好祝福。在您的眼中，我何等可鄙，您却保守我远离邪恶的罪与过犯，使我不必害怕在您的子民和世界面前暴露我自己。我卑微的名字因您的祝福，通过我的笔和我的四处服侍而为人所知。

随着牛顿的“四处服侍”而声名鹊起的诗人威廉·考珀于1800年4月离世。牛顿在他的葬礼上布道，并为他的朋友创作了一首挽歌，他在诗中盼望有一天能够在天堂里“在你的旁边求取一间住处”。在牛顿80岁的日记和书信中，这种对永恒生命的期待盼望和对地上生命的回顾反思是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在字里行间对自己的属灵生命和家庭生活充满了感恩，他心满意足地说自己“心灵平安、家庭平安、教会平安”。

在这三个祝福中，“家庭平安”来自于牛顿家庭中那令人安慰的组合。在科尔曼大街的房子中，一小群上了年纪的忠心仆人照料着他。与18世纪大多数雇主不同，牛顿把仆人当作家人来对待。他充满感情地写信告诉威廉·布尔说：

菲比日渐老迈，我担心她支撑不了多久了；克莱布哮喘很厉害，萨莉还算不错。也许一个年轻强健点儿的仆人能和他们三个加起来做得差不多，但我们彼此相爱、和睦相处，尽可能地相互分担对方的重负……我常常想，我对他们的感恩要多于他们对我的感谢，但愿除了

死亡，没什么能把我们分开。

牛顿的家庭生活令其更感安慰的还在于他的养女贝琪·卡特莱特的关爱与照顾。她叫他“爸爸”，与他一起住在科尔曼大街的房子里，牛顿说贝琪是“我老年的参谋和安慰”。但在1801年时，他对她的依赖却暂时中断了。那年她患了忧郁症，她的症状异常糟糕，不得不入院治疗了几个月，牛顿满怀忧伤地思念她。他深爱的这个女儿是他的书信读者，是他工作中最亲密的伙伴。贝琪不在身边时，牛顿身陷困境。他对一位朋友说：“我现在老眼昏花，写字很困难，无法流利地阅读自己写的字，也看不清朋友的来信，除非用浓黑的墨水把字写得大大的。”贝琪住进附近一家有名的精神病院后不久，威廉·布尔曾去探望牛顿，谈起他孤单的朋友时，威廉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会这么伤心。”

贝琪被禁闭在精神病院时，牛顿一直与她保持着接触和联系。每天早晨，他在固定的时间从家步行去医院，他站在精神病患者病房的窗边，冲那个方向摆手，然后问陪他前来的朋友或仆人是否贝琪回应他的问候了。他的眼睛无法看清远处，他只好问别人：“你看见一只白手帕左右摇摆了吗？”一旦陪伴他的人看到了挥舞的手帕，牛顿就会因为能够继续与心爱的女儿保持交流而感觉满足，然后才回家。他一直惦记着她。过了一段时间，他尝试着为贝琪提供特殊的药物治疗，他也在日记中记录了许多为她做的祈祷。其中一个祷告记录是1802年3月20日，这是1748年他在灰狗号上经历风暴、归信的第54个纪念日。他回忆了“那个充满恐惧和恩典的日子”，在日记结尾处，他写道，“我为我心爱的孩子的康复献上祈祷，但我仍然愿意从心底里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牛顿为贝琪恢复健康做的祈祷看起来得到了上帝的回应，不久之后，她就康复出院了，重新开始做姑父同时也是养父的陪护人。两年后，她嫁给了眼镜商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他的店铺就在伦敦交易所的北面。1805年5月2日，他们在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堂举办婚礼。牛顿赶来参加，用颤抖的手签名，但他实在太虚弱了，无法全程出席婚礼仪式。1804年10月，也就是8个月前，他主持最后一场婚礼时已经颇为困难尴尬了。那是威廉·布尔的儿子托马斯的婚礼，在圣路加的老街举行。牛顿不得不自始至终地坐着主持，而且在典礼仪式中多次忘词，他不止一次问来宾一个问题：“我讲到哪儿啦？”

除了日益严重的健忘，牛顿在 80 岁时差不多完全看不见了，还有些耳聋，但他仍然坚持布道。朋友们都反对他这样。1805 年 9 月，威廉·布尔与牛顿共进晚餐，他后来说：“牛顿先生非常虚弱——他上讲坛都已经很困难了，我只好用尽力气搀扶着他。”他也不免惊愕地注意到牛顿强烈声明自己仍然能够站讲坛进行出色的布道。布尔对此评价说：“看到他仍坚持随时随处讲道，每个人都摇头叹息……他的理解力正在衰退，而且这种衰退是极为真实完全的。”

另一位密友理查德·塞西尔也持同样的观点。1806 年 1 月，他鼓起勇气问牛顿：“关于公开布道，您是不是最好去思想一下做过的工作，在您确实地发现自己不再能讲话之前就停下来？”

“我不能停下来，”牛顿提高了声音说，“怎么可能！一个非洲老巫师在还能说话的时候会闭嘴不说吗？”

最终，朋友们以温和的劝阻让牛顿正视了自己的年老体衰。1806 年 10 月，他在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堂的讲坛上做了最后一次布道，内容是呼吁会众为一年前爆发的特拉法加战争（Battle of Trafalgar）中的孤儿寡妇设立一项基金。不幸的是，他的记忆力衰退到极点，他记不住要宣讲的内容；多次需要靠人提醒。在这次溃败性的布道后，人们不让他再登讲坛了。但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一些教会活动中读圣经，直到他的眼睛完全看不见，头脑也差不多完全停止活动，完全无法胜任此事为止。1806 年 12 月，约翰·牛顿名义上仍是圣玛丽伍尔诺斯的教堂牧师，他挣扎着走过其生命最后的 12 个月，他身体的机能逐渐衰退，但他的信心却从不曾减弱。

大罪人与大救主

对于一个相信耶稣的人而言，死算什么！它只是呼吸停止了而已。如果把它拟人化，也许我们应该欢迎这位信使传递的消息——我们的悲伤已经终结，永生之门在我们面前敞开。死亡、疾病、痛苦和冲突的种种预告让我们的身体经常感觉惊恐，但正是死自己使我们从这一切当中解脱出来。

上述这段话是牛顿在离世6年前写给汉娜·莫尔的，它表明他在灵里已经做好离开世界的准备了。他晚年的日记中也记录了许多祈求上帝帮助他渴有信心地面对最后时刻的祈祷：

哦，以谦卑、感恩、顺服之心面对死亡是我的心愿。但愿在那个时刻，我不会因烦躁、嫉妒或任何怨恨而败坏性情，而能够带着平安、盼望之心预备接受这种离去，倘若我当时还能说话，我愿自己用最后的气息见证您的信实与恩慈。阿们。

在生命最后的12个月里，他的身体和头脑都越来越虚弱，他祈祷让自己能够变得强壮些，但显然这种情况只会偶尔出现。在生命之旅的最后阶段，牛顿的思维就像一座发生故障但仍在运转的灯塔，在长时间的黑暗中，会突然迸发出耀眼的亮光。

1807年是牛顿在世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中，他最忠心的看护就是养女贝琪。1805年，她和丈夫约瑟夫·史密斯结婚后不久就搬进科尔曼

大街的房子，他们以感恩回报的爱心照料着牛顿。贝琪说：“照顾他真的是快乐且让人感伤的服侍。想想看，他有一颗如此温柔沉静的心灵，让人觉得为他做每件事都是合宜应该的。”

牛顿继续以同样的温柔沉静接待源源不断的来访者，尽管他已经没有多少力气和他们交谈了。那些最常来看望他的来访者中有一位是约翰·坎贝尔牧师。1807年2月10日，他写道：“牛顿先生现在只能待在床上了，他有三周没下楼了。他说，‘我从上帝的话里得安慰——我们能够从那里得到极大的安慰。’”

三个月后，坎贝尔发现牛顿的健康状况明显地恶化了，他在日记中写道：

晚上去拜访时发现他非常虚弱。我在他旁边坐了10分钟，不断地在他的耳边重复圣经的片段；但他一句话也没说，对我也没有任何反应。最后他认出我来了。和他一起祷告后，他向我表达了感谢，并握了握我的手，愿我获得所有的祝福。

有一个极大的祝福一定会让牛顿欣喜不已，如果他听说了并且能够明白的话，这个消息就是英国废除了贩奴贸易。威廉·威伯福斯的废奴议案经过20年的议会斗争，终于在1807年2月24日凌晨4时在众议院以283票对16票的绝对性优势获得通过。一个月后，议案写进了律法。3月25日，《废除贩奴贸易法案》获得王室批准。

尽管无法准确地知道牛顿对于这个重大事件的反应，但早在3年前的1804年，他就在写给威伯福斯的信中对这个时刻的到来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当时，废奴议案在议院中经历了长期的斗争，似乎已经到了胜利的边缘：

尽管我几乎看不见眼前的纸上写的是什么，但我必要因将来的成功向主表达我的感恩，也向你表达我的祝贺。迄今为止，他一直在帮助你不懈地努力争取废除奴隶贸易，我曾经将其看作是一个极重的负担，其重量足以将一个文明进步、受人尊重的国家拖入海底……我还有两个月就满80岁了，我不知能否活着看到这项工作的完成，我只知道，所有的时刻和方式都在他的手中。我相信，只要我日渐衰微的能力能够继续存留，充满希望的胜利前景会让我每一天都心满意足。

当知道废奴运动已经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时，牛顿的满足感一定可以同那位上了年纪的西面相比，当基督降生时，他是耶路撒冷圣殿中一位虔诚的敬拜者。西面曾声言：“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路加福音 2：29）。牛顿对“如今安然去世”之语的表达更通俗化，它形象地表明在他健康尚可的时候他仍保有措辞生动的天赋。他对一位来访者说：“我就像一个坐进马车准备启程的人，每个小时都充满着期待，不断地向窗外张望。”这些临别之词中最值得纪念的是威廉·杰的记录：

在最后阶段，我看望了牛顿先生。他已经不太能说话了，我想我能为他留下的记录就是这些：“我几乎忘了一切，但我仍记着两件事——我是大罪人，基督是大救主！”

杰在“最后阶段”进行告别性拜访之后不久，约翰·坎贝尔于 1807 年 12 月 14 日看望了牛顿，他写道：

今天晚上我最后一次拜访牛顿先生。他虚弱无力，较平常更甚，据说是因为感冒。他对眼前的一切没什么感觉。我问他睡眠如何？“还不错。”“牛顿先生，天堂里没有睡眠。”“在那儿我们不需要睡觉。”隔了一会儿，他补充道，“但在这儿得睡觉。”与他一同祈祷后，他伸出手握握我的手，似乎是在感谢我，但他什么也没说。

7 天后，也就是 1807 年 12 月 21 日，约翰·牛顿于晚上 8 时 15 分左右离开人世，享年 82 岁 5 个月。《泰晤士报》把他的离世当作新闻刊在了 12 月 23 日的报纸上，报道标题是醒目的一个大字——“死”，文章开篇即言：

圣玛丽伍尔诺斯和圣玛丽·伍尔彻赤·郝教堂的联合教区牧师约翰·牛顿先生在科尔曼大街的家中去世，享年 82 岁。他在此教区担任了 28 年牧师。他的一生清白无瑕，无论是作为普通人还是一位牧者，他都具有和蔼温良的性情，其著作闻名遐迩众所周知，以至于无需做任何多余的评述解释。

牛顿早在 1803 年 78 岁之际便写下了遗嘱，把他留下的一年一百多英镑的养老金分给三个仆人“作为我对他们忠心耿耿和仁慈友爱，特别是他

们在我亲爱的妻子后来长期患病之际给予的精心温和的照料的感谢”。他给两个外甥各留了 50 英镑，他们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托马西娜的儿子本杰明和亨利·尼德；送给主日学学校 50 英镑；送给贫穷虔诚牧师救济会 50 英镑；另有 20 英镑留给了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堂的教区执事。这笔可观的财产余下的部分包括肯特的房产和著作版权都归到了“我心爱的养女伊丽莎白·卡特莱特”的名下。

牛顿在遗嘱中要求自己葬在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堂的地下室，挨着妻子波琳和养女伊丽莎·坎宁安的棺木。他指示葬礼应该“尽可能地简朴，合乎礼仪即可”。12月31日，大群会众包括30多位牧师出席了这场仪式。按照当时的习俗，一周之后举行追思礼拜，由牛顿的密友理查德·塞西尔宣讲，选用的是《路加福音》12：42—43的经文：“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牛顿也许希望能够在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堂的地下室中安静地守在波琳的身边，但他无法预见到19世纪伦敦地铁的快速发展。公司管理者希望在教堂的正下方建一座新的地铁站，这样旅客就可以通过银行站进入城市了，新闻报道把它描述为“世界上唯一一座被圣化了的地铁站”。为了完成“城市与南部伦敦电气化铁路公司”的挖掘任务，棺木必须为电气化铁轨让路。1893年1月25日，约翰·牛顿牧师夫妇的遗骨被掘出，在奥尼的教堂墓地重新安葬。为了纪念这一事件，维多利亚时代的抒情诗人J. H. 斯蒂芬森（J. H. Stephenson）创作了一首纪念诗，以表达他对掘墓行动的不满和对逝世近80年的牛顿的崇高敬意：

一个陌生人的葬礼也不会这样吧
今日两樽棺木竟被掘地而出
此身的灵魂难享清静之福
实是破土之人所为

在伍尔诺斯的骨匣里经过了多少时日
妻与夫的骨灰都在地下安睡
如今那些扰人的手彼此合力
袒露死者的宁静在大厦之内

虔敬的手掌托举

约翰·牛顿安息在奥尼的荫谷

他不会忍受孤凄的抛弃

他的伴侣也一定与之一同安息

在这里他吟写神圣之歌

在这里他登坛宣讲基督

在奥尼的众人中间，他决定

只知十架与基督自己

在奥尼他必会得享安息

直到最后的号角唤死者复活

加入永远的祝福之列

金色的竖琴在空中拨响

牛顿自己很可能对那些关于金色竖琴的华丽词藻“毫不动心”，就像他肯定对《泰晤士报》在他去世时称其“一生清白无瑕”的溢美之词不以为然一样，因为他从不曾忘记，他是因着神圣的恩典，被基督从罪恶的生活中救拔出来的，他在自己撰写的墓志铭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奥尼的墓碑铭文和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堂的纪念碑文上写道：

约翰·牛顿

曾离经叛道 放荡无为

做过非洲奴隶的奴仆

蒙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

丰盛之怜悯

得保守、挽回、赦免

受命传讲

其多年意欲摧毁的真道

这份自述正与其最后的遗言——“我是大罪人，基督是大救主”相呼应，清晰地表明约翰·牛顿对上帝深挚的感恩，是上帝把他从耻辱中拯救出来，赐给他奇异的恩典。

结语：约翰·牛顿的遗响

约翰·牛顿在身后留下了持久性的影响。自他于 1807 年去世之后，200 年间，他所完成的工作及其树立的榜样在当代社会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牛顿对后世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那首著名的《奇异恩典》。21 世纪，这首圣诗传递的内容对亿万听众和歌者产生了影响，其原因在于，《奇异恩典》的歌词优美且具一种直达人心的冲击力，它们形象地表达了上帝赐予罪孽之人的浩荡恩典。要知道，牛顿 1773 年写这首圣诗是为了教导奥尼的会众，他把它当作 18 世纪的一种改革方法——自己创作赞美诗，用简明易懂的形式解释上帝真实永存的爱。牛顿从不曾设想过他为白金汉郡教区中一些花边工人和农场工人创作的圣诗竟然会唱遍五大洲，传扬两百多年，成为世界上录制、演唱和流行最多最广的歌曲。如果不是因圣经经文（《历代志上》17：16—17）的影响和个人经历的激发，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写出这些诗句。《奇异恩典》使无数听众和会众深受感动，这是因为牛顿对自己的信仰历程深有感触，因此可以说，圣诗是牛顿自我信仰历程与圣经神学的一次精当的融合。这首源自一颗亲身经历上帝恩典的心灵之歌感动了无数颗心灵。

《奇异恩典》的歌词是牛顿生命故事的外化，这首圣诗也变成了一份长久的个人见证，在 250 年里，极少有其他杰出的基督徒的见证能够与之比肩。如果牛顿活在今天，他可能会对自己的杰出卓越颇感困窘。他向来认为自己是一个大罪人，从未把自己看作是圣徒。他所犯的罪在其早年的文字中有完整的记载，尤其在他担任贩奴船船长三次远赴非洲的航海日志和日记中都有记录。这些文字内容丰富多彩，时不时地插入令人惊悚的细

节，它们以一位亲历者的参与为 18 世纪的奴隶贸易提供了一份最好的历史图景。

牛顿的航海日记也提供了一份记录，描述他早期经历的精神冲突，它们是那本畅销自传《真实的叙述》的蓝本。想到自己是因着这本书而成功的，牛顿知道他作为一个基督徒证人的真实可信既不是因其早年的邪恶也不是因其后来的美德，而只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使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牛顿身上的这种种改变是真实的，但在改变发生之前，他却必须经历争战。对其生活经历研究得越多，越能从中学到大量的经验教训。在他于 1748 年遭遇大西洋风暴面临“转折”或言归信和 1764 年开始以教区牧师身份在奥尼从事牧养工作之间的那段早期岁月，牛顿至少有四个经验可供后世借鉴：

第一个经验是任何一个初信者都可以从牛顿的生活中学到：一个罪人不可能凭单单一次归信的经历就变成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生活的属灵者，而要在归信之时便开始经历一个漫长、坚忍和英勇上进的过程。牛顿在将要沉没的灰狗号上通过祈求认识上帝之后，在其早年生活中仍然多次跌倒和犯罪。只有在他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地更新、降服，虔诚地遵行上帝的法则、律例和教导之后，他的改变才能出现真正的进展。

从牛顿经历的缓慢而痛苦的降服过程中可以学到第二个经验：没有好的导师，一个人的信仰很难获得进步。牛顿自己发现了这个问题。从 1749 年到 1754 年间，他在长途远航中一直在学习，他把大量时间投入到独自的祈祷和读经中，这种努力并未白费，但远远不够。在 1754 年 5 月结识第一位属灵导师亚历山大·科拉内船长之前，他一直像一粒落在石头地上的种子，发芽太快。在科拉内之后，还有一大群导师如塞缪尔·布鲁维、乔治·怀特菲尔德、亨利·克鲁克、亨利·维恩、威廉·格林姆肖和约翰·卫斯理，他们帮助牛顿将信心牢牢地建立、扎根在福音上。这些经历丰富的人所教导他圣经的基本原理是其信仰的基石。

牛顿提供给后世的第三个经验是：牛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他所认定的使命中。他以文字描述了自我反省的经历，这就是《有关重要问题的遐思与疑问辑录》（1758），其中对自省、阅读和探索的全面思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 21 世纪任何意欲接受圣职的候选人来说，它都会是具有实用价值的研究书籍。

只有在他相信自己已经认定上帝的呼召时，他才学到了第四个有价值

的经验：上帝的时间常常与我们的时间不一样。牛顿相信他在 1758 年就已经准备好接受圣职任命了，但他却被迫经历了 6 年的挫败、失望和遭受拒绝。值得赞赏的是，牛顿在日记中清楚地表明，在这段坎坷的时期，他从不曾对上帝的至高权威失去过信心。圣公会的各个高级教长对此事的耽延与推诿对他来说似乎相当不公平，但他们却帮助他学习去做上帝的真仆人——忍耐、克制、虔信，这远比那种拥有优先权的急躁匆忙更重要。

1764 年，牛顿到达奥尼，这是他牧养的第一个教区。他在此地进行了福音宣讲的改革并且开始对教民进行探访，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对于一位正准备接管一所新教堂的现代牧师来说，他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范例。他赢得了那些听讲圣经教导的会众的信任；通过勤勉的牧养工作，他扩大了交往范围；他开展了为教区儿童设立的特别教导事工，并为成年人建立了新的祈祷小组。在跨越宗派界限和与其他牧师、教会的协作方面，他表现出罕见的才能。他着手开展的这些艰难事工为他赢得了奥尼公众的尊重与爱戴，他成了一位深受欢迎的成功的带薪牧师。他的努力使会众人数增加了三倍（需要在教堂建造一条新的长廊），带领为数众多的人进入委身的信仰。

尽管牛顿在奥尼教会影响重大，但他在教区之外获得的名气更大。他长于写作，最先出版的是自传《真实的叙述》（1764），而后是《奥尼赞美诗》（1779），其中不但包括《奇异恩典》，还有许多其他的圣诗精品，如《耶稣之名何等甘甜》和《有荣耀的事乃指你言》。在这两部畅销书的出版之间，牛顿还写了一部颇具影响的教会史著作和三部对个人进行属灵指导的书信集。这些陆续出版的书籍使牛顿的写作成为其事工和后续影响的主要部分。

牛顿公开事奉的核心有两个个人化的力量来源——他的幸福婚姻和他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与波琳的婚姻从 1750 年起一直持续到她于 1790 年患癌症去世为止，这份婚姻是浪漫、祈祷、服侍和喜乐的结合。尽管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但牛顿夫妇通过收养弟弟和妹妹家的两个孤儿做自己的女儿和与一群朋友（特别是威廉·考珀、玛丽·尤文和威廉·布尔）建立亲密的关系而组建了一个大家庭，夫妻俩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家中的仆人也都被看作是他们的家庭成员。这个基督徒的家庭和婚姻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是杰出的典范。

牛顿与上帝的关系的秘密之处在于他的祈祷生活。他一丝不苟地记日

记，使得后人能够通过细节研究得知牛顿的祈祷如何频繁（一天至少5个小时）、为谁祈祷（有一张长长的名单）以及他的祈祷优先次序（向主感恩和谦卑自省）。他的祈祷生活的神学——赞美上帝的至高权威，努力顺服并与十字架上的基督一同受苦，以忧伤痛悔的罪人之心仰赖天父——在祈祷者与倾听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圣洁的关系。任何一个研究牛顿的祈祷生活的人都一定会从中学到许多功课，因为他在敞开心扉与上帝建立深入关系方面，是一位真诚自律并积极实践的大师。

1779年，当牛顿到伦敦做圣玛丽伍尔诺斯的教区牧师时，他已经被看作是福音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了。他因着创作更多的作品、创建社团、栽培年轻牧者尤其宣教士而提高了自己的名声与影响力。

牛顿亲自创建或辅助创建的社团有折衷派社团、英国教会传教士协会和英国圣经公会。牛顿还影响了一批颇有才能的宣教士赴海外宣教，其中包括到孟加拉的威廉·凯里和到澳大利亚的理查德·约翰逊，后者是遣送罪犯移民的第一舰队的随船牧师。

借着对朋友施加影响，牛顿在宗教、文学和政治生活领域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宗教领域，牛顿对英国圣公会的影响极为重要，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在《基督教牧者小传》（*Essays in Ecclesiastical Biography*, 1849）中对此有公正的评述，说他“是英国圣公会第二批建造者中的一位”。此类赞赏性的历史评价对牛顿来说并不为过，因为他是福音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这场运动在18世纪得到广泛的推广，21世纪的人们仍不断地从牛顿的著作和见证文章中获取灵感。

在文学领域，如果没有牛顿在1773年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止诗人威廉·考珀的自杀企图，那么考珀永远不可能写出如《职责与约翰·吉尔平的坐骑》（*The Task and John Gilpin's Ride*）这样的经典杰作。在20年的时间里，牛顿是考珀的亲密友人、属灵导师和诗集编撰者，这为考珀赢得了名气。他们也曾联手创作《奥尼赞美诗》，它在英语世界中成为最具塑造力和最畅销的圣诗集。

牛顿是一位属灵贤哲，同时也不乏世俗的智慧，这使他能够在晚年完成一个最为艰巨的任务——影响威廉·威伯福斯并支持他的废奴运动。

没有威廉·威伯福斯，废奴运动就不会取得成功；而没有约翰·牛顿，就不会有威廉·威伯福斯。这句话可以解释牛顿的政治影响。正是因着牛顿的智慧引导，才使威伯福斯顺利地通过了1785年12月那场艰难的

精神危机，当时他正在为进入教会服侍还是留在政界谋生而徘徊。正是牛顿指出身为议员的威伯福斯具有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甘心为上帝而工作的潜能，他才决定留在政界。此后，牛顿逐渐成为威伯福斯的属灵导师和事业的支持者，成为这位年轻的国会议员的有力指导，为废奴运动的发展提供最有力的公开证据，这是牛顿对后世的贡献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其重要性源于这个事实，即牛顿与威伯福斯之间的友谊奠定了1807年废奴主义者最终在人道主义和历史中赢得伟大胜利的基础。

1807年3月25日，威伯福斯的法案获得了国王的批准，牛顿在有生之年看到并经历了废除奴隶贸易的胜利。9个月后，在18世纪便得享82岁高龄的约翰·牛顿离开人世。他曾经是作家、圣诗诗人、传道者、教会领袖、有影响力的人物、废奴运动参与者。不过，尽管他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我们对其遗响的评价很难超越他自己在墓志铭中那句简单的自述，这段话如今刻写在奥尼教堂基地的墓碑上：“（约翰·牛顿）曾离经叛道，放荡无为，做过非洲奴隶的奴仆，蒙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丰盛之怜悯，得保守、挽回、赦免，受命传讲其多年意欲摧毁的真道……”这就是约翰·牛顿从蒙羞到蒙恩的生命历程简史。

参考书目

- Aitken, Jonathan, *Nixon: A Life*.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1993.
- Alleine, Joseph, *An Alarme to Unconverted Sinners*, 1671.
- Apologia Secunda: Or, A Supplementary Apology for Conformity: Two Epistles, Humbly Addressed to the Awakened Clergy by a Layman*. London: S. Bladon, 1785.
- Augustinus, Aurelius (Augustine of Hippo), *Confessions*, 397 – 398 (参见 *The Confessions of Saint Augustine*, ed. Albert C. Outler, Dallas, 1955).
- Barlass, William, *Sermons and Correspondence*. New York, 1818.
- Barrow, Isaac, *Euclidis Elementa*, 1655.
- Baxter, Richard, *A Call to the Unconverted*, 1658.
- Belmonte, Kevin, *A Hero for Humanity*. Zondervan, 2007 (revised from Nav-Press, 2002).
- Bennett, Benjamin, *The Christian Oratory: or the Devotion of the Closet Display'd*, 2 vols., 1726 – 1728.
- Berridge, John, *Works of the Rev John Berridge*, ed. Whittingham, 1838, p. 395.
- Book of Common Prayer*. London, 1662.
- Boswell, James, *Life of Johnson*, 1799, 2 vols.
- Buchanan, George, *Psalmorum Davidis Paraphrasis Poetica*, 1566.
- Bull, Josiah, *But Now I See*, Banner of Truth, 1998 (1868 年第一版名为 *John Newton of Olney and St Mary Woolnoth, An Autobiography and Narrative*, 主要依据牛顿日记和其他未公开发表的文件编辑)。
- Bunyan, John, *Come and Welcome to Jesus Christ*, 1678.
- . *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 1666.
- . *The Jerusalem Sinner Saved*, 1689.

- Burnet, Dr. David, *The Life of Sir Matthew Hale*, 1749.
- Campbell, John, *Letters and Conversational Remarks of the Rev John Newton*, 1808.
- Cecil, Richard, *The Life of John Newton*, ed. Marylynn Rouse. Christian Focus, 2000.
- Cooper, Anthony Ashley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Characteristick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3 vols., 1711.
- Dibdin, Thomas Frognall, *Reminiscences of a Literary Life*, 1836.
- Doddridge, Philip, *Some Remarkable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Colonel James Gardner*, 1747.
- .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 in the Soul*, 1745.
- Edwards, Brian, *Through Many Dangers*. Evangelical Press, 2001 (修订版).
- Edwards, Jonathan, *A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in the Conversion of Many Hundred Souls in Northampton and the Neighbouring Towns and Villages of New-Hampshire in New-England*. London, 1737.
- Ella, George Melvyn, *William Cowper: The Man of God's Stamp: A Bicentenary Evaluation, Vindication and Appreciation*, 2001.
- Excell, Edwin Othello, *Coronation Hymns*. Chicago, 1910.
- Faber, Frederick, *Jesus and Mary; or Catholic Hymns for Singing and Reading*. London: Burns, 1849.
-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the Reverend Mr Whitefield*, 1739.
- Flavel, John, *Navigation Spiritualized, or A New Compass for Seamen*, c. 1670.
- . *On the Keeping of the Heart*, 1671.
- . *The Mystery of Providence*, 1678.
- . *Gleanings from Pious Authors with a Choice Collection of Letters* (部分出自晚年的牛顿牧师之手) *and Original Poetry, by the Author of Miscellaneous Thoughts*, [by Powell, E. ?], 1824, pp. 4-5.
- Grea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33.
- Green, Thomas, *A Dissertation on Enthusiasm, Shewing the Danger of its Late Increase...* London, 1755.
- Grimshawe, Rev. T. S., *The Life and Works of William Cowper*. London, 1849.
- Hastings, Selina (Countess of Huntingdon), *A Select Collection of Hymns, to Be Universally Sung in All the Countess of Huntingdon's Chapels, Collected by Her Ladyship*. London, 1780.
- Hervey, James, *Meditations Among the Tombs*, 1746.
- Hindmarsh, Bruce, *John Newton and the English Evangelical Tra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6.
- .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It Has Sounded,” 2000年5月，在惠顿神学院

举办的美国新教赞美诗研究会上分发的未公开发表的论文。

-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mmission, XV Report, Appendix, Part 1, The Manuscripts of the Earl of Dartmouth, iii, 1896.
- Hooker, Richard, *Of 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 1593.
- Horace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Odes* (今译, 见 *The Complete "Odes" and "Epodes,"* Oxford World's Classics by Horace and David West, 2004).
- Jarvis, Rupert C., *Customs Letter-Books of the Port of Liverpool 1711 - 1813*, 1954.
- Jay, William,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Jay*, ed. George Redford and John Angell James.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74 (1854).
- Jennings, David, *Sermons Upon Various Subjects Preached to Young People on New Year's Days*, 1730: Sermon III, *The Happy Change; or, the Profit of Piety*, Philemon 10 - 11, pp. 58 - 85.
- Julian, John, ed., *A Dictionary of Hymnolog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 vols., 1957 (1907).
- Law, William, *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1728 (当代出版社如 Kessinger Publishing Co., 2005).
- Loane, Marcus L., *Oxford and the Evangelical Succession*, 1950.
- Martin, Bernard and Spurrell, Mark, *The Journal of a Slave Trader*, 1962.
- Madan, Martin, *Thelyphthora; or, A Treatise on Female Ruin*, 2 vols., 1780.
- Martin, Bernard, *John Newton*, 1950.
- Mason, John, *A Little Catechism with Little Verses and Little Sayings, for Little Children*. London, 1692.
- Memoir of the Life of Richard Phillips by His Daughter*. London, 1841.
- Milner, Joseph, *History of the Church*, 1797.
- Minutes of the Evidence Taken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Appointed for the Examination of Witnesses on the Slave Trade, Reported 21 May, 1790.*
- Newton, John, *129 Letters from the Rev John Newton to the Rev William Bull*, ed. Thomas Palmer Bull, 1847.
- . *365 days with Newton*, ed. Marylynn Rouse, Day One, 2007.
- . *A Monument... to Eliza Cunningham.*
- . *A Review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 . *Adelphi, A Sketch of the Character, and an Account of the Last Illness, of the Late Rev. John Cowper, A. M., Written by His Brother [William Cowper], Faithfully Transcribed from His Original Manuscript by John Newton*, 1802
- . *An Authentic Narrative of Some Remarkable and Interesting Particulars in the*

- Life of ***** . Communicated in a Series of Letters to the Rev Mr Haweis, Rector of Aldwinckle, Northamptonshire and by Him (at the Request of Friends) Now Made Public*, London: R Hett for J. Johnson, 1764.
- . *Apologia, Four Letters to a Minister of an Independent Church [Samuel Palm-er] by a Ministe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John Newton]*, 1784.
- . *Cardiphonia*, 1783.
- . *The Christian Correspondent*, 1790.
- . *Forty-One Letters on Religious Subjects*.
- . *Gods genade, en zyn vrymagtig albestuur, ontdekt in de zeldzame levens-gevallen... beschreven in XIV brieven...* Rotterdam, 1767.
- . *Letters to a Wife*, 2 vols., 1793.
- . *Memoirs of the Life of the Late Rev William Grimshaw*, 1799.
- . *Messiah: Fifty Expository Discourses, on the Series of Scriptural Passages, Which Form the Subject of the Celebrated Oratorio of Handel*, 2 vols., 1786.
- . *Olney Hymns in Three Books*, 1779 (Cowper & Newton Museum, 1984, 依照 1779 年伦敦出版的第一版复制本).
- . *Out of the Depths*. Kregel, 1990 (包括牛顿的《真实的叙述》再版本).
- . *Sixty-eight Letters... to a Clergyman*, ed. John Newton Coffin, 1845, 2nd edition.
- . *The Aged Pilgrim's Triumph*.
- . *The Searcher of Hearts* (关于《罗马书第八章》的系列布道文), ed. Marylynn Rouse. Christian Focus, 2000.
- . *The Works of the Rev John Newton*.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85. (参见 *Complete Works*, The John Newton Project, www. johnnewton. org).
- . *Thoughts up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1788.
- . *Twenty-Five Letters* (to Robert and Josiah Jones). Edinburgh, 1840.
- Owen, Nicholas, *Journal of a Slave Dealer—A View of Some Remarkable Axcedents in the Life of Nicholas Owen on the Coast of Africa and America from the Year 1746 to the Year 1757*, ed. Eveline Martin, 1930.
- Pearson, Hugh Nicholas,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Rev Dr Claudius Buchanan*, 1817.
- Phipps, William E, “Amazing Grace” in *John Newton, Slave-Ship Captain, Hymn-writer, and Abolitionist*.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Mercer, Georgia, USA, 2001.
- Piper, John, “Amazing Grace” in *the Lif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见 Jonathan Aitken 写的序), 2007.

- Pollock, John, *Abolition! Newton, the Ex-Slave Trader, and Wilberforce, the Little Liberator*. The Trinity Forum and Day One Publications, 2007.
- . *Newton the Liberator*. Kingsway, 2000 (1981 年第一版名为《奇异恩典》).
- . *Wilberforce*. Kingsway, 2007 (1977).
- Pratt, Josiah, ed., *The Thought of the Evangelical Leaders*. Banner of Truth, 1978 (1856 年版复制本).
- Report of the Lords of the Committee of Council appointed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all matters relating to trade and foreign plantations; submitting to His Majesty's consideration the evidence and information they have collected in consequence of His Majesty's order in council dated the 11th of February 1788, concerning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trade to Africa, and particularly the trade in slaves...*, 1789.
- Roberts, William, *Memoirs of Mrs Hannah More*, 4 vols., 1836.
- Scougal, Henry, *The Life of God in the Soul of Man*, 1677 (Christian Focus 再版, 2005).
- Scott, Thomas, *The Force of Truth: An Authentic Narrative*, 1779 (Banner of Truth 再版, 1984).
- Southey, Robert, ed., *The Works of William Cowper, Esq.*, 15 vols., 1833 - 1837.
- Stanhope, George (Dean of Canterbury), *The Christian's Pattern or a Treatise of the Imitation of Jesus Christ in Four Volumes Written Originally in Latin by Thomas à Kempis, Render'd into English. To which Are Added Meditations and Prayers for Sick Persons*, 1698.
- Stowe, Harriet Beecher, *Uncle Tom's Cabin*, 1852.
- The Christian Observer*. London, Vol. 1, January 1802.
- The Evangelical Magazine*, June 1794, Review of Religious Publications: *Letters to a Wife, by the Author of Cardiphonia*, reviewed by Richard Cecil, pp. 260 - 261.
- The Morning Chronicle*, January Saturday 26, Monday 28, Tuesday 29, 1788.
- The Times*, December 23, 1807.
- Thomas, Gilbert, *William Cowper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Ivor Nicholson and Watson, 1935.
- Trevelyan, George Macaulay,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64.
- Turner, Steve, "Amazing Grace." Lion, Oxford, 2005 (first edition HarperCollins, 2002).
- Venn, Henry, *The Life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of the late Rev Henry Venn, ed. H Venn, with a Memoir of his Life by J Venn*, 1993 (1835).
- Walker, William, *The Southern Harmony and Musical Companion*. New Haven, 1835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依照 1854 年的复制本出版, 1993 年).

Watts, Isaac, *Psalms,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1720.

Wesley, John, *The Journal of The Rev John Wesley*. Dent & Sons Ltd, London.

——. *Sermons on Several Occasions*, 4 vols. , 1771.

——. *Works*, ed. Thomas Jackson, London, 1829 - 1831.

Wilberforce, William, *A Practical View*, 1787.

——.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Edited by His Sons, Robert Isaac Wilberforce and Samuel Wilberforce*, 2 vols. , 1840.

Wilberforce, Robert Isaac, and Wilberforce, Samuel, *Life of Wilberforce*, 5 vols. , 1838.

Williams, Eric, *Capitalism and Slavery*, 1944.

Williamson, George C. , *John Russell*, RA. , London, 1893.

Williams, Gomer, *History of the Liverpool Privateers and Letters of Marque with an Account of the Slave Trade*, 1897.

Wordsworth, William, *The Prelude*, 1805.

Wheatley, Canon SW, Vicar of St Margaret's Church, Rochester, *Historical Notes*, 1992.

Wright, Thomas, *Olney Advertiser*, November 13, 1909, "Olney Man."

——. *The Life of William Cowper*, London, 1892.

特藏 (Special Collections)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MS Don e ff 50 - 51.

MS Wilberforce c. 42.

MS Wilberforce c. 49.

Bristol Baptist College:

G 97B OS Box C Letters from John Newton to John Ryland Jnr.

British Library:

Eg 3662 Letters from John Newton to William Cowper.

Add Mss 21254 - 6 Fair Minute Books.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Add 7826 Thornton Papers.

Cowper & Newton Museum:

Annotated Letters to a Wife.

Journal of Children's Meetings.

Sermon Notebooks.

Dr. Williams's Library :

Letters from John Newton to the Rev. David Jennings MS 38. 98. 46 - 57.

Guildhall Library, Corporation of London :

GL MS 7639A St Mary Woolnoth Register of Births, Marriages and Deaths.

Print and Drawings, St Mary Woolnoth.

John Rylands Library,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Some Thoughts on the Advantages and Expediency of Religious Associations, Humbly Offered to All Practical Christians (很有可能出自约翰·牛顿之手), Liverpool:

Printed by John Sadler, c. 1745 (很有可能出自于1756年).

Lambeth Palace Library :

MS 2935 Correspondence.

MS 2937 Miscellaneous Thoughts and Enquiries on an Important Subject.

MS 2941-3 Diaries.

MS 3972 Correspondence.

Lincolnshire Diocesan Record Office :

Lincoln Episcopal Register No. 39, fo. 32r/33r.

Liverpool Record Office :

Letter from John Newton to Polly.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

NMM LOG/M/46, Logbook of John Newton.

ADM/L/H/67, Lieutenant's Logbook of HMS *Harwich*, January 1743 - June 1744

(Lieut. Thomas Ruffin).

Porteus Library, London University :

AL 322 Letter from John Newton to Thomas Charle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

Hannay Collection.

John Newton Collection CO 134.

John Newton Collection CO 192.

John Newton Collection CO 199.

Newton Diaries CO199.

Public Record Office :

B239/a/33, *A Journal of the Most Material Transactions and Occurrences at*

York Fort by Mr John Newton Chief Factor There—Commencing 18th

August 1748 Ending 11 August 1749, Hudson's Bay Company.

PROB. 11/1474 Probate of Newton's Will.

Ridley Hall, Cambridge:

Letters from John Newton to John Thornton.

University Library, Birmingham University Special Collections:

CMS Acc. 81 [Venn].

West Yorkshire Archive Service:

Catalogue Ref CL Letters from John Newton to Henry Crooke; Crooke's Diaries.

缩写语的常用来源

Annotated Letters to a Wife——考珀和牛顿博物馆。牛顿晚年时在他的《与妻书》的书页空白处写下他的思考。

Bull——*But Now I See* by Josiah Bull, Banner of Truth, 1998. (1868年第一版名为 *John Newton of Olney and St Mary Woolnoth, An Autobiography and Narrative, Chiefly Compiled from His Diary and Other Unpublished Documents*). 页码索引取自旗帜出版社的版本。

C&N——Cowper & Newton Museum.

Campbell——*Letters and Conversational Remarks of the Rev John Newton* by John Campbell, 1808. 页码索引取自 1811 年版本。

Cecil——*The Life of John Newton* by Richard Cecil, ed. Marylynn Rouse, Christian Focus, 2000.

Clunie——*The Christian Correspondent* by John Newton, 1790 (Newton's letters to Captain Alexander Clunie).

Diary——约翰·牛顿未公开发表的日记。Princeton University Newton Diaries CO199; December 22, 1751 - June 5, 1756; January 1, 1773 - March 21, 1805; Lambeth Palace Library: MS 2941, Pocketbook January 1-December 31, 1767; Travel Diaries: MS 2942, 1791 - 1794; MS 2943, 1800; 1803.)

Edwards——*Through Many Dangers* by Brian Edwards, Evangelical Press, 2001.

Haweis——*Letters from John Newton to Thomas Haweis*, Princeton University, CO 199.

HMC——Historical Manuscript Commission, 15 卷报告、附录、第 1 部分, 1896 年达特茅斯伯爵的手稿第 3 卷 (包括牛顿写给达特茅斯伯爵部分信件的修订版)。

Jennings——Letters from John Newton to the Rev. David Jennings, 1750 - 1760, Dr. Williams's Library, MS 38. 98. 46 - 57.

KJV——钦定本英文圣经

Letters to a Wife——*Letters to a Wife* by John Newton, 1793; *The Works of the Rev John Newton*,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85, Vol. 5. (原书再版, 页码索引取自后一版)

LPL——伦敦兰贝斯宫图书馆

Martin——*The Journal of a Slave Trader* by Bernard Martin and Mark Spurrell, 1962.

Narrative——*Out of the Depths* by John Newton, Kregel, 1990 (包括再版的 *Newton's Authentic Narrative*, 1764).

NMM——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

Olney Hymns——考珀和牛顿博物馆, 约翰·牛顿和威廉·库珀创作的三卷《奥尼赞美诗》, 1984 年 (根据 1779 年伦敦第一版复制本)。

Pollock——*Newton the Liberator* by John Pollock, Kingsway, 2000 (1981 年第一版名为 “*Amazing Grace*”)。

PRO——凯尤 (Kew) 公共档案馆

Turner——“*Amazing Grace*” Steve Turner, Lion, 2005 (first edition, Harper Collins, 2002).

原始资料和传记注释

1 灵性培养

原始资料：

Cecil, pp. 15 - 21.

Narrative, pp. 21 - 39, 第 2 和第 3 封信。

Sermons Upon Various Subjects Preached to Young People on New Year's Days by David Jennings, 1730: 第三篇布道文“幸福的改变”或“虔诚的益处”，《腓利门书》10—11 节，pp. 58 - 85。

Olney Hymns, Book One, Hymn 41.

Psalms,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Isaac Watts, 1720: Book One, Psalm 98; Book Three, Hymn 7.

圣保罗的《腓利门书》10—11 节：“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母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

传记：

伊丽莎白·卡特莱特 (Elizabeth Catlett, 娘家姓 Churchill, 1707 - 1773)

这个伊丽莎白是伊丽莎白·牛顿的远房表妹，她们曾经就读于同一所学校。伊丽莎白于 1727 年嫁给乔治·卡特莱特，并定居在查塔姆。伊丽莎白·牛顿在她的家中去世。

大卫·詹宁斯 (David Jennings, 1691 - 1762)

詹宁斯是独立派教会牧师，他们的聚会地在威坪新楼的老石头街上。他是圣歌诗人艾萨克·沃兹的好友；牛顿的母亲伊丽莎白是其教会成员。

1725年7月26日，牛顿在此受洗。牛顿在信仰更生之后把詹宁斯看作自己属灵的父亲，经常与他通信。

托马西娜·牛顿 (Thomas Newton, 逝于1776年)

托马西娜是意大利人，牛顿的继母。据说其家族住在莫尔庄园农场，那儿是丹克瑞勋爵在艾维莱地区的贝尔胡斯房产。她与约翰·牛顿船长生养了三个孩子威廉、亨利和托马西娜。根据牛顿的说法，她在生前“除了孩子出生时，从不曾思考过信仰问题，从未到任何地方参加过礼拜”。

西蒙·斯凯特利夫 (Simon Scatliff, 逝于1668年)

西蒙是牛顿的外祖父，伦敦市保罗码头一位数学仪器制造商。他一共生养了四个孩子——约翰、西蒙、塞缪尔和牛顿的母亲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未婚时的姓氏在结婚登记处被写作“西特利夫”。斯凯特利夫家族出现过一长串制造数学仪器和科学仪器的人才。可以通过 www.scatliff.net 查看其宗谱。

2 初恋与首航

原始资料：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by Anthony Ashley Cooper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 3 vols., 1711. 牛顿深受该书第二卷《道德家：哲学狂想曲》(*The Moralists: A Philosophical Rhapsody*) 所吸引。

Narrative, pp. 29 - 39, 第2和第3封信。

The Christian Oratory; or the Devotion of the Closet Display'd by Benjamin Bennett, 2 vols., 1726 - 1728.

科弗代尔1535年翻译出版的圣经诗篇第107篇第23节以及1662年的英国国教公祷书的引文。

传记：

威廉·布莱船长 (Captain William Bligh, 1754 - 1817)

布莱曾经在一次远航中做库克船长的领航员。1785年起，布莱住在威坪宽街，它是红莱恩大街的延伸街道，牛顿6年前出生在这儿。后来在布莱船长的邦蒂号上成为叛乱首领的弗莱彻·克里斯蒂经常来宽街拜访布莱。

詹姆斯·库克 (James Cook, 1728 - 1779)

库克于1746年来到威坪。当时他是当地一位船主的学徒，1755年做

海军志愿兵。他曾经环游世界，对增强水手的健康做过贡献。牛顿从海上回家时，他好像仍在此地居住。

约瑟夫·曼内斯特 (Joseph Manesty, 逝于 1771 年)

曼内斯特是约翰·牛顿船长的朋友。他是利物浦的市镇办事员和船主，专做奴隶和食糖贸易。牛顿船长不在的时候，他对年轻的约翰一直慈爱有加。如今乐园街外面的曼内斯特巷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3 被迫服役

原始资料：

HMS *Harwich* Muster, PRO: ADM 36/1444 和 1449. HMS *Harwich*, PRO, Captain Philip Carteret's Logbook: ADM 51/3858; Lieutenant Thomas Ruffin's Logbook HMS *Harwich*, NMM: ADM/L/H/67.

Letter from Newton to Polly, January 24, 1744, LPL MS 2935, ff. 1-2.

Letters to a Wife, p. 367, August 30, 1751.

Narrative, pp. 29-39, 第 3 封信。

Pollock, pp. 43-47.

传记：

菲利普·卡特雷特 (Philip Carteret, 逝于 1748 年)

牛顿被强征入伍时，他是哈威奇号战舰舰长。他差点儿被牛顿谋杀。1794 年 (原文如此——译者注)，卡特雷特以海军少将军衔退役。

詹姆斯·米切尔 (James Mitchell)

米切尔是哈威奇号战舰舰长菲利普·卡特雷特的秘书。他曾写过 *a Journal of a Voyage to the East Indies in His Majesty's of 50 Guns and 350 Men*。

乔治·坡考克先生 (Sir George Pocock, 1706-1792)

萨瑟兰号战舰的海军准将。当时萨瑟兰号战舰是包括牛顿在其中担任海军候补少尉的哈威奇号等战舰的旗舰。坡考克于 1755 年升职为海军少将，1761 年升职为海军上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墓地有一席之地。

4 鞭笞与降职

原始资料：

Narrative, pp. 29-39, 第 3 封信。

Pollock, pp. 45 - 46.

传记：

亨利·梅德里海军上将（1687 - 1747）

梅德里自 1745 年起在地中海任总司令。牛顿舰长曾请求梅德里上将把儿子从哈威奇号战舰上解救出来，但未成功。

5 交换

原始资料：

Narrative, pp. 41 - 48, 第 4 封信。

History of the Liverpool Privateers and Letters of Marque with an Account of the Slave Trade by Gomer Williams, 1897.

6 为奴在非洲

原始资料：

Euclidis Elementa by Isaac Barrow, 1655, Book Six.

Narrative, pp. 49 - 64, 第 5 封和第 6 封信。

The Prelude by William Wordsworth, 1805 edition, Book Six, *Cambridge and the Alps*, lines 160 - 174.

7 获救灰狗号

原始资料：

Narrative, pp. 57 - 64, 第 6 封信。

传记：

斯万维克船长（Captain Swanwick）

他是灰狗号船长，因曼内斯特的请求将牛顿从塞拉利昂救离出来。

8 惹是生非与亵渎神明

原始资料：

Narrative, pp. 65 - 71, 第 7 封信。

The Christian's Pattern or a Treatise of the Imitation of Jesus Christ in Four Volumes Written Originally in Latin by Thomas à Kempis, Render'd into English. To which Are Added Meditations and Prayers

for Sick Persons, by George Stanhope, Dean of Canterbury, 1698. 最接近牛顿时代的是 1742 年的版本, 引文来自第 13 章《圣十字架的荣耀之路》, 5; 第 23 章《对死之沉思》, 2。

传记:

乔治·斯坦霍普 (George Stanhope, 1660/1 - 1728)

斯坦霍普大约在 1697 年和 1702 年分别被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任命为路易舍姆和德普特福德教区牧师。从 1704 年到 1728 年, 他是坎特伯雷教长。他整理的《效法基督》于 1698 年首次出版。

9 死荫之旅

原始资料:

Narrative, pp. 73 - 80, 第 8 封信。

Life of Johnson, James Boswell, 1799, Vol. 1, p. 403. 鲍斯威尔提到的这段有关约翰逊的叙述出自“雄鹿”号护卫舰上他的黑人仆人、理发师弗朗西斯。

Life of Johnson, James Boswell, 1820, Vol. 2, p. 573. 这段引文的背景是约翰逊错误地暗示了他自己的作品《罪人写给不幸同胞的书信》不太可能出自威廉·多德牧师之手, 后者在做完这篇布道后 (因为假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之名借债 4200 英镑) 立刻被处以绞刑。

10 船上浪子

原始资料:

Narrative, pp. 73 - 80, 第 8 封信。

11 爱情与船主

原始资料:

Letter from Newton to Mrs. Eversfield “to be left at Mr. Cadett’s,” May 24, 1748, LPL MS 2935, ff. 224 - 225.

Narrative, pp. 81 - 87, 第 9 封信。

传记:

艾文斯菲尔德姨妈 (Aunt Eversfield)

牛顿年少时不被允许与波琳接触, 他只好把信寄给她的姨妈, 请她转交。这一位也许就是苏珊娜·艾文斯菲尔德 (娘家姓丘吉尔, 波琳的母亲

未婚时的姓氏)。1725年，她在查塔姆的圣玛丽教堂与威廉结婚。牛顿在书信中曾经多次提及艾文斯菲尔德太太。

12 布朗罗号的远航

原始资料：

Bull, pp. 29 - 30.

Letter from Newton to Polly, July 29, 1748, Liverpool Record Office.

Narrative, pp. 89 - 102, 第10封和第11封信。

传记：

杰克·卡特莱特 (Jack Catlett, 1731 - 1764年)

波琳的弟弟。约翰·丘吉尔·卡特莱特在萨瑟克区圣奥雷夫大街高特先生办事处做律师。他和牛顿从一开始认识就是亲密的朋友。牛顿与他通信，希望他能改变观念。1764年，在杰克去世前不久，牛顿感觉他发生了改变。

13 书籍、肉体与灵魂之争

原始资料：

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by William Law, 1728. 还有许多现代出版物由 Kess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于 2005 年出版。

Letter from Newton to Polly, July 13, 1749, LPL MS 2935 f. 4, 伦敦兰贝斯宫。

Narrative, pp. 97 - 102, 第11封信。

Odes (三卷), by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Horace), 23 B. c.; *Odes* (第四卷), 13 B. c. 可参见现代译本, 即全本《颂诗》(*Odes*)和《抒情诗》(*Epodes*) (牛津世界经典), 贺拉斯与大卫·威斯特, 2004年。该章列举了一些复杂的尾韵和颂诗的韵律。对此的说明可以参见 http://rpo.library.utoronto.ca/display_rpo/terminology.cfm.

传记：

托马斯·亚当 (Thomas Adam, 1701 - 1804)

托马斯·亚当出生于利兹市。21岁任汉堡农庄旁边温特瑞哈姆教区牧师，他在那儿度过余生。在教牧期间，他经历了真正的信仰更生，后来，特别是通过他在1753年出版的《关于教理问答的讲章》一书对英国圣公会内部的福音影响巨大。约翰·卫斯理请教亚当关于与英国圣公会分

歧的事，亚当的回应让卫斯理回复说：“我们目前在观点上并无分歧。”

查尔斯·卫斯理 (Charles Wesley, 1707 - 1788)

查尔斯与自己的哥哥约翰经历相似。两人当中，查尔斯的圣歌创作天分更突出。他创作了 600 多首赞美诗。查尔斯很欣赏牛顿的圣歌，请牛顿在自己离世时做扶柩人之一。牛顿尊重了朋友的心愿，但当时他做得不够称职，因为当天刮着刺骨的寒风，飘起鹅毛大雪，葬礼变成了“步行式送葬”。查尔斯被葬在伦敦圣玛丽波恩教堂。

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1703 - 1791)

约翰·卫斯理由英国圣公会按立，并在牛津大学讲道。他和其他几个人在那儿创建了“圣洁会”，因其“严守规则”而著名。卫斯理深受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影响，参加过他们的一个聚会，他确认自己能够相信唯有在基督里才能获得拯救。当圣公会不再为他提供讲坛时，他就在国内巡游，站在户外讲道，并按照一种“严格”的生活方式建立了研读圣经、祈祷和聚会的团体。许多年后，它形成了如今被称作“卫理公会派”的宗派。

乔治·怀特菲尔德 (George Whitefield, 1714 - 1770)

怀特菲尔德在牛津时曾是“圣洁会”的一员，并跟随卫斯理兄弟到达佐治亚州。他多次往返美国，以巡回布道家的身份走遍整个不列颠群岛大规模传道。他的讲演才能如此出色，甚至莎士比亚戏剧演员大卫·盖里克都渴望能够效仿他。怀特菲尔德为传福音的缘故而竭尽全力，他后来对牛顿真诚地吐露说：“我声嘶力竭地喊叫，无需节制。我宁肯心甘情愿地耗尽，也不愿一言不发地锈掉。”

14 与波琳结婚

原始资料：

Annotated *Letters to a Wife*, Vol. 1, opposite p. 2 (1750 年 5 月 19 日的信)。

Historical Notes, by Canon S. W. Wheatley, vicar of St Margaret's Church, Rochester, 1992.

Letters to a Wife: 前言, p. 307; 1751 年 1 月 8 日的信, p. 343.

Narrative, pp. 97 - 109, 第 11 封和第 12 封信。

婚礼仪式取自 1662 年伦敦出版的《公祷书》。《公祷书》的全名是 *Book of Common Prayer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Sacraments and Other*

Rites and Ceremonies of the Church According to the Us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Together with the Psalter or Psalms of David Pointed as They Are to be Sung or Said in Churches and the Form or Manner of Making, Ordaining, and Consecrating of Bishops, Priests, and Deacons.

传记:

约拿单·索安 (Jonathan Soan, 1717 - 1768)

索安曾主持约翰和玛丽 (波琳)·牛顿的婚礼, 他建议两个人在每年的结婚纪念日都要实践在婚礼仪式上念诵的《公祷书》。1739年起, 他担任罗彻斯特文法学校校长, 聘金是“13 英镑 6 先令 8 便士并一座大宅和一座花园, 别无附加条件”, 1757 年他辞去该职。他还是罗彻斯特圣玛格丽特教会的教区牧师。索安可能因联姻而与卡特莱特家族有亲戚关系。

15 阿盖尔公爵号船长

原始资料:

A Journal of the Most Material Transactions and Occurrences at York Fort by Mr John Newton Chief Factor There—Commencing 18th August 1748 Ending 11 August 1749, Hudson's Bay Company. B239/a/33.

Campbell, p. 181.

Cecil, p. 65.

Journal of a Slave Dealer—A View of Some Remarkable Axcedents in the life of Nicholas Owen on the Coast of Africa and America from the Year 1746 to the Year 1757, by Nicholas Owen, ed. Eveline Martin, 1930.

Letters to a Wife: September 3, 1750, p. 331; November 21, 1750, p. 339; March 29, 1751, pp. 348 - 349; August 14, 1751, pp. 362 - 363; September 15, 1751.

Narrative, pp. 97 - 102, 第 11 封信。

NMM LOG/M/46, Newton's Logbook (由三次贩奴航行组成), pp. 1 - 62, August 11, 1750 to October 17, 1751; Martin, pp. 1 - 62.

在这次旅行中, 牛顿的阅读书目包括: *Psalmorum Daudidis Paraphrasis Poetica* by George Buchanan, 1566; other works in Latin by 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 (1466 - 1536), Casimir, 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 B. C. - 43 B. C.), Pliny (A. D. 61/62 - 113), Marcus Porcius Cato (234 B. C. - 149 B. C.), Decimus Iunius Iuvenalis (Juvenal, late first century, early second century), Titus Livius (Livy, c. 59 B. C. - A. D. 17), Gaius Julius Caesar (100 B. C. - 44 B. C.), 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Sallust, 86 - 34 B. C.), the comic playwright of the Roman Republic, Publius Terentius Afer (Terence, c. 185 or 195 B. C. - 159 B. C.), and Publius Vergilius Maro (Virgil, 70 B. C. - 19 B. C.).

传记:

约翰·坎贝尔 (John Campbell, 1766 - 1840)

坎贝尔来自爱丁堡，在牛顿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到伦敦金士兰的公理会教堂做牧师。他珍惜牛顿的友谊和建议，参加在牛顿家中为“牧师、预备牧师和后备牧师们”举办的非正式聚会。坎贝尔记录了牛顿的许多谈话，1808年，他把这些谈话记录和来往书信整理为《约翰·牛顿牧师的书信与谈话录》(*Letters and Conversational Remarks of the Rev John Newton*)一书出版。

16 非洲号首航

原始资料:

Diary, PU, December 22, 1751; November 19, 1752; February 12, 1753.

在牛顿出版的《与妻书》中有一个脚注(406 - 407页)，他有一段回忆性评论:

读者可能像我此刻一样，在了解了我所描述的这桩邪恶贸易的某些情形和那些我没提及的充满暴虐的行为之后，很想知道，在当时，身为中间商的我，在从事并推动这项事业时，会不会带着一种厌恶恐惧之情。有例可证，习俗和利润蒙蔽了我的双眼。我在懵懂愚昧中做这事，我敢肯定，此前此后，但凡我对奴隶贸易有所思考，都不会让我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尽管我的宗教观念还不算太清晰，良知也处于萌芽状态，但我仍然不敢违背内心的光照得罪上帝。实际上，当一艘奴隶船靠岸后，它会面临接连不断、数不清的危险，我那时经常——甚至现在仍会惊讶，竟然有那么多的人能够平安地离开海岸。当时，依靠着上帝的旨意，我受到异乎寻常的恩待；倘若我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行为有所了悟或者哪怕有所质疑，当我陷入

灾难和恐怖之中惊慌失措时，这种信心应该立时遭到失败。但我对这项事业的厌恶之感已经非常强烈了。在封闭的办公空间和禁闭环境中，我被迫与我的囚犯们在一起，这种感觉并不舒服；但我把它看作是上帝命定的人生轨迹，特别为我预定；我把它看作是一个我必须以忍耐和感恩之心承担的十字架，直到他愿意将我从这当中解救出来。但直到那时，我仍然只是认为自己应该以温和的态度对待、看顾那些奴隶，探讨的仍只是让他们舒适和方便的事，以及如何让整船白人和黑人获得安全。

Jennings, August 29, 1752.

Letters to a Wife: July 11, 1752, pp. 390 - 391; May 18, 1753, pp. 416 - 418; July 25, 1753, pp. 430 - 432.

Logbook, June 30, 1752 to August 29, 1753; Martin, pp. 63 - 82.

Narrative, pp. 103 - 109, 第 12 封信。

牛顿在船上的读物有：*The Life of God in the Soul of Man* by Henry Scougal, 1677, reprinted by Christian Focus, 2005; *Meditations Among the Tombs* by James Hervey, 1746; *Some Remarkable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Colonel James Gardner* by Philip Doddridge, 1747;

The Life of Sir Matthew Hale by Dr. David Burnet, 1749.

17 航海生涯结束

原始资料：

Diary, PU, October 21, 1753 - July 5, 1754.

Letters to a Wife: December 10, 1753, pp. 445 - 447; April 8, 1754, pp. 458 - 459; April 18, 1754, pp. 459 - 461; April 30, 1754, pp. 461 - 462; May 16, 1754, pp. 462 - 463; May 30, 1754, pp. 464 - 465; June 7, 1754, pp. 465 - 466; August 1754, pp. 483 - 485; August 18, 1754, pp. 485 - 487.

Logbook, October 21, 1753 to August 7, 1754; Martin pp. 83 - 96.

Narrative, pp. 103 - 117, 第 12 封和 13 封信。

The Lords of the Committee of Council 的报告指定对所有涉及贸易和国外种植园的事项要进行考虑；因为陛下于 1788 年 2 月 11 日签署的命令涉及到了与非洲的通商尤其奴隶贸易的现状，他们收集了证据和信息提交给陛下考虑……1789 年第 2 部分。

传记：

亚历山大·科拉内 (Alexander Clunie, 逝于 1770 年)

1754 年 1 月 3 日，科拉内成为塞缪尔·布鲁维的斯特普尼独立派教会中的一员，当时他写的地址是威坪波德大街（即今坦奇大街），那儿距离牛顿童年住过的红莱恩大街（即今里尔登路）只有一石之遥。牛顿在日记中写道：“愿您的祝福临到他……您以恩慈之心将您的器皿带到我身边。愿他的榜样能够激励我去照样行。”牛顿一直与科拉内保持联系，后来他把写给对方的书信整理为《基督徒书信集》出版。在其中一封书信中，他对科拉内说：“您在圣齐斯岛上的谈话对我是极大的祝福，我曾经对人和事所知甚少，但从那儿以后，我才开始有所领悟。”

18 失业、灵感与祈祷**原始资料：**

Bull, pp. 76 - 77, 81 - 82.

Customs Letter-Books of the Port of Liverpool 1711 - 1813 by Rupert C. Jarvis, 1954.

Diary, PU, 1755: March 25, 1755, June 13, 1755, June 19, 1755, July 29, 1755.

Letters to a Wife, August 20, 1755, pp. 494 - 495.

梅斯特·艾克哈特 (Meister Eckhart, 1260 - 1327)，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从反面指出：

灵魂的底里是寂暗。

在所有的创造当中，唯有宁静与上帝最相像。

Narrative, pp. 111 - 125, 第 13 封和第 14 封信。

Works by John Wesley, 第 13 卷, p. 449.

传记：

塞缪尔·布鲁维 (Samuel Brewer, 1723 - 1796)

约翰和波琳·牛顿称他为“亲爱的布鲁维先生”，他年纪轻轻就被任命为斯特普尼独立派教会牧师，这要感谢 25 位太太，她们“含泪请求”，直到一位执事收回了反驳意见。布鲁维在当时就看到“分门别类不会让教堂里坐满人”。在他牧养的最后阶段，有两三百人定期参加他的聚会礼拜。布鲁维的教堂位置如今是伦敦东区的一座农庄。

约瑟夫·巴特勒 (Joseph Butler, 1692 - 1752)

巴特勒出生在一个长老会教徒家中，但他长大后决定参加圣公会。他后来是大法官的专职牧师、罗彻斯特的带薪牧师、卡洛琳王后智囊团秘书、布里斯托主教、圣保罗学院院长，并最终成为杜伦主教。1739年，在他做布里斯托主教时，他要求约翰·卫斯理停止在其主教教区内宣教。

科劳斯通 (Croxton, 逝于 1755)

科劳斯通是利物浦的海关稽查主管。在他接受一笔遗产时，有传言说他打算辞职——“根本不顾他的任何否认之言”——牛顿语。然而，死亡突然降临。在本章中，这场意想不到的变故导致牛顿成为他的继任者。

约翰·古斯 (John Guyse, 1660 - 1761)

古斯是赫特福德独立教会牧师，住在新宽街。塞缪尔·布鲁维就是因他的讲道更新了信仰。古斯每周五在小圣海伦教堂讲道，每周二在品内大厅给零售商人讲道。牛顿在古斯眼睛快失明的时候听过他的讲道，深为古斯博士的状态所激励，因他竟然能够凭记忆准确地引用大段圣经和其他书籍内容。牛顿说：“我因此从他人身上看到应许，他们的日子如何，他们的力量便如何，那么我何必对自己过去跌倒的经历如此害怕呢？”

托马斯·布里列顿—索尔兹伯里 (Thomas Brereton-Salusbury, 逝于 1756年)

托马斯·布里列顿 1732年任利物浦市长。他在 1749年改姓索尔兹伯里。按照规定，他若要继承岳父索尔兹伯里·劳埃德在里德布鲁克的房产，必须如此。他拥有两处巨大的房产，一处是萨夫海尔庄园，一处是苏特威克庭园。他是利物浦的下院议员，当时利物浦属于切斯特管辖。

19 循道主义与物质主义

原始资料：

Bull, p. 76, 81 - 82.

Diary, PU; August 17, 1755; August 27, 1755; September 10 - 14, 1755; September 15, 1755; September 26, 1755; September 30, 1755.

“尽你所能地赚钱。尽你所能地省钱。尽你所能地捐钱。”这是卫斯理对《路加福音》16: 9“金钱的使用”进行布道总结的三点，约翰·卫斯理在多个场合的布道文中都用过这个系列中的第一部分，见第4卷，1771年。

Letters to a Wife, September 16, 1755, pp. 503 - 504; September 30, 1755, pp. 508 - 509; October 3, 1755, pp. 509 - 511.

Narrative, pp. 119 - 125, 第 14 封信。

传记：

约翰·约翰逊 (John Johnson, 1706 - 1791)

约翰逊在 1741 年被任命为利物浦贝热姆大街浸信会教堂牧师。教会发生分裂后，他带了几位会友搬到斯坦利大街，牛顿做海关稽查主管时第一次参加周日敬拜就是听他布道。当时乔治·怀特菲尔来利物浦，他建议牛顿去听听另一位浸信会牧师约翰·奥顿更具实用性的讲道。据说约翰逊的讲道有一种“在神学上吹毛求疵和挑起争端的”倾向。他的严格甚至过激的加尔文主义使其变得日益狭隘。他领导的一个小团体就是后来著名的“约翰逊派浸信会”。

约翰·奥顿 (John Oulton, 1738 - 1780)

奥顿在约翰逊正式退出贝热姆大街浸信会后成为这所教堂的牧师。牛顿认为他是一个“出色而谦卑的人”。奥顿的讲道激励了牛顿对基督的热爱。有一次讲道特别提到了《雅歌》1: 3，他宣讲道：“他的名如膏油倾倒出来，哦，耶稣的名字——它真是如油倾倒而出——但愿我活着没有别的愿望，只想把这名告诉给所有人，包括我所在的这个领地。”也许牛顿的赞美诗《耶稣之名何等甘甜》就是根据这段经文和奥顿的讲道创作的。

20 利物浦的生活

原始资料：

Bull, p. 93.

Capitalism and Slavery by Eric Williams, 1944

Confessions by Aurelius Augustinus (Augustine of Hippo), 397 - 398. Also *The Confessions of Saint Augustine*, ed. Albert C. Outler, Dallas, 1955. 引文出自：《De Ascensione》, Book One, Chapter 1, Confessions and Enchiridion; Book VIII, Chapter 12.

Diary, August 25, 1755; February 12, 1756; March 2, 1756; March 28, 1756; April 12, 1756; April 18, 1756.

Letter from John Newton to George Whitefield, January 2, 1756, LPL MS 2935 ff. 232 - 233, 伦敦兰贝斯宫图书馆

Narrative, pp. 119 – 125, 第 14 封信。

Some Thoughts on the Advantages and Expediency of Religious Associations, Humbly Offered to All Practical Christians (极有可能出自约翰·牛顿之手), Liverpool; Printed by John Sadler, c. 1745 (极有可能在 1756 年)。特藏于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Works of John Wesley, ed. Thomas Jackson, London, 1829 – 1831.

21 圣职呼召

原始资料：

Bull, p. 98.

Letter from John Newton to Henry Crooke, November 20, 1758.
West Yorkshire Archive Service, Catalogue Ref CL.

Memoirs of the Life of the Late Rev William Grimsbaw..., by John Newton, 1799, p. 8.

Miscellaneous Thoughts and Enquiries on an Important Subject by John Newton, LPL MS 2937.

Nixon: A Life by Jonathan Aitken, Regnery Publishing, 1993, pp. 27 – 28.

Sermons and Correspondence by William Barlass, New York, 1818, p. 545.

传记：

威廉·巴拉斯 (William Barlass, 逝于 1817 年)

巴拉斯出生在苏格兰的珀斯郡附近。曾在阿伯丁郡附近的非公民的苏格兰长老会 (Antiburgher Seceders) 任牧师。他在教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促使他开始与牛顿通信。巴拉斯后来移民到美国，成为纽约的一位书商和出版商。

亨利·克鲁克 (Henry Crooke, 1708 – 1770)

亨利 (哈瑞)·克鲁克出生在圣齐斯岛，在利兹市汉斯莱特/肯派克斯做副牧师，后来是那儿的教区牧师。牛顿在 1758 年接受了这位肯派克斯副牧师的建议，但却无法获得约克郡大主教的授权认可。

约翰·爱德华兹 (John Edwards, 1714 – 1785)

爱德华兹是利兹市一位不从国教教会牧师，他是第一个邀请约翰·牛顿到教堂布道的人，其结果异常糟糕。爱德华兹曾经是一位循道会传道人，在乔治·怀特菲尔德的教导下重生，但后来脱离卫理公会进入独立教会。

詹姆斯·司各特 (James Scott, 1710 - 1783)

司各特是汉克蒙德威克城独立教会牧师。他建立了一所学院，着重训练布道技巧和学术研究能力。他最突出的贡献是为英格兰北部地区输送福音派牧师。

22 第一次遭拒

原始资料:

A Dissertation on Enthusiasm, Shewing the Danger of Its Late Increase... by Thomas Green, London, 1755, p. 90.

Book of Common Prayer, London, 1662, Canons 34 and 36.

Cecil, pp. 86 - 88.

Clunie, pp. 18 - 19.

Diary of Henry Crooke, West Yorkshire Archive Service, Catalogue Ref CL.

Letter from John Newton to David Jennings, Dr. Williams's Library, MS 38. 98. 46 - 57, August 29, 1752.

Letters from John Newton to Henry Crooke, West Yorkshire Archive Service, Catalogue Ref CL: November 9, 1758; March 15, 1759.

Letters from John Newton to Polly, December 19, 1758, LPL MS 2935 f 23; December 28, 1758, LPL MS 2935 f. 24.

Letters to a Wife, December 21, 1758, p. 521.

Of 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 by Richard Hooker, 1593.

传记:

约翰·法塞特 (John Fawcett, 1740 - 1817)

法塞特在乔治·怀特菲尔德的教导下获得信仰更生。当他还是个年轻的基督徒时，他每个礼拜天步行 9 英里到哈沃什听威廉·格林姆肖布道，从中获益颇多。他后来成为赫柏登桥附近温斯盖特的浸信会牧师。牛顿的《叙述》一书中收集了他写给法塞特、又被法塞特拿给托马斯·哈维斯

看的系列书信。法塞特曾经写过一本圣经祈祷本注释和几首赞美诗，还建立了一所不信奉英国国教者学院。

本杰明·英格哈姆 (Benjamin Ingham, 1712 - 1772)

英格哈姆曾与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一同在牛津读书，是他把约翰和查尔斯介绍给乔治认识的。英格哈姆加入了莫拉维亚弟兄会，把约克郡的福尼克地区的一块土地给了他们，至今，此地仍然为莫拉维亚弟兄会所使用。1741年，他与玛格丽特女士结婚，她是哈斯汀伯爵最小的女儿。他们住在阿伯福德。英格哈姆后来离开了莫拉维亚弟兄会。

亨利·维恩 (Henry Venn, 1725 - 1797)

维恩于1754年任克拉朋的副牧师。1759年，他成为汉德斯菲尔德教堂牧师。在三年里，他看到有900人在他的牧养下获得信仰的更新。从1771年到他去世为止，他是威灵的教区牧师，但疾病使他很难尽职。他是牛顿早期基督徒牧师朋友之一。维恩的孙子亨利出版了他的书信集，他的儿子约翰出版了他的传记，其中有一段维恩提到牛顿时说“我对他的妻子去世的消息做了草率简单的回应，他却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长信给我，令我不免深感羞愧”。

23 疑虑重重

原始资料：

Bull, pp. 101, 106 - 109, 113 - 114.

Cecil, p. 215.

Clunie, pp. 8 - 14, July 30, 1762.

HMC, pp. 172 - 173; Letter from John Newton to Lord Dartmouth, May 22, 1759; Letter from Richard Chapman to John Newton, February 10, 1759; Letter from John Newton to the Bishop of Chester, April 5, 1759; Letter from the Archdeacon of Chester to John Newton, May 17, 1759.

1759年2月10日，伦敦格罗夫纳广场。我在此转达约克大主教的手令，你写给大人的多封信件，我将向你转述他的回复。大人听说你在利物浦的海关有一份差事，而且已经做了一段时间，大人认为你不妨按照上帝对你的安排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做下去。因此大人说他很抱歉无法同意你担任圣职。理查德·查普曼

Letter from John Newton to John Wesley, November 14, 1760.

Letters to a Wife, December 25, 1758, pp. 522 - 525, July 14, 1762, pp. 531 - 536.

The Journal of The Rev John Wesley, Dent & Sons Ltd, London, Vol. 2, p. 502, March 20, 1760.

传记：

约翰·吉尔伯特 (John Gilbert, 1693 - 1761)

约翰·吉尔伯特博士是约克大主教，有名的顽固强硬派。他拒绝为牛顿授圣职，且拒绝说明任何理由。波洛克提及他时，说他是“上了年纪的无所事事的吉尔伯特博士”。从吉尔伯特开始才在任职仪式上为候选人施按手礼。不过，因为他不肯为牛顿施按手授职礼，所以他被遗忘在历史中了。

爱德蒙·吉内 (Edmund Keene, 1714 - 1781)

爱德蒙·吉内博士在 1752 年至 1771 年任切斯特主教，随后任艾里主教。他是剑桥大学彼得学院院长和剑桥大学副校长。曾写过《墓园挽歌》的诗人托马斯·格雷为吉内博士写了两句略欠敬意的墓志铭：

吉内博士躺在这儿，切斯特的
好主教

他吃了一只大肥鹅，无力消化咽气了

24 《真实的叙述》

原始资料：

A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in the Conversion of Many Hundred Souls in Northampton and the Neighbouring Towns and Villages of New-Hampshire in New-England, by Jonathan Edwards, London, 1737.

*An Authentic Narrative of Some Remarkable and Interesting Particulars in the life of ***** . Communicated in a Series of Letters to the Rev Mr Haweis, Rector of Aldwinckle, Northamptonshire and by Him (at the Request of Friends) Now Made Public*, London: R. Hett for J. Johnson, 1764.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the Reverend Mr Whitefield (1739).

Haweis, 尤其是 f. 19, 21; 1763 年 1 月 7 日, 1763 年 1 月 23 日。

Hindmarsh, pp. 13 - 48.

The Force of Truth; An Authentic Narrative, Thomas Scott, 1779; reprinted by Banner of Truth, 1984.

传记:

托马斯·哈维斯 (Thmas Haweis, 1734 - 1820)

哈维斯由特鲁洛的塞缪尔·沃克带领皈信基督的。与牛顿相遇后不久,他就因对福音派教导过于热心,而被牛津圣玛丽·玛德琳教堂从副牧师职位上辞退。他后来成为伦敦洛克医院的副牧师,牧养过威廉·库珀的侄子马丁·马丹;随后又成为北安普敦郡奥德温科的教区牧师。他也是亨廷顿伯爵夫人管区的巡回传道人,并是伦敦宣教协会的创建人和坚定的支持者。

威廉·理雅各 (William Legge, 达特茅斯伯爵, 1731 - 1801)

达特茅斯伯爵二世,是殖民局大臣、商务大臣、掌玺大臣和牛津大学的事务大臣,同时还是亨廷顿伯爵夫人的朋友。牛顿到伦敦拜访他之后,给身在利物浦的妻子写信说:“亲爱的夫人,我认为我对他身边那些乘坐自己的四轮马车出行的几个人已经有所了解了,他们像约克郡的佃农那样谦卑和单纯,而且不乏爽快和幽默。”牛顿给达特茅斯伯爵写了大量书信,后来续集出版为《心声》。在许多读者当中,有一位著名人物就是汉娜·莫尔,她正是通过阅读此书改变信仰的。

25 终获任命

原始资料:

Bull, pp. 113 - 114, 121 - 122.

Haweis; f. 19, January 7, 1763; f. 24, March 19, 1763; f. 29, August 14, 1763; f. 30, September 26, 1763; f. 41, December 30, 1763; f. 44, February 7, 1764; f. 47, February 26, 1764.

Letters from Newton to Polly, LPL MS 2935; ff. 41 - 47, April 10, 1764; April 16, 1764; April 17, 1764; April 19, 1764.

Letters to a Wife, pp. 536 - 539.

Lincolnshire Diocesan Record Office, Lincoln Episcopal Register No. 39, fo. 32r/33r, 林肯郡主教档案局, 林肯主教名录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y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New York, 1964, p. 62.

传记：

约翰·格林 (John Green, 1706 - 1779)

格林博士就是因达特茅斯伯爵之请为牛顿授命圣职的主教。他在1761年至1769年间任林肯教区主教。

罗伯特·黑·德鲁蒙特 (Robert Hay Drummond, 1709 - 1776)

扎蒙特博士是达卜林子爵 (后来升为金诺尔伯爵) 的次子。他以扎蒙特的姓氏成为诺森伯兰郡的波瑟教区牧师、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带薪牧师、乔治二世专职牧师、圣亚萨教区主教、索尔兹伯里主教，后来在1761年至1776年去世时任约克郡大主教。

26 奥尼的第一印象

原始资料：

A Pilgrim's Progress by John Bunyan, 1776 edition.

Bull, pp. 123 - 124.

Clunie, pp. 22 - 24, April 30, 1764; pp. 24 - 29, June 1, 1764; pp. 37 - 44, July 1764.

Hindmarsh, pp. 173 - 183.

Letters to a Wife, April 28, 1764, p. 541.

Olney Man by Thomas Wright, *Olney Advertiser*, November 13, 1909, p. 7.

《诗篇》130: 1 (KJV): “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130: 6 “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我要说，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Twenty-Five Letters (to Robert and Josiah Jones) by John Newton, Edinburgh, 1840, pp. 66 - 67, October 12, 1765.

27 教区牧师

原始资料：

Bull: pp. 135, 137 - 138, 141, 204.

C&N, Newton's Journal of Children's Meetings: January 24, 1765; February 7, 1765, 考珀和牛顿博物馆

C&N, Newton's Sermon Notebook No. 4. Discourses on John 3: 1 - 21, No. 19, John 3: 16, 库珀和牛顿博物馆, 牛顿布道笔记第 4 篇关于《约翰福音》3: 1-21, 第 19 篇关于《约翰福音》3: 16 的论述。

Cecil, pp. 102 - 106.

Clunie: pp. 57 - 60, November 26, 1764; pp. 61 - 63, December 11, 1764; pp. 71 - 75, February 23, 1765.

Gods genade, en zyn vrymagtig albestuur, ontdekt in de zeldzame levensgevallen ... beschreven in XIV brieven... by John Newton, Rotterdam, 1767.

Hindmarsh, pp. 185, 200.

HMC, p. 175, February 11, 1765.

Sixty-eight Letters ... to a Clergyman by John Newton, ed. John Newton Coffin, (第二版), 1845, p. 134, November 10, 1795.

作品第 2 卷, p. 163, 给科林斯先生的信, 1777 年 9 月 10 日。

传记:

约翰·桑顿 (John Thornton, 1720 - 1790)

桑顿是英国央行董事、俄国公司董事, 同时是海运协会创建人之一和首席财务主管 (庚斯博罗画过他的肖像)。汉娜·威伯福斯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桑顿的妻子露西深受艾萨克·沃兹的影响, 他自己则因乔治·怀特菲尔德而改变信仰。桑顿对基督徒牧师的资助极为慷慨。他去世时, 牛顿对其评价说: “我想, 也许在欧洲没有哪个人的人生能像他这样如此令人怀念。”《绅士杂志》对此有个回应, 声称桑顿是整个欧洲最伟大的慈善家, 不过附加了一条提醒说 “除了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先生”。

约翰·迪瑞克 (John Drake, 逝于 1775)

迪瑞克在牛顿到达奥尼时是独立教会的牧师。这间教会通过艾萨克·沃兹及其传记作者托马斯·吉伯的努力而获得复兴。牛顿寻求与其建立友谊和共同服侍的关系, 并在奥尼建立了一年一度的青年事工, 当时同独立教会信徒、浸信会信徒和圣公会信徒一起为他们的年轻人联合举行了连续多天的新年事工。

摩西·布朗尼 (Moses Browne, 1704 - 1787)

牛顿被邀请到奥尼任副牧师时, 布朗尼是此地的教区牧师, 并刚刚成

为布莱克海什莫登学院的本堂牧师，但他不想放弃奥尼的薪俸，因为他有一个大家庭。令考珀印象深刻的是他竟然有“10至12个孩子”。牛顿同意布朗尼继续从60英镑的薪俸中获得20英镑，尽管他从未露过面。

28 迁居的压力：与波琳一同祈祷

原始资料：

Bull, p. 141, 155.

Letters to a Wife, pp. 541–603.

Newton's pocket diary for 1767, LPL, MS 2941.

注：约西亚·布尔指出1767年提供给牛顿的职位在剑桥郡的“康特汉姆”（Cottenham），但牛顿在日记中通常把这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写成“康丁汉姆”（Cottingham）。

29 祈祷与《教会史》

原始资料：

Bull, p. 118.

Haweis, f. 31, October 16, 1763.

Hindmarsh, p. 235, 318.

HMC, p. 189, October 25, 1768.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by Joseph Milner, Vol. 1, 1794, 前言。

The Life and Works of William Cowper by the Rev. T. S. Grimshawe, London, 1849, William Cowper to John Newton, June 13, 1783, p. 133.

Works, Vol. 1, “Forty-One Letters on Religious Subjects”: 第2封信, p. 141; 第25封信, p. 316.

Works, Vol. 3, “A Review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p. 33.

传记：

约瑟夫·米尔纳（Joseph Milner, 1744–1797）

约瑟夫·米尔纳是艾萨克的弟弟，是赫尔文法学校校长和北费瑞比的教区牧师。米尔内在《教会史》的简介中写道：“牛顿先生的历史书卷（《回顾》）早已闻名遐迩，其价值已经被虔诚和有识之士们所认可。我曾认为它

刚刚开始便已结束。但是，就像每个执行自己的写作方案的作者一样，该书的风格形式具有统一性，同样，我也在这些地方发现自己在情绪观念上与这位可敬的作者之差异，我改变了自己的认识，集中于此去理解它，尽可能地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熟读其富于启发性的《基督教会史》，它第一次向我指明了这项工作的意义。”

30 与考珀的友谊

原始资料：

Adelphi, A Sketch of the Character, and an Account of the Last Illness, of the Late Rev. John Cowper, A. M., Written by His Brother [William Cowper], Faithfully Transcribed from His Original Manuscript by John Newton, 1802.

Bull; pp. 158, 179.

Diary, LPL MS 2941; September 14 - 16, 1767; October 23, 1767.

HMC, October 24, 1767, p. 184.

Letters from John Newton to William Cowper July 14, 1767; August 16, 1767. PU, Hannay Collection, Box 9.

Letters from William Cowper to Judith Marian; July 10, 1767; September 26, 1767, June 18, 1768, C&N.

The Letters and Prose Writings of William Cowper, ed. James King and Charles Ryskamp. Oxford: 1979.

William Cowper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Gilbert Thomas, Ivor Nicholson and Watson, 1935, p. 75.

31 创造力与危机

原始资料：

Bull, pp. 172, 181 - 182, 197 - 198.

Diary, PU, January 2 - 24, 1773; April 12, 1773; May 28, 1774.

Grea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33, Vol. III, p. 481.

Letter from John Thornton to John Newton to source re snake, p. 13.

Olney Hymns, Book One, Hymns 43, 44.

Olney Hymns, Preface, pp. v - vi.

The Life of William Cowper by Thomas Wright, London, 1892.

The Stricken Deer or The Life of Cowper by David Cecil, London, 1929.

The Works of William Cowper. Esq., ed. Robert Southey. 15 volumes. 1833 - 1837.

The Works of William Cowper, ed. T. S. Grimshawe, 1849, p. 35; *Adelphi*, pp. 468, 654.

William Cowper: The Man of God's Stamp: a Bicentenary Evaluation, Vindication and Appreciation by George Melvyn Ella, 2001, pp. 23, 176.

传记:

罗伯特·骚塞 (Robert Southey, 1774 - 1883)

骚塞年仅三岁便被送到姑母家, 与那位性情“怪诞专横的”姑母同住。像考珀一样, 他进入威斯敏斯特学校读书, 但因为在学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反对鞭刑的杂文而被开除。在牛津, 他与塞缪尔·泰勒·克勒律治成为好友, 人们认为后者的《古舟子吟》的创作灵感来自牛顿的《真实的叙述》。两人各自结婚后, 两家人共同住在凯斯维克小镇的格里达庄园, 那儿距离威廉·华兹华斯的聚会地不远。沃尔特·司各特先生称骚塞为桂冠诗人 (但他本人拒绝这个称呼)。

大卫·塞西尔 (David Cecil, 1902 - 1986)

爱德华·克里斯汀·大卫·加斯科因·塞西勋爵 (名义上的称谓) 是索尔兹伯里侯爵四世的幼子。他是伦敦格雷姆学院修辞学教授, 后来任牛津大学英语文学教授, 在那儿, 他成为文学讨论小组“淡墨会” (the Inklings) 的成员, 小组其他成员还有 C. S. 路易斯和 J. R. R. 托尔金。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 - 1859)

托马斯是一个神童, 是撒迦利亚·麦考利 (废奴主义者, 威伯福斯和牛顿的朋友) 的儿子。他从律师转而成为国会议员。他在印度最高委员会工作时制订的刑法体系被认为“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法律系统规则”, 但在其他几个国家并未得到实施。在他完成主要著作《英格兰历史》之前, 他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历史学家 G. M. 特里维廉是他的重侄子。

32 《奇异恩典》

原始资料:

“Amazing Grace,” in John Newton, *Slave-Ship Captain, Hymn-*

writer, and Abolitionist by William E. Phipps,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6 - 127.

Bull, p. 138.

Cecil, pp. 89, 129 - 130, 183, 363, 365 - 368.

Diary, PU, January 1, 1773.

Hindmarsh, pp. 276 - 278.

Newton's Sermon Notebook, LPL MS 2940 ft. 1 - 4.

Olney Hymns: Preface, pp. v - xiii; Book One, Hymn 41.

The John Newton Project, www. johnnewton. org, "Amazing Grace."

Turner, pp. 111 - 118.

33 《奇异恩典》的影响

原始资料:

A Dictionary of Hymnology, ed. John Julia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 vols., 1957 (1907).

A Select Collection of Hymns, to Be Universally Sung in All the Countess of Huntingdon's Chapels, Collected by Her Ladyship (Selina Hastings, Countess of Huntingdon), London, 1780.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It Has Sounded* by Bruce Hindmarsh, unpublished paper delivered at Wheaton College for Hymnody in American Protestantism Conference, May 2000.

Coronation Hymns by Edwin Othello Excell, 1910.

Olney Hymns: Preface, pp. v-xiii; Book One, Hymn 41.

The Southern Harmony and Musical Companion by William Walker, New Haven, 1835 (a facsimile of the 1854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1993 b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Turner, pp. 145 - 191; Appendix 1, pp. 259 - 261; Appendix 2, pp. 263 - 272.

Uncle Tom's Cabin by Harriet Beecher Stowe, 1852, Chapter 38.

传记:

爱德温·奥赛罗·埃克塞尔 (Edwin Othello Excell, 1851 - 1921)

德国改革宗教会牧师的儿子，埃克塞尔像一位砖匠和泥水匠那样开始自己的服侍工作，他在芝加哥的乔治·鲁特处学习音乐，并在美国各地不断地建立成人音乐学校。他与福音派信徒山姆·琼斯合作达 20 年。埃克塞尔写了 2000 多首福音歌曲，并在芝加哥一间音乐出版社工作。

哈里特·比彻·斯托 (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

哈里特是公理会牧师莱曼·比彻的女儿。她同父亲任校长的莱恩神学院教授加尔文·埃利斯·斯托结婚，她于 1850 年在缅因州鲍登学院亦获教授之职。斯托创作过许多著作，其中一本是 1852 年出版的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她创作的大部分赞美诗被收在《普利茅斯诗集》中，1855 年由其弟亨利·沃德·比彻出版 (参见 [www. cyberhymnal. org](http://www.cyberhymnal.org))。

威廉·沃克 (William Walker, 1809–1875)

沃克搜集和整理民间歌曲。与妻弟本杰明·弗兰克林·怀特一起参与成人音乐学校和野外营会，并使用阿巴拉契亚南部民歌编曲。1835 年，搬到康涅狄格首府哈特福德市后，沃克出版了《南方歌曲和音乐手册》，但未为怀特署名，致使后者于 1844 年出版了一本与之相争的《圣琴》。两个人都使用了音符记谱法 (参见 [www. cyberhymnal. org](http://www.cyberhymnal.org))。

34 赢得友谊和影响大众

原始资料：

129 *Letters from the Rev John Newton to the Rev William Bull*, ed. Thomas Palmer Bull, 1847: December 26, 1777, p. 3; January 27, 1778, p. 6; December 24, 1780, p. 106.

Cecil, p. 269.

Diary, PU: September 23, 1773; September 13, 1777; February 13, 1779; July 24, 1779.

Edwards, p. 209.

Hindmarsh, p. 246, citing *Works of the Rev John Berridge*, ed. Whittingham, 1838, p. 395.

Jesus and Mary; or Catholic Hymns for Singing and Reading by Frederick Faber, London: Burns, 1849, p. xii.

Letter from¹ William Bull to John Newton, October 16, 1779, LPL

MS 3972 ff. 66 - 67.

Omicron by John Newton, 1774.

Works, Vol. 1, pp. 197 - 217, quoting particularly pp. 203, 209, 217.

传记：

约瑟夫·福斯特-巴哈姆 (Joseph Foster-Barham, 1729 - 1789)

继父提出条件只要使用他的姓氏巴哈姆，约瑟夫·福斯特就可以继承产业。牛顿于1773年在贝尔福德的莫拉维亚弟兄会家庭小组中与他会谈了6个小时。两人的交流颇顺利，翌日，牛顿被邀共进早餐，就像他对桑顿解释的那样，当时他“被邀在家庭小组中释经并祷告”。他们成为亲密友人。约瑟夫有四个女儿，她们多次在牛顿夫妇家中小住。福斯特-巴哈姆有时参加奥尼的祷告会，牛顿在贝尔福德逗留时也会参加“礼拜堂”的聚会。约瑟夫继承了牙买加的一处甘蔗园，名叫“美索不达米亚”。1754年，他和弟弟威廉劝说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信徒与奴隶们一同工作，向他们传讲福音。

威廉·布尔 (William Bull, 1738 - 1814)

1764年，威廉·布尔被班扬聚会处派到新港—佩格奈尔独立教会做牧师；同一年，牛顿来到奥尼。牛顿很高兴能与这位思想深刻的同行进行平等交往和对话，并鼓励他说：“我们非常欢迎您来我们这儿，如果您不辞辛苦地跑来，对我们无异于一块金币掉进了守财奴的口袋里。”约翰·桑顿在财政上支持布尔，向他保证：“您需要钱的时候，请记得我是您的银行，可以免费支取。”布尔很明白他需要随时随地免费支取的是属灵的资助，就像他从埃克斯茅斯写的家书中清晰地表达的那样——“我听说许多人在安息日从埃克塞特赶来听我布道。唉！唉！倘若他们像我这么了解我自己的话，我想他们一定会留在家里。”布尔的儿子托马斯和孙子约西亚都相继承接了他的事业，成为牧师。

约翰·班扬 (John Bunyan, 1628 - 1688)

约翰·班扬生于贝德福德的埃斯托镇，父亲是一位修补匠。他曾参加过国内战争。偶然听过一次闲谈遂改变信仰，但很快就因以不从国教教徒身份布道而入狱。在狱中，在发现圣经和“耶稣基督再没有哪个时候比此刻更真实显明了”。他写过60本著作，最有名的是《天路历程》。牛顿连续几个月在每周二晚上的祷告会用它来做教导，他经常向科拉内汇报教导进程，

如“上周二我们已经到达‘窄门’”之类。桑顿请牛顿为1776年出版的《天路历程》写了一篇序言。班扬的许多思想和观点都在牛顿自己的生活中有所体现。

托马斯·琼斯 (Thomas Jones, 1747? - 1817)

琼斯在牛津大学进行牧师培训学习期间，利用假期在奥尼接受牛顿的希腊和希伯来语辅导。圣·埃德蒙的一位导师向校长狄克逊抱怨说，琼斯和其他5名学生是“专门宣讲灵恩、重生和亲近上帝的狂热份子”。狄克逊试图为他们辩护，但副校长却以6名学生“固守卫理公会派信条，擅自祈祷、阅读和解释圣经，并在私人房间唱赞美诗”而将他们开除。在《圣詹姆斯的年鉴》中有一份补充报告说：“一位院长注意到，6位绅士因对信仰过分热心而遭开除，倘若对某些人的情况调查得再详细些会更合宜。”亨廷顿太太在琼斯获得圣职后接纳了他，他成为奥尼附近克理夫顿的副牧师。

艾萨克·米尔纳 (Isaac Milner, 1750 - 1820)

约瑟夫的弟弟，威伯福斯先生的导师，以撒后来成为剑桥女王学院院长和卡莱尔教长。1773年7月，牛顿很高兴能邀请米尔纳兄弟到自己在奥尼的牧师府度过两晚，因为“他们的博闻强识使我们的谈话丰富多彩，远超过我通常所熟知的。尽管几乎没有几个聪敏博学之士能够脱离基督而通晓所有的事，但是赞美主，他还是创造了这样的人。”米尔纳在周二晚上的祷告会面对“一大群会众”进行了一场“非常出色的布道”，宣讲《希伯来书》9:13—14。

小约翰·里兰德 (John Ryland Junior, 1753 - 1825)

老约翰·里兰德的儿子，服侍之初便在北安普敦的莱曼学院浸信会教堂做牧师父亲的副手，后来做牧师。早在十几岁时他就受牛顿之邀到奥尼的牧师府小住。他们之间建立的温暖情谊一直延续到牛顿的老年时代。里兰德在做重大决定之前都会求教牛顿的意见，比如向未婚妻求婚或者协助父亲偿还债务之类（牛顿曾明智地主张他一定要确保妻子同意他的任何安排），并在布里斯托尔的布劳德米德浸信会做牧师。他后来是布里斯托尔浸信会学院院长。

老约翰·里兰德 (John Ryland Senior, 1723 - 1792)

约翰·克莱特·里兰德是北安普敦一位精明能干、忠诚信实同时略嫌古怪偏执的传道人和牧师。人们形容他的头脑仿佛“鱼钩，能把靠近的一切都抓住并保存下来”。牛顿经常在里兰德的家中 and 教堂旁边的两所学校

里布道（他的养女在那儿的女子学校做寄宿生）。威廉·杰曾经描写过他第一次与里兰德见面：“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在我脸前挥舞着拳头，大声叫道：‘年轻人，如果你胆敢让萨里教堂的会众使你骄傲，瞧我不把你一拳打翻在地！’”说完，里兰德松开手，开始用一种温柔得近乎谄媚的语气和他说话。

托马斯·司各特（Thomas Scott, 1747 - 1821）

司各特当时是温斯特·安德伍德和雷温斯通的副牧师，那儿离奥尼很近。他的谈话情况据说都被收入到他的自述《真理的力量》中。他把手稿送给牛顿校对。6个月后，由打印稿制成的第一批底稿送印时，牛顿在日记中满怀感恩地写道：“我认为，在教导和改变罪人的心灵方面，这本书的出版是对您的恩典工作最简洁精当的阐释之一。”司各特在帮助威廉·威伯福斯坚固属灵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约翰·萨特克利夫（John Sutcliff, 1752 - 1814）

萨特克利夫17岁那年在温斯盖特的约翰·法塞特牧师（正是他促使牛顿出版了书信集《真实的叙述》）带领下改变信仰。牛顿在奥尼时参加过浸信会为萨特克利夫举行的牧师授职仪式，并对其过于偏激的加尔文主义有所削弱。萨特克利夫曾提出每月一次为福音的成功传扬祷告一小时，他后来创建了英国浸信会（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到孟加拉宣教的鞋匠威廉·凯利在奥尼的两年里曾经被萨特克利夫所牧养（牛顿当时已经离开奥尼）。

约书亚·西蒙斯（Joshua Symonds, 1739 - 1788）

西蒙斯是贝德福德班扬聚会所的牧师。他是一个腼腆的年轻人，在奥尼的浸礼会活动期间经常拜访牛顿并在牧师府小住。牛顿一直在试图帮助他克服自卑感，告诉他自己在奥尼服侍期间讲道极为干涩枯燥，只好请会众为他祷告。西蒙斯向身为英国国教徒的牛顿请教关于其（浸信会）教会的一个洗礼问题时，两人发生了争执。他们曾经多年保持通信和互访关系（但仍未能超越这个特殊问题！）

哈利·特里劳尼（Harry Trelawney, 1756 - 1834）

亨利先生又叫哈利，出生在康沃耳一个著名的英国国教徒家庭。他在威斯敏斯特学校读书，后来进入牛津大学。1776年6月，牛顿意想不到地收到了他的信，并回复了建议。9月，他又给“HT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希望能够“引导他转回先前的宗派，我认为他在那儿能获得更好的前

途”。但他的努力未能奏效。次年，牛顿在给桑顿的信中说明了实况：“我希望哈利先生能取得成功——但我仍感遗憾，他本非一名不从国教信徒，但他却已经变成了一个刻板教条的不从国教信徒了。他的改变过于迅速，这种迅速的改变往往容易导致极端。”特里劳尼不但从英国圣公会转向了长老会（他在卢港为自己建了一所教堂），不久又转回英国圣公会，并成为康沃耳郡圣埃伦教堂带薪侍奉者，随后又来了一次反转，受职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神父。

约翰·怀特福德（John Whitford, 1745 - 1782）

怀特福德在牛顿做海关稽查主管时就是利物浦循道会的传道人。牛顿的一封信让他在教义的内容上颇为挣扎。牛顿写道：“我们亲爱的主在彼得跌倒和悔改之后，他可曾问彼得——你聪明吗？你有学问吗？你能言善辩吗？不，他也没问彼得——你达到完美了吗？你精明可信吗？你属于正统吗？他只问了一句话——‘你爱我吗？’如果当年对这个问话只回答一句就足够，那么现在有何不可？……倘若彼得在信仰自白和情感上仍然还有浮夸自大的心思，那么这个问题会一再提起——‘你爱我吗？’这是圣经的先例。”两个人重新恢复来往是在1775年约翰·迪瑞克去世之后，怀特福德被任命为奥尼独立教会牧师。

汉娜·威伯福斯（Hannah Wilberforce, 1742? - 1788）

约翰·桑顿同父异母的妹妹汉娜嫁给了威廉·威伯福斯（国会议员威廉的伯父）。他们在伦敦暂时照料年少的侄儿。当牛顿途经伦敦旅行时，他会到他们在温布尔登的家中布道，布道文经常取自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牛顿当年写给汉娜及其丈夫的信件保存至今。汉娜在丈夫去世后会到奥尼与牛顿夫妇住在一起，在这儿遇到威廉·布尔，并与他成为至交。

35 卷入政治？

原始资料：

Bull, pp. 214, 219 - 220.

Diary, PU, May 31, 1775; June 6, 1775; June 11, 1775; October 1, 1775; February 17, 1776; February 25, 1776.

Hindmarsh, pp. 173 - 174.

Letter from Newton to John Thornton, December 2, 1775, Ridley

Hall.

《民数记》16: 46: “摩西对亚伦说: ‘拿你的香炉, 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 又加上香, 快快带到会众那里, 为他们赎罪。因为有忿怒从耶和华中出来, 瘟疫已经发作了。’”

Olney Hymns, Book Two, Hymn 64.

《启示录》16: 1: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 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 把盛上帝大怒的碗倒在地上。’”

36 家庭生活与健康烦恼

原始资料:

Cecil, p. 137.

Diary, PU, December 7, 1774; February 2, 1776; August 3, 1776; September 24, 26, 1776; November 19, 1776; December 3, 12, 17, 25, 26, 1776.

Letter from John Newton to Betsy Catlett, October 22, 1779, LPL, MS 2935, ff. 262 - 263.

Letter from Judith Madan to John Newton, May 13, 1773, LPL, MS 3972, f. 49.

Letters from Polly to John Newton; November 13, 1775; January 24, 1776; undated; Birmingham University Library, CMS Acc. 81. c. 65 (Venn).

Letters to a Wife, May 9, 1774, p. 583; December 26, 1775, p. 595.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Jay, ed. George Redford and John Angell James, Banner of Truth, 1974 (1854), p. 277.

37 离开奥尼

原始资料:

Bull, pp. 22, 238.

Diary, PU, November 5, 1777; September 19, 21, 1779; October 2, 1779; January 13, 1780.

Hindmarsh, pp. 219 - 220.

John Newton by Bernard Martin, 1950, p. 270.

Letter from Newton to John Thornton, November 18, 1777,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Thornton Papers, Add. 7826/1/A.

Olney Hymns, Book Two, Hymn 10, *Casting the Gospel net*, verse 5.

38 到达伦敦

原始资料:

129 *Letters*: December 7, 1779, pp. 67 - 68; January 19, 1780; May 22, 1780, p. 81; June? (undated), 1780, pp. 84 - 85; February 17, 1781, p. 110.

Bull, pp. 275 - 276.

Cecil, p. 220.

Letter from John Newton to Polly, January 22, 1780, LPL MS 2935, ff. 184 - 185.

Letters from John Newton to Thomas Charles, November 21, 1780, London University, Porteus Library, AL 322.

Letters from John Newton to William Cowper: April 1, 29, 1780, British Library, Eg 3662.

The Subject and Temper of the Gospel Ministry: Ephesians 4: 15,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Preached in the Parish Church of St Mary Woolnoth on Sunday December 19, 1779, The Day of his First Public Service in that Church, by John Newton, Rector.

Works, Vol. 6, p. 198, Letter to Joshua Symonds, March 20, 1781.

Works, Vol. 6, p. 157, Newton to William Cowper, April 29, 1780.

39 家庭、朋友和《辩护书》

原始资料:

Apologia, *Four Letters to a Minister of an Independent Church [Samuel Palmer] by a Ministe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John Newton]*, 1784, (reprinted in *Works*, Vol. 5).

Apologia Secunda; or, a Supplementary Apology for Conformity: Two Epistles, Humbly Addressed to the Awakened Clergy by a layman, London: S. Bladon, 1785.

Bull, pp. 264 – 265, 279.

Jay, p. 272.

Letter from Newton to William Cowper, March 10, 1780,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O192.

Letter from Newton to William Cowper, February 3, 1781, British Library, Eg 3662.

Letter from William Cowper to Polly, March 4, 1780, Princeton University, Hannay Collection, Bound Vol. 2.

Letter from Newton to John Ryland Junior, July 31, 1789, Bristol Baptist College.

Memoirs of Mrs Hannah More by William Roberts, 1836, Vol. 1, p. 159, Letter from Hannah More to Mrs. Boscawen, 1780; p. 258, Letter from Hannah More to her sister.

Olney Hymns, Book One, Hymn 9, “Jacob’s Ladder.”

Taylor, pp. 2 – 3, July 20, 1784; p. 16, October 28, 1785.

Thelyphthora; or, A Treatise on Female Ruin by Martin Madan, 2 vols., 1780.

Works, Vol. 5 *A Monument... to Eliza Cunningham*, pp. 101 – 125. 引自 pp. 110, 120, 122, 123.

Works, Vol. 5 (Apologia), pp. 1 – 58, 引自 pp. 46 – 47, 50 – 51, 55, 56.

40 折衷派社团与《弥赛亚》

原始资料：

Bull, pp. 167 – 169.

Campbell, pp. 63 – 74.

Cecil, p. 152.

John Newton’s Eclectic Society Notes, Cowper & Newton Museum: August 17, 1789.

Messiah; Fifty Expository Discourses, on the Series of Scriptural Passages, Which Form the Subject of the Celebrated Oratorio of Handel by John Newton, 2 vols., 1786 (reprinted in *Works*, Vol. 4).

Oxford and the Evangelical Succession by Marcus L. Loane, 1950, p. 125.

The Christian Observer, London, Vol. 1, January 1802.

The Thought of the Evangelical Leaders, ed. Josiah Pratt, Banner of Truth, 1978 (1856 年版复制本): January 22, 1798, pp. 6-8; June 24, 1799, pp. 115-120.

Works, Vol. 4 (*Messiah*), pp. 25-27, 401-402.

传记:

理查德·塞西尔 (Richard Cecil, 1748-1810)

塞西尔是贝尔福德·劳圣约翰教堂的牧师，是折衷派社团和英行差会的创建者之一。他的布道充满震撼和冲击力；他坚持宣讲，在引起会众保持注意力方面拥有异乎寻常的能力。塞西尔获得牛顿授权为其编写传记，借用他的日记和书信，与他一起检查校对草稿。塞西尔晚年得了半身不遂，非常痛苦，不得不在讲坛上坐着布道。

亨利·福斯特 (Henry Foster, 1745-1844)

福斯特在牛津大学女王学院学习。1766年，他住在奥尼牛顿的牧师府，给牛顿留下了相当美好的印象（牛顿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及他时说他是“一个谦和有礼的学生”），以至于牛顿经常请他来布道。有好几次，牛顿外出时，他代替牛顿站讲坛。福斯特曾在布利菲亚斯的圣安妮教堂做威廉·罗曼尼的助理牧师，并在朗埃克教堂做讲员多年。最后，他成为克勒肯维尔的圣詹姆斯教堂牧师。波琳和约翰都曾请福斯特在自己的葬礼上朗读圣经。

埃利·贝茨 (Eli Bates, 逝于 1812)

贝茨的父亲是乔治·萨维尔先生的一个佃户。萨维尔被他的聪慧天资所感动，承担了对他的教育并资助他。他写了几本书——《乡村哲学》、《基督徒政治》、《中国碎片》和《巴克斯特作品精选集》。他后来成为乔治·萨维尔先生的秘书，并且是折衷派社团创建者之一。牛顿到了老年，身体日渐衰微，双眼昏盲，贝茨协助在讲坛上照顾他。

查尔斯·西蒙 (Charles Simeon, 1759-1836)

西蒙在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任牧师，是一位伟大的福音派领袖。在激励学生归向信仰方面成就斐然，许多学生到海外做宣教士。西蒙是折衷派社团的一名乡村成员。他鼓励奔赴非洲和远东宣教而形成的社团后来变成

了英行差会。他也参与了圣经公会工作和向犹太人传教的事工。西蒙出钱承担 21 所教堂的牧师薪金，目的是借这些地方宣扬福音信息。牛顿在剑桥大学代西蒙讲道，并邀请他到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堂来布道。

约翰·维恩 (John Venn, 1759 - 1813)

约翰是亨利的儿子。他是圣三一克拉朋的教区牧师，威廉·威伯福斯的朋友，克拉朋联盟成员之一。他是英行差会他创建人之一，并为其起草章程。他的布道明白易懂，但一开始，他对自己担负的责任一直心存疑虑。

乔治·帕特里克 (George Patrick, 1746 - 1800)

他是牛顿童年居住的埃塞克斯地区阿维莱村牧师，喜好猎狐。他从教区一位教民的口中第一次听到牛顿的名字，决定到伦敦亲自听牛顿布道，因此使个人的信仰得到复兴。据说，当他搬到伦敦时，他有一大群会众和一大批对手。他的会众通常在 1500 名左右，远远超过伦敦其他教堂的人数。他住在克勒肯维尔的怀特尼斯·劳。

约西亚·普莱特 (Josiah Pratt, 1768 - 1844)

约西亚·普莱特就读于牛津大学。开始为塞西做牧师助理时，他还是个容易害羞和沮丧的年轻人。他的前辈建议他说：“普莱特，别灰心！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有用的人，时间一到，你就必会被使用。”他后来做牛顿的牧师助理，再后来成为科尔曼大街圣斯蒂芬教堂牧师。他是英行差会的秘书，也是英国圣经公会的创建人之一。在国会中承继威伯福斯废奴运动的继任者托马斯·福威尔-巴克斯顿 (Thomas Fowell-Buxton) 先生就是从普莱特的教导中获得激励的，于是他和妻子 (伊丽莎白·弗莱的姐姐) 退出教友派教会参加了普莱特的教会。

41 威廉·威伯福斯的导师

原始资料：

A Call to the Unconverted by Richard Baxter, 1658.

An Alarme to Unconverted Sinners by Joseph Alleine, 1671.

Come and Welcome to Jesus Christ by John Bunyan, 1678.

Confessions by John Austin.

Gleanings from Pious Authors with a Choice Collection of Letters (部分出于晚年的约翰·牛顿牧师之手) and *Original Poetry, by the Author of Mis-*

cellaneous Thoughts (by Powell, E?), 1824, pp. 4 – 5.

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 by John Bunyan, 1666.

Letter from Newton to William Cowper, Princeton University, Han-nay Collection, Box 9, January 30, 1786.

Letters from Newton to William Wilberforce, MS Wilberforce c49; December 22, 1785, f1; March 21, f4; undated, f6.

Life of Wilberforce by Robert Isaac Wilberforce and Samuel Wilberforce, 1838, Vol. 1, pp. 92 – 97, December 2, 1785.

MS Wilberforce c. 42,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MS Don e f50, Wilberforce's Diary, Bodleian Library.

MS Don e f51, Wilberforce's Diary, January 11, 12, 1786.

On the Keeping of the Heart by John Flavel, 1671.

The Jerusalem Sinner Saved by John Bunyan, 1689.

The Mystery of Providence by John Flavel, 1678.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 in the Soul by Phillip Doddridge, 1745.

Wilberforce by John Pollock, 1977, p. 32.

Navigation Spiritualized, or A New Compass for Seamen by John Flavel, c. 1670.

Letters, ed. Henry Venn, 1993, May/June 1786, p. 435.

42 与威伯福斯通信

原始资料:

Letters between John Newton and William Wilberforce, MS Wilberforce c. 49,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Newton to Wilberforce, May 18, [1786].

Newton to Wilberforce, November 1, 1786.

Newton to Wilberforce, November 15, 1786.

Newton to Wilberforce, November 1, 1787.

Newton to Wilberforce, [incomplete].

Newton to Wilberforce, July 5, 1788.

Wilberforce to Newton, September ?, 1788.

Newton to Wilberforce, December 10, 1788.

Newton to Wilberforce, June 10, 1791.

Newton to Wilberforce, September 10, 1793.

Newton to Wilberforce, June 19, 1794.

Newton to Wilberforce, March 19, 1795.

Newton to Wilberforce, October 28, 1795.

Newton to Wilberforce, July 21, 1796.

Wilberforce to Newton, [incomplete] 1797.

Newton to Wilberforce, June 7, 1797.

Life of Wilberforce, Vol. 1, October 28, 1787: “全能的上帝在我面前放下（目标）。”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for Effect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British Library, Add Mss 21254, Fair Minute Book One, October 30, 1787: “财务主管报告说他接到 Wm. 威伯福斯先生的信，他请求尽快了解奴隶贸易方面的信息。会议决定：格兰威尔·夏普、小塞缪尔·霍尔和菲利普·桑塞姆成立委员会在奴隶贸易的问题上随时与威廉·威伯福斯先生协商，一旦有消息就彼此互通。”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edited by his sons, Robert Isaac Wilberforce and Samuel Wilberforce, 1840, Vol. 1, April 21, 1797, pp. 155 - 159.

43 废奴运动参与者

原始资料：

Letters from John Newton to John Ryland, January 16, 1788, April 30, 1788, Bristol Baptist College, John Ryland letters, G 97B OS Box C.

Memoir of the Life of Richard Phillips, by his daughter, London, 1841. Letters from Newton to Richard Phillips: June 14, 1786 [8], pp. 25 - 29; July 5, 1788, pp. 29 - 32.

Minutes of the Evidence Taken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Appointed for the Examination of Witnesses on the Slave Trade, Reported 21, May 1790, pp. 137 - 148.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for Effect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Fair Minute Books 1 and 2, British Library, Add Mss 21254 - 5.

1788年1月29日决议：史密斯先生和巴克莱先生被指派去仔细考量和寻查方案以便增强委员会的能力，最终以有效的方式传播开来，这就是后来出版的题为《对非洲奴隶贸易的思考》一文，由牛顿牧师创作。

1788年2月5日（和1788年2月19日）：巴克莱先生和史密斯先生的报告上说，他们同意指示要求他们全部保留牛顿牧师先生的那本名为《对非洲奴隶贸易的思考》一书未卖出的印刷品，并预订3000册新版的印刷品。报告中还提到他们将在下周六准备好，并希望把这本大版本的书发给国会每位议员人手一本。

1788年6月24日，会议决定：财务主管有意愿为主日学协会拨款，其中574英镑是作为牛顿牧师先生《关于非洲奴隶贸易的思考》的小册子的费用。

1788年11月18日（牛顿的《思考》一书只剩下10册）：小组委员会报告指定对所有涉及贸易和国外种植园的事项要进行考虑；因为陛下于1788年2月11日签署的命令涉及了与非洲的通商尤其奴隶贸易的现状，他们收集了证据和信息提交给陛下考虑……1789年第二部分；引自牛顿先生的证词，他在歇尔布罗河流域的经历——见第一部分：奴隶们；生产——第二部分：关于把奴隶带往西印度群岛等地的证词——以及牛顿先生标注为5月23日的信，在他最后一次航海行程中，他不曾埋葬过一个白人或者黑人，这种超乎寻常的记录使他受到当权者的高看，但他对此声誉却毫不在意。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edited by his sons, Robert Isaac Wilberforce and Samuel Wilberforce, 1840, Vol. 1 Preface, p. x; December 13, 1794, p. 114.

The Morning Chronicle, Saturday, January 26, Monday January 28, Tuesday January 29, 1788.

Thoughts up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by John Newton, 1788; also in *Works*, Vol. 6, pp. 519 - 548, quoting from pp. 521 - 522, 530, 533 - 535, 548.

传记：

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1759 - 1806）

小皮特是威廉·威伯福斯的亲密朋友，年仅 24 岁便成为首相。从 1783 年起，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 1801 年，在去世之前，他又做了两年首相。在威伯福斯成为基督徒后，牛顿曾劝说他继续保持先前的友谊关系，威伯福斯与两位从前的大学朋友相联合，获得了非凡的力量。

理查德·菲利普斯 (Richard Phillips, 1756 年-?)

理查德的侄子詹姆斯是一位印刷商，在伦巴第大街旁边有一间办公室，靠近牛顿所在的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堂。这对叔侄同是 1787 年建立的“促进废除奴隶贸易协会”重要的教友派成员。理查德后来积极投入到英国圣经公会的工作中，建立了许多附属性组织，圣经公会称他为“圣经协会之父”。

威廉·杜宾 (William Dolben, 1727 - 1814)

威廉·杜宾先生是调查牛顿关于奴隶贸易听证会特别委员会主席。他主动进入一艘停泊在泰晤士河边运送奴隶的空船上亲自查看情况，所见一切令他甚为震动。他提出的关于限制奴隶数量的议案在一定范围内获得通过，这是一个虽然不大却意义深远的胜利，这就是威廉·杜宾法。

44 波琳去世

原始资料：

129 *Letters*, December 10, 1791, p. 258.

A Relation of Some Particulars, Respecting the Cause, Progress, and Close, of the Last Illness of My Late Dear Wife, Letters to a Wife, Appendix No. 1 (also in *Works*, Vol. 5), 1793, pp. 613 - 625; quoting pp. 614 - 615, 617 - 620, 622 - 623; Appendix 2, pp. 626 - 644; see also pp. 314 - 315.

Bull, p. 319.

Cecil, pp. 187 - 188.

Diary, PU: August 4, 1789; August 4, 1790; December 26, 1790; December 15, 1791; August 4, 1792; December 15, 1792; August 4, 1793.

Letter from Newton to Dr. Benamor, Princeton University, John Newton Collection, CO192.

Letter from Newton to Matthew Powley, January 28, 1791, Prince-

ton University, John Newton Collection, CO134.

Letter from Newton to William Wilberforce, January 3, 1792, MS Wilberforce c. 49, f. 38.

Reminiscences of a Literary Life by Thomas Frognall Dibdin, 1836, Vol. 1, p. 162 脚注。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Jay, Banner, 1974 (1854), p. 278.

The Evangelical Magazine, June 1794, Review of Religious Publications: *Letters to a Wife*, by the Author of *Cardiphonia*, reviewed by Richard Cecil, pp. 260 - 261.

45 暮年与余响

原始资料:

129 *Letters*; November 6, p. 293; November 1797, p. 295; October 28, 1797, pp. 289 - 297.

Bull, pp. 321, 336 - 338, 341, 346 - 347, 350, 354 - 357.

Campbell: July 18, 1795, pp. 75 - 76; October 7, 1796, pp. 92 - 97; February 10, 1796, p. 83.

Cecil, pp. 182 - 184, 362 - 364.

Diary, LPL MS 2943, August 3 - 4, ff. 9 - 11.

Diary, PU, March 20, 1802.

Edwards, p. 33.

Jay, pp. 269 - 270, 281 - 283.

John Russell, RA by George C. Williamson, London, 1893, p. 54.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Rev Dr Claudius Buchanan by Hugh Nicholas Pearson, 1817.

Letters from Claudius Buchanan to John Newton, LPL MS 3972, ff. 29 - 59.

Sixty-Eight Letters to a Clergyman, 1845, January 23, 1795, p. 94.

Twenty-Five Letters, 1840, Introduction, pp. 14 - 16.

传记:

詹姆斯·科芬 (James Coffin, 1756 - 1833)

詹姆斯和妻子是通过阅读牛顿的著作才第一次复兴个人信仰。身为教

区牧师的詹姆斯非常重视与牛顿的交往，他当时与牛顿保持了好多年书信往来。科芬夫妇的儿子出生时被命名为“约翰·牛顿·科芬”，以纪念两人的友谊，牛顿对这种纪念方式的反应是：“但愿在孩子长大成人时，牛顿之名能够像山上的灯，警醒他对抗那在我年轻时使我深陷其中的各种罪恶，（若没有奇异恩典），我应该早就在那场船舶失事中丧生了。”牛顿给这家人的信件后来被科芬的儿子以《写给牧师及其家人的书信》之名出版，一开始收录了66封信，后来增加到68封。

约翰·罗素（John Russell, 1745 - 1806）

罗素是为乔治三世画像的画家。他的绘画风格使他赢得了“色粉笔画王子”称号。他是怀特菲尔德临时聚会处的成员，1764年9月30日晚7:30分，他在素描本上做记录时改变信仰。他为牛顿绘制的彩色玻璃蚀刻画如今陈列在怀特菲尔德花园，即托特纳姆法院路已被炸毁的怀特菲尔德温泉教堂原址。牛顿的复印件由其女婿遗赠给英国宣教会。

沃尔特·泰勒（Walter Taylor）

他是三位沃尔特·泰勒中的一个，他们的家庭都与圣歌诗人艾萨克·沃兹一家是朋友，并承袭了他们在南安普敦老阿巴伍巴独立教堂里的位置。牛顿在那儿逗留时，会参加教堂早晨的活动，晚上在泰勒的洗衣店为从周围乡村赶来的几百名会众布道。泰勒是一位优秀的工程师。他发明了圆锯，是第一位用愈疮木制造出船体龙骨墩的人，并提供前所未闻的7年保质期（在特拉法加战役之前他以此装备了英国整个海军——牛顿经常收到他送来为伦敦壁炉添火的碎木料）。泰勒获得了一个绰号——“纳尔逊的工程师”。

46 大罪人与大救主

原始资料：

Bull, p. 358.

Campbell; February 10, 1807, p. 185; May 28, 1807, p. 185; December 14, pp. 186 - 187.

Cecil, pp. 165 - 166, 376 - 385.

Diary, PU, August 4, 1790.

Jay, p. 279.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by William Roberts, 1834, Vol. 3, pp. 97 - 101 (Letter from Newton to Hannah More, September 1, 1799).

Pollock, pp. 211 - 214.

Print and Drawings, Guildhall Library, St Mary Woolnoth, newspaper cutting September 1903.

Probate of Newton's Will, 1803, codicil 1804, PRO, PROB. 11/1474.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1840, Vol. 1, pp. 302 - 303, June 5, 1804.

Re-Interment of John Newton in Olney Churchyard, On Wednesday January 25th 1893 by Rev. J. H. Stephenson of Lympham, Prebendary of Wells; Lyon and Knight, Olney Market-Place, Olney, 1893.

St Mary Woolnoth Register of Births, Marriages and Deaths, Guildhall Library, Corporation of London, GL MS 7639A.

“西面颂”，拉丁语义为“安然离世”，是1662年国教晚崇拜祈祷书中的一句祷告，直接引自《路加福音》2：29—32，老迈的西面喜享长寿，有机会看到弥赛亚降临世界。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The Times obituary, December 23, 1807.

传记：

威廉·杰 (William Jay, 1769 - 1853)

威廉·杰离开石匠职业后才开始学习以求牧师之职的，16岁时他开始布道。还在少年时代，他就在自治市人满为患的萨里教堂做过系列讲道，听道的人中有牛顿的妹妹托马西娜和丈夫本杰明·尼德。在牛顿位于科尔曼大街的家中，杰经常与其他年轻牧师和传道人共进早餐、互相交流。他在巴斯市的阿盖尔教堂做了62年牧师。杰的《自传》及《当代名人回忆录》为牛顿那些朋友的生活及个性提供了一种引人入胜的观察视角。